

斯大林全集

第一卷

斯大林全集

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精裝本定價四萬元

一九五三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字數 271,000 字

印數 1—30,000 冊

書號 1397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1

1901-1907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幾點說明

一、本全集卷次、分篇等完全與俄文版同。

二、本全集有三種註釋：一爲著者註，在文中用陽文圓形註碼(○)、(◎)、(⊙)……標明，附在每頁正文的邊行，其中間亦有編者註，註末另加「編者註」字樣，以資識別，一爲俄文版編者註，在文中用六角註碼(〔 〕)、(〔 〕)、(〔 〕)……標明，附在全書正文之後，一爲譯者註，在文中用陽文圓形阿拉伯碼(①)、②、③……標明，附在每篇正文的末尾，並加「譯者註」字樣。

三、書中引文有註明出處，見某書某卷某頁或見報紙期刊某時某期者，其卷次、頁碼和期數等都是俄文版原書的卷次和頁碼；俄文報刊的日期和期數，在著者註或編者註中所引論著，有中文譯本而比較可作定本者，在俄文版卷次頁碼之後，另註中文版卷次頁碼。

四、俄文版「斯大林全集」中引證「列寧全集」的卷次用羅馬字碼標明者爲第三版，用阿拉伯字碼標明者爲第四版，因現在第三版不易見到，爲便利讀者查閱起見，凡原書有用第三版卷次和頁碼者，本書一律改爲第四版的卷次和頁碼。

五、本書「出版說明」中已經說明，書中日期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之前都依舊曆（正教曆），其後爲公曆。但文中間亦有在舊曆日期之下用括號註明另一數字者，此數字爲公曆日期。

六、本書譯文雖經多次校審，不妥之處恐所難免，希讀者指正。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本版『斯大林全集』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斯大林全集』俄文版譯出。『斯大林全集』俄文版是根據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決定、由蘇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編纂、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開始出版的。

出版說明

這部『斯大林全集』是根據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的決定出版的。

在這以前，斯大林同志的著作只有一部分出過單行本。例如，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的論文和演說，曾收集在『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書中，於一九二五年出過兩版。一九三二年印行了『論十月革命』文集，其中包括論述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論文和演說。論民族問題的著作編在『馬克思主義和民族殖民地問題』文集中，出了幾版。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間主要為說明黨內問題和粉碎各種敵視我黨的反對派集團而作的論文和演說，曾編成『論反對派』一書，於一九二八年出版。此外，還有包括約·維·斯大林論述某一問題的論文和演說的文集，例如『論列寧』、『關於烏克蘭的論文和演說』、『農民問題』、『論共產主義青年團』等等。

在各個不同時期，弗·依·列寧和約·維·斯大林的著作曾合編為幾種文集出版，如『一九一七年文選』、『論保衛社會主義祖國』、三卷本的『研究聯共（布）歷史參考文集』、一卷本的『列寧斯大林文選』、『論黨的建設』、『論社會主義競賽』、『論勞動』等等。

到目前為止，斯大林同志的文集流傳最廣的是已經出過十一版的『列寧主義問題』。這書的篇目，

每新出一版，都有相當大的變更：幾乎每版都增添了一些新的著作，同時爲保持該書原有篇幅起見，著者又刪去了其中某些著作。斯大林同志在蘇聯人民反對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的衛國戰爭時期所發表的講話、報告和命令，都收集在『論蘇聯偉大衛國戰爭』一書中，已經出了五版。

但是，約·維·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後的著作，還有許多只在當時的報紙和雜誌上發表過，以後再沒有重新印行，並且至今也沒有收集成冊。此外還保存着從未在報刊上發表過的斯大林同志的論文和書信。

這部全集是想把約·維·斯大林的著作差不多全部編輯在一起的第一次嘗試。

『斯大林全集』第一卷包括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七年四月的著作。

第二卷包括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三年的著作。

編入第三卷的是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準備時期（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的著作。其中主要是刊登在『真理報』上的論文。

編入第四卷的是蘇維埃政權成立後最初幾個月以及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時期（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〇年）的著作。

第五卷、第六卷、第七卷包括蘇維埃國家過渡到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工作時期（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的著作。第五卷包括一九二一年至弗·依·列寧逝世（一九二四年一月）這個時期的著作。編入第六卷的是一九二四年的著作。第七卷包括一九二五年的著作。

約·維·斯大林在爲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而鬥爭的時期（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的著作，編入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各卷。第八、第九兩卷包括一九二六年的論文、演說、報告和講話。第十、第十一兩卷包括一九二七年的論文、演說、報告和講話。第十二卷包括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的論文、演說、報告和講話。

第十三卷包括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的著作，這些著作主要是論述農業集體化問題和社會主義工業化進一步發展的問題。

第十四卷包括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〇年的著作，這些著作是論述蘇聯爲完成社會主義建設而進行的鬥爭，蘇聯新憲法的制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後的環境中爭取和平的鬥爭。

第十五卷的內容是約·維·斯大林著的、在一九三八年以單行本出版的『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

第十六卷包括約·維·斯大林在蘇聯偉大衛國戰爭時期的著作，即當時他在各次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周年紀念日發表的報告、講話和命令，在德國和日本戰敗和投降時發表的告人民書，以及其他文件。

編入各卷的全部著作都是按照寫作或發表的年月順次排列的。每卷都附有說明、供參考的簡註和著者的年表。日期在改用新曆以前（即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以前）按舊曆，改用新曆以後則按新曆。

斯大林同志的著作完全保持原狀，只有某些論文由著者作了很少的純屬文字上的修改。

聯共（布）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

第一卷說明

編入『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的是著者從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七年四月主要在梯弗里斯進行革命活動時期的著作。

在這幾年中，布爾什維克在弗·依·列寧領導下逐漸奠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黨及其思想體系和組織原則的基礎。

這個時期，斯大林同志在與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派別和機會主義派別作鬥爭中，在南高加索建立了列寧火星派即布爾什維克的組織，並領導了這些組織的活動。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論證並捍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的基本原則。

編入第一卷的約·維·斯大林的著作，只有一小部分用俄文印行過，大部分曾刊登在格魯吉亞文的報紙上並出過格魯吉亞文的單行本。這些著作大部分是第一次用俄文印行的。

俄國社會民主黨高加索聯盟委員會的檔案和南高加索布爾什維克組織所出版的某些載有約·維·斯大林著作的刊物，至今尚未找到。例如，『工人馬克思主義小組學習大綱』（一八九八年）和『信條』（一九〇四年）等著作就是如此。

本版第一卷並未包括約·維·斯大林從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七年四月的全部著作。

聯共（布）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

著者第一卷序言

編入全集第一卷的著作是著者在活動初期（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七年）寫的，當時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和政策尚未完全形成。這種情況也多少反映到全集第二卷。

爲了理解和恰當地評價這些著作，應該把它們看做一個年輕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一個還沒有完全成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著作。因此，這些著作中自然還留下老一輩馬克思主義者某些後來顯得陳舊了的論點的痕跡，這些論點以後都被我黨糾正了。我指的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土地綱領問題，一個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條件問題。

從第一卷裏（見『土地問題』三文）可以看出，當時著者主張把地主的土地分歸農民所有。在我黨統一代表大會^①上討論土地問題時，大多數做實際工作的布爾什維克代表贊成分配土地的觀點，大多數孟什維克代表主張土地私有^②，而列寧和其餘一部分布爾什維克代表則主張土地國有；在這三個草案的鬥爭過程中，當土地國有的草案顯然沒有希望被代表大會通過時，列寧及其他主張土地國有的人就在代表大會上贊成分配土地的草案。

主張分配土地的人提出了三個理由反對土地國有：（甲）農民不會贊成把地主的土地收歸國有，

因為他們想把這些土地歸爲己有，（乙）農民將反對土地國有，因為他們會把土地國有看成廢除當時已歸農民所有的那些土地的私有權的一種措施，（丙）即使能够說服反對土地國有的農民，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仍然不應當主張土地國有，因為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之後，俄國不會是社會主義的國家而會是資產階級的國家，假使大量的收歸國有的土地掌握在資產階級國家手中，那就會過分加強資產階級的力量而損害無產階級的利益。

當時主張分配土地的人依據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布爾什維克也在內）所公認的前提：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以後，會有一個相當長的革命中斷時期，即勝利了的資產階級革命和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間歇時期。在此期間，資本主義將有可能更自由更蓬勃地發展起來，而且擴展到農業方面去，階級鬥爭將更加深入而極其廣泛地展開，無產階級在數量上將增長起來，無產階級的覺悟性和組織性將提到應有的高度，並且只有具備了這一切條件，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才會到來。

應該指出，兩種革命之間會有長期間歇這一前提，在代表大會上並沒有遭到任何方面的任何反對，當時無論是主張土地國有的人和主張分配土地的人，或主張土地市有的人，都認爲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土地綱領應促使俄國資本主義更蓬勃地向前發展。

我們這些做實際工作的布爾什維克是否知道列寧當時主張俄國由資產階級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主張不間斷的革命呢？是的，知道的。這是從他的小冊子「兩個策略」（一九〇五年）和一九〇五年的著名論文「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裏面知道的，在那裏他說：「我們主張不間斷的革命」

命」，「我們決不半途而廢」。但是我們做實際工作的人並沒有好好鑽研這個問題，沒有了解它的偉大意義，這是由於我們的理論修養不夠，也是由於我們犯了做實際工作的人不關心理論問題的通病。大家記得，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列寧在當時沒有發揮由資產階級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這個理論的論據，沒有在代表大會上運用這些論據來論證土地國有的主張。他當時沒有運用這些論據，是不是他認為問題尚未成熟，而且沒有指望出席代表大會的大多數做實際工作的布爾什維克能了解和接受由資產階級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呢？

只是過了些時候，當列寧關於俄國由資產階級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已經成為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路線時，黨內在土地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才消除了；因為當時已很明顯，在俄國這樣的國家裏，特殊的發展條件已經給由資產階級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奠定了基礎，所以馬克思主義的黨除了土地國有的綱領而外，是不能有任何土地綱領的。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問題。從第一卷裏（見「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可以看出，著者當時所持的是馬克思主義者都熟悉的論點：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主要條件之一是要無產階級佔人口的多數，因此在資本主義不夠發達因而無產階級還沒有佔人口的多數的國家裏，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這個論點，當時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包括布爾什維克）中間，同樣在其他各國社會民主黨中間，是大家公認的。然而歐美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帝國主義之前的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時期的資本

主義的過渡，以及列寧所發現的各國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規律，——這一切都表明：這個論點已不適合新的發展情況，在資本主義還沒有達到發展的最高點、無產階級還沒有佔人口的多數、資本主義陣綫却薄弱得能被無產階級衝破的個別國家裏，社會主義的勝利是完全可能的。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就是這樣在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間產生的。大家知道，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的根據是：社會主義革命不一定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裏獲得勝利，而首先會在資本主義陣綫薄弱、無產階級比較容易衝破這個陣綫、資本主義即使只有中等發展水平的國家裏獲得勝利。

對蒐集在第一卷裏的著作，著者的意見就是如此。

約·斯大林

一九四六年一月

① 即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代表大會。這次代表大會旨在把黨內兩派統一起來，故稱「統一」代表大會。

② 這裏指的是把土地交給地方自治機關或所謂地方自治局支配。——譯者註。

目錄

出版說明	一
第一卷說明	五
著者第一卷序言	七

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七年

編輯部的話	三
俄國社會民主黨及其當前任務	九
社會民主黨怎樣理解民族問題？	一七
庫泰依斯來信	四七
庫泰依斯來信（也是那位同志的信）	五二
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政黨（論黨章第一條）	五七
高加索的工人們，是復仇的時候了！	六三

各民族友愛萬歲！

七一五

告公民書。紅旗萬歲！

七一六

略論黨內意見分歧

七一七

武裝起義和我們的策略

七一八

臨時革命政府和社會民主黨

七一九

答「社會民主黨人報」

七二〇

反動加緊起來了

七二一

資產階級在佈置圈套

七二二

公民們！

七二三

告全體工人書

七二四

梯弗里斯，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七二五

兩次搏鬥（論一月九日事變）

七二六

國家杜馬和社會民主黨的策略

七二七

土地問題

七二八

論土地問題

七二九

論修改土地綱領（一九〇六年四月十三日〔二十六日〕在俄國社會民主黨

第四次代表大會第七次會議上的演說）

七三〇

論目前形勢（一九〇六年四月十七日〔三十日〕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

第四次代表大會第十五次會議上的演說）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起義

國際反革命

目前形勢和工人黨統一代表大會

階級鬥爭

「工廠立法」和無產階級鬥爭（關於十一月十五日頒佈的兩項法令）

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一 辯證方法

二 唯物主義理論

三 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附錄

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辯證唯物主義

註釋

年表（一八七九年至一九〇六年）

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七年

編輯部的話^①

我們這一部分格魯吉亞的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深信創辦一種自由的定期刊物對於覺悟的格魯吉亞讀者是一個迫切的問題；我們深信這個問題現在必須加以解決，如果再拖延下去，就只會使共同事業受到損害；我們深信每一個覺悟的讀者都會歡迎這種刊物並給以各種幫助；因此，針對着這種需要，我們將竭盡全力滿足讀者的願望。今天，我們辦的格魯吉亞第一個自由刊物『鬥爭報』已創刊號出版了。

爲使讀者對於我們這個刊物，同時也對於我們本身有明確的認識起見，我們要講幾句話。

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已經波及全國每一個角落，也波及我們稱之爲高加索的這一個俄國的角落，而和高加索一起，我們的格魯吉亞同樣被波及了。格魯吉亞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是不久以前才產生的，它一共只有幾年的歷史，確切一點說，這個運動的基礎是在一八九六年才奠定的。我們這裏也像其他各地一樣，最初時期的工作也沒有超出秘密活動的範圍。我們近來所看到的那種鼓動工作和廣泛宣

① 社會民主黨的秘密報紙『鬥爭報』社論。

傳工作，當時是無法進行的，所以只好把一切力量集中在為數不多的小組上面。現在這個時期已經過去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已經在工人羣衆中間傳播開來，於是工作也就超出了狹小的秘密活動的範圍，而在很大一部分工人中間展開了。公開的鬥爭開始了。這個鬥爭向第一批工作者提出了許多過去還不突出、也不十分需要加以闡明的問題。首先極其尖銳地提到我們面前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用什麼辦法來更廣泛地展開鬥爭？口頭上回答這個問題是很簡單很容易的，實際上却完全不是這樣。

對於有組織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來說，主要的手段當然是廣泛地宣傳和鼓吹革命思想。然而革命者現在的工作條件却是如此矛盾，如此困難，並且要求作如此重大的犧牲，以致無論宣傳工作或鼓動工作，往往都不能像運動初期所需要的那樣進行。

靠書本和小冊子進行小組活動漸漸不可能了，這首先是由於憲警的迫害，其次也由於工作的實際要求。只要有人被捕，鼓動工作就會鬆懈下來，要和工人保持聯系，要時常到工人那裏去，就成為不可能了，然而工人對於許多迫切的問題却盼望得到解釋。殘酷的鬥爭在工人周圍進行着，政府用一切力量對付工人，而工人却無法用批判的眼光來觀察時局，無法得知事情的真相，往往只要鄰近某工廠遭到小小的挫折，就會使具有革命情緒的工人消沉下去，對前途失掉信心，於是領導者又得重新吸引他們來參加工作。

靠那種只能解答某些具體問題的小冊子進行鼓動工作，在大多數場合，效果是很小的。因而創辦一種能够解答日常問題的刊物，就成為必要的了。這個盡人皆知的真理是無須我們證明的。在格魯吉

亞工人運動中，以定期刊物作爲革命工作最主要手段之一的時候已經到來了。

爲了供某些沒有經驗的讀者參考起見，我們認爲關於合法報紙應該講幾句話。如果工人中間有人以爲合法報紙（無論這個報紙是在什麼條件下出版的，也無論它的方針怎樣）能代表他的利益，代表工人的利益，那末我們認爲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關心」工人的政府對待合法報紙的手段是很高明的。一大羣叫做書報檢查員的官吏被派來專門監視這些報紙，只要有一絲真理的光芒從縫隙裏透露出來，他們就用紅墨水和剪刀來對付。一道一道的訓令雪片似地飛到書報檢查局：「不得放過任何一點有關工人的消息，不許登載某某事件，不准討論某某問題」，如此等等。在這種情況下，當然報紙是不能真正辦好的，工人要想在報紙上，哪怕是從字裏行間尋找一點有關工人問題的報道和正確的評價都是徒勞無益的。假使有人認爲工人可以利用某一合法報紙上面僅僅由於劊子手檢查員的疏忽而放過的寥寥幾行順便涉及工人問題的文字，那末應該指出：誰要把希望寄託在這樣的片言隻字上面，誰要靠這些零碎消息來建立一套有系統的宣傳工作的話，那就證明他是不通事理的。

再說一遍，我們之所以要講這一點，不過是供某些沒有經驗的讀者參考罷了。

總之，創辦格魯吉亞的自由的定期刊物是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所迫切需要的。現在問題只在於怎樣辦這個刊物，它應當以什麼爲指南，它應當給格魯吉亞社會民主黨人一些什麼。

如果從旁觀者的地位一般地來看格魯吉亞報紙的存在問題，尤其是內容和方針問題，那末也許會覺得這個問題可以自然地簡單地自行解決：格魯吉亞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並不是一個單獨的運

動，並不僅僅是具有自己綱領的格魯吉亞工人運動，它和全俄的運動携手並進，因而是服從於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由此可見，格魯吉亞社會民主黨的報紙應當只是一個地方性的機關報，主要是闡明地方性的問題和反映地方性的運動。但是這樣的回答却抹殺了我們所不能迴避而必然要碰到的困難。我們所講的是語文方面的困難。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有可能通過全黨機關報來解釋一切總的問題，而把闡明僅屬地方性問題的事情交給各個地區委員會去做，然而格魯吉亞報紙在其內容方面却處於困難的境地。格魯吉亞報紙應同時起全黨機關報的作用和區域性的、地方性的機關報的作用。由於大多數格魯吉亞工人讀者不能流暢地閱讀俄文報紙，所以格魯吉亞報紙的領導者就不能不闡明帶全黨性的俄文報正在討論和必須討論的一切問題。這樣，格魯吉亞報紙必須向讀者介紹一切原則性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同時它必須領導地方上的運動，恰當地闡明每一事件，對任何事實都不能不加以解釋，並且還要解答本地工人特別關心的一切問題。格魯吉亞報紙應當把格魯吉亞的戰鬥工人跟俄羅斯的戰鬥工人聯系起來，團結起來。它應當向讀者報道本地生活、俄國生活和國外生活中一切使他們感到興趣的事物。

我們對格魯吉亞報紙的看法，總的說來就是如此。

現在談談這個報紙的內容和方針。

我們應當要求這個社會民主黨的報紙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戰鬥的工人身上。我們認為用不着多說，在俄國，而且到處一樣，只有革命無產階級才負有解放人類並為全世界謀幸福的歷史使命。顯然，

只有工人運動才有自己的堅固根基，也只有它才沒有任何荒誕無稽的空想。因而這個報紙，作為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就應當領導工人運動，給它指示道路，使它不犯錯誤。總之，這個報紙的首要責任是盡可能地接近工人羣衆，設法經常影響他們，使自己成為有意識的、領導工人羣衆的中心。

可是，因為在俄國今天的情況下，除工人以外，社會上還可能有其他階層的人以『爲自由』而鬥爭的戰士姿態出現，並且因為這種自由是俄國戰鬥工人當前的目標，所以這個報紙對於任何革命運動都應該給以篇幅，哪怕這個運動是發生在工人運動範圍以外的。我們說『給以篇幅』，不是僅僅順便刊載一些報道或簡訊，不，這個報紙必須特別注意其他社會階層中間正在發生或將要發生的革命運動。它必須解釋每一社會現象，從而影響每一個爲自由而鬥爭的人。因此，這個報紙應該特別注意到俄國的政治形勢，估計到這個形勢的一切後果，而且要把必須進行政治鬥爭的問題盡可能提得更廣泛些。

我們確信，誰也不能利用我們這些話來證明我們似乎就是要與資產階級保持聯系和實行妥協的人。對於反對現存制度的運動（哪怕這個運動是在資產階級社會裏發生的）給予應有的估價，指出弱點和錯誤，也不會給社會民主黨人塗上機會主義的污點。不過我們決不應忘記社會民主主義的原則和革命的鬥爭方式。如果我們以這個尺度來衡量每一個運動，我們就會避免伯恩施坦派的一切謬語。這樣，格魯吉亞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必須對一切有關工人運動的問題經常給以明確的答覆，解釋各種原則性的問題，從理論上說明工人階級在鬥爭中的作用，並以科學社會主義的光芒照耀工人所遇到的每一種現象。

同時，這個報紙必須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代表者，必須及時向讀者報道俄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所持的一切策略觀點。它必須向讀者介紹其他各國工人的生活狀況和他們爲了改善自己的地位在幹什麼，在怎樣鬥爭，必須及時地號召格魯吉亞工人起來參加鬥爭；同時對於任何一個社會運動都不應不加以注意，不應不給以社會民主主義的批判。

我們對格魯吉亞報紙的看法就是如此。

我們不能用依靠我們現有的力量就能全部完成這些任務的諾言來欺騙自己，又欺騙讀者。要把這個報紙辦好，就需要讀者和同情者方面的幫助。讀者會看出『鬥爭報』創刊號是有許多缺點的，然而只要讀者能給以幫助，這些缺點是能够改正的。例如，我們可以指出地方新聞報道做得不够。我們遠離故鄉，沒有可能注視格魯吉亞的革命運動，沒有可能及時報道和闡明這個運動中的問題。所以必須有格魯吉亞當地人士的幫助。誰願意在寫作方面也幫助我們，那他一定會找出辦法來和『鬥爭報』編輯部建立直接或間接聯系的。

我們號召全體戰鬥的格魯吉亞社會民主黨人親切關懷『鬥爭報』的命運，對於它的出版和散發予以多方的協助，從而把格魯吉亞第一個自由的報紙『鬥爭報』變成革命鬥爭的工具。

載於一九〇一年九月『鬥爭報』創刊號

本文沒有署名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俄國社會民主黨及其當前任務

一

人類的思維只是在經歷許多磨難、痛苦和變化之後，才科學地研究出和論證了社會主義。西歐社會主義者只是在烏托邦（空想的、無法實現的）社會主義荒野上盲目徘徊很久之後，才給自己開闢了道路，才探索出和論證了社會生活的法則，從而論證了社會主義對於人類的必要性。從十九世紀初葉起，歐洲產生了許多勇敢的、忘我的、忠實於工作的學者，他們曾力圖闡明和解決這個問題：什麼東西才能拯救人類，使之擺脫隨着商業和工業的發展而日益加劇和惡化的宿疾？爲了消滅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壓迫，在西歐有過多次暴風雨，多次大流血，然而悲愁依舊沒有消散，創傷還是那樣厲害，痛苦日益不堪忍受。我們應認爲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空想社會主義沒有闡明社會生活的法則，只是飛翔在實際生活的上空，好高騖遠，殊不知真正需要的却是與現實的牢固聯系。當實際生活中還沒有實現社會主義的任何基礎時，空想家們就把實現社會主義作爲當前的目標，並且依其結

果講來更可悲的是，他們（羅柏特·歐文、路易·勃朗、傅立葉等等）期待當代有權有勢的人來實現社會主義，在他們看來，這些有權有勢的人是不難信服社會主義理想的正確性的。這個觀點完全抹殺了現實的工人運動和工人羣衆，其實工人羣衆才是社會主義理想唯一天然的代表者。空想家們是不能了解這一點的。他們想不依靠人民（工人）本身的幫助而用制定法律和發表宣言的辦法來創造人間的幸福。他們對於工人運動並沒有特別注意，甚至往往否認它的意義。因此他們的理論始終是和工人羣衆不相干的理論，可是在工人羣衆中間却有一種偉大的思想完全不依賴這些理論而成熟起來，這種思想在十九世紀中葉由天才的卡爾·馬克思宣佈出來：『工人階級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從這些話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一個現在連『瞎子』也看得清楚的真理：要實現社會主義理想，就必須有工人的獨立自主的活動，必須使工人不分民族和國家團結成一個有組織的力量。當時必須論證這個真理（這一點由馬克思及其朋友恩格斯光輝地完成了），以便爲強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奠定牢固的基礎，這個政黨今天好似一個難逃的劫運籠罩在歐洲資產階級制度的頭上，威脅着這個制度，要消滅它，要在它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

社會主義思想在俄國發展的途徑差不多也和在西歐一樣。在俄國，社會主義者也是盲目徘徊很久之後，才達到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即科學的社會主義。在這裏也有過社會主義者，也有過工人運動，可是兩者互不相干，各行其是：社會主義者走向無法實現的空想（『土地與自由黨』、『民意

黨」)，而工人運動則走向自發的騷動。兩者在同一時期（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活動，可是互不相識。社會主義者在勞動人民中間沒有基礎，因而他們的活動是脫離實際的，沒有根基的。工人則沒有領導者，沒有組織者，因而他們的運動流為混亂的騷動。這就是社會主義者爭取社會主義的英勇鬥爭仍然沒有結果和他們非凡的勇敢精神在專制制度的堅壁上碰得粉碎的主要原因。俄國社會主義者直到九十年代初期才和工人羣衆接近起來。當時他們看到，只有工人階級才是救星，只有這個階級才能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隨後，俄國社會民主派就把自己的努力和注意力全部集中到當時俄國工人中間所發生的運動上面。還不够覺悟的和對鬥爭還沒有準備的俄國工人，力求逐漸脫離自己的絕望境地，總想設法改善自己的命運。自然，當時在這個運動中有條理的組織工作是沒有的，運動是自發的。

社會民主派就在這樣的情況下着手領導這個不自覺的、自發的和無組織的運動。他們竭力發揚工人的覺悟性，竭力把個別工人集團反對個別業主的分散的鬥爭統一起來，融合成總的階級鬥爭，使這個鬥爭成為俄國工人階級反對俄國壓迫階級的鬥爭，並竭力使這個鬥爭具有組織性。

最初一個時期，社會民主派不能在工人羣衆中開展自己的活動，因而只限於宣傳鼓動小組的工作。當時社會民主派的唯一工作方式就是小組活動。這些小組的目的是要從工人中間造就出一批將來能領導運動的人材。因此這些小組是由先進工人組成的，也只有優秀的工人才有機會在這些小組裏學習。

但是，小組活動時期很快就過去了。社會民主派不久便覺得必須走出狹隘的小組圈子，把自己的影響散佈到廣大工人羣衆中去。外部的條件也促進了這一點。這時工人中間的自發運動特別高漲。你們誰不記得幾乎整個梯弗里斯都被這種自發運動所席捲了的那一年呢？各煙草工廠和鐵路工廠中無組織的罷工接二連三地發生了。這種情況在我們這裏發生在一八九七年至一八九八年，在俄羅斯則稍微早一些。當時必須及時給以幫助，而社會民主派也就趕緊去幫助了。要求縮短工作日、廢除罰款、提高工資等等的鬥爭開始了。社會民主派清清楚楚知道，工人運動的發展不能局限於這些瑣碎的要求，這些要求並不是運動的目的，而只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儘管這些要求是瑣碎的，儘管各個城市和地區的工人今天還是各自分散地進行鬥爭，但這個鬥爭本身將使工人認識到，只有整個工人階級團結成統一的、強大的、有組織的力量去衝擊他們的敵人時，才能得到完全的勝利。這個鬥爭也將向工人表明，他們除了自己的直接敵人資本家而外，還有另一個更警覺的敵人，這個敵人就是整個資產階級有組織的力量，即擁有軍隊、法庭、警察、監獄和憲兵的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既然西歐的工人要改善自己生活狀況的任何最小的試圖都會碰到資產階級政權的壓制，既然在已經爭得人權的西歐，工人也得與政府當局進行直接的鬥爭，那末俄國工人在自己的運動中就一定會和專制政權發生衝突，這個政權之所以是任何工人運動的警覺的敵人，不僅因為它保衛資本家，而且因為它既是專制政權，就不能容忍各個社會階級的獨立自主活動，特別是不能容忍這個比其他階級更受壓迫更受踐踏的工人階級的獨立自主活動。俄國社會民主派就是這樣理解運動的進程，並用全力在工人中間

傳播這些思想的。他們的力量就在於此，他們一開始便有偉大的和勝利的發展的原因就在於此。一八九六年彼得堡各織布廠工人的大罷工就證明了這一點。

但是，最初一些勝利竟使某些不堅強的人失去了理智，衝昏了他們的頭腦。從前空想社會主義者只注意到最終目的，並為這個目的所眩惑而完全忽視或者否認在他們眼前展開的現實的工人運動，現在某些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則恰好相反，他們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只放在自發的工人運動及其日常需要方面。當時（五年以前）俄國工人的階級覺悟是很低的。俄國工人還剛剛從百年大夢中覺醒過來，他們的眼睛習慣於黑暗，當然看不到第一次呈現在他們面前的世界裏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當時他們沒有什麼大的需要，他們的要求也不高。俄國工人還只是要求稍微增加工資或縮短工作時間而已。至於必須改變現存制度、必須消滅私有制、必須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對於這一切，俄國工人羣衆是一點也不了解的。他們也不大敢想到結束全俄人民在專制政權下所過的苟延殘喘的奴隸生活，不大敢想到人民的自由和人民參加管理國家的問題。就在這個時候，俄國社會民主派的一部分人認為自己的職責是把自己的社會主義思想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另一部分人却醉心於經濟鬥爭，醉心於局部地改善工人生活狀況的鬥爭（例如縮短工作時間和提高工資），甘願把自己的偉大職責、自己的偉大理想完全忘掉。

這後一部分人也像他們西歐的同道者（所謂伯恩施坦派）一樣地說：『對我們，運動就是一切，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工人階級究竟爲了什麼進行鬥爭，他們根本不去過問，只要有鬥爭就行了。於

是所謂捨本逐末的政策就盛行起來了。結果有一天彼得堡『工人思想報』(2)竟然宣稱：『我們的政治綱領就是實行十小時工作制，恢復六月二日法令』(3)所廢除的節日。』(4) (5)

這部分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不去領導自發運動，不把社會民主主義的理想灌輸到羣衆中去，不把羣衆引向我們的最終目的，反而成了運動本身的盲目工具；他們盲目地跟着一部分不够開展的工人走，只限於表達當時工人羣衆所意識到的那些需要和要求。一句話，他們是站在那裏敲着敞開的大門，不敢走進屋子裏面去。他們竟沒有能力向工人羣衆說明運動的最終目的是社會主義，甚至沒有能力向工人羣衆說明當前的目標是推翻專制制度，更可悲的是他們認爲這一切不但無益，而且是有害的。他們把俄國工人看成了小孩子，唯恐這種大胆的思想嚇壞了他們。不僅如此，依照社會民主派另一些人的看法，實現社會主義並不需要任何革命鬥爭：所需要的只是經濟鬥爭，只要有罷工和工會、消費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社會主義就算成功了。他們認爲老一輩的國際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學說是錯誤的，因爲這些人說，當政權尚未轉入無產階級手中（即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前，改變現存制度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徹底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制度並不是什麼新東西，其實它和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也沒有區別；據他們說，把社會主義容納到現存制度中去是很容易的，每一個工會，甚至每一個消費合作社零售處或生產合作社，都已經是『社會主義的一部分』了。他們就想用

① 必須指出，最近彼得堡『門爭協會』及其報紙編輯部已拋棄了自己原先那個純粹經濟鬥爭的方針，竭力把政治鬥爭的思想貫徹到自己的行動中去。

這種補綴舊衣的荒唐辦法來給受苦受難的人類縫製新衣！但最令人痛心而且爲革命者所無法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這部分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把他們西歐的老師（伯恩斯坦及其同夥）的學說發展到這樣的地步，居然恬不知恥地宣稱：政治自由（即罷工、結社、言論等等自由）是和沙皇制度可以相容的，因而特別的政治鬥爭，即推翻專制制度的鬥爭，完全是多餘的，因爲單是經濟鬥爭就足以達到目的，只要不顧政府禁令，更頻繁地舉行罷工，政府就會疲於懲治罷工者，罷工和集會的自由也就自然而然地來了。

可見這些所謂『社會民主主義者』要想證明的是：俄國工人只應當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精神用在經濟鬥爭上，而不應當追求各種『渺茫的理想』。在實踐上他們的行動表明了，他們認爲自己的天職僅僅是在某某城市裏進行地方工作。他們對於組織俄國社會民主黨絲毫不感興趣，反而認爲組織政黨是一種滑稽可笑的兒戲，會妨礙他們履行自己的直接『天職』——進行經濟鬥爭。罷工、再罷工和爲戰鬥基金募集幾文錢，——這就是他們的全部工作。

你們一定會想到，他們既然這樣縮小了自己的任務，既然拋棄了社會民主主義，那末這些自發『運動』的崇拜者至少可以給這個運動做出許多成績來。然而就在這點上我們也被欺騙了。彼得堡運動的歷史使我們確信這一點。起初，在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七年間，運動有過輝煌的發展和勇敢的邁進，以後就變爲盲目的徘徊，最後竟至停滯不前。這是毫不奇怪的，因爲『經濟派』要給經濟鬥爭建立堅固組織的全部努力，必然會碰到政府當局的堅壁，而且總是碰得粉碎。憲警的惡毒迫害使得任何

經濟組織都無法存在。罷工也沒有得到什麼好處，因為一百次罷工總有九十九次被憲警的高壓手段所扼殺，工人們被無情地趕出彼得堡，牢獄的牆壁和西伯利亞的嚴寒殘忍地消磨着他們的革命精力。我們深信運動之所以會這樣停滯（當然是相對的停滯），不能只歸咎於外部的條件，憲警的迫害，也要歸咎於思想本身、階級意識發展方面的停滯，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工人革命精力的減弱。

由於俄國工人在進行鬥爭時所打的旗幟仍然是一塊寫着經濟鬥爭瑣碎口號的陳舊褪色的破布，他們就不能隨着運動的發展深刻地了解鬥爭的崇高目的和內容，所以工人們也就不免以較少的精力、較小的興趣、較低的革命熱情來參加這個鬥爭，因為偉大的精力只是為了偉大的目的而產生的。

而且，要不是我國實際生活條件日益有力地推動俄國工人去進行直接的政治鬥爭，上述情況對運動造成的危害是會更大的。當時，哪怕普通一次小小的罷工，也向工人正面提出我們在政治上毫無權利這個問題，使他們與政權和武裝力量發生衝突，並且清清楚楚地證明單靠經濟鬥爭是不夠的。所以和這些『社會民主主義者』的願望相違背，鬥爭一天比一天更具有明顯的政治性質。覺醒了的俄國工人對於今天壓得他們呻吟叫苦的政治經濟現狀公開表示不滿的每一企圖，他們想擺脫壓迫的每一企圖，都能推動工人舉行經濟鬥爭色彩日益減少的遊行。俄國的五一節為政治鬥爭和政治遊行示威開闢了道路。於是俄國工人在自己舊有的唯一鬥爭手段——罷工以外，又增添了一種新的强有力的手段，即一九〇〇年哈爾科夫五一運動時第一次試用過的政治遊行示威。

這樣，俄國工人運動由於自己內部的發展，便從小組宣傳和經濟罷工鬥爭逐漸轉上政治鬥爭和

政治鼓動的道路了。

當工人階級看見俄國其他社會階級的人抱着爭取政治自由的決心登上鬥爭舞台時，這個轉變就顯著地加速了。

二

在沙皇制度壓迫下呻吟叫苦的不僅僅是工人階級。專制制度沉重的魔掌也窒息着其他的社會階級。呻吟叫苦的有因經常挨餓而浮腫了的俄國農民，他們被苛捐雜稅的重担弄得貧困不堪，他們受唯利是圖的資產者和『高貴的』地主任意宰割。呻吟叫苦的有小市民、國家機關和私人機關的小職員，小官吏，總之，就是人數衆多的城市平民，他們的生活也和工人階級的生活一樣地沒有保障，他們有理由不滿意自己的社會地位。呻吟叫苦的有不能容忍沙皇鞭撻政策的一部分小資產階級乃至中產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中一部分有學識的人，即所謂自由職業者（教員、醫生、律師、大學生和一般學生）。呻吟叫苦的有俄國境內被壓迫的各民族和異教徒，其中包括那些被逐出鄉土而其神聖情感蒙受傷害的波蘭人和芬蘭人，歷史賦予他們的權利和自由都被專制制度蠻橫地踐踏了。呻吟叫苦的有經常受迫害受侮辱的猶太人，他們甚至被剝奪了其他俄國庶民所享有的微不足道的權利，即隨處居住的權利、就學的權利、供職的權利等等。呻吟叫苦的有格魯吉亞人、阿爾明尼亞人以及其他民族，他

們被剝奪了開辦本族學校的權利，在國家機關中工作的權利，他們不得不服從專制政權所瘋狂推行的、可恥的、壓迫少數民族的俄羅斯化政策。呻吟叫苦的有俄國境內各種教派的千百萬信徒，他們不願依照正教神父的意旨而想本着自己的良心來信奉宗教。呻吟叫苦的還有……但一切受俄國專制制度壓迫摧殘的人是舉不勝舉的。他們的人數是如此之多，要是他們都懂得這一點並明白誰是他們的共同敵人，那末俄國的暴政是一天也不能存在的。可惜俄國農民還處於數百年來由奴役、貧窮和無知所造成的閉塞狀態，他們現在還剛剛在覺醒，還不明白誰是他們的敵人。俄國各被壓迫民族，在不僅有俄國政府反對它們，甚至還有俄羅斯人民由於尚未認識專制制度是全國人民的公敵而同樣也反對它們的時候，它們簡直不敢想像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剩下的就是工人階級、城市平民和資產階級中一部分有學識的人。

但是，一切國家和一切民族的資產階級都極善於攫取並非由自己的勝利所得來的果實，都極善於假他人之手火中取栗。他們從來也不願意在與強敵鬥爭中，在暫時還不大容易獲得勝利的鬥爭中，拿自己的較有特權的地位去冒險。儘管他們不滿意，但他們畢竟生活得不壞，因此他們樂意把受哥薩克鞭打、被士兵槍殺、在街壘中搏鬥等等權利讓給工人階級和一般平民去獨享。他們自己只是『同情』鬥爭，至多也不過是對兇暴的敵人那種鎮壓人民運動的殘酷行為表示一下（在心裏）『憤慨』罷了。他們是害怕革命行動的，只有在鬥爭的最後幾分鐘，當看清敵人沒有力量的時候，他們自己才轉而採取革命的辦法。這個道理是歷史經驗教給我們的……只有在鬥爭中除了自己的鎖鏈而外別無可失的

工人階級和一般人民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儘管俄國的經驗還很貧乏，却也證明了一切革命運動的歷史所教給我們的這個古老的真理。

特權階層中，只有一部分大學生表明決心要爲實現自己的要求鬥爭到底。但是我們不應忘記，這部分大學生也是那些受壓迫的公民的子弟，並且大學生都是在學的青年，當他們還沒有投身於人生大海，還沒有在那裏佔有一定社會地位的時候，他們比任何人都熱心地追求那號召他們爲自由而鬥爭的理想。

不管怎樣，現在大學生幾乎是以首領、以先進部隊的姿態出現於「社會人士」的運動中。社會各階級中不滿意的人，今天都聚集在他們周圍。起初，大學生企圖使用從工人那裏模仿來的罷工手段進行鬥爭。可是，在政府對他們的罷課報之以野蠻的法令（『暫行條例』⁽²⁾），規定把參加罷課的大學生徵去當兵的時候，大學生就剩下了一種鬥爭手段，即向俄國社會求援，並由罷課轉向街頭遊行示威。大學生也就是這樣做的。他們沒有放下武器，反而鬥爭得更英勇、更堅決了。被壓迫的公民聚集在他們周圍，工人階級向他們伸出援助之手，於是運動就變成了威脅政權的強大運動。俄國政府使用大批軍警和憲兵來對不馴順的公民進行殘酷而毫無結果的鬥爭已經有兩年之久了。

最近幾天的事件顯示，政治遊行示威是不會失敗的。十二月初在哈爾科夫、莫斯科、下新城、里加等等城市發生的事件表明，目前公衆的不滿已經是有意識地表現出來了，這些不滿的公衆已有決心從沉默的抗議轉向革命的行動了。然而大學生所提出的要求，即學習自由和大學內部生活的自由，

對於廣大的社會運動來說是太狹隘了。要把所有參加這個運動的人聯合起來，就需要一面旗幟，一面爲大家所了解而感到親切的、能體現一切要求的旗幟。這樣的旗幟就是推翻專制制度。只有摧毀專制制度，才能建立起依靠人民參加國家管理並保障學習、罷工、言論、宗教、民族及其他等自由的社會制度。只有這樣的制度才能給人民以自衛手段，使他們不受各種壓迫者、商人、資本家、僭侶、貴族的迫害；只有這樣的制度才能開闢出一條自由的道路，使人們走向美好的未來，並能自由地爲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而奮鬥。

當然，大學生只憑自己的力量是不能進行這個巨大的鬥爭的，他們軟弱無力的手臂擎不住這面沉重的旗幟。要擎得住這面旗幟，就需要更強有力的手臂，而在當前的情況下，只有工人羣衆聯合的力量才是這樣的力量。因此俄國工人階級必須把全國旗幟從大學生軟弱的手中拿過來，在上面大書『打倒專制制度！民主憲法萬歲！』去引導俄國人民走向自由。對於大學生呢，我們應當感謝他們給我們上了這一課：他們顯示了政治遊行示威在革命鬥爭中具有何等重大的意義。

街頭遊行示威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爲它可以很快地把大批的居民吸引到運動中來，使他們立刻知道我們的要求，並且造成廣闊的肥沃土壤，使我們能够大胆散播社會主義思想和政治自由的種子。街頭遊行示威可以造成街頭鼓動，使社會上一部分落後的怯懦的人不能不受到它的影響^①。在

① 秘密的書籍和鼓動傳單，在俄國目前情況下，很難傳到每個居民手中。雖然散發秘密書刊收效很大，但在大多數場合下這些書刊只能散到一小部分居民中間。

遊行示威的時候，任何人只要走到街上，就能看見勇敢的鬥士，就能明白他們是爲了什麼而鬥爭，就能聽見號召大家起來鬥爭的自由演說，就能聽到揭露現存制度和暴露我國社會疥癩的戰鬥歌曲。因此，政府當局最害怕街頭遊行示威。所以它恐嚇大家：不但要嚴懲示威者，而且要嚴懲『好奇者』。在人民的這種好奇心中間，隱藏着對政府當局的主要危險：今天的一個『好奇者』，明天就會作爲一個示威者把一批批新的『好奇者』集合到自己的周圍。而這樣的『好奇者』今天在每個大城市裏都是數以萬計的。今天俄國居民再也不像過去那樣，一聽到什麼地方發生騷動就躲藏起來（『說不定就會出亂子，可別把我也牽連進去，還是走開爲妙。』從前他們總是這樣說），今天他們却擠到發生騷動的地方去，『好奇地打聽』：究竟這種騷動是爲什麼發生的，這樣多的人究竟爲了什麼要去挨哥薩克的鞭打。

在這種情況下，『好奇者』再不會漠不關心地聽着皮鞭和馬刀的揮舞聲了。『好奇者』看到，示威者集合在街頭是爲了訴說自己的願望和要求，而政府當局却用毒打和殘酷鎮壓來回答他們。『好奇者』不惟不逃避皮鞭的響聲，反而要擠上前去，可是皮鞭再也分辨不出：究竟哪些人是普通的『好奇者』，哪些人是『暴徒』。這時皮鞭遵照着『完全民主平等』的原則，不分性別、年齡甚至階層地位而任意亂打這兩類人的脊背。皮鞭就這樣幫我們的大忙，加速『好奇者』的革命化。皮鞭就從鎮壓人們的武器變成喚醒人們的武器。

因此，儘管街頭遊行示威還不能給我們帶來直接的效果，儘管示威者的力量今天還很薄弱，不能

迫使政府立刻對人民的要求讓步，可是今天我們在街頭遊行示威中所蒙受的犧牲，將來會換得百倍的補償。在鬥爭中犧牲的或從我們陣營中抓去的每一個戰士，都會喚起成百成千的新戰士。暫時我們在街頭還不止一次要挨打，政府在街頭搏鬥中也還不止一次要成為勝利者。但這將是『皮洛士的勝利』^①。再來幾次這樣的勝利，專制制度的失敗就必不可免了。專制制度以今天的勝利給自己準備未來的失敗。我們堅信這一天一定會到來，這一天已為時不遠，我們要冒着皮鞭的毒打去散播政治鼓動和社會主義的種子。

政府也不亞於我們，它深知街頭鼓動對於它是死刑的判決；只要再過兩三年，人民革命的魔影就會出現在它的面前。前幾天，政府通過葉加特林諾斯拉夫省省長宣佈：它『甚至不惜採取極端手段來消滅街頭遊行示威的最小嘗試』。顯然，這個聲明帶着槍彈氣味，可能還帶着砲彈氣味，但我們認為槍彈這種激起人們不滿情緒的工具是不亞於皮鞭的。我們並不以為，政府採取這種『極端手段』就能長期制止政治鼓動，從而阻礙它的開展。我們希望革命的社會民主派也能使自己的鼓動工作適應因政府採取這種『極端手段』而造成新情況。無論如何，社會民主派應當警惕地注視事變，應當迅速利用這些事變的教訓，並且善於使自己的行動適應不斷變化的情況。

但是，爲了這一點，社會民主派就必須有一個強大而緊密團結的組織，即黨的組織，它將不僅按名稱來說是團結的，而且按自己的基本原則和策略觀點來說也是團結的。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爲建立這樣一個以堅定的原則和不可摧毀的秘密活動武裝起來的強大政黨而奮鬥。

社會民主黨應當利用已經開始的新的街頭運動，應當把俄國民主主義的旗幟拿到自己手裏，並把俄國民主主義引向大家所盼望的勝利！

這樣，在我們面前就開始了一個以政治鬥爭爲主的時期。這種鬥爭對於我們是不可避免的，因爲在現存的政治條件下，經濟鬥爭（罷工）是不能得到什麼重大結果的。罷工在自由國家裏也是一種有利也有害的武器；甚至在那裏，工人雖然有各種鬥爭手段，即政治自由、堅強的工會組織和富足的基金會，但罷工往往還是以工人的失敗而結束。至於我們這裏，罷工却是一種要遭受逮捕和武力鎮壓的罪行，任何工會組織都要受禁止，因此我們這裏的罷工只有抗議的作用了。可是就抗議而言，遊行示威却是更有力的武器。在罷工期間，工人的力量是分散的，參加罷工的只有一個廠或幾個廠的工人，至多只有某一種行業的工人；舉行總罷工甚至在西歐也是非常困難的，而我們這裏則完全不可能，但是在街頭遊行示威中，工人却能立刻把自己的力量聯合起來。

由此可見，一部分『社會民主主義者』對於問題的看法是多麼狹隘，他們竟想把工人運動局限在經濟鬥爭和各種經濟組織的範圍裏，把政治鬥爭讓給『知識界』、大學生和社會人士去進行，而只讓工人充當配角。歷史教導我們，在這樣的情況下，工人就只好爲資產階級火中取栗。在反對專制政權的鬥爭中，資產階級常常樂於利用工人壯健的手臂，但當勝利已經取得時，他們就把勝利的果實據爲己有，使工人一無所得。如果我們這裏的情形也是如此，那末工人從這個鬥爭中是什麼也得不到的。至於大學生和社會人士中的其他抗議者，要知道，他們也是屬於資產階級的。只要給他們一個無傷大體

的能賦予人民些微權利的『殘缺不全的憲法』，就足以使這些抗議者唱起另一種調子來頌揚『新』制度了。資產階級時時刻刻懼怕共產主義的『赤色魔影』，在一切革命中他們總是當事情剛剛開始時就力圖把它結束。被工人所驚嚇的資產階級只要得到一點點於自己有利的讓步，就向政府伸出調和的手，無恥地出賣自由事業^①。

只有工人階級才是真正民主主義可靠的砥柱。只有工人階級才不會由於獲得某種讓步而和專制政權妥協，才不會因為人家彈奏憲政琵琶，唱起甜蜜調子便麻痺起來。

因此，工人階級有本事站在總的民主主義運動的前頭呢，還是作為『知識界』即資產階級的配角去做運動的尾巴，這對於俄國民主事業是有非常重大意義的。在前一場合下，由於推翻專制制度，就會有一個廣泛的民主憲法，這個憲法給工人、閉塞的農民和資本家以平等權利。在後一場合下，我們就只會得到一個『殘缺不全的憲法』，這個憲法在踐踏工人的要求、只給人民一種自由的幻影方面，將不亞於專制制度。

但是，爲了能起領導作用，工人階級就必須組織成一個獨立的政黨。那時工人階級在反對專制制度的鬥爭中，就不會害怕自己的暫時同盟者『社會人士』的任何叛變和出賣行爲了。當這些『社會人士』一旦背叛了民主事業時，工人階級就會用自己的力量引導這個事業前進，而這個獨立的政黨將給

① 當然，在這裏我們不是指那些已經背棄了自己的階級而參加到社會民主派隊伍中作鬥爭的知識分子。但這樣的知識分子只是例外，他們是『白色的鳥兒』。

工人階級以相當這種事業所必需的力量。

載於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二月

『鬥爭報』第二、三兩期合刊

本文沒有署名

從格魯古亞文譯成俄文

① 皮洛士是伊壁魯斯王（公元前三一一年至二七二年）。公元前二八〇年他與羅馬作戰終於取得勝利，但損失慘重。

他說：「再有一次這樣的勝利，我也就完了！」（皮洛士的勝利）表示得不償失之意。——譯者註。

社會民主黨怎樣理解民族問題？

一

一切都在變化…… 社會生活在變化，『民族問題』也跟着在變化。在各個不同的時期，有各個不同的階級出現在鬥爭舞台上，而且每一個階級都是按照自己的觀點來理解『民族問題』的。因此，『民族問題』在各個不同時期服務於各種不同的利益，並具有各種不同的色彩，這要看它是由哪一個階級提出和在什麼時候提出而定。

例如，我們這裏存在過所謂貴族的『民族問題』，當時（在『格魯吉亞歸併於俄國』之後）格魯吉亞貴族感到喪失他們原先在格魯吉亞國王統治時代所享有的特權和勢力，對於自己是多麼不利，他們認為充當『庶民』有傷自己的尊嚴，所以想要『解放格魯吉亞』。他們想藉此使格魯吉亞國王和貴族擔當『格魯吉亞』的領導者，從而把格魯吉亞人民的命運交給他們！這是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義』。如果不把格魯吉亞貴族反對在高加索的俄羅斯統治者的個別陰謀計算在內，那末這個『運動』就沒有做出任何一件能够博得榮譽的事情，沒有在格魯吉亞人的生活中留下任何顯著的痕跡。只要社會

生活事變稍微觸到這個本來就很軟弱的『運動』，就足以把它根本破壞。的確，商品生產的發展、農奴制度的廢除、貴族銀行的創立、城市和鄉村中階級對抗的加劇、鄉村貧民運動的加強等等，——這一切都給格魯吉亞貴族以致命的打擊，同時也給『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義』以致命的打擊。格魯吉亞貴族分裂成爲兩派。其中一派拋棄了任何『民族主義』而向俄國專制制度伸出手來，想從那裏換得高官厚祿、低息貸款和農具，要政府保障他們不受農村『暴動者』的威脅等等。格魯吉亞貴族的另一派，更軟弱的一派，則同格魯吉亞的主教和大司祭串通一氣，從而把受實際生活驅逐的『民族主義』置於教權主義羽翼之下。這一派熱中於恢復那些已被破壞的格魯吉亞教堂（這是他們『綱領』中的主要條文），即『昔日偉業的紀念碑』，並且虔誠地等待一個能實現他們農奴君主制『願望』的奇蹟的到來。

這樣，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義在奄奄一息的時候，就採取了教權主義的形式。

同時，現代社會生活又在我們這裏提出了資產階級的民族問題。當年輕的格魯吉亞資產階級感到自己很難和『外國』資本家進行自由競爭時，它就通過格魯吉亞民族民主主義者開始唧唧起什麼獨立的格魯吉亞來了。格魯吉亞資產階級想用關稅壁壘保護格魯吉亞市場，用強力把『外國』資產階級從格魯吉亞市場趕出去，用人爲的方法提高物價，並用這種『愛國的』手腕在發財的角逐場上求得成功。

格魯吉亞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目的過去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不用說，要實現這個目的，就必

須有力量，而這種力量就在無產階級身上。只有無產階級才能給被閹割的資產階級『愛國主義』注入生命力。必須把無產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於是『民族民主主義者』就走上了舞台。他們費了許多氣力來駁斥科學社會主義，對社會民主黨人大肆誹謗，勸告格魯吉亞無產者離開這些人，同時讚美格魯吉亞無產階級，勸它『爲了工人本身的利益』設法加強格魯吉亞資產階級。他們一再懇求格魯吉亞無產者說：不要毀滅『格魯吉亞』（或許是指格魯吉亞資產階級？），忘掉『內部的意見分歧』，和格魯吉亞資產階級親善起來等等。但這都是白費氣力的！資產階級政論家的甜言蜜語麻醉不了格魯吉亞無產階級！格魯吉亞馬克思主義者的無情攻擊，特別是把俄羅斯、阿爾明尼亞、格魯吉亞和其他民族的無產者變成了一個社會主義隊伍的強大的階級發動，給我們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以一個毀滅性的打擊，並把他們從戰場上趕走了。

『爲了恢復被污辱的聲名』，我們那些逃走了的愛國者『至少也得改變一下色彩』，即使領會不了社會主義的觀點，至少也得披上一件社會主義的外衣。果然，秘密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姑稱之爲）『社會主義的』機關報『格魯吉亞報』已爬上了舞台！他們就想這樣來誘惑格魯吉亞工人！但是已經晚了！格魯吉亞工人已經學會分清黑白，他們很容易就看破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只是改變了一下色彩』，並沒有改變自己觀點的本質，『格魯吉亞報』徒有社會主義的空名罷了。他們明白了這一點，於是高聲嘲笑格魯吉亞的『救星』！『格魯吉亞報』的那些唐·吉珂德式的希望並沒有實現！

另一方面，我們的經濟發展又漸漸在格魯吉亞資產階級先進人士和『俄羅斯』之間架起一座橋

梁，使這些人士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和「俄羅斯」發生聯系，從而使本來已經動搖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基礎更加動搖起來。這就是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第二個打擊！

新的階級即無產階級走上了鬥爭舞台，於是新的「民族問題」即無產階級的「民族問題」也跟着產生了。正如無產階級不同於貴族和資產階級一樣，無產階級所提出的「民族問題」也不同於貴族和資產階級的「民族問題」。

現在我們就來談一談這個「民族主義」。

社會民主黨怎樣理解「民族問題」呢？

俄國無產階級早就談到鬥爭了。大家知道，任何鬥爭的目的都是要取得勝利。但是，爲了無產階級的勝利，必須不分民族地把一切工人聯合起來。很明顯，打破民族間的壁壘而把俄羅斯、格魯吉亞、阿爾明尼亞、波蘭、猶太和其他民族的無產者緊密團結起來，乃是俄國無產階級勝利的必要條件。

俄國無產階級的利益就是如此。

然而，俄國專制制度是俄國無產階級最兇惡的敵人，它經常阻撓無產者的團結事業。它用強盜手段摧殘俄國各「異」族的民族文化、語言、風俗和機關。專制制度剝奪了他們應有的公民權利，從各方面壓制他們，口蜜腹劍地在他們中間散播猜忌和仇視，挑起他們的流血衝突。這表明俄國專制制度的唯一目的是要離開俄國境內的各個民族，加強他們之間的民族糾紛，鞏固民族壁壘，從而更加順利地分裂無產者隊伍，更加順利地把整個俄國無產階級分散爲小的民族集團，以便扼殺工人的階級覺

悟，破壞工人的階級團結。

俄國反動勢力的利益就是如此，俄國專制制度的政策就是如此。

很明顯，俄國無產階級的利益遲早一定要和沙皇專制制度的反動政策發生衝突。事實果然這樣，社會民主黨的『民族問題』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

應該怎樣打破聳立在各民族間的民族壁壘，應該怎樣消滅民族的閉關自守狀態，以便使俄國各民族無產者更好地互相接近起來，更緊密地團結起來呢？

社會民主黨的『民族問題』的內容就是如此。

社會民主聯邦主義者回答說：應該分成各個民族政黨並把它們組成一個『自由聯盟』。

『阿爾明尼亞社會民主工人組織』也再三重複這樣的話。

由此可見，他們勸我們不要團結成一個由統一的中央來領導的全俄政黨，而要分成由幾個中央來領導的幾個政黨，並且還說這都是爲了加強階級團結！我們想使各民族的無產者互相接近起來。我們究竟應當採取什麼辦法呢？社會民主聯邦主義者回答說：只要使各民族的無產者互相疏遠就可以達到目的！我們想把無產者聯合成一個政黨。我們究竟應當採取什麼辦法呢？社會民主聯邦主義者回答說：只要把俄國無產階級分散爲各個政黨就可以達到目的！我們想要消滅民族壁壘。我們究竟應當採取什麼辦法呢？他們回答說：只要用組織上的壁壘來加強民族間的壁壘就可以達到目的！這一切就是他們給我們這些有着一個共同敵人並在相同的政治條件下進行鬥爭的俄國無產者出的主

意！總之，他們對我們說：你們要幹得使敵人拍手稱快，並且親手葬送你們的共同目的！

好吧，我們就暫且同意社會民主聯邦主義者的意見，跟着他們走，看他們要把我們引到哪裏去！俗語說得好：追問撒謊人，就要追到撒謊的大門。

假定我們聽從了我們那些聯邦主義者的意見並建立了各個民族的政黨，那末由此會得到什麼結果呢？

這是不難了解的，在以前，當我們還是集中主義者的時候，我們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無產者的共同生活條件上、放在他們的一致利益上的，而關於他們的『民族差別』，我們只是在和他們的共同利益不相抵觸的範圍內來談的；在以前，我們認為最首要的問題是要弄清楚俄國各民族無產者之間一致的地方在哪裏，他們之間共同點是什麼，以便在這些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全俄工人的集中的政黨。而現在，當『我們』已成爲聯邦主義者的時候，引起我們注意的却是一個新的最主要的問題：要弄清楚俄國各民族的無產者之間有什麼不同，他們之間有什麼差別，以便在『民族差別』的基礎上建立各個民族的政黨。這樣，在集中主義者是次要東西的『民族差別』，在聯邦主義者却成爲建立各民族政黨的基礎了。

如果我們沿着這條路再走下去，那末我們遲早就要得出一個結論：例如，阿爾明尼亞無產者的『民族的』和某些其他的『差別』是和阿爾明尼亞資產階級的這些『差別』一樣的；阿爾明尼亞無產者和阿爾明尼亞資產者具有同樣的習俗和性格；他們組成一個民族，組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民族』。

這就離『共同行動的統一基礎』不遠了，不論資產者或無產者，作爲同一『民族』的成員都應當站在這個基礎上，互相親密地攜起手來。這時，專制沙皇的偽善政策可能被認爲是這種友誼的『新的』明證，而關於階級對抗的言論將被認爲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教條』。何況還有人會用他那富有詩意的手『更大胆地』撥動暫時還存在於俄國各民族無產者中間的狹隘的民族琴絃，彈出他所需要的調子來。沙文主義的騙術將會博得信用（信任），朋友會被認作敵人，而敵人會被認作朋友，於是就要發生混亂，而俄國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也就要降低了。

◎『阿爾明尼亞社會民主工人組織』剛剛採取了這樣一個值得誇耀的步驟，它在自己的『宣言』中堅決地宣稱：『決不能把無產階級（阿爾明尼亞的無產階級）和社會（阿爾明尼亞的社會）分開；團結起來的（阿爾明尼亞的）無產階級應當是阿爾明尼亞人民的最有理性 and 最有力量有機組成部分』，『結成一個社會主義政黨的阿爾明尼亞無產階級應竭力確定阿爾明尼亞的社會思想，阿爾明尼亞無產階級將是白己種族的嫡子』等等（見『阿爾明尼亞社會民主工人組織』的『宣言』第三條）。

第一、令人不解的是：爲什麼『不能把阿爾明尼亞無產階級和阿爾明尼亞社會分開』呢？難道它們不是隨時隨地都在『分開』嗎？當團結起來的阿爾明尼亞無產階級於一九〇〇年（在梯弗里斯）對阿爾明尼亞資產階級和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阿爾明尼亞人宣戰時，難道它不是和阿爾明尼亞社會『分開』了嗎？『阿爾明尼亞社會民主工人組織』如果不是一個和阿爾明尼亞社會其他各階級『分開』了的阿爾明尼亞無產者的階級組織，又是什麼呢？也許『阿爾明尼亞社會民主工人組織』是一個包括一切階級的組織吧？難道戰鬥的阿爾明尼亞無產階級可以限制於『確定阿爾明尼亞社會思想』嗎？難道它不應當前進，向這個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社會思想』宣戰並給它灌輸革命精神嗎？事實證明，它應該這樣做。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末不言而喻，『宣言』應當使讀者注意的就不只是『確定社會思想』，而是同這個思想作鬥爭，而是必須使這個思想革命化；這樣一來，『宣言』就會更好地說明『社會主義

這樣，我們不是打破民族壁壘，而是依照聯邦主義者的美意，用組織上的壁壘把它更加鞏固起來；我們不是把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向前推進，而是把它扔到後面，使它受到危險的考驗。於是，專制沙皇『就要與高采烈』了，因為他永遠也得不到像我們這樣不取報酬的助手。

難道我們是要達到這樣的結果嗎？

最後，我們本來需要一個統一的靈活的集中的黨，這個黨的中央委員會能在瞬息間發動全俄工人，並領導他們向專制制度和資產階級作堅決的衝擊，可是有人却硬塞給我們一個畸形的、分散成各個政黨的『聯邦式的聯盟』！他們給我們的不是鋒利的武器，而是生鏽的武器，並保證說：你們用這

無產階級」的義務。最後，既然這個種族中的一部分——阿爾明尼亞資產階級——像蜘蛛那樣吮吸着阿爾明尼亞無產階級的血液，而另一部分——阿爾明尼亞僧侶——不僅吮吸工人的血液，並且一貫地腐蝕他們的意識，阿爾明尼亞無產階級又怎能成爲『自己種族的嬌子』呢？如果從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看問題，那末所有這些問題都是簡單的，而且是必然要發生的。但是『宣言』的起草人却看不到這些問題，因爲他們是用從崩得（猶太工人聯盟）（七）那裏抄襲來的聯邦主義的民族主義觀點來看問題的。一般講來，『宣言』的起草人似乎立意要處處模仿崩得。他們把崩得第五次代表大會『關於崩得在黨內的地位』的決議第二條也列入了自己的『宣言』。他們把『阿爾明尼亞社會民主工人組織』叫做阿爾明尼亞無產階級利益的唯一保護者（見上述『宣言』第三條）。『宣言』的起草人忘記了我黨在高加索各處建立的委員會（八）幾年來在高加索一直被認爲阿爾明尼亞民族（以及其他各民族）無產者的代表，忘記了這些委員會在用阿爾明尼亞文進行口頭的和印刷品的宣傳鼓動以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並在鬥爭時領導他們等等，而『阿爾明尼亞社會民主工人組織』却是不久前才產生的。他們竟把這一切都忘記了，並且可以想像得到，他們爲了一絲不苟地抄襲崩得的組織觀點和政治觀點，一定會忘掉更多的東西的。

個武器可以更快地消滅你們的勢不兩立的敵人！

你們看，社會民主聯邦主義者要把我們引導到哪裏去！

可是，因為我們不是要『鞏固民族壁壘』，而是要打破這種壁壘，因為我們需要的不是生鏽的武器，而是鋒利的武器，以便根除現時的不公平制度，因為我們不是想叫敵人拍手稱快，而是想叫敵人大吃苦頭，並把他們消滅乾淨，所以很明顯，我們應該撇開聯邦主義者，而找出解決『民族問題』的更好的答案。

二

上面我們所說的是不應該怎樣解決『民族問題』。現在我們就來談一談應該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就是說，社會民主黨是怎樣解決這個問題的。

首先必須記住，現時在俄國活動的社會民主黨是把自己稱為俄國（而不是俄羅斯）社會民主黨的。顯然它是想以此向我們表明，它不僅要把俄羅斯無產者集合在自己的旗幟下，而且要把俄國一切民族的無產者集合在自己的旗幟下，所以它將採取一切辦法來消滅聳立在無產者之間的民族壁壘。

○ 不妨指出，下面所寫的都是對我們黨綱上關於民族問題的條文所作的一些說明。

社會民主黨怎樣理解民族問題？

其次：我們黨已經消除了那籠罩着『民族問題』而把它弄得神秘莫測的迷霧，已把這個問題分解成各個因素，使其中每一個因素都帶有階級要求的性質，並且在綱領中用條文的形式規定出來。這樣，黨就向我們清楚地表明：所謂『民族利益』和『民族要求』，就其本身來說，並沒有特殊的價值；這些『利益』和『要求』究竟有多少值得注意，是要看它們把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和階級發展向前推進多少或能夠向前推進多少而定的。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就藉此明白地指出了它所走上的道路和它在解決『民族問題』時所採取的立場。

『民族問題』是由哪幾部分組成的呢？

社會民主聯邦主義者先生們要求些什麼呢？

(一) 要求『俄國各民族的公民權利平等』嗎？

你們感到不安的是現在俄國盛行的公民權利不平等的現象嗎？你們想把政府剝奪去的公民權利歸還俄國各民族，所以要爲這些民族要求公民平等權利嗎？難道我們反對這個要求嗎？我們非常了解公民權利對於無產者有多麼大的意義。公民權利是一種鬥爭武器，剝奪這些權利就等於剝奪武器；誰不知道沒有武器的無產者就不能很好地進行鬥爭呢？俄國無產階級正需要俄國各民族的無產者都能很好地進行鬥爭，因爲這些無產者鬥爭得愈好，他們的階級覺悟就愈高，而他們的階級覺悟愈高，俄國無產階級的階級團結也就愈緊密。是的，這一切我們都知道，因此我們無論現在和將來都要用全

力爲俄國各民族的公民權利平等而鬥爭！你們只要讀一讀我們黨綱第七條上黨所規定的『全體公民不分性別、宗教信仰、種族和民族，一律享有完全平等權利』，就會知道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負有實現這些要求的責任。

社會民主聯邦主義者還要求什麼呢？

(二) 要求『俄國各民族的語言自由』嗎？

你們感到不安的是俄國各『異』族無產者幾乎都被禁止用本族語言學習，幾乎都被禁止在公共機關、國家機關和其他機關內使用本族語言的情形嗎？確實有理由感到不安！語言是發展和鬥爭的工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語言。俄國無產階級的利益，要求俄國各民族的無產者有充分權利使用那種能够保證他們更容易受到教育，更好地在各種會議上，在各種公共機關、國家機關和其他機關中和敵人作鬥爭的語言。本族語言就被公認爲這樣的語言。他們說：各『異』族的無產者使用本族語言的權利被剝奪了，難道我們能够默不作聲嗎？究竟我們的黨綱是怎樣回答俄國無產階級這個問題的呢？你們只要讀一讀我們黨綱第八條上我黨所要求的『居民有權用本族語言受教育，由國家和地方自治機關出資設立爲保證實現這一權利所必需的學校，每個公民都有權在會議上用本族語言發表意見，在一切地方的公共機關和國家機關中，本族語言應當與國定語言同樣使用』，——你們只要讀了這一條，就會相信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也負有實現這一要求的責任。

社會民主聯邦主義者還要求什麼呢？

(二) 要求「俄國各民族的自治」嗎？

你們想藉此說明同一法律不能同樣適用於俄國境內因獨特的生活條件和居民成分而互不相同的各個地方嗎？你們想讓這些地方都有權使一般的國家法律適合於它們的獨特條件嗎？如果是這樣，如果你們要求的內容是這樣，那就必須用適當的形式表達出這個要求，必須消除民族主義的煙霧即糊塗觀念而直截了當地述說出來。如果你們聽從這個勸告，那末你們就會相信我們絲毫也不反對這個要求。我們毫不懷疑，俄國境內因獨特的生活條件和居民成分而互不相同的各個地方不能同樣應用國家憲法，這樣的地方應該有權用適當的形式來實施一般的國家憲法，以便得到更大的好處，以便更充分地發揮人民中間的政治力量。這是俄國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所要求的。如果你們再讀我們黨綱第三條上我黨所要求的「施行廣泛的地方自治，保證各個具有獨特的生活條件和居民成分的地方有權實行區域自治」，那末你們就會看到俄國社會民主黨先要把這個要求的民族主義煙霧廓清，然後把實現這個要求的責任擔負起來。

(四) 你們是向我們指出沙皇專制制度野蠻地摧殘俄國各「異」族的「民族文化」，橫暴地干涉他們的內部生活並從各方面壓制他們，野蠻地破壞了（並繼續破壞着）芬蘭人的文化機關，殘暴地掠奪了阿爾明尼亞的民族財產等等嗎？你們要求保證不受專制制度殘暴的蹂躪嗎？難道我們沒有看見沙皇專制制度的暴行嗎？難道我們不是一直在反對這種暴行嗎？目前誰都看得很清楚，現在的俄國政府是如何在壓制和絞殺俄國各「異」族的人民。同樣毫無疑義，政府的這種政策每天都在腐蝕俄國無

產階級的階級覺悟，使它受到危險的考驗。因此，我們隨時隨地都要反對沙皇政府這種含有腐蝕作用的政策。因此，我們隨時隨地都要保衛這些民族的各種機關，使之免受專制制度憲警暴力的摧殘，我們不僅要保衛它們的有益的機關，並且要保衛它們的無益的機關，因為俄國無產階級的利益向我們提示：只有各民族自己才有權消滅或發展本民族文化的某一方面。但是，請讀一讀我們的黨綱第九條吧。難道我們的黨綱第九條不就是講的這一點嗎？要附帶說一句，這一條無論在我們的敵人或友人間都引起了紛紛的議論。

但是在這裏，有人打斷我們的話，勸我們停止談論第九條。我們問道：爲什麼呢？他們回答說：『因爲』我們黨綱中的這一條和同一黨綱中第三、第七、第八各條『根本矛盾』，如果賦予各民族以依照自己意志處理本民族全部事務的權利（見第九條），那末在上述黨綱中就不應當有第三、第七、第八各條，——反過來說，如果這些條文在黨綱中仍然保留，那末毫無疑問，就應當把第九條從黨綱中刪去。毫無疑問，『格魯吉亞報』^①也是講的這一類的话，它居然以其固有的輕率態度問道：『對一個民族說『我給你以區域自治權』，而同時又提醒這個民族，說它有權依照自己的意志處理本民族全部事務，——這是什麼邏輯呢？』（見『格魯吉亞報』第九期）『可見』綱領中含有邏輯上的矛盾，『可見』爲了消除這個矛盾，必須把黨綱中某一條或某幾條刪去！是呀，『無條件地』必須刪去，否則怎麼行呢？

① 我們在這裏提到『格魯吉亞報』，只是爲了更好地闡明第九條的內容，本文的目的是批判社會民主聯邦主義者，而不是批判根本和他們不同的『格魯吉亞報派』（見第一章）。

請看，邏輯本身在通過不合邏輯的『格魯吉亞報』表示抗議了。

講到這裏，我想起一個古代的故事。據說從前有一位『解剖聖手』，凡是『真正』解剖家『所必需的』一切：畢業證書、工作場所、解剖器具、無比的奢望，他樣樣都有。但是只缺少一樣小小的東西——解剖學知識。有一次，人家請他說明那些胡亂擺在解剖台上的一套骨頭彼此間有什麼聯系。於是我們這位『著名的聖手』有機會大顯身手了。『聖手』堂而皇之、鄭重其事地『工作』起來了！可是糟糕得很！這位『聖手』對解剖學却一竅不通，他不知道哪些骨頭接在哪些骨頭上才可以成爲一副完整的骨骼！這個可憐蟲忙了半天，出了一身大汗，可是白費氣力！最後，當他把一切弄得亂七八糟、沒有得到任何結果的時候，他就抓起幾根骨頭扔得遠遠的，同時帶着哲學家的神情大罵特罵，說是『居心叵測的』人竟把一些假骨頭放在他的解剖台上。當然，觀衆對這位『解剖聖手』只好報之以哄堂大笑了。

『格魯吉亞報』也發生了這類的『怪事』。它忽然想要分析我們的黨綱，但它却不知道我們的黨綱究竟是什麼東西，應該怎樣加以分析，它不懂得這黨綱中的各個條文彼此有什麼聯系，每個獨立條文有什麼意義，於是就帶着『哲學家的神情』忠告我們說：因爲我不能了解你們的綱領的某某條文，所以（？）必須把它們從綱領中刪去。

可是，我並不想恥笑這個本來就够可笑的『格魯吉亞報』，因爲俗語說，好漢是不打落水狗的！恰恰相反，我甚至情願幫助它理解我們的黨綱，不過要它履行下面幾個條件：（一）要親口承認自己的無知；（二）要仔細聽我的話；（三）要顧到邏輯。

請看問題在哪裏。我們的黨綱第三、第七、第八各條是根據政治集中主義規定的。俄國社會民主黨把這些條文列入自己的綱領時所持的理由是：所謂「徹底」解決「民族問題」，即「解放」俄國各「異」族人民，一般講來，在政治統治權還握在資產階級手中時，是辦不到的。這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目前的經濟發展在「各民族」和「俄羅斯」之間逐漸搭起一座橋梁，使其聯系日益密切，因而在這些民族的資產階級領導集團中間產生友好的感情，結果就使他們的「民族解放」的意願失去了依據；第二、一般講來，無產階級是不會贊助所謂「民族解放」運動的，因為到現在為止，任何這樣的運動總是只有利於資產階級，而腐蝕和損害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的。這些理由就產生了政治集中主義的思想，以及由這個思想所決定的我黨黨綱第三、第七、第八各條。

然而，這正像上面所說的，是一般的看法。

但是，這並不是說不可能造成某種經濟和政治條件，使各「異」族資產階級進步人士在這種條件之下要求「民族解放」。

也可能發生這樣的情況：這種運動對於提高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是有利的。

那時我們黨應該怎麼辦呢？

正因為可能發生這種情況才把第九條列入我們的黨綱，正因為預見到可能發生這種情況才賦予

① 我認為必須告訴讀者，「格魯吉亞報」從最初幾期起就向邏輯宣戰，認為邏輯是必須搗毀的一種雜物。你們不要理會「格魯吉亞報」常用邏輯名義講話這回事，因為它這樣做不過是由於它秉性輕浮和患有健忘病罷了。

各民族一種權利，使他們能竭力本着自己的願望（例如，完全『解放』，實行分立）去處理本民族的事務。

我們黨是一個以領導全俄戰鬥無產階級爲目的的黨，它應該有充分的準備去適應無產階級生活中可能發生的這種情況，正因爲如此，所以它應該把這樣的條文列入自己的綱領。

任何一個深謀遠慮的政黨都應該這樣做。

然而，『格魯吉亞報』的『聖手』和某些社會民主聯邦主義者，原來並不以第九條的這種意思爲滿足。他們要求『斷然地』、『直截了當地』回答一個問題：『民族獨立』對無產階級有利還是無利？①

說到這裏，我想起了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俄國的形而上學者，他們喋喋不休地向當時的辯證論者問到雨水對於收成有益還是有害，要求『斷然地』回答他們。辯證論者當然不難證明，這樣提出問題完全是不科學的。對於這樣的問題在不同的時間應該有不同的回答：雨水在天旱時是有益的，而在多雨時却是無益的，甚至是有害的。所以要求『斷然地』回答這樣的問題，顯然是愚蠢的。

可是，這一類的例子並沒有使『格魯吉亞報』得到教益。

伯恩施坦的信徒們也曾要求馬克思主義者同樣『斷然地』回答下面這個問題：合作社（即消費生產互助社）對於無產階級有益還是有害？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不難證明，這樣提出問題是毫無意義的。

① 見『格魯吉亞報』第九期所載『老（即老朽！）革命者』一文。

他們很簡明地解釋了：一切都以時間地點為轉移，——在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已提高到應有程度的地方，在無產者已團結成一個強固的政黨的地方，如果合作社是由黨着手建立和領導的，那它對無產階級就會有很大的益處，而在沒有具備這些條件的地方，合作社對於無產階級就會是有害的，因為合作社能使工人產生小商人的傾向和行會的閉關自守心理，從而損害工人的階級覺悟。

可是，這個例子也沒有使「格魯吉亞報派」得到教益。他們還更加固執地問道：民族獨立對無產階級有益還是有害？請你們斷然地回答吧！

可是我們看到，那些能在各「異」族資產階級中間產生和發展「民族解放」運動的條件，此刻還不存在，而且將來也不一定會出現，——它們不過是我們所假定的一些可能產生的條件罷了。此外，究竟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在那時會提高到什麼程度，這個運動對於無產階級有多大益處或害處，目前也無法知道！試問，有什麼根據？來「斷然地」回答這個問題呢？從什麼地方能得出這樣的回答？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求「斷然地」回答，難道不是愚蠢嗎？

很明顯，這個問題必須讓各「異」族人民自己去解決，而我們則應當為他們爭取解決這個問題的權利。讓各民族在必要時自己去決定：「民族獨立」對他們有益還是有害？如果有益，那末應該用什麼方式去實現？只有他們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格魯吉亞報派」先生們總是把自己的要求建築在沙灘上，根本就想不到有人能夠為自己的要求找到更堅固的基礎！

可見，依據第九條的規定，各『異』族人民有按照自己願望來處理本民族事務的權利。而我們，依據同一條規定，則應該設法使這些民族的願望成爲真正社會民主主義的願望，使這些願望是從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出發的，爲此就必須以社會民主主義精神去教育這些民族的無產者，而對某些反動的『民族的』習慣、風俗和機關則進行嚴厲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批判，但這並不妨礙我們保護這些習慣、風俗和機關，使之不受憲警暴力的迫害。

第九條的基本意思就是如此。

很容易看出，我們綱領中的這一條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原則有着多麼密切的邏輯上的聯系。既然我們的整個綱領建立在這個原則上，我黨綱第九條和其餘各條有邏輯上的聯系自然也就很明顯了。

愚蠢的『格魯吉亞報』之所以被稱爲『聖明的』機關報，也是因爲它不能領會這種簡單的道理。關於『民族問題』還有什麼沒有談到呢？

(五)是『捍衛民族精神及其特性』嗎？

但是，這種『民族精神及其特性』是什麼呢？科學老早通過辯證唯物主義證明了任何『民族精神』都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有誰駁倒過辯證唯物主義的這個觀點嗎？歷史告訴我們，誰也沒有駁倒過。因此，我們應該贊同上述的科學觀點，應該同科學一起重複說：任何『民族精神』都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既然如此，既然任何『民族精神』都不存在，那末不言而喻，對於根本不存在的東西要加

以任何捍衛，在邏輯上是愚蠢的，這種愚蠢必然會引起相應的、歷史上的（不良的）後果。也許只有『格魯吉亞報』，即『革命的格魯吉亞社會聯邦主義黨的機關報』（見『格魯吉亞報』第九期）^①，才適於談論這種『哲學的』蠢話。

民族問題就是如此。

① 把自己稱呼得這樣奇怪的『黨』，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格魯吉亞報』敘述說（見『格魯吉亞報』第十期增刊第一號）：『今年春天，格魯吉亞革命者，即格魯吉亞無政府主義者，『格魯吉亞報』的擁護者，格魯吉亞社會革命黨人在國外集會並且……結成……格魯吉亞社會聯邦主義黨。』……是的，正是這些一心一意輕視任何政治的無政府主義者，這些崇拜政治的社會革命黨人，這些否認任何恐怖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措施的『格魯吉亞報派』，——正是這樣形形色色和互相排斥的一羣人，居然結成……一個『黨』了！這樣理想的雜湊班子，真是人們任何時候也想像不到的呀！這就是人們不會感到寂寞的地方！有些組織家認定，要把人們結合成一個黨就必須有共同原則。他們弄錯了！這一羣形形色色的人向我們說：『黨』所藉以建立的基礎並不是共同原則，而是沒有原則！我們不要『理論』和原則，不要這些奴隸的枷鎖！這一羣形形色色的人用高談哲理的口吻說道：我們把這些東西擺脫得越快越好。果然，這些人一擺脫了原則，一下子就建立了……一座紙房子——對不起——建立了『格魯吉亞社會聯邦主義黨』。原來『七個半人』只要湊在一塊，隨時就能建立一個『黨』；這班不學之徒，無兵之『將』竟空談宏論：俄國社會民主黨『是反社會主義的、反動的』等等，俄羅斯社會民主黨人是『沙文主義者』，我黨高加索聯盟『奴隸般地』服從黨中央委員會等等（見格魯吉亞革命者第一次代表會議的決議），——這怎能不令人發笑。本來也不應該期待已枯寧時代殘留下來的老古董能做出什麼好事情，什麼樹結什麼果，什麼獻出什麼貨。

* 應當指出，我黨各個部分的一致行動，在某些關鍵時刻的『分子』看來就是『收斂較地團結』。隨着斷定說：這都是神聖實驗的結果。

社會民主黨怎樣理解民族問題？

由此可見，我們黨是把民族問題分成了各個部分，吸取了這個問題中的精華，把它注入自己綱領的血管中，並藉此表明了在社會民主黨內應如何解決『民族問題』，以便根本打破民族壁壘而片刻也不離開我們的原則。

試問，為什麼需要單獨的民族政黨呢？或者：社會民主聯邦主義者藉以建立自己的組織觀點和政治觀點的社會民主主義『基礎』究竟是什麼呢？這種『基礎』是看不出來的，而且也是不存在的。社會民主聯邦主義者是懸在半空中的。

他們可以用兩種方法擺脫這種尷尬的境地：一種方法是他們必須徹底拋開革命無產階級的觀點，而採取鞏固民族壁壘的原則（聯邦主義形式的機會主義）；另一種方法是他們必須拋棄黨組織內的任何聯邦主義，而大胆地舉起消滅民族壁壘的旗幟，並團結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統一陣營中。

載於一九〇四年九月一日

『無產階級鬥爭報』第七期

本文沒有署名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庫泰依斯^①來信^②

這裏現在需要從第六十三期起的『火星報』(1933)雖然它沒有火星，但還是需要它，因為這報上至少還有一些時事簡訊，那有什麼辦法呢，對敵人必須好好地了解才行。十分需要由邦契—布魯也維奇負責出版的東西(1933)：『爲召開代表大會而鬥爭』、『告全黨書』(是否就是二十二人的宣言？(1933))，路多沃依^③寫的『我們之間的爭論』、『論社會主義本質』、『論罷工』等文章(如果出版了的話)，列寧反駁盧森堡和考茨基的小冊子(1933)、『同盟代表大會記錄』(1933)、『進一步』(1933)(如果此刻來不及，可緩寄)。任何新的刊物，從簡短的宣言到較大的著作，只要是稍微涉及現在黨內鬥爭問題的都在需要之列。

我讀了加略爾卡^④寫的小冊子『打倒拿破崙主義』。寫得還不錯。假使他那個鐵錘打得更重一點，砸得更深一點，那就更好一些。開玩笑的語氣和請原諒的字句使他的打擊失去了力量 and 分量，因而損害了讀者的印象。作者大概很懂得我們的立場，對某些問題的理解和發揮都很巧妙，所以這個缺點就特別刺目。凡是站在我們立場上的人，就應當以堅定不移的口吻講話。在這一點上說，列寧是一個真正的山鷹。

普列漢諾夫分析『做什麼？』(1933)的幾篇文章，我也讀過了。此人不是完全發了瘋，便是心懷仇恨

和敵意。我想這兩個原因都是有的。我覺得普列漢諾夫是落在新問題的後面了。他以為在他面前的還是舊時的論敵，所以他總好唱老調，說『社會意識決定於社會存在』，『思想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就好像列寧說過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在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時期便能出現似的。現在就連那些中學生也知道『思想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然而現在所說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這個一般的公式我們早就領會了，現在已到詳細說明這個一般性問題的時候了。現在我們關心的是，怎樣把各個思想創造一個思想體系（社會主義理論），怎樣把大大小小的思想結成一個嚴整的體系——社會主義理論，並且由誰來創造和結成。究竟是羣衆向自己的領導者提供綱領和綱領的根據呢，還是領導者向羣衆提供？假若羣衆自己和羣衆的自發運動能向我們提供社會主義理論，那就用不着去護衛羣衆，使他們不受修正主義、恐怖主義、祖巴托夫主義、無政府主義的有害影響，因為『自發運動本身就會產生社會主義』。如果說自發運動本身不會產生社會主義理論（不要忘記，列寧所說的是社會主義理論），那就是說，社會主義理論是在自發運動之外產生的，是由具備現代知識的人在觀察和研究自發運動以後得來的。那就是說，社會主義理論是『完全不依賴自發運動的增長』，甚至是違背着這個運動而創造的，然後才從外面灌輸到這個運動中去，依照自己的內容，即依照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之客觀要求而糾正這個運動。

由此得出的結論（實際結論）就是：我們應把無產階級提高到能够認識真實的階級利益，認識社會主義的理想，而決不是把這個理想瑣碎化，或者使它去適應自發運動。這個實際結論正是建築在列

寧所奠定的理論基礎上面。只要接受了這個理論前提，任何機會主義都沾染不上你。列寧思想的意義就在於此。我之所以稱它爲列寧思想，是因爲在俄國文壇上沒有人像列寧把它說得那樣清楚。普列漢諾夫以爲自己仍然是生活在九十年代，咀嚼着已經咀嚼過十七八遍的道理，說什麼『二二得四』。他居然不以重複馬爾丁諾夫的思想爲恥……

你大概讀過二十二人的宣言……你們那裏來過一位同志，他帶走了高加索各委員會主張召開黨的非常代表大會的決議。

你以絕望的眼光看問題是沒有道理的，只有庫泰依斯委員會動搖過，可是我已經說服了他們，以後他們也就誓爲布爾什維主義効忠了。說服他們並不困難，因爲有了這個宣言，中央的兩面政策也就昭然若揭，而在得到關於這事的新消息之後，就更不能有所懷疑了。它（中央委員會）一定會碰垮台的，這裏的同志和俄羅斯的同志都將竭力使它垮台。大家都在咬牙切齒地反對它。

寫於一九〇四年九月至十月

第一次刊印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① 格魯吉亞西部的城市。——譯者註。

② 略多沃依是阿·阿·波格丹諾夫（又名馬林諾夫斯基）的筆名。——譯者註。

③ 加略爾卡即布爾什維克米·斯·奧卑明斯基（又名阿歷山得羅夫）。——譯者註。

庫泰依斯來信

(也是那位同志的信)

回信寫遲了，請不要生氣。一向都很忙。你寄來的東西（『同盟代表大會記錄』、加略爾卡和略多沃依兩人寫的『我們之間的爭論』、『社會民主黨人報』創刊號、『火星報』最近幾期）都收到了。略多沃依的見解（『結論之一』）我是喜歡的。反駁盧森堡的那篇文章也很好。這些先生——盧森堡、考茨基、普列漢諾夫、阿克雪里羅得、查蘇利奇等等——竟像至親好友似的，樹立了一種什麼家風。他們不能彼此『背棄』，就像宗法氏族的成員一樣，互相包庇，絲毫也不去考察究竟親人有無過失。正是這種家庭『親屬』的情感使得盧森堡不能客觀地觀察黨內危機（當然還有其他原因，例如對事實了解很差，戴着外國眼鏡看問題等等）。這也就說明了普列漢諾夫、考茨基及其他諸人的某些不體面的行為。

這裏大家都愛讀邦契出版的刊物，因為這些刊物很巧妙地表現出布爾什維克的立場。假如加略爾卡切實地論述了普列漢諾夫的文章（『火星報』第七十期和第七十一期），那就好了。加略爾卡論文的基本意思是說：普列漢諾夫從前講的是一套，現在講的又是一套，自相矛盾。這有什麼了不得！這算什麼新發現！這並不是普列漢諾夫第一次的自相矛盾。也許他還要以此自誇，以為自己就是『辯證

過程』的活的體現。自然，前後不一致是『領導者』政治面貌上的一個污點，而這（污點）無疑是應當指出的。但這裏（即在第七十期和第七十一期上）所說的並不是這件事，而是重要的理論問題（存在對意識的關係問題）和策略問題（被領導者對領導者的關係問題）。依我看來，加略爾卡本應指明：普列漢諾夫對列寧進行的論戰，是十足的唐·吉珂德式的舉動，是同風車搏鬥，因為列寧在自己的書裏是始終一貫地遵循着馬克思關於意識起源的原理的。至於普列漢諾夫在策略問題上所進行的攻擊，則是轉到機會主義者陣營去的『個人』所特有的徹頭徹尾的糊塗觀念。假如普列漢諾夫把問題提得很明確，譬如這樣說：『究竟是誰制定綱領，是領導者還是被領導者？』又如：『究竟是誰把誰提高到了解綱領的水平，是領導者提高被領導者，還是被領導者提高領導者？』或者是：『也許不需要領導者把羣衆提高到了解綱領、策略和組織原則的水平吧？』假如普列漢諾夫如此明確地給自己提出這些問題，提出這些性質單純、內容重複因而本身就包含着答案的問題，那末他也許會對自己的意圖大吃一驚，不會這樣大吹大擂地來反對列寧了。可是由於普列漢諾夫沒有這樣做，就是說，由於他用『英雄和羣衆』的詞句混淆了問題，所以他在策略上就走到機會主義方面去了。混淆問題乃是機會主義者的特色。

在我看來，假如加略爾卡從本質上提出了此類的問題，那就更好了。你也許會說這是列寧的事情，但我不能同意這一點，因為列寧這些受人指摘的觀點並不是列寧私人的觀點，所以這些觀點之被曲解，對其他黨員也像對列寧一樣，是關係重大的。當然，列寧能比別人更好地完成這個任務……

已經通過了一些支持邦契的出版物的決議。也許還能弄到一些經費。你大概已在『火星報』第七十四期上讀過一些『擁護黨內和平』的決議。依·麥·列·梯·亞·明·格·列·里·亞·委員會的決議和巴·庫·委員會的決議沒有被提到，是因為那上面絲毫也沒有談到對中央委員會的『信任』。我寫信告訴過你，九月的決議是堅決要求召開代表大會的。我們且看將來怎樣吧，就是說，且看黨總委員會〔C〕開會的結果怎樣吧。你收到六個盧布沒有？最近幾天內，你還會收到一些錢。不要忘記託那個人把『給一位同志的信』〔C〕這本小冊子帶給我們，因為這裏還有很多人沒有讀過。請把下一期『社會民主黨人報』也寄來。

柯斯特羅夫〔C〕又給我們寄來了一封信，信內說到精神和物質（彷彿講的是印花布一類的物質）。這個蠢驢竟不懂得他在這裏遇見的對象並不是『黎溝報』〔C〕的讀者。組織問題和他有什麼相干呢？

『無產階級鬥爭報』〔C〕最近一期（第七期）已經出版了。那上面有我寫的一篇反對組織上和政治上的聯邦主義的論文〔C〕，順告。如有可能，就將這一期寄給你。

寫於一九〇四年十月

第一次刊印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政黨

(論黨章第一條)

大胆宣佈『俄國是統一而不可分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連小孩子也知道『統一而不可分的』俄國並不存在，它早就分成兩個對立的階級，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現在誰都曉得這兩個階級間的鬥爭已變成我國現代生活所賴以旋轉的軸心。

然而，在此以前這一點是難於看出的，其原因是由於當時只有個別集團在個別城市和個別角落裏進行鬥爭，因此我們只看見鬥爭舞台上的個別集團，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作爲兩個階級，當時還看不出來，也難以看出來。可是後來各個城市和各個區域聯合起來了，無產階級各個集團攜起手來了，總罷工和示威運動爆發了，——於是我們面前就呈現出兩個俄國即資產階級俄國和無產階級俄國互相鬥爭的一幅壯麗的圖畫。在鬥爭舞台上出現了兩支大軍即無產者大軍和資產者大軍，這兩支大軍間的鬥爭已波及我國整個的社會生活。

既然軍隊沒有領導者就不能行動，既然每支軍隊都有自己領路的先頭部隊，那末就很明顯，和這

兩支大軍一起行動的還應有各自的領導集團，即通常所說的政黨。

於是出現了如下的情景：一邊是自由黨率領的資產者大軍，另一邊是社會民主黨率領的無產者大軍，每支大軍都在自己的政黨領導下進行階級鬥爭^①。

我們之所以提到這點，是爲了把無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作個比較，從而簡略地闡明無產階級政黨的一般面貌。

上述一切已經足以說明：無產階級政黨作爲一個戰鬥的領導集團，第一、按成員數量來說，它應當比無產階級小得多；第二、按覺悟程度和經驗來說，它應當比無產階級更高些；第三、它應當是一個團結一致的組織。

在我們看來，上述一切是用不着證明的，因爲很明顯，只要有必然使人民大衆貧困落後的資本主義制度存在，整個無產階級就不能提高到應有的覺悟程度，所以必須有一個覺悟的領導集團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無產者大軍，把這支大軍聯合起來，並在鬥爭中領導他們。同樣很明顯，一個以領導戰鬥的無產階級爲目的的政黨，就不應當是個人的偶然湊合，而應當是團結一致的集中的組織，因爲只有這樣才能按照統一的計劃指導黨的工作。

簡略說來，我們黨的一般面貌就是如此。

① 我們完全沒有講到俄國其他各政黨，因爲要來闡明我們所分析的問題，根本沒有講到這些政黨的必要。

先記住這一點，再來談我們的主要問題：我們究竟能把什麼人稱爲黨員呢？本文所論的黨章第一條就是講這個問題的。

那末，我們就來研究這個問題吧。

我們究竟能把什麼人稱爲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黨員呢？換句話說，黨員的義務是什麼呢？

我們黨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黨。這就是說，我們黨有自己的綱領（運動的最近目的和最終目的），有自己的策略（鬥爭方式）和自己的組織原則（結合形式）。綱領、觀點、策略、觀點和組織觀點的一致，是我們黨賴以建立的基礎。只有這些觀點的一致，才能把黨員結成一個集中的黨。如果觀點的一致被破壞了，黨也就要瓦解的。所以只有完全承認黨的綱領、策略和組織原則的人才能稱爲黨員，只有足夠理解 and 完全承認我們黨的綱領、策略和組織觀點的人才能參加我們黨的隊伍，同時也就是參加無產者大軍的領導者隊伍。

可是，就一個黨員說來，是不是只承認黨的綱領、策略和組織觀點就够了呢？能不能把這樣的人稱爲無產者大軍的真正領導者呢？當然不能！第一、大家知道，世界上有不少的空談家很樂意「承認」黨的綱領、策略和組織觀點，可是除了講空話以外，什麼也不能做。如果把這種空談家稱爲黨員（即稱爲無產者大軍的領導者），那就會褻瀆黨的神聖尊嚴！況且我們黨又不是一個哲學學派或宗教教派。難道我們黨不是一個鬥爭的黨嗎？既然我們黨是一個鬥爭的黨，它就不能滿足於抽象地承認它的綱領、策略和組織觀點，它就一定要求自己的黨員實現他所承認的觀點，這難道不明白嗎？這就

是說，誰要想成爲我們黨的黨員，誰就不能只以承認我們黨的綱領、策略和組織觀點爲滿足，而應該實行這些觀點，實現這些觀點。

但是，就一個黨員說來，實現黨的觀點是什麼意思呢？他什麼時候才能實現這種觀點呢？只有當他進行鬥爭的時候，當他和全黨一起走在無產階級大軍前頭的時候。不能單獨地、分散地進行鬥爭呢？當然不能！相反地，人們首先要聯合起來，組織起來，然後再投入戰鬥。否則任何鬥爭都是不會有結果的。所以很明顯，就是黨員也只有當他們結成一個團結一致的組織時，才能進行鬥爭，因而才能實現黨的觀點。同樣很明顯，黨員愈能緊密地結成一個團結一致的組織，就愈能更好地進行鬥爭，因而也就愈能更完滿地實現黨的綱領、策略和組織觀點。有些人說得對，我們黨是領導者的組織，而不是個人的湊合。既然我們黨是領導者的組織，那末很明顯，只有在這個組織中工作、認爲自己的義務是把個人願望同黨的願望融爲一體並和黨一起行動的人，才能算做這個黨的一員，算做這個組織的一員。

這就是說，要做一個黨員，就必須實現黨的綱領、策略和組織觀點；要實現黨的觀點，就必須爲這種觀點而鬥爭；要爲這種觀點而鬥爭，就必須在黨的組織中工作並和黨一起工作。顯然，要做一個黨員，就必須參加黨的一個組織^①。只有當我們參加了黨的一個組織，因而把我們個人的利益和黨的

① 正如任何複雜的有機體都是由無數最簡單的有機體組成的一樣，我們黨作爲一個複雜的總的組織，也是由許多區域的組織即地方組織所組成的，這些組織一經黨代表大會或中央委員會批准，便可稱爲黨的組織。由此可見，並不

利益融爲一體的時候，我們才能成爲黨員，才能成爲無產者大軍的真正領導者。

既然我們黨不是一些空談家的湊合，而是通過中央委員會來很好地引導無產者大軍前進的領導者的組織，那末上述一切也就不言而喻了。

還要指出一點。

以前我們黨很像一個好客的宗法家庭，願意把一切同情者都接納進來。可是我們黨在成了一個集中的組織以後，也就拋掉了那副宗法的面貌，完全變爲一座只對够資格的人開放大門的堡壘了。這對於我們是有重大意義的。正當專制政府竭力用「工聯主義」、民族主義和教權主義等等來腐蝕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的時候，而另一方面，又當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竭力摧殘無產階級的政治獨立性、竭力想控制無產階級的時候，我們應當非常警惕，決不應忘記我們黨是一座只對經過考驗的人開放大門的堡壘。

我們已經闡明了做黨員的兩個必要條件（承認黨綱和在黨組織中工作）。如果再加上一個條件，即黨員必須給黨以物質上的幫助，那末有權取得黨員稱號的一切必要條件就完全具備了。

這就是說，只有承認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綱、給黨以物質上的幫助並參加黨的一個組織的人，才能稱爲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員。

只是委員會才稱爲黨的組織。中央委員會的成立是爲了指導這些組織使它們按照統一計劃來工作，這些地方黨組織便通過中央委員會而組成一個巨大的集中的組織。

列寧同志①所提出的黨章第一條的條文就是這樣。

可見這個條文完全是從我們黨是集中的組織，而不是個人的湊合，這一觀點產生的。

這個條文的最大優點就在這裏。

然而，竟有一些同志把列寧的條文當做『狹隘的』和『不方便的』條文而加以接斥，並提出了自以為既不『狹隘』又非『不方便的』條文。我們說的是馬爾托夫②的條文，現在我們來分析這個條文。

依據馬爾托夫的條文說來，『凡承認黨綱，在物質上幫助黨並在黨的一個組織領導下經常親自協助黨者，皆得爲俄國社會民主黨黨員』。可見這個條文中略去了做黨員所必要的第三個條件，即黨員必須參加黨的一個組織。馬爾托夫竟認爲這個明確而必要的條件是多餘的，並在自己的條文內加進了『在黨的一個組織領導下……親自協助黨』這樣一個含糊的語句來代替這個條件。這樣說來，不參加黨的任何一個組織（這像什麼『黨』呵！），不認爲自己應該服從黨的意志（這像什麼『黨的紀律』呵！）也可以成爲一個黨員！試問，黨對於那些不參加黨的任何一個組織，因而不認爲自己應該絕對服從黨的紀律的人，又怎能『經常地』加以領導呢？

馬爾托夫提出的黨章第一條的條文就在這個問題上碰得粉碎了，而這個問題在列寧的條文中却解決得很巧妙，因爲列寧的條文肯定地認爲參加黨的一個組織是做黨員所必要的第三個條件。

① 列寧是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中傑出的理論家和實踐家。

② 馬爾托夫是『火星報』編輯之一。

這樣，我們只有把馬爾托夫條文中『在黨的一個組織領導下……親自協助黨』這個含糊而毫無意義的語句丟掉。如果丟掉這個條件，馬爾托夫的條文中就只剩下兩個條件（承認黨綱和給予物質上的幫助），這兩個條件本身是沒有任何價值的，因為任何一個空談家都可以『承認』黨綱並給黨以物質上的幫助，但這決不能使他享有做黨員的權利。

看吧，這就是所謂『方便的』條文！

我們說：真正的黨員決不應該只以承認黨綱為滿足，他們必須努力實現自己所承認的綱領。馬爾托夫回答說：你們太嚴格了，因為就一個黨員說來，如果他不拒絕給黨以物質上的幫助等等，那末實現他所承認的綱領就不十分需要了。馬爾托夫好像憐憫某些『社會民主主義』空談家似的，不願意對他們關上黨的大門。

其次，我們說，因為要實現黨的綱領，就必須進行鬥爭，而要進行鬥爭，就必須團結起來，所以願意做黨員的人必須加入黨的一個組織，必須把個人願望同黨的願望融為一體，必須和黨一起去領導戰鬥的無產者大軍，就是必須組成集中的政黨的嚴整部隊。馬爾托夫回答說：並不一定要求黨員非組成嚴整的部隊不可，非結成組織不可，各人單獨進行鬥爭也成了。

我們要問：那末我們黨究竟是什麼呢？是個人的偶然湊合呢，還是團結一致的個導者的組織？如果說它是領導者的組織，那末能不能把不參加這個組織，因而不認為自己必須服從其紀律的人算做這個組織中的一員呢？馬爾托夫回答說：黨並不是一個組織，或者確切些說，黨是一個無組織的組

織（請看，這是什麼『集中制』呀！）！

可見照馬爾托夫看來，我們黨不是一個集中的組織，而是由一些承認我們黨綱等等的地方組織和個別『社會民主主義』分子湊合起來的。但是，如果我們黨不是一個集中的組織，它也就不會是一座只對經過考驗的人才敞開大門的堡壘。的確，在馬爾托夫看來，也正如他的條文所表明的那樣，黨並不是一座堡壘，而是一切同情者都可以自由參加的宴會。一個人只要有一點知識，只要表示一點同情，只要給一點物質上的幫助，那就成了，他就有充分權利算做一個黨員了。馬爾托夫給那些嚇慌了的『黨員』打氣說：有些人認為黨員必須參加黨的一個組織，因而必須使個人願望服從黨的願望，別聽他們的話！第一、同意這些條件是很難的，因為使個人願望服從黨的願望並不是好玩的呀！第二、我已經在自己的說明中指出過，這些人的意見是錯誤的。好吧，先生們，請光臨……宴會吧！

馬爾托夫好像是憐憫某些沒有決心使個人願望服從黨的願望的教授和中學生，於是在我們黨的堡壘上鑿了一個洞，讓這些可敬的先生有機會偷偷地鑽進我們黨內來。他向機會主義大開方便之門，而且是在成千上萬的敵人壓制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時大開方便之門呢！

然而，還不止於此。問題在於馬爾托夫那個可疑的條文使機會主義有可能在我們黨內從另一方面產生出來。

我們知道，馬爾托夫的條文只說到承認綱領，關於策略和組織却隻字未提，其實爲了保證黨內的一致，不僅要有綱領觀點的一致，同樣還要有組織觀點和策略觀點的一致。有人會對我們說，列寧同

志的條文也沒有講到這一點。不錯！但是要知道，列寧同志的條文是沒有必要講到這一點的！一個人既在黨的一個組織中工作，就必然和黨在一起進行鬥爭，服從黨的紀律，所以他除了遵循黨的策略和黨的組織原則而外，當然不能遵循其他的策略和其他的組織原則，難道這還不明白嗎？然而對於一個只承認黨綱而不參加黨的任何組織的『黨員』，你有什麼可說呢？怎能担保這個『黨員』所持的策略和組織觀點就是黨的策略和組織觀點，而不是別的策略和組織觀點呢！這就是馬爾托夫的條文無法向我們說明的問題！接受了馬爾托夫的條文，我們就不免會有一個奇怪的『黨』，它的『黨員』有同一的綱領（這還成問題！），而策略觀點和組織觀點却各不相同！真是妙不可言的多樣性！我們的黨又怎能不像一個宴會呢？

不過要問一問：究竟應當把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所囑咐我們的、與馬爾托夫條文根本矛盾的那個思想上和實踐上的集中制置於何地呢？毫無疑問，如果一定要在兩者之間選擇一個，那末丟掉馬爾托夫的條文是會正確一些。

這就是馬爾托夫向我們提出的、和列寧同志的條文相反的多麼荒謬的條文！

我們認為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馬爾托夫的條文是考慮不周的結果；我們希望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一定能改正第二次代表大會的錯誤並採納列寧同志的條文。

現在把以上所說的再路述一遍。無產者大軍已經走上了鬥爭舞台。如果說任何一支大軍都要有自己的先頭部隊，那末無產者大軍也應有這樣一個部隊。因此，就出現了無產階級領導者集團，即俄

國社會民主黨。這個黨既然是一定的大軍的先頭部隊，第一、它就應當用自己的綱領、策略和組織原則武裝起來；第二、它就應當是一個團結一致的組織。如果要問究竟應當把什麼人稱爲俄國社會民主黨黨員，那末這個黨只能給一個回答：只有承認黨綱、在物質上幫助黨並在黨的一個組織中工作的人，才能稱爲本黨黨員。

列寧同志在他那個傑出的條文中所表達的正是這個十分明顯的真理。

載於一九〇五年一月一日

「無產階級鬥爭報」第八期

本文沒有署名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高加索的工人們，是復仇的時候了！

沙皇陸軍大量減員，沙皇艦隊相繼覆沒，旅順口終於可恥地投降了，——這又一次暴露了沙皇專制制度的衰朽腐敗……

由於飲食惡劣和缺乏任何衛生設備，在士兵中間流行着各種傳染病。又因為連起碼的住所和服裝都沒有，這種不堪忍受的情況就更加惡化了。瘦弱而又疲憊的士兵，像蒼蠅一樣地死去。而在這以前還有成千上萬的陣亡者！……這種情況在士兵中間引起了波動和不滿。士兵逐漸從沉眠中覺醒過來，開始覺得自己是人；他們不再盲目服從長官的命令，而時常用口哨聲和威嚇聲來對待那些「作威作福的軍官」。

一個軍官從遠東給我們來信說：

「我做了一件蠢事！不久以前，我遵照長官的要求向士兵講了一次話。當我剛剛提到必須保衛沙皇和祖國的時候，會場上立刻發出了一片口哨聲、謾罵聲、威嚇聲……我不得不躲開這羣狂怒的人……」

遠東的情況就是如此！

高加索的工人們，是復仇的時候了！

如果再加上俄國國內後備軍人中間的騷動和他們在敖德薩、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庫爾斯克、平茲及其他城市裏舉行的革命的遊行示威，新兵在古里亞、依麥列梯亞、加爾塔里尼亞、俄國南部和北部的抗議，如果再注意到無論是監獄或子彈都阻止不住抗議的人們（不久以前，在平茲有幾個後備軍人因參加遊行示威而被槍決），那末就容易了解俄國士兵的心事了……

沙皇專制制度就要失去它的主要靠山，它的『可靠的軍隊』！

另一方面，沙皇國庫一天比一天空虛。軍事失敗一個接着一個。沙皇政府在外國政府面前逐漸喪失了信用。目前它只能勉強弄到必需的款項，再過些時候，任何貸款也會弄不到手了！『無疑地，你很快就要垮台了；你被推翻以後，誰來還債？』這就是外國政府對信用掃地的沙皇政府的回答！至於困苦飢寒的人民，連自己都不能餬口，還能拿出什麼給沙皇政府呢？！

這樣，沙皇專制制度連它的第二個主要靠山，即仰給於貸款的富裕國庫也要喪失了！

同時，工業危機一天比一天嚴重，工廠不斷地倒閉，數百萬工人要求麪包和工作。更嚴重的飢荒籠罩着受盡苦難的農村貧民。日益高漲的人民的怒潮愈來愈猛烈地衝擊着沙皇的寶座，腐朽的沙皇專制制度搖搖欲墜了……

當俄國憤怒的人民準備進行堅決衝鋒的時候，四面受敵的沙皇專制政府像毒蛇那樣蛻去老皮，竟放下（彷彿是放下！）皮鞭，披上羊皮，宣佈了和好政策！

同志們，聽見了嗎？沙皇政府現在請求我們忘掉皮鞭的響聲和子彈的嘯聲，忘掉成百成千被殺

害的英勇同志，忘掉他們的英靈，而這些英靈正環繞在我們的身旁，對我們耳語說：『要復仇呀！』

專制制度竟恬不知恥地向我們伸出沾滿鮮血的雙手，勸我們同它和好！它下了一道什麼『聖旨』？，答應給我們什麼『自由』……真是一羣老練的強盜！他們想用空話來給數百萬忍飢挨餓的俄國無產階級羣衆充飢！他們想用空話來滿足千百萬窮困疲憊的農民的要求！他們想用諾言來壓倒戰爭的犧牲者孤兒寡婦的哭聲！可惡的東西！他們快淹死了，還想抓住一根草來救命！……

是的，同志們，沙皇的寶座搖搖欲墜了！沙皇政府把從我們身上刮去的脂膏作為俸祿分給那些屠殺我們的劊子手——大臣、省長、縣官、獄吏、警官、憲兵和暗探；這個政府把我們的子弟抓去當兵，又強迫他們來槍殺我們；這個政府千方百計地支持那些時時刻刻反對我們的地主和老闆；這個政府給我們戴上腳鐐手鐐，使我們淪爲毫無權利的奴隸；這個政府野蠻地踐踏和侮辱了我們最神聖的東西——人格；正是這個政府，現在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就要失去它的立足地了！

是復仇的時候了！現在是應該爲那些在雅羅斯拉夫里、多姆布羅夫、里加、彼得堡、莫斯科、巴士姆、梯弗里斯、茲拉托烏斯特、梯霍列茨卡雅、米哈伊洛夫、基什涅夫、哥美里、亞庫茨克、古里亞、巴庫及其他地方被沙皇暴吏殘殺的光榮同志復仇的時候了！現在是要求沙皇政府對遠東戰場上成千上萬的無辜死難者負責的時候了！現在是應該擦乾他們遺留下來的孤兒寡婦的眼淚的時候了！現在是要求沙皇政府對我們遭受的苦難和屈辱，對它一向用來拘禁我們、侮辱我們的鎖鏈負責的時候了！現在是打倒沙皇政府、爲社會主義制度掃清道路的時候了！現在是推翻沙皇政府的時候了！

我們一定要推翻沙皇政府。

自由派的先生們力圖挽救正在崩潰的沙皇寶座，是枉費心機的！他們竭力想在沙皇那裏求得一點恩施，使沙皇採納他們所擬定的『憲法草案』⁽²⁾，以便用一些小小的改良，給他們自己鋪平走上政治統治的道路，並且把沙皇變成他們的工具，用資產階級專制制度來代替沙皇專制制度，然後有步驟地扼殺無產階級和農民！但這都是白費氣力的！自由派的先生們，已經太晚了！請睜開眼睛看看沙皇政府究竟給了你們些什麼吧，請讀一讀那道『聖旨』吧：那裏有微不足道的『地方自治局和城市自治局』的『自由』，有微不足道的『個人權利不受侵害』的『保障』，有微不足道的『言論出版』的『自由』，同時還有大書特書的訓誡：說『一定要維護不可變更的帝國根本法』，說『要採取切實辦法來保持法律的全部效力：因為這種法律是專制國家內最重要的朝廷柱石』……結果呢？人們還沒來得及弄明白可笑的沙皇所下的可笑『勅令』，而對各報社的『警告』就雪片似地飛來，憲兵警察到處橫行，甚至連平常的宴會也被禁止了！沙皇政府自己就已竭力證明：它那些微不足道的諾言都不過是無聊的空話而已。

另一方面，憤怒的民衆却準備革命，而不準備跟沙皇和好。他們堅信這句諺語：『駝背只有墳墓能醫治。』是的，先生們，你們真是白費氣力！俄國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它就像旭日東昇一樣地不可避免！難道你們能阻止旭日東昇嗎？這個革命的主力是城鄉無產階級，這個革命的旗手是社會民主黨，而決不是你們這班自由派的先生們！為什麼你們忘記了這件顯而易見的『小事』呢？

暴風雨即將來臨，它是曙光到來的先聲。從巴庫到巴士姆的高加索無產階級，在兩三天前就已一致表示了他們對沙皇專制制度的痛恨。無疑地，高加索無產者這次光榮的嘗試對俄國其他各處的無產者不會沒有影響。其次，請讀一讀各地工人羣衆對沙皇政府表示深惡痛絕的無數決議，請聽一聽農村中那種敢怒而不敢言的沸騰的怨聲，你就會確信俄國像一枝裝上子彈、扣起扳機的槍，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是的，同志們，俄國革命即將爆發，「根除」可惡的沙皇的醜觀寶座的時候已經不遠了！

我們的重大的責任是充分準備迎接這個時機。同志們，我們就來準備吧！來吧，我們在廣大無產階級羣衆中撒播好的種子吧！讓我們攜起手來團結在各地黨委員會的周圍吧！我們連一分鐘也不應當忘記；只有黨委員會才能勝任地領導我們，只有黨委員會才能指引我們走進那叫做社會主義世界的『樂園』！只有俄國社會民主黨才能使我們睜開眼睛認清敵人，才能把我們組成一支勇猛的大軍，並率領我們去和敵人作鬥爭，才能和我們同甘共苦而且總是走在我們前頭！今後還是它來領導我們前進，也只有它才能領導我們前進！

根據普遍、平等、直接和無記名投票制選舉出來的立憲會議，——這就是我們現在所應當爭取的！

只有這樣的立憲會議才能使我們有一個爲爭取社會主義所極其需要的民主共和國。

同志們，前進吧！當沙皇專制制度動搖的時候，我們的責任就是準備堅決衝擊！是復仇的時候了！

打·倒·沙·皇·專·制·制·度·！
全·民·立·憲·會·議·萬·歲·！
民·主·共·和·國·萬·歲·！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萬·歲·！

一九〇五年一月

按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高加索聯盟秘密印刷所
（阿禪拉巴爾印刷所）一九〇五年一月八日印
的傳單原文刊印

署名：聯盟委員會

各民族友愛萬歲！

公民們！革命無產階級的運動正在發展，民族間的壁壘正在崩潰！俄國各民族的無產者正在團結成一支各民族的大軍，無產階級運動的許多細流正在匯合成一條總的革命洪流。這條洪流的浪潮日益高漲，日益猛烈地衝擊着沙皇的寶座。腐朽的沙皇政府搖搖欲墜了。無論監獄、苦役或絞架，都阻止不住無產階級的運動。這個運動日益發展起來了！

沙皇政府爲了鞏固自己的寶座，想出了一個『新』辦法。它煽動俄國各民族互相敵視，它唆使俄國各民族互相殘殺，它力求把無產階級總的運動分裂成一些零星的運動並使其互相對抗，它組織蹂躪猶太人、阿爾明尼亞人的暴行，如此等等。而這一切都是爲了用兄弟自相殘殺的戰爭來離開俄國各民族，削弱它們，然後毫不費力地把它們一一征服！

分而治之，——這就是沙皇政府的政策。沙皇政府在俄國各個城市是這樣幹的（請回顧一下哥美里、基什涅夫及其他城市的蹂躪行爲），在高加索也是這樣幹的。下賤的東西！它力求用公民的鮮血和屍體去鞏固它那可惡的寶座！巴庫城內瀕於死亡的阿爾明尼亞人和韃靼人的呻吟，妻子、母親和孩兒的眼淚，誠實而尚未覺悟的公民的無辜鮮血，手無寸鐵、死裏逃生的人們的驚惶神色，被毀壞的

家園，被劫掠一空的商店和不絕於耳的可怕的槍聲，——這就是屠殺誠實公民的劊子手沙皇用以鞏固他那寶座的東西。

是的，公民們！是他們這幫沙皇政府的走卒唆使一部分還沒有覺悟的韃靼人去殘殺和平的阿爾明尼亞人！是他們這幫沙皇政府的走狗把槍枝和子彈發給韃靼人，叫警察和哥薩克穿上韃靼服去殘殺阿爾明尼亞人！這幫沙皇的奴才花了兩個月的時間製造這次兄弟自相殘殺的戰爭，他們的野蠻目的畢竟達到了。罪該萬死的沙皇政府！

現在，可鄙的沙皇手下這幫可鄙的奴僕又竭力要在我們梯弗里斯挑起兄弟自相殘殺的戰爭！他們要你們流血，他們想分裂你們，統治你們！你們可要警惕呀！阿爾明尼亞人、韃靼人、格魯吉亞人和俄羅斯人，你們要携起手來，更緊密地團結在一起，政府企圖分裂你們，你們就一致回答它：打倒沙皇政府！各族人民友愛萬歲！

大家携起手來，聯合起來，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團結在這個真正能把巴庫慘案的唯一禍首沙皇政府葬入墳墓的力量周圍。

你們應當一致高呼：

消滅民族糾紛！

打倒沙皇政府！

各族人民友愛萬歲！

民·主·共·和·國·萬·歲！

一九〇五年二月十三日

按俄國社會民主黨梯弗里斯委員會
印刷所印的傳單原文刊印

署名：梯弗里斯委員會

各民族友愛萬歲！

告公民書。紅旗萬歲！

大希望變成了大失望！不是民族敵視，而是互相友愛，互相信任！不是兄弟間的自相殘殺，而是反對沙皇制度、反對這個製造蹂躪行為的禍首的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沙皇政府的希望破滅了！它畢竟沒有挑起梯弗里斯各民族的互相殘殺！……

沙皇政府早已在竭力唆使無產者自相殘殺，早已在竭力分裂總的無產階級運動。所以它在哥美里、基什涅夫及其他地方組織了蹂躪少數民族的暴行。爲了同一目的，它又在巴庫挑起了兄弟自相殘殺的戰爭。現在，沙皇政府又把視線投向梯弗里斯來了。它想在這裏，在高加索的中心演出了一齣流血血的慘劇，然後再搬到各地去重演！它唆使高加索各民族互相殘殺，使高加索無產階級淹沒在自己的血泊裏。多妙呵！沙皇政府洋洋得意了。它甚至散發傳單，號召屠殺阿爾明尼亞人！它滿以爲成功在望。誰知在二月十三日那天，成千上萬的阿爾明尼亞人、格魯吉亞人、韃靼人和俄羅斯人，好像偏要和沙皇政府作對，集合在萬克教堂院子裏發誓要『在反對離開我們的魔鬼的鬥爭中』互相支持，充分表現了萬衆一心的氣概。有些人發表演說，號召『團結』，羣衆報以掌聲。我們的傳單散發了三千份。羣衆爭先恐後地搶着閱讀。羣衆的情緒高昂起來了。他們簡直有意和政府爲難，決定次日還在這個教

堂院子裏集合，以便再次『宣誓互相親愛』。

二月十四日。教堂的整個院子和附近的大街小巷都擠滿了人。散發和閱讀我們的傳單，都是完全公開的。民衆成羣結隊地討論着傳單的內容。有些人發表演說。羣情高昂，當即決定：舉行遊行示威，從錫安教堂和回教寺院近旁經過，在途中『宣誓互相親愛』，直到波斯墓場停下，再作一次宣誓，然後解散。羣衆立刻實行自己的決議。在途中，在回教寺院附近和波斯墓場上，都有人發表演說並散發我們的傳單（這天總共散發了一萬二千份）。羣衆情緒越來越高。蓄積的革命精力正在奔放。羣衆又決定通過總督府大街及戈洛文大街繼續遊行示威，然後解散。我們委員會利用機會立刻組織了一個小小的領導核心。這個核心由一個先進工人率領，位置在隊伍的中心，於是一面臨時製成的紅旗就在總督府前飄揚起來了。由示威者抬起來的旗手發表了富有鮮明政治色彩的演說。他首先請同志們不要因旗幟上沒有社會民主黨的口號而惶惑。示威者回答說：『沒有關係，沒有關係，這個口號已經牢記在我們心裏了！』然後旗手說明紅旗的意義，用社會民主黨的觀點批評先前發言的人，揭露他們言論的不徹底，指出消滅沙皇制度和資本主義的必要並號召示威羣衆在社會民主黨紅旗下進行鬥爭。『紅旗萬歲！』羣衆回答說。示威羣衆向萬克教堂行進，途中停留三次並聽旗手演說。旗手再次號召示威羣衆和沙皇制度作鬥爭，並請大家宣誓：要像現在參加遊行示威一樣，萬衆一心地舉行起義。『我們宣誓！』羣衆回答說。以後，示威羣衆到達萬克教堂近旁，同哥薩克發生了小小的衝突，然後就解散了。

「梯弗里斯八千公民大示威」的情形就是如此。

梯弗里斯公民就這樣回答了沙皇政府的偽善政策。他們爲了討還巴庫公民的血債，就這樣對萬惡的政府實行了報復。光榮和榮譽歸於梯弗里斯公民！

梯弗里斯數千公民集合在紅旗下，幾次宣判沙皇政府的死刑；面臨着這種情形，萬惡的沙皇政府的那幫萬惡的奴才不得不實行退却，放棄了這次蹂躪少數民族的暴行。

可是，公民們，這是不是說沙皇政府今後再不設法組織這種暴行呢？絕對不是！只要沙皇政府存在一天，它愈失去立足之地，它就要愈頻繁地對少數民族採取蹂躪行爲。根絕這種暴行的唯一方法就是消滅沙皇專制制度。

公民們，你們珍重你們自己和你們親人的生命嗎？你們愛護你們的親戚朋友，而不願遭受蹂躪嗎？如果這樣，那你們就要知道，只有消滅沙皇制度，才能消滅一切蹂躪行爲和隨之而來的流血慘劇！

推翻沙皇專制制度，——這就是你們首先應該達到的目的！

公民們，你們想消滅任何民族敵視嗎？你們想求得各族人民的完全團結一致嗎？如果這樣，那你們就要知道，只有消滅不平等現象，只有剷除資本主義制度才能消滅一切民族糾紛！

社會主義的勝利，——這就是你們最後應該達到的目的！

可是，有誰能把卑鄙齷齪的沙皇制度連根剷除，有誰能使你們永不遭受蹂躪呢？只有社會民主

黨所領導的無產階級。

有誰能摧毀資本主義制度，有誰能使地球上的各民族團結一致呢？也只有社會民主黨所領導的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也只有無產階級，才能爲你們爭得自由與和平。

那末，你們就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站到社會民主黨旗幟下面來吧！

公民們，站到紅旗下面來吧！

打倒沙皇專制制度！

民主共和國萬歲！

打倒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萬歲！

紅旗萬歲！

一九〇五年二月十五日

按俄國社會民主黨梯弗里斯委員會

印刷所印的傳單原文刊印

署名：梯弗里斯委員會

略論黨內意見分歧

(CIV)

『社會民主黨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

——考茨基

我們的『孟什維克』真是太討厭了！我說的是梯弗里斯的『孟什維克』。他們一聽說黨內有分歧意見，就喋喋不休地說：『不管你高興不高興，我們隨時隨地都要談論意見分歧，不管你高興不高興，我們反正總是要罵『布爾什維克』！於是他們就拚命地罵，好像發了瘋一樣。在一切十字路口，在自已人或外人中間，總而言之，不管在什麼地方，他們都是叫嚷着老一套：要提防『多數派』，這不是自己人，這是靠不住的人！單在『通常的』活動場所叫罵，他們還嫌不夠，還把『案件』搬到合法刊物上去，從而再次向世人表明自己的……討厭。』

『多數派』究竟有什麼過錯呢？我們的『少數派』為什麼要這樣『生氣』呢？
讓我們來看看歷史事實吧。

『多數派』和『少數派』是在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一九〇三年）上開始產生的。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我們分散的力量本來應該團結成一個統一的強大的黨。我們這些黨的工作者對這次代表大會曾

抱着很大的希望。我們當時歡呼：我們終於等到了這一天，我們就要團結成一個統一的黨了，我們就有可能按照統一的計劃活動了！……固然，在此以前我們也活動過，但我們過去的活動是分散的

無組織的。固然，在此以前我們也曾企圖統一起來，正是爲了這個目的，我們召開了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一八九八年），甚至似乎是『統一起來了』，可是這種統一只在口頭上存在；黨仍然分散爲一些單個的集團，力量仍然是分散而需要統一的。所以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必須把分散的力量集合起來，並把它們團結成一個整體。我們必須建立一個統一的黨。

但事實證明，我們當時的希望在某種程度上是過早了。這次代表大會並沒有能够使我們團結成一個統一而不可分的黨，它只是爲這樣一個黨奠定了基礎。然而代表大會却向我們清楚地表明：黨內存在着兩條路綫，一條是『火星報』（指舊『火星報』）的路綫，一條是『火星報』反對者的路綫。因此代表大會就分成兩部分，即『多數派』和『少數派』。前者擁護『火星報』路綫，並團結在『火星報』周圍；後者則反對『火星報』而採取相反的立場。

這樣，『火星報』就成了黨內『多數派』的旗幟，而『火星報』的立場就成了『多數派』的立場。

『火星報』走的是什麼道路呢？它所維護的是什麼呢？

要了解這一點，就必須知道它是在什麼條件下登上歷史舞台的。

『火星報』創刊於一九〇〇年十二月。這是俄國工業開始發生危機的時候。伴隨有一系列同業罷工（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八年間）的工業繁榮，漸漸爲危機代替了。危機一天天尖銳起來，而且成了

同業罷工的障礙。雖然如此，工人運動還是爲自己開闢道路，並向前發展：許多細流匯成一條洪流，運動日益帶有階級色彩，漸漸走上了政治鬥爭的道路。工人運動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了……不過當時還看不見先進部隊，還看不見能把社會主義意識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把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結合起來因而賦予無產階級鬥爭以社會民主主義性質的社會民主黨^①。

當時的『社會民主黨人』（他們被稱爲『經濟派』）究竟幹了些什麼呢？他們竭力讚揚自發運動，漫不經心地重複說：工人運動並不怎樣需要社會主義意識，沒有這種意識它也能很好地達到自己的目的，問題的實質在於運動本身。運動就是一切，而意識却是微不足道的。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這就是他們努力追求的目標。

既然如此，那末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使命究竟是什麼呢？他們斷定說：它應該是自發運動的馴服的工具。把社會主義意識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並不是我們的事情，領導這個運動也不是我們的事情，——這只是徒勞無益的強制；我們的義務只是傾聽這個運動的聲息並準確地記錄社會生活中所發生的事情，——我們應該做自發運動的尾巴^②。一句話，社會民主黨被描繪成運動中的累贅。

誰不承認社會民主主義，誰也就不應該承認社會民主黨。正因為如此，『經濟派』才這樣固執已

① 社會民主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其中包括一切社會民主主義的戰士，不論他是工人或是知識分子。

② 我們的『社會民主黨人報』（三）燃起了『批評』的熱情（見創刊號『多數派還是少數派？』一文），不過我應該指出，它對『經濟派』和『工人事業派』（他們彼此的區別不大）估計得不正確。問題並不在於他們『蔑視政治問題』，而在

見，再三斷言無產階級政黨在俄國是不可能存在的。他們說：讓自由派去從事政治鬥爭吧，這種事情是比較合乎自由派的身分的。我們社會民主黨人應該幹些什麼呢？我們應該照舊以單個的小組形式存在，各小組在自己的圈子裏單獨活動。

需要的不是黨而是小組！——他們說。

這樣，一方面，工人運動發展起來了，它需要一個先進的領導的隊伍；另一方面，以『經濟派』爲代表的『社會民主黨』，不但不去領導運動，反而否認自己的作用，做了運動的尾巴。

當時必須大聲疾呼地說明一個思想：沒有社會主義的自發工人運動就是在黑暗中摸索，即使有一天能摸索到目的地，但誰知道要到什麼時候並且要受多少痛苦，所以社會主義意識對於工人運動是有極大意義的。

同時還必須說明，這種意識的體現者社會民主黨應該把社會主義意識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應該始終走在運動的前頭，而不要冷眼旁觀，做自發工人運動的尾巴。

於他們做運動的尾巴和只是重複運動所提示給他們的東西。過去有一個時期僅僅舉行罷工。那時他們宣傳的是經濟鬥爭。到了遊行示威的時期（一九〇一年），發生了流血事件，產生了失望情緒，於是工人就採用恐怖手段，以爲這能拯救他們，使他們不受暴君的統治。這時『經濟派——工人事業派』也加入總的合唱隊並且神氣十足地宣稱：現在應該採取恐怖手段，襲擊監獄，釋放獄中同志等等了（見『工人事業』雜誌（二）『歷史性的轉變』一文）。可見這決不能說他們是『蔑視政治問題』的。該文作者是借用馬爾丁諾夫的話來進行『批評』的，但如果他去了解一下歷史事實，那就比較有益了。

同時還必須說明一個思想：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直接責任是把無產階級各個先進隊伍集合起來，把它們團結成一個統一的黨，從而永遠結束黨內的分散狀態。

『火星報』着手規定的正是這些任務。

請看它在一篇綱領性的論文（見『火星報』創刊號）中是怎樣說的：『社會民主黨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¹⁾這就是說，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或站在工人運動外面的社會主義，都是社會民主黨應該反對的一種不良現象。可是，因為『經濟派——工人事業派』崇拜自發運動，因為他們輕視社會主義的意義，所以『火星報』指出：『工人運動脫離了社會民主黨就會瑣碎化，並且必然會墮入資產階級的泥潭。』因此，社會民主黨的責任是『給這個運動指出它的最終目的，指出它的政治任務，保護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獨立性』。

俄國社會民主黨有什麼責任呢？『火星報』繼續寫道：『由此自然要產生出俄國社會民主黨所應該實現的任務：把社會主義思想和政治自覺灌輸到無產階級羣衆中去，組織一個和自發工人運動有緊密聯系的革命的黨。』這就是說，它應該始終走在運動的前頭，它的首要任務就是把工人運動中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力量團結成一個統一的黨。

『火星報』編輯部⁽²⁾就是這樣論證它的綱領的。

① 當時『火星報』編輯部由普列漢諾夫、阿克雪里羅得、查蘇利奇、馬爾托夫、斯塔羅維爾⁽³⁾和列寧六人組成。

『火星報』是否實現了這個出色的綱領呢？

大家都知道它是怎樣努力實現這些極重要的思想的。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向我們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因為代表大會以三十五票的多數承認『火星報』為全黨的中央機關報。

既然如此，那末某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還要『謾罵』舊『火星報』，難道不是很可笑的嗎？

請看孟什維克的『社會民主黨人報』對『火星報』所發的議論吧：

『它（『火星報』）應當分析『經濟主義』的思想，排斥謬誤的觀點，採取正確的觀點，並把『經濟主義』納入新的軌道……可是事實上却不是這樣。反對『經濟主義』的鬥爭引起了另一個極端，即輕視經濟鬥爭，對它採取鄙棄的態度，只承認政治鬥爭有首要的意義。不經濟的（應該說：『沒有經濟的』）政治，——這就是新的方向。』（見『社會民主黨人報』創刊號『多數派還是少數派？』一文）

但是，可敬的『批評家』，這一切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在哪個國家發生的呢？普列漢諾夫、阿克雪里羅得、查蘇利奇、馬爾托夫和斯塔羅維爾做了些什麼？他們既然在編輯部中佔多數，為什麼不把『火星報』引上『正』路呢？最可敬的『批評家』，在這以前你自己究竟幹什麼去了？你為什麼沒有警告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要是警告了的話，它就不會承認『火星報』為中央機關報了。

但是，我們且把『批評家』撇開吧。

事情是這樣的：『火星報』正確地看出了『迫切的問題』，正是走上了我在上面說過的那條道路，並且努力地執行了自己的綱領。

列寧在他卓越的著作『做什麼？』一書中更明確、更令人信服地表明了『火星報』的立場。

我們就來談談這本書吧。

『經濟派』崇拜自發的工人運動，但誰不知道自發運動就是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就是工聯主義』^①，而工聯主義是不願看見資本主義範圍以外的任何東西的。誰不知道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就是在資本主義圈子裏踏步不前，在私有制周圍徘徊，即使有一天能達到社會革命，但誰知道要在什麼時候並且要受多少痛苦才能達到。工人們是在最近時期還是經過一個長時期，是經過容易的道路還是經過困難的道路才能踏上『樂土』，這些問題對於他們難道都是無所謂的嗎？顯然，誰讚揚自發運動並崇拜自發運動，誰就不由自主地在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之間挖掘鴻溝，誰就輕視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意義，誰就把這個思想體系逐出實際生活之外，並且不由自主地使工人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支配，因為他不了解『社會民主黨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②，不了解『對工人運動自發性的任何崇拜和對「覺悟成分」的作用即社會民主黨的作用的任何輕視，都是——完全不管輕視者自己願意與否——加強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對於工人的影響』^③。

① 列寧：『做什麼？』第二十八頁。（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一一頁）

② 考茨基：『愛爾福特綱領』第九十四頁，中央委員會出版。

③ 列寧：『做什麼？』第二十六頁。（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〇九頁）

我們來比較詳細地說明一下。在我們這個時代只能存在着兩種思想體系：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它們之間的區別，也在於前者（即資產階級思想體系）較後者要老得多，傳播的範圍要廣得多，在生活中扎下的根要深得多，無論在自己人中間或外人中間，到處都可以碰到資產階級的觀點，而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則剛剛開始走了幾步，剛剛給自己開闢道路。不用說，如果就思想的傳播來講，那末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即工聯主義的意識，比剛剛走了幾步的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傳播起來要容易得多，對於自發工人運動的影響也要廣泛得多。這一點之所以正確，尤其是因為自發運動——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本來「就有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支配的傾向」^①。而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支配就是排斥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因為這兩種思想體系是互相否定的。

有人會問我們：怎麼？難道工人階級不是傾向於社會主義的嗎？是的，它是傾向於社會主義的。不然的話，社會民主黨的活動就會是毫無結果的了。然而同樣正確的是：反對和阻礙這個傾向的，有另一個傾向，就是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支配的傾向。

我剛才說過，我國社會生活中浸透了資產階級思想，所以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比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傳播起來要容易得多。不要忘記，資產階級的思想家這時也並沒有打瞌睡，他們照自己的辦法裝扮成社會主義者，竭力想使工人階級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支配。如果社會民主黨人也像「經濟派」一

① 列寧：「做什麼？」第二十八頁。（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二頁）

樣地毫不在意，做自發運動的尾巴（社會民主黨採取這種態度時，工人運動就是自發的），那末不言而喻，自發的工人運動就將沿着這條老路走去並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支配，當然要到長期的摸索和痛苦迫使它和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斷絕聯系而奔赴社會革命的時候為止。

這就叫做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支配的傾向。

請看列寧是怎樣說的：

『工人階級自發地傾向於社會主義，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時時刻刻以各種形式復活起來的）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却自發地而又最厲害地迫使工人接受它。』^①正因為如此，所以自發的工人運動，當它還帶着自發性的時候，當它還沒有和社會主義意識結合起來的時候，就要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支配並且有受這種思想體系支配的傾向^②。如果不是這樣，那末社會民主主義的批評、社會民主主義的宣傳就是多餘的了，那末『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也是多餘的了。

社會民主黨一定要反對這種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支配的傾向，而促進另一種傾向即社會主義的傾向。當然，將來總有一天，經過長期的摸索和痛苦之後，自發運動沒有社會民主黨的幫助也會達到自己的目的，也會走到社會革命的門前，因為『工人階級自發地傾向於社會主義』^③。但在那時以前怎

① 列寧：『做什麼？』第二十九頁。（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二二頁）

② 同上，第二十八頁。（同上，第二二一頁）

③ 同上，第二十九頁。（同上，第二二二頁）

麼辦呢？在那時以前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像『經濟派』那樣袖手旁觀並且讓位給司徒盧威和祖巴托夫一夥人嗎？擯棄社會民主主義而促成資產階級的工聯主義思想體系的統治嗎？忘掉馬克思主義而不把『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嗎？

不！社會民主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①，它的責任是始終走在無產階級前頭，它的責任是『使工人運動脫離這種投到資產階級羽翼下去的工聯主義的自發趨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羽翼下來』^②。社會民主黨的責任是把社會主義意識灌輸到自發的工人運動中去，把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結合起來，因而賦予無產階級鬥爭以社會民主主義的性質。

有些人說，某些國家的工人階級自己已經創造出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科學的社會主義），並且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自己也會創造出這種思想體系的；因此，他們說，把社會主義意識從外面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完全是多餘的。但這是極大的錯誤。要創造科學的社會主義，就必須領導科學，就必須用科學知識武裝起來，並善於深刻地研究歷史發展的法則。而工人階級，當它還是工人階級時，是不能領導科學、推進科學並科學地研究歷史法則的，因為它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經費來做這件事情。考茨基說：『科學的社會主義』只有在深湛的科學知識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出來……但科學的代表人物並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的知識階層（着重號是考茨基加的）。現代的社會主義學說也就是從這

① 馬克思：『宣言』第十五頁（三）。

② 列寧：『做什麼？』第二十八頁。（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一一頁）

一階層的個別分子的頭腦中產生出來的，他們把這個學說傳給了才智出衆的無產者……」^①

因此，列寧說：凡是崇拜自發的工人運動和對它袖手旁觀的人，凡是經常輕視社會民主黨的意義而讓位於司徒盧威——祖巴托夫一夥的人，都以爲這個運動本身就能創造出科學社會主義來。『但這是極大的錯誤』^②。有些人以爲在九十年代舉行罷工的彼得堡工人已經有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但這也是錯誤的。他們並沒有這種意識，『而且也不可能。這種意識（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各國的歷史都證明：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即必須結成工會，必須和廠主鬥爭，必須向政府爭取頒佈工人所需要的某些法令等等的信念。而社會主義學說則是由有產階級中學識豐富的人即知識分子創造的哲學、歷史和經濟的理論中成長起來的。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們的社會地位來說，也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③。列寧繼續寫道：這當然不是說，『工人不參加這一創造工作。但他們不是以工人的身分來參加，而是以社會主義理論家的身分，以蒲魯東和魏特林（他們兩個都是工人）一類人的身分來參加的，換句話說，只有當他們多少能掌握他們那個時代的知識並把它向前推進的時候，他們才能多少參加這一創

① 列寧：『做什麼？』第二十七頁，那裏引用了考茨基發表於『新時代』雜誌（三）（見該雜誌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第三期第七十九頁）的一篇有名論文中的這段話。（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二〇頁）

② 同上，第二十六頁。（同上，第二〇九頁）

③ 同上，第二十頁至第二十一頁。（同上，第二〇二頁）

造工作』。

這一切可以大致設想如下。存在着資本主義制度。有工人，也有廠主。他們之間進行着鬥爭。科學社會主義暫時還沒有在任何地方出現。當工人已在進行鬥爭時，科學社會主義在任何地方却還無影無踪……對的，工人在鬥爭着。然而他們是各自反對自己的廠主，和自己的地方當局發生衝突；那裏在罷工，這裏在舉行羣衆大會和遊行示威；那裏在向當局要求權利，這裏在宣佈抵制；有些人在談論政治鬥爭，另一些人則在談論經濟鬥爭，如此等等。但這並不是說工人已經具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也不是說：他們的運動的目的是要摧毀資本主義制度，他們確信推翻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就像確信旭日必然東昇一樣，他們認為爭取自己的政治統治（無產階級專政）是達到社會主義勝利的必要工具等等。

與此同時，科學在發展着。工人運動逐漸引起科學的注意。大部分學者有了一種想法，認為工人運動是些不安分守己的人的騷動，不妨用皮鞭去開導他們。另外一些學者則以為富人應該分給窮人一點殘羹剩飯，即認為工人運動是乞丐運動，目的是要討得一些施捨。在一千個這樣的學者中間，也許只有一個能够科學地觀察工人運動，科學地研究全部社會生活，注意階級間的衝突，傾聽工人階級的怨聲，並且終於科學地證明：資本主義制度決不是什麼永恆的東西，它也和封建制度一樣是暫時

① 列寧：『做什麼？』第二十七頁。（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二〇頁）

的，隨之而來的必然是把它否定了的社會主義制度，而社會主義制度只能由無產階級經過社會革命來建立。一句話，科學社會主義正在被創造着。

當然，假如沒有資本主義和階級鬥爭，也就不會有科學社會主義。但同樣正確的是：少數的幾個人，比方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假如他們沒有掌握科學的知識，也就不能創造出科學社會主義。

什麼是沒有工人運動的科學社會主義呢？——這好像是放在船上不用的羅盤，只會生鏽，結果只好把它扔到海裏去。

什麼是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呢？——這好像是一隻沒有羅盤的大船，雖然也能駛到彼岸，但是有了羅盤，到達彼岸就會快得多，危險也會少一些。

把這兩件東西結合起來就會有一隻很好的大船，它會一直駛向彼岸，安然靠近碼頭。

把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結合起來就會有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它會一直向前猛進，到達『樂土』。

所以，社會民主黨（而不只是社會民主黨的知識分子）的責任就是把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把社會主義意識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因而賦予自發的工人運動以社會民主主義的性質。

列寧就是這樣說的。

某些人斷定說，似乎在列寧和『多數派』看來，工人運動如果不和社會主義思想體系聯結起來，就會趨於滅亡，不能達到社會革命。然而這是一種臆說，是一些閒人的臆說，這種臆說恐怕只能從安恩之流的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頭腦中產生出來（見『旅行家』雜誌『』第六期『什麼是黨？』一文）。

列寧確定地說：「工人階級自發地傾向於社會主義。」①列寧之所以沒有詳細說明這一點，只是因為他認為用不着去證明本來已經證明了的東西。此外，列寧並沒有打算研究自發運動，他只是想向實際工作者說明他們應該自覺地做些什麼。

列寧在和馬爾托夫論戰的另一個地方又說過如下一段話：

「我們黨是不自覺過程的自覺表現者。」正是如此。並且正因為如此，所以力求使「每個罷工者」都能自稱為黨員的這一傾向是不正確的，因為假使「每次罷工」都不只是強大的階級本能和必然引向社會革命的階級鬥爭的自發表現，而是這個過程的自覺表現……那末我們的黨……就會一下子把整個資產階級社會消滅掉。」②

可見在列寧看來，即使不能稱為社會民主主義的那種階級鬥爭和階級搏鬥，也必然會把工人階級引向社會革命的。

如果你們對另外一些「多數派」代表的意見也感興趣，那末就請你們聽聽吧。他們中間的哥林同志在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說道：

「如果讓無產階級自行其是，那末事情會怎樣呢？這就會和資產階級革命前夜所發生的事情相似。資產階級革命家未曾有過任何科學的思想體系。然而資產階級制度還是產生了。沒有自己的思

① 列寧：「做什麼？」第二十九頁。（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一二頁）
② 列寧：「進一步，退兩步」第五十三頁。（同上，第四一五頁）

想家的無產階級，當然，歸根到底也會朝着社會革命方面工作的，不過是本能地工作……無產階級也會本能地實行社會主義，但它不會有社會主義理論。這一過程不過是緩慢而較為痛苦罷了。」^①

這段話是無須解釋的。

總之，自發的工人運動，即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必然會瑣碎化而帶有工聯主義的性質，它一定會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支配。能否由此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就是一切，工人運動却是微不足道的呢？當然不能！只有唯心主義者才這樣說。經過很長時期以後，總有一天經濟的發展必然把工人階級引向社會革命，因而將迫使它和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斷絕任何聯繫。問題只在於這將是一條很漫長很痛苦的道路。

另一方面，沒有工人運動的社會主義，不管它是在什麼樣的科學基礎上產生的，終究還是一句空話，毫無意義。能否由此得出結論說，運動就是一切，社會主義却是微不足道的呢？當然不能！只有那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才會發出這樣的議論，他們認為意識既然是社會生活本身產生的，因而也就沒有任何意義。社會主義可以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從而由空洞的詞句變成銳利的武器。

結論呢？

結論就是：工人運動必須和社會主義相結合，實踐活動和理論思想必須融合為一，從而賦予自發

① 見「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記錄」第二一九頁。

的工人運動以社會民主主義的性質，因為『社會民主黨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①。於是，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的社會主義就會由空洞的詞句變成工人手中極大的力量。於是，變成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自發運動就會循着正確的道路迅速地走向社會主義制度。

那末，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使命何在呢？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

我們的責任，社會民主黨的責任，就是使自發的工人運動離開工聯主義的道路而走上社會民主主義的道路。我們的責任就是把社會主義意識^②灌輸到這個運動中去，並把工人階級的先進力量團結成一個集中的黨。我們的任務就是始終走在運動的前頭，毫不倦怠地和一切阻礙這些任務實現的人作鬥爭，不管他們是敵人也罷，『朋友』也罷。

大體說來，『多數派』的立場就是如此。

我們的『少數派』不喜歡『多數派』的立場，他們說，這個立場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矛盾的』！最可敬的先生們，真是這樣的嗎？究竟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在什麼行星上有這種事情呢？他們說：讀一讀我們的論文，你們就會相信我們是對的。好，我們就來讀一讀吧。

我們面前有一篇叫做『什麼是黨？』的文章（見『旅行家』雜誌第六期）。『批評家』安恩是怎樣責備黨內『多數派』的呢？『他們（『多數派』）……自稱為黨的首腦……硬要別人服從他們……爲了替

① 見『愛爾福特綱領』第九十四頁，中央委員會出版。

② 即馬克思和恩格斯創造出來的意識。

自己的行為辯護，甚至常常臆造出一些新理論，譬如說，工人羣衆靠自己的力量不能領會（着重號是我加的）『崇高理想』等等。』^①

試問：『多數派』現在或過去什麼時候是否提出過類似的『理論』呢？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沒有提出過！恰恰相反，『多數派』的思想代表列寧同志十分確定地說，工人階級很容易領會『崇高理想』，很容易領會社會主義。請聽吧：

『人們常常說：工人階級自發地傾向於社會主義。在下述意義上說，這完全是正確的，就是社會主義理論比其他一切理論都更深刻更正確地確定工人階級受苦受難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領會這個理論。』^②

可見在『多數派』看來，工人是很容易領會那些叫做社會主義的『崇高理想』的。

那末安恩為什麼要異想天開，他這個奇怪的『發現』是從什麼地方挖掘出來的呢？讀者們，原來『批評家』安恩所指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指的是『做什麼？』一書中的一段話，列寧在那裏講到了創造社會主義並斷言工人階級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創造出科學社會主義^③。但你們會說：怎麼會是這樣的呢？創造社會主義是一回事，領會社會主義則是另外一回事。為什麼安恩忘記了列寧明白地說

① 見『旅行家』雜誌第六期第七十一頁。

② 列寧：『做什麼？』第二十九頁。（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二二頁）

③ 同上，第二十頁至第二十一頁。（同上，第二〇二頁）

到領會『崇高理想』的那些話呢？讀者們，你們是對的，但安恩既然很想做一個『批評家』，他應該怎麼辦呢？你們想一想，這是多麼英勇的事情：編造出自己的一套『理論』，把它硬套在對方的頭上；然後就對準自己幻想出來的果實開火。這就是所謂批評！不管怎樣，安恩『靠自己的力量不能領會』列寧的『做什麼？』一書，這倒是毫無疑義的。

現在我們就打開所謂『社會民主黨人報』來看看。『多數派還是少數派？』（見『社會民主黨人報』創刊號）一文的作者說了些什麼呢？

他勇氣十足、大喊大叫地攻擊列寧，因為在列寧看來，『工人運動的自然的（應當是『自發的』）發展不是走向社會主義，而是走向資產階級思想體系』^①。可見作者並不懂得自發的工人運動就是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讓作者去證明不是這樣吧！），而這樣的運動一定會受資產階級的工聯主義的思想體系的支配，一定會傾向於它，因為我們這個時代只能存在着兩種思想體系，即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和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凡是前者不存在的地方，後者就一定出現並佔據其地位（你證明這是相反的吧！）。是的，列寧正是這樣說的。但同時他並沒有忘記工人運動所特有的另一種傾向，即社會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不過是暫時被那種接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傾向所遮蔽罷了。列寧直截了當地說『工人階級自發地傾向於社會主義』^②，並且正確地指出社會民主黨的任務是除其他辦法外，也採取和

① 見『社會民主黨人報』創刊號第十四頁。

② 列寧：『做什麼？』第二十九頁。（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二二頁）

『經濟派』作鬥爭的辦法來加速這種傾向的勝利。可敬的『批評家』，為什麼你的文章裏不引用列寧的這些話呢？難道這些話不也就是這位列寧說的嗎？這樣做是於你不利的，對不對？

作者又說：『依照列寧的意見……工人按其地位（着重號是我加的）來說，與其說是社會主義者，不如說是資產者……』^①真是蠢話，我簡直沒有料到這樣的作者會說出這樣的蠢話！難道列寧指的是工人的地位嗎？難道他斷言工人按其地位來說是資產者嗎？該要多麼蠢的人才會說被剝奪了生產工具、靠出賣勞動力過活的工人按其地位來說是資產者呢？不！列寧所說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問題在於一個人按其地位來說可能是無產者而不是資產者，但他同時也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地位，因而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支配。在這種場合，工人階級的情形也正是如此。而這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一般地說，作者愛說空話，不加思考就脫口而出！例如作者一味固執地說『列寧主義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矛盾的』^②，他這樣反覆地說，却不了解這種『思想』會把他引到哪裏去。假定我們暫時相信他，以為列寧主義確實『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矛盾的』，往下又怎樣呢？由此會得出什麼結論呢？結論如下：『列寧主義把『火星報』（舊『火星報』）拉過去了』（這是作者也不否認的），可見『火星報』也『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矛盾的』。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以三十五票的多數承認『火星報』為黨的中央

① 見『社會民主黨人報』創刊號第十四頁。

② 同上，第十五頁。

機關報，並且對它的功績大加稱讚^①，可見這次代表大會及其綱領和策略也『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矛盾的』……讀者們，這豈不可笑嗎？

作者仍繼續說：『照列寧的意見，自發的工人運動是去和資產階級結合的……』是的，是的，作者無疑是去和愚蠢結合了，如果他能離開這條道路，那就好了。

但是，我們且把『批評家』撇開，來請教馬克思主義吧。

可敬的『批評家』一味固執地說，『多數派』及其代表——列寧的立場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矛盾的，因為無論是考茨基，或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都和列寧所堅持的相反！真是這樣嗎？我們來看吧！

作者告訴我們說：『考茨基在他的「愛爾福特綱領」中寫道：「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利益互相對立到這樣的程度，以致這兩個階級的意向在相當長久的時期內不能結合起來。在每個具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中，工人階級之參加政治活動遲早會使工人階級脫離資產階級政黨而成立獨立的工人黨。」』

但是，由此得出的結論是什麼呢？結論只能是：資產階級的利益和無產階級的利益是互相矛盾的，無產階級『遲早』要脫離資產階級而成立獨立的工人黨（請記住：是工人黨而不是社會民主工

○ 見『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記錄』第一四七頁。記錄裏載有一項決議，把『火星報』稱為社會民主主義原則的真正維護者。

黨)。作者以爲考茨基在這裏是和列寧的意見分歧的！其實列寧是說無產階級遲早不僅要和資產階級脫離，而且要實行社會革命，即推翻資產階級。他又補充說：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就是竭力使社會革命盡可能迅速地實現，並且自覺地實現。是的，正是自覺地而不是自發地實現，因爲列寧所說的正是一種自覺性。

這位「批評家」繼續從考茨基的書中引證說：「……在情況已經發展到建立獨立的工人黨的地方，工人黨如果不是一開始就受到社會主義傾向的感染，遲早必定能領會社會主義傾向，那末歸根到底它一定會成爲社會主義的工人黨，即社會民主黨。」^②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只是說工人黨將領會社會主義的傾向。難道列寧否認這一點嗎？根本沒有這回事！列寧直截了當地說：不僅工人黨，而且整個工人階級也在領會社會主義。③。既然如此，這個「社會民主黨人報」和它那位大撒其謊的英雄爲什麼要胡說八道呢？他們爲什麼要亂說一通呢？俗語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們這位迷糊了的作者正是這樣。

可見考茨基在這裏是和列寧沒有絲毫分歧的。但這一切却異常清楚地證明了作者的思考不周。考茨基是否說過什麼有利於「多數派」立場的話呢？請看，這就是他在一篇分析奧國社會民主黨

① 列寧：「進一步，退兩步」第五十三頁。（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四一五頁）

② 見「社會民主黨人報」創刊號第十五頁。

③ 列寧：「做什麼？」第二十九頁。（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二二頁）

綱領草案的出色論文中說過的一段話：

『在我們那些修正派的批評家（伯恩施坦的信徒）中間，有許多人以為馬克思似乎曾經斷言經濟發展和階級鬥爭不僅造成社會主義生產的條件，而且還直接產生確認社會主義生產之必要性的意識（着重號是考茨基加的）。於是這些批評家就反駁道，資本主義最發達的英國，對於這種意識却是最陌生的。根據草案（奧國草案）看來，可以設想，奧國社會民主黨綱領起草委員會也是贊成這一……觀點的……草案上寫道：「資本主義的發展愈使無產階級的數量增加，無產階級就愈是不得不進行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並且也愈有可能來進行這個鬥爭。無產階級就會意識到」社會主義有實現的可能和必要。因此社會主義意識就是無產階級鬥爭的必然的直接結果。但這種觀點是完全不正確的……現代社會主義意識只有在深湛的科學知識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出來……但科學的代表人物並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的知識階層（着重號是考茨基加的）。現代的社會主義學說也就是從這一階層的個別分子的頭腦中產生出來的，他們把這個學說（科學社會主義）傳給了才智出衆的無產者，後者又把它灌輸到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去……可見社會主義意識是一種從外面灌輸到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去的東西，而並不是一種從這個鬥爭中自發產生出來的東西。因此，舊「加因斐綱領」說得非常正確：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就是把認識無產階級地位及其任務的意識灌輸到無產階級中去……』

讀者們，你們能否回憶起列寧對這一問題的類似的思想？你們能否回憶起「多數派」的那個衆所

周知的立場？爲什麼「梯弗里斯委員會」及其「社會民主黨人報」要隱瞞真情呢？爲什麼可敬的「批評家」講到考茨基的時候在自己論文中却不引證考茨基的這幾句話呢？那些最可敬的人是在欺騙誰呢？爲什麼他們這樣「輕視」讀者呢？莫非因爲他們……害怕真理，躲避真理，以爲真理也是可以隱瞞的嗎？他們正像一種烏，把自己的頭藏在翅膀下面，就以爲誰都不見它了！他們正像這種烏一樣糊塗。

既然社會主義意識是在科學基礎上創造出來的，既然這種意識要由社會民主黨^①努力從外面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那末很明顯，這一切都是因爲當工人階級還是工人階級的時候，就不能領導科學，不能靠本身的力量創造科學社會主義：它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經費來做這件事情。

考茨基在他的「愛爾福特綱領」中說過如下一段話：

「……無產者至多只能領會資產階級學者們所創造的一部分知識，並使之適合於自己的和需要，然而當他們還是無產者的時候，他們是沒有空閒時間和經費來獨立地把科學發揮到資產階級思想家所達到的範圍之外的。所以獨創的工人社會主義不免帶有空想主義的一切重要特徵。」^②（空想

① 見「新時代」雜誌（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第二十卷第三期第七十九頁。考茨基的這篇精彩論文曾被引用於列寧的「做什麼？」一書第二十七頁。（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〇九頁至第二一〇頁）

② 並且不僅是社會民主黨的知識分子。

③ 見「愛爾福特綱領」第九十三頁，中央委員會出版。

主義就是虛假的非科學的理論。)

考茨基繼續說：這種空想社會主義往往帶有無政府主義的性質，可是「……大家知道，凡是無政府主義運動（即指無產階級空想主義而言。——考茨基註）真正深入羣衆而成爲階級運動的地方，儘管這種運動在表面上還帶有激進的色彩，但遲早總要變爲最狹隘的純粹的職工運動」①。

換句話說，工人運動若不和科學社會主義相結合，就不免會瑣碎化而具有「狹隘職工運動」的性質，因而受工聯主義思想體系的支配。

『這是蔑視工人，這是抬高知識分子呀！』我們的『批評家』及其『社會民主黨人報』大喊大叫起來……不幸的『批評家』，可憐的『社會民主黨人報』！他們把無產階級看成一位任性的小姐，對她不能說實話，永遠只能恭維她，使她不至於跑掉！不，最可敬的人們！我們相信，無產階級會表現出超過你們所想像的堅強性來。我們相信它不會害怕實話！而你們……究竟對你們有什麼可說：你們現在還是害怕實話，而且在自己的文章中沒有把考茨基的真實觀點告訴讀者……

總之，沒有工人運動的科學社會主義，永遠是些隨便說說的空話。

另一方面，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就是一種工聯主義的瞎闖，固然它有一天也會引導到社會革命，可是要付出長期的磨難和痛苦的代價。

① 見『愛爾福特綱領』第九十四頁，中央委員會出版。

結論呢？

『工人運動應和社會主義相結合』：『社會民主黨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①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考茨基就是這樣說的。

我們已經看到『火星報』（舊『火星報』）和『多數派』也是這樣說的。

我們已經看到列寧同志也是站在這個立場上的。

可見『多數派』是堅定地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的。

很明顯，少數派『批評家』喋喋不休地說出的所謂『蔑視工人』、『抬高知識分子』、『多數派的非馬克思主義立場』以及諸如此類的奇談，不過是梯弗里斯『孟什維克』的胡說和空想罷了。

相反地，我們可以看出，事實上『和馬克思主義根本矛盾的』是梯弗里斯『少數派』自己，是『梯弗里斯委員會』及其『社會民主黨人報』。但這一點容我們以後再說。我們暫時把注意力放在下面一點上吧。

爲了證明自己的言論正確，『多數派還是少數派？』的作者引用馬克思（？）的一段話說：『某一階級的理論家在理論上得出的結論，乃是該階級本身在實踐中已經走到了。的結論。』^②

二者必居其一。不是作者不懂格魯吉亞文，就是排字工人弄錯了。任何一個識字的人都不會說

① 見『愛爾福特綱領』第九十四頁。

② 見『社會民主黨人報』創刊號第十五頁。

『已經走到了的結論』。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已經得出了的結論』或者『正要得出的結論』。如果作者是指後一種說法（正要得出的結論），那就應當指出：他把馬克思的話轉述錯了，馬克思從來沒有說過這類的話。如果作者是指前一種說法，那末他引證的句子就應當是這樣的：『某一階級的理論家在理論上得出的結論，乃是該階級本身在實踐中已經得出了的結論。』換句話說，如果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論上得出了推翻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是不可避免的這一結論，那末，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在實踐中已經推翻了資本主義，已經打倒了資本主義制度並且在它的廢墟上建立了社會主義生活！

不幸的馬克思！誰知道我們那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還會把多少荒謬的言論加在他的頭上呵！馬克思真是這樣說的嗎？事實上他說的是：小資產階級的理論上的代表『在理論上得出的任務和決定，就是小資產者由於自己的物質利益和自己的社會地位在實踐中所得出的那些任務和決定。一個階級的政治的 and 文化的代表和它所代表的階級之間的關係，一般說來就是如此』^①。

由此可見，馬克思根本沒有說『已經走到了』。這些『哲學』詞句是可敬的『批評家』捏造出來的。在這種場合，馬克思的話完全是另外一種意思。

馬克思在上述論點中所發揮的是什麼思想呢？他所發揮的不過是：無論哪個階級的理論家都不能創造出一種在實際生活中沒有具備相當要素的理想，他只能看出未來事物的要素，並據此在理論

① 如果讀者手邊沒有『拿破崙第三政變記』（卷五），就請參看『黨的第二代表大會記錄』第一一二頁，那裏引用了馬克思所說的這段話。

上創造出本階級在實踐中要達到的理想。差別就在於理論家超過本階級而先看出未來事物的萌芽。這也就叫做『在理論上得出什麼結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宣言』中說：

『因此，共產黨人（即社會民主黨人）在實踐上是世界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推動社會前進的一部分，而在理論上他們比其餘的無產階級羣衆善於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

是的，思想家是『推動社會前進』的，他們比『其餘的無產階級羣衆』看得遠得多，全部要點也就在這裏。思想家推動社會前進，正因為如此，所以思想、社會主義意識對於運動具有偉大的意義。

可敬的『批評家』，你就是爲這一點攻擊『多數派』嗎？那末你就和馬克思主義訣別吧，你要知道『多數派』正是以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自豪的。

『多數派』在這種場合的情形很和恩格斯在九十年代的情形相似。

當時唯心主義者硬說思想是社會生活的泉源。在他們看來，社會意識是社會生活藉以建立的基礎，所以他們被稱爲唯心主義者。

當時必須證明，思想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思想是生活本身產生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走上了歷史舞台並且卓絕地完成了這個使命。他們證明：社會生活是思想的泉源，因此社會生活是社會意識藉以建立的基礎。這樣，他們也就替唯心主義挖掘了墳墓，而替唯物主

義掃清了道路。

某些半馬克思主義者却這樣了解：似乎意識、思想在生活中只有極小的意義。

當時必須證明思想的偉大意義。

於是恩格斯出來發表意見，在他的書信（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四年）中強調說：誠然，思想不是從天上掉下來，而是生活本身所產生的，可是它一旦產生出來，就會獲得巨大的意義，它把人們聯合起來，組織起來，並且在產生它的社會生活上打下自己的烙印，——思想在歷史運動中有巨大的意義。

伯恩施坦及其伙伴高聲叫道：『這不是馬克思主義，這是叛變馬克思主義。』但馬克思主義者只是付之一笑而已……

俄國也有過一些半馬克思主義者，即『經濟派』。他們硬說，既然思想是社會生活產生的，那末社會主義意識對於工人運動也就只有微不足道的意義。

當時必須證明，社會主義意識對工人運動有重大的意義，沒有這種意識，運動就是工聯主義的瞎闖，無產階級不知何時才能從瞎闖中擺脫出來而到達社會革命。

於是『火星報』出現了，它卓絕地完成了這個使命。『做什麼？』一書出版了，列寧在這部著作中強調社會主義意識的偉大意義。黨的『多數派』形成了，它堅定地走上了這條道路。

然而這時一些伯恩施坦的嘍囉們却跑出來叫喊道，這『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矛盾的』！

『經濟派』的嚷囉們，你們可知道馬克思主義是什麼嗎？

讀者會說：真奇怪！讀者會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普列漢諾夫寫了一篇批評的文章反對列寧（見新『火星報』第七十期和第七十一期）？他為什麼非難『多數派』呢？難道梯弗里斯那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他們的『社會民主黨人報』不是重複着普列漢諾夫發表過的意見嗎？是的，他們是在重複，但重複得很蠢笨，簡直令人討厭。是的，普列漢諾夫發表了批評的意見。然而你們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嗎？普列漢諾夫跟『多數派』和列寧是沒有分歧的。不止普列漢諾夫一人，而且馬爾托夫、查蘇利奇、阿克雪里羅得也是如此。真的，就我們上面講的那個問題來說，『少數派』的領袖和舊『火星報』是沒有分歧的。而舊『火星報』乃是『多數派』的旗幟。不要驚訝！請看事實吧。

我們讀過舊『火星報』上的一篇綱領性的論文（見上）。我們知道，這篇論文完全表明了『多數派』的立場。這篇論文是誰發表的呢？是當時的『火星報』編輯部。誰參加了這個編輯部呢？列寧、普列漢諾夫、阿克雪里羅得、馬爾托夫、查蘇利奇和斯塔羅維爾。他們中間現在只有列寧一個人是『多數派』，其餘五個人都在領導『少數派』，然而事實畢竟是事實，——『火星報』的這篇綱領性的論文是在他們負責編輯時發表的，因此他們不應當自食其言，他們大概相信自己所寫的東西吧。

但是，好吧，我們就撇開『火星報』不談。

且看馬爾托夫寫些什麼：

『這樣看來，社會主義思想最初並不是在工人羣衆中間產生的，而是在資產階級出身的學者的書房中產生的。』^①

再看查蘇利奇寫些什麼：

『甚至整個無產階級的階級團結的思想……也不是這麼簡單而能從每個工人的頭腦中獨立產生出來的……社會主義……也決不是在工人的頭腦中「自然而然」生長起來的……社會主義理論是由生活和知識的全部發展過程準備起來的……並且是由具有這種知識的天才頭腦創造出來的。社會主義思想在工人中間的傳播，幾乎在整個歐洲大陸上，都是由那些在上層階級的學校裏受過教育的社會主義者開始的。』^②

現在我們來聽一聽曾在新『火星報』（第七十期和第七十一期）上鄭重其事地反對列寧的普列漢諾夫所說的話吧。事情發生在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普列漢諾夫駁斥馬爾丁諾夫而爲列寧辯護。當時，普列漢諾夫責備馬爾丁諾夫，說他抓住了列寧的一句話，而忽略了『做什麼？』一書的全文，然後普列漢諾夫繼續說：

『馬爾丁諾夫同志的手法使我想起了一個書報檢查官的話：「給我一篇『禱告詞』，讓我從中抽出一句話來，我可以給你們證明，它的作者是應該判處絞刑的。」然而，不僅馬爾丁諾夫同志一個人而且

① 馬爾托夫：『紅旗』第三頁。

② 見『曙光』雜誌（一九二四年）第四期第七十九頁至第八十頁。

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人對這句倒毒話（列寧的話）的一切責難全是出於誤解。馬爾丁諾夫同志引證恩格斯的話：「現代社會主義是現代工人運動在理論上的表達。」列寧同志也同意恩格斯的意見……但要知道，恩格斯的話乃是一般原理。問題在於究竟是誰最先闡述了這一理論上的表達。列寧所寫的不是一篇論述歷史哲學的學術論文，而是一篇反對「經濟派」的辯論文章，「經濟派」硬說：我們應當靜待工人階級不用「革命徽菌」（即社會民主黨）的幫助而獨自達到的結局。其所以禁止社會民主黨向工人進行宣傳，正因為它是「革命徽菌」，正因為它具有理論的意識。但如果你們把「徽菌」去掉，那就只剩下沒有覺悟而必須從外面把意識灌輸進去的羣衆了。假如你們願意公正地對待列寧並把他這部書仔細地讀一遍，那末你們就會看到列寧所說的正是這一點。」^①

普列漢諾夫在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就是這樣說的。

然而，正是受馬爾托夫、阿克雪里羅得、查蘇利奇、斯塔羅維爾等等唆使的同一位普列漢諾夫，過了幾個月再出來說話的時候，竟抓住他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辯護過的列寧的同一句話，宣稱列寧和「多數派」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知道，如果從『禱告詞』中抽出一句話來斷章取義地加以解釋，那末它的作者恐怕也要因背叛上帝而受絞刑的。他知道這樣做是不公正的，一個公正的批評家是不會這樣做的，但他還是從列寧的書中抽出這句話來，他還是不公正地做去，當衆打自己的嘴巴。而馬

① 見「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記錄」第一二三頁。

爾托夫、查蘇利奇、阿克雪里羅得和斯塔羅維爾則附和着他，由他們自己負編輯責任，把普列漢諾夫的文章登在新『火星報』（第七十期和第七十一期）上，因而再一次使他們自己丟臉。

爲什麼他們表現得這樣沒有氣節，爲什麼『少數派』的這些領袖們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爲什麼他們否認由自己署名登在『火星報』上的那篇綱領性的論文，爲什麼他們自食其言呢？什麼時候聽說社會民主黨內有過這樣顛倒是非的醜事？

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和普列漢諾夫的文章發表以前這幾個月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事情原來是這樣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從原有的六個編輯中只選出了三個即普列漢諾夫、列寧和馬爾托夫來担任『火星報』的編輯。至於阿克雪里羅得、斯塔羅維爾和查蘇利奇三人，代表大會則指定他們去担任別的職務了。代表大會當然有權這樣做，而且每個人都應服從它的決定，因爲代表大會是全黨意志的體現者，是黨的最高機關，誰反對它的決定，誰就是踐踏黨的意志。

可是這些固執的編輯卻沒有服從黨的意志，沒有服從黨的紀律（黨的紀律也就是黨的意志）。原來黨的紀律是專爲我們這種普通工作者編造的！他們痛恨代表大會沒有把他們選爲編輯，於是退到一邊，並把馬爾托夫勾引過去組成了反對派。他們對黨宣佈抵制，拒絕黨的工作，並開始威嚇黨說，把我們選進編輯部、中央委員會和黨總委員會去，不然我們就要製造分裂。於是分裂開始了。這樣，他們又一次踐踏了黨的意志。

下面就是這些罷工的編輯提出的要求：

『恢復舊有的「火星報」編輯部（就是說，讓我們在編輯部佔三個位置）。』

把一定數量的反對派分子（即『少數派』）加進中央委員會去。

讓反對派分子在黨總委員會中佔兩個位置等等……

我們提出的這些條件，是使黨內不至發生威脅全黨生存的唯一保證。』（就是說，要滿足我們的要求，不然我們就要在黨內製造大分裂。）○

黨怎樣回答他們呢？

黨的代表者（中央委員會）和其他同志向他們聲明說：我們不能違反黨代表大會的決議，選舉是代表大會的事情，可是我們仍然企圖恢復和平和一致，老實說，爭位置已經是可恥的了，而你們却爲了爭位置要來分裂黨，等等。

罷工的編輯們惱羞成怒了，——真的，他們爲了爭位置而發動鬥爭了，——他們把普列漢諾夫拉了過去○，開始幹起他們的英雄事業來了。他們必須在『多數派』和『少數派』之間硬找出某種更『厲

○ 見「對同盟代表大會記錄的述評」第二十六頁。

也許讀者要問：這位熱烈擁護過『多數派』的普列漢諾夫怎麼會轉到『少數派』方面去了呢？原來是他和列寧之間發生了意見分歧。當『少數派』暴怒起來並宣佈抵制的時候，普列漢諾夫就認爲必須完全讓步。列寧不同意他的意見。普列漢諾夫就漸漸傾向『少數派』了。他們之間的意見分歧更加擴大了，普列漢諾夫終於變成了列寧和『多數派』的反對者。關於這一點列寧寫道：

「……過了幾天，我果然和總委員會一位委員去找普列漢諾夫，當時我們和普列漢諾夫的談話經過是這樣的：

害的。『意見分歧』，藉以證明他們並不是爲了爭位置。他們東找西找，結果在列寧的書中找到了一段話，如果把這段話同原文割裂開來，斷章取義地加以解釋，確實可以吹毛求疵地罵一通。『少數派』的領袖們暗中想道：這個主意妙極了，列寧是『多數派』的領導人，我們糟蹋了列寧，就能把黨拉到自己方面來。於是普列漢諾夫那一套論調就來了，說什麼『列寧及其追隨者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誠然，他們今天拚命攻擊的，就是他們昨天還在擁護的列寧書中的那種思想，但有什麼辦法：機會主義者之所以稱爲機會主義者，正因爲他們是不尊重原則性的。

這就是他們自己打自己嘴巴的緣故，這就是他們顛倒是非的根源。但還不止於此。

過了一些時候，他們看出，除了幾個幼稚的人而外，誰也沒有理睬他們反對『多數派』和列寧的那種煽動，他們看到『事情』不妙，於是決定再來粉飾一番。同一個普列漢諾夫、同一個馬爾托夫和

普列漢諾夫說：「要知道，世上常有一種愛吵愛鬧的老婆（即指『少數派』），對這樣的老婆必須讓步，免得她們瘋瘋顛顛、當衆大吵大鬧起來。」

我回答說：「也許是這樣，但讓步要讓得保證自己有能力能使更大的『吵鬧』不致發生。」（見『對同盟代表大會記錄的述評』第三十七頁，那裏引證了列寧的信〔二七〕）

列寧和普列漢諾夫沒有達成協議。從這時起，普列漢諾夫就開始轉到『少數派』方面去了。

我們根據可靠的消息得知：普列漢諾夫又在離開『少數派』，並已創辦了自己的機關刊物『社會民主黨人日報』（РК）。

同一個阿克雪里羅得又於一九〇五年三月十日用黨總委員會的名義通過了一項決議，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同志們！（他們向『多數派』說）……雙方（即『多數派』和『少數派』）都曾屢次表示自己確信：現有的策略上組織上的意見分歧，並不是一種使雙方不能在統一的黨組織範圍內進行工作的意見分歧。』◎他們說，因此我們要召集同志裁判會（由倍倍爾等組成）來解決我們之間的小小爭執。

一句話，黨內的意見分歧不過是一種可以由同志裁判會來解決的意氣之爭，而我們大家——他們說——是一個統一的整體。

然而怎麼會這樣呢？人居然號召我們這些『非馬克思主義者』到黨組織中去，說我們大家還是一個統一的整體等等……這是什麼意思呢？『少數派』的領袖們，要知道這是你們叛變了黨！難道可以委任『非馬克思主義者』担负黨的領導職務嗎？難道社會民主黨內有『非馬克思主義者』立足的餘地嗎？或許是你們自己也叛變了馬克思主義，所以改變了陣綫吧？

然而，若要等待他們回答，那就未免太幼稚了。原來這些妙不可言的領袖們在口袋裏裝着幾種『原則』，需要哪一種就掏出哪一種來。你看他們是多麼反覆無常呵！……

所謂『少數派』的領袖就是這樣的。

◎ 見『火星報』第九十一期第三頁。

不難想像，跟隨在這種領袖後面的嘍囉們，即梯弗里斯的所謂『少數派』該是些什麼樣的人了……還有一件不幸的事，就是尾巴有時不聽頭腦的指揮，不肯服從它。例如在『少數派』的領袖們認為可能調解並號召黨的工作人員取得一致時，而梯弗里斯的『少數派』及其『社會民主黨人報』却繼續在那裏大鬧特鬧，說『多數派』和『少數派』之間的鬥爭是『決死的鬥爭』^①，所以我們一定要斬殺一番！真是各人唱各人的調子。

『少數派』埋怨我們把他們叫做機會主義者（無原則的分子）。可是，既然他們自食其言，既然他們出爾反爾，既然他們始終動搖，試問，這不叫做機會主義又叫做什麼呢？難道一個真正的社會民主黨人能常常改變自己的信念嗎？要知道，就連手帕也不是這樣經常更換的。

我們那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味固執地說，『少數派』具有真正的無產階級性質。真是這樣的嗎？好，我們來看看吧。

考茨基說：『無產者比較容易接受黨的原則，他傾向於不以一時情緒、不以個人利益或局部利益為轉移的原則性的政策。』^②

而『少數派』呢？他們也是傾向於這種不以一時情緒和其他東西為轉移的政策嗎？恰恰相反，他們經常搖擺，他們永遠動搖，他們憎恨堅定的原則性的政策，他們寧願採取無原則的立場，他們聽從

① 見『社會民主黨人報』創刊號。

② 見『愛爾福特綱領』第八十八頁，中央委員會出版。

一時的情緒的驅使。至於事實，我們早已知道了。

考茨基說：無產者喜愛黨的紀律，「當無產者還是一個孤立的個人時，他是什麼力量也沒有的。他的全部力量，他走向進步的全部能力，他的一切希望和期待，都是從組織中汲取來的……」正因爲如此，所以他不爲個人利益所誘，不爲個人榮譽所惑，他「被派到任何崗位上都能盡自己的職責，自願地服從那浸透他的全部感覺、全部思維的紀律」①。

而「少數派」呢？他們也是這樣被紀律性所浸透的嗎？恰恰相反，他們藐視黨的紀律，嘲笑黨的紀律②。「少數派」的領袖們就是天字第一號破壞黨內紀律的人。請你們回想一下阿克雪里羅得、查蘇利奇、斯塔羅維爾、馬爾托夫及其他不服從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的人們吧。

考茨基繼續說：「知識分子却完全不是這樣。」他服從黨的紀律是很勉強的，是迫不得已，而不是出於自願的。「他承認需要紀律，但只是對羣衆而言，而不是對上等人物而言。至於他自己，那他當然是把自己列入上等人物裏的……」李卜克內西却是一位理想的模範知識分子，他渾身浸透了無產階級情緒，他……在被指定的任何一個崗位上努力工作，使自己完全服從於我們的偉大事業，並鄙棄……知識分子落到少數地位時所常常發出的那種頹唐的啜泣。在這裏還可以舉出馬克思，他從來

① 列寧：『進一步，退兩步』第九十三頁，那裏引證了考茨基的這段話。（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四六六頁）

② 見『同盟代表大會記錄』。

也沒有想爭第一把交椅，在國際中他曾不止一次落到少數地位，但他還是模範地服從黨的紀律。」^①

而『少數派』呢？他們在什麼地方表現過『無產階級情緒』呢？他們的行為像李卜克內西和馬克思那樣嗎？恰恰相反，我們看到『少數派』的領袖們並沒有使自己的『我』服從於我們的神聖事業；我們看到正是這些領袖們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落到少數地位時』，就沉溺於『頹唐的啜泣』；我們看到，在代表大會後，正是他們爲了爭奪『頭等位置』而痛哭起來，並且正是爲了爭奪這種位置而挑起了黨內的分裂……

可敬的孟什維克，這就是你們的『無產階級性格』嗎？

孟什維克向我們問道：那末，爲什麼某些城市的工人站在我們這方面呢？

是的，不錯：在某些城市中工人們是站在『少數派』方面的，但這並不能證明什麼。在某些城市中工人們也跟着修正主義者（德國的機會主義者）走，但這並不是說修正主義者的立場是無產階級的立場；這並不是說他們不是機會主義者。有一次，連烏鴉也找到了玫瑰花，但這並不是說烏鴉就是夜鶯。難怪俗語說：

烏鴉一找到了玫瑰花，

就把自己當做夜鶯誇。

① 列寧：『進一步，退兩步』第九十三頁，那裏引證了考茨基的這段話。（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四六七頁）

* * *

現在很清楚，黨內的意見分歧究竟是在什麼基礎上發生的。顯然，我們黨內暴露了兩種趨向：無產階級堅定性的趨向和知識分子動搖性的趨向。現在的『少數派』就是這種知識分子動搖性的表現者。梯弗里斯『委員會』及其『社會民主黨人報』就是這個『少數派』的馴服的奴隸！

全部問題就在這裏。

誠然，我們那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常常叫喊說他們反對『知識分子的心理』，並且他們還企圖責備『多數派』有『知識分子的動搖性』，但這很像一個賊偷了別人的錢，却大聲叫喊：『捉賊呀！』此外，大家知道，誰害的什麼病，誰就老是談着這種病。

按俄國社會民主黨高加索聯盟委員會
一九〇五年五月出版的小冊子原文刊印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武裝起義和我們的策略

革命運動『目前已經發展到必須舉行武裝起義的地步了』，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作出的這個估計日益證實是正確的。革命的火燄燃燒得越來越猛烈，時而在這裏，時而在那裏，引起地方性的起義。洛茲的三天街壘戰和巷戰，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幾萬工人參加的、和軍隊發生過多次不可避免的流血衝突的罷工，敖德薩的起義，黑海艦隊和里巴瓦港海軍的『騷動』^①，梯弗里斯的『一周』^②，——這一切都是暴風雨來臨的先兆。暴風雨迫近了，不可遏止地迫近了，不是今天便是明天就會在俄國爆發；它將以排山倒海之勢，沖毀一切衰老腐朽的東西，洗掉俄羅斯人民身上那數百年來的恥辱——專制制度。沙皇政府最後的拚命掙扎：加緊採取各種鎮壓手段，在全國一半地區宣佈戒嚴，大量增設絞架，同時對自由派發表誘惑的言論，假意允諾實行各種改良，——這一切都挽救不了它的歷史命運。專制制度的滅亡指日可待，暴風雨必不可免。全體人民所歡迎的新制度已在萌芽，人民都期待它帶來革新和復興的氣象。

日益迫近的暴風雨向我黨提出了些什麼新問題呢？我們應如何使自己的組織和策略適應實際生

活的新要求，以便更積極地、更有組織地參加革命開端所唯一必需的武裝起義呢？工人階級不僅是革命的先鋒，而且是革命的主要行動力量；爲了領導起義，我們作爲這個階級的先進部隊，是應當建立一些專門機關呢，還是依靠現有的黨的機構就够了？

這些急待解決的問題擺在我黨面前已經有幾個月了。崇拜『自發運動』的人把黨的目的降低到僅僅跟在生活進程的後面，做了運動的尾巴，而不像先進的覺悟部隊所應做的那樣走在運動的前頭；對於這樣的人，這些問題是不存在的。他們說，起義是自發的，組織和準備起義是不可能的，任何一種預定的行動計劃都是空想（他們反對任何『計劃』，因爲計劃是『自覺性』的東西，而不是『自發的現象』），都是白費氣力；社會生活有它自己的令人莫測的道路，它是會打破我們的一切計劃的。他們說，因此我們只應限於宣傳和鼓吹起義的思想，羣衆『自我武裝』的思想；我們只應實行『政治領導』，至於『在技術上』領導起義人民，那隨便讓誰去做都可以。

反對『尾巴政策』的人駁斥說：可是要知道，我們向來都是實行這種領導的。顯然，廣泛進行鼓動和宣傳，對無產階級實行政治領導是完全必要的。然而，若是僅僅限於這種一般性的任務，就等於我們不是避免回答實際生活所直接提出的問題，就是暴露我們根本不善於使自己的策略適應蓬勃發展的革命鬥爭的需要。不待說，現在我們應當大大加強政治鼓動工作，應當竭力設法不僅要使無產階級受我們的影響，而且要使那些逐漸向革命靠攏的廣大『人民』階層也受我們的影響，我們應當在社會各階級中努力傳播必須舉行武裝起義的道理。但是我們不能只限於這一點！要使無產階級能够利

用必將到來的革命以利於自己的階級鬥爭，要使無產階級能够建立最能保證以後爲實現社會主義而鬥爭的民主制度，就必須使無產階級（在它的周圍團結着沙皇制度的反對派）不僅處於鬥爭的核心地位，而且成爲起義的領袖和領導者。在技術上領導和在組織上準備全俄起義，這正是實際生活向無產階級提出來的新任務。如果我黨要想成爲工人階級真正的政治領導者，就不能而且不應當拒絕執行這些新任務。

那末爲了達到這一目的，我們應當採取什麼辦法呢？我們最初的步驟應當是什麼呢？

我們有許多組織在實踐中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它們拿出了自己的一部分人力和物力去武裝無產階級。我們對專制制度的鬥爭，現已進入大家都承認的必須武裝起來的時期。然而僅僅意識到武裝的必要性是不夠的，還必須直接地清楚地向黨提出實踐的任務。因此我們的委員會應當立刻着手就地武裝人民，成立專門辦理這件事情的小組，成立各區收集武器的小組，設立製造各種炸藥的小工廠，制定奪取國家的和私人的軍械庫和兵工廠的計劃。我們不僅應當像新『火星報』所勸告我們的，用『自我武裝的迫切需要』武裝人民，並且應當像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所責成我們的，切實『採取最積極的辦法武裝無產階級』。在解決這個問題時，我們和從黨內分裂出去的那一部分人也罷（只要他們是確實認真考慮武裝問題，而不是只空談什麼『自我武裝的迫切需要』），和抱着同一目的的各民族的社會民主黨組織，例如阿爾明尼亞聯邦主義者等等也罷，都要比在其他問題上更容易達成協議。在巴庫已經作過這樣的嘗試，那裏在二月慘案以後，我們的委員會，『巴拉漢內——比比——愛巴特』集

團和公察克黨人^{〔三〕}委員會，曾聯合設立了一個武裝組織委員會。當然，要創立這樣一種艱鉅的事業，必須大家共同努力，所以我們認為派別的計較要盡量少妨礙一切社會民主主義力量在這個基礎上的團結。

除了擴大軍火儲藏、設法弄到武器和由工廠製造武器之外，還必須極端注意建立各種戰鬥隊去使用獲得的武器。把武器直接發給羣衆是絕對不允許的。由於我們的經費很少，並且很難隱藏武器不使嗅覺銳敏的警察發覺，所以我們無法武裝比較廣大的民衆，如果這樣做，我們的一切努力就會是白費的。當我們建立起專門戰鬥組織的時候，情形就會完全不同了。我們的戰鬥隊將學會很好地使用武器，並且在起義時（不管它是自發的，還是早有準備的）都能成爲主要的先進的隊伍而行動起來，起義人民將團結在它們的周圍，並在它們的領導下去參加戰鬥。由於戰鬥隊的經驗豐富和組織嚴密，又有很好的武裝，所以我們就有可能利用起義人民的一切力量，從而達到當前的目標，即武裝全民並實現預定的行動計劃。戰鬥隊會很快地奪得各種軍械庫、政府機關、公用事業機關、郵政局、電話局等等，這都是革命進一步發展所必需的。

但是，這些戰鬥隊不僅在革命起義已普及全城時才需要，而且在起義前夜所起的作用也是重大的。最近半年來，我們看得很清楚，在社會各階級的心目中已經喪失威信的特權制度，竭力把全國各地的黑暗勢力，不管是職業流氓，還是韃靼人中間那些狂妄無知之徒，都動員起來對付革命者。這種黑暗勢力被警察武裝起來並在其庇護下用恐嚇手段恫嚇民衆，造成一種阻礙解放運動的困難環境。

我們的戰鬥組織應當隨時準備對這種黑暗勢力的一切企圖予以應有的反擊，並設法把那由於他們的活動而引起的憤怒和反抗變為反政府的運動。能够隨時走上街頭去率領人民羣衆的武裝戰鬥隊不難達到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所規定的目的：『組織武裝抵抗去對付黑幫及其他一切由政府領導的反動分子的行動。』（『關於在革命前夜對待政府策略的決議』——見『通報』（1933）

我們的戰鬥隊和一般軍事技術組織的主要任務之一應當是制定本區域的起義計劃，並使這計劃和黨中央所制定的全俄計劃相適合。找出敵人最薄弱的地方，指定向敵人進攻的出發點，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佈置在本區各處，將全城的地形考查清楚，——這一切都應預先完成，使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致措手不及。在本文中詳細分析我們組織在這方面的活動是完全不適宜的。在制定行動計劃時應嚴守秘密，同時還要在無產階級中間盡量廣泛地傳播進行巷戰所絕對必需的軍事技術知識。爲了這個目的，我們應當吸收黨組織中的軍人來參加這個工作。爲了同一目的，我們還可以把它們其他許多同志，按照他們的本領和性情說來對這件事情都會很有益處的同志，吸收來參加這個工作。

只有這樣周密地準備起義才能保证社會民主黨在必將到來的人民和專制制度間的戰鬥中起領導作用。

只有充分的戰鬥準備才能使無產階級把與軍警的零碎衝突變成全民起義，以便推翻沙皇政府，建立臨時革命政府。

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將違背『尾巴政策』崇拜者的主張，竭力把武裝起義的技術領導和政治領導

都集中在自己的手裏。這種領導是保證我們能够利用必將到來的革命以有裨於我們階級鬥爭的必要條件。

載於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五日

「無產階級鬥爭報」第十期

本文沒有署名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① 一九〇五年六月至七月，黑海艦隊的「波將金」鐵甲艦、二六七號水雷艇、「勝利者喬治」鐵甲艦和「普魯特」教練艦相繼舉行起義。一九〇五年七月，拉脫維亞里巴瓦港的海軍舉行起義。——譯者註。

② 一九〇五年六月二十日，赫弗里斯開始總罷工。城內各處舉行羣衆大會，通過決議，要求言論出版的自由等等。六月末，總罷工有組織地結束了。——譯者註。

臨時革命政府和社會民主黨

(四)

一

人民革命日益發展。無產階級正在武裝自己並高舉起義的旗幟。農民正在伸直腰幹，並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爆發總起義和「根除」那可恨沙皇的可恨寶座已爲期不遠了。沙皇政府將被推翻。在它的廢墟上，將建立起革命的政府——臨時革命政府；這個政府定會解除黑暗勢力的武裝，把人民武裝起來並立即着手召開立憲會議。這樣，沙皇的統治就將由人民的統治來代替。現在，人民革命正在順着這條道路前進。

臨時政府應當做些什麼呢？

它應當解除黑暗勢力的武裝，制裁革命的敵人，使他們不能再恢復沙皇專制制度。它應當武裝人民，促使革命進行到底。它應當實現言論、出版、集會等等的自由。它應當取消間接稅，施行累進的利潤稅和遺產稅。它應當組織農民委員會來調整農村中的土地關係。它還應當使教會和國家分離，使學校和教會分離……

除了這些一般的要求外，臨時政府還應當實現工人的階級要求：罷工和組織工會的自由，八小時

工作制、實行國家勞動保險、保證勞動衛生條件、設立「勞動介紹所」等等。

總之，臨時政府必須完全實現我們的最低綱領^①，並立即着手召開全民立憲會議，以立法手續把社會生活中所發生的種種變革「永遠」固定下來。

誰應當參加臨時政府呢？

革命將由人民來完成，而人民就是無產階級和農民。顯然，無產階級和農民應當擔負起把革命進行到底、制裁反動勢力、武裝人民等等的責任。為此，無產階級和農民在臨時政府中就需有保護自己利益的人。無產階級和農民將在街頭佔統治地位，他們將流血犧牲，自然他們在臨時政府中也應當佔統治地位。

有人向我們說：這都是對的，可是無產階級和農民有什麼共同點呢？

共同點就是：他們都憎恨農奴制的殘餘，他們都在和沙皇政府進行決死的鬥爭，他們都希望建立民主共和國。

然而這並不能使我們忘記一個真理，即他們之間的差別比他們的共同點要大得多。

這個差別在哪裏呢？

差別就在於：無產階級是私有制的敵人，仇恨資產階級制度，他們之所以需要民主共和國只是為

① 關於最低綱領，請參看「關於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通報」。

了聚集力量，然後推翻資產階級制度；農民對私有制却戀戀不捨，擁護資產階級制度，他們之所以需要民主共和國則是爲了鞏固資產階級制度的基礎。

不用說，只是在無產階級想要消滅私有制的時候，農民①才會反對無產階級。另一方面，同樣很明顯，只是在無產階級想要推翻專制制度的時候，農民才會擁護無產階級。目前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就是說，它不觸犯私有制，因而農民今天沒有任何理由掉轉自己的武器來反對無產階級。況且今天的革命是要根本推翻沙皇政權，所以農民願意堅決向無產階級這個先進的革命力量靠攏。很明顯，無產階級同樣也願意援助農民，願意同農民一起反對共同的敵人——沙皇政府。無怪乎偉大的恩格斯說：在民主革命勝利以前，無產階級應當同小資產階級一起反對現存的制度②。如果在革命的敵人還沒有被完全制裁以前，我們的勝利不能稱爲勝利，如果制裁敵人和武裝人民是臨時政府的責任，如果臨時政府應當負起完成勝利的責任，那就不言而喻，除了小資產階級利益的保護者應當參加臨時政府而外，作爲無產階級利益的保護者的無產階級代表也應當參加臨時政府。假如負責領導革命的無產階級讓小資產階級單獨地將革命進行到底，那就太不明智，那就是背叛自己。只是不要忘記：反對私有制的無產階級必須有自己的政黨，並且一分鐘也不應當走偏了路。

換句話說，無產階級和農民應當共同努力推翻沙皇政府，應當共同努力制裁革命的敵人；正因爲

① 即小資產階級。

② 見「火星報」第九十六期。這段話在「社會民主黨人報」第五期上轉載過，見「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一文。

如此，所以無產階級跟農民一樣，也應當有自己利益的保護者即社會民主黨人參加臨時政府。

這個道理如此清楚，如此明顯，再來加以說明似乎是多餘的了。

但是，『少數派』對這一點却表示懷疑，他們一味固執地說：社會民主黨參加臨時政府是不合身分的，是和原則相抵觸的。

我們就來分析這個問題吧。『少數派』的論據是什麼呢？首先他們援引了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四)的文件。這次代表大會和饒勒斯主義相反，通過了一項決議，說社會主義者不應力圖參加資產階級政府，而臨時政府是資產階級政府，因此參加臨時政府在我們是不能容許的。『少數派』就是這樣議論的。他們沒有注意到，如果像小學生那樣理解代表大會的決議，那我們連革命也不應當參加了。實際上成了這樣：我們是資產階級的敵人，今天的革命既然是資產階級革命，我們就完全不應當參加這個革命！『少數派』的邏輯就是要我們走上這條道路。社會民主黨却說，我們無產者不僅應當參加今天的革命，並且應當在這個革命中起帶頭作用，領導這個革命，把這個革命進行到底。但是不參加臨時政府，就不可能把革命進行到底。不容爭辯，『少數派』的邏輯在這裏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我們仿效自由派，應當拋棄無產階級是革命領導者的思想，於是我們參加臨時政府的問題也就自行消失；或者我們應當公開承認這個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同時也就承認參加臨時政府的必要性。但『少數派』既不願拋棄前者，也不願拋棄後者，他們既想做自由派，又想做社會民主黨人！他們就是這樣殘忍地糟蹋無辜的邏輯……

至於說到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那末它所指的是法國正式政府而不是臨時革命政府。法國政府是反動的保守的政府，它保護舊事物，反對新事物；顯然，真正的社會民主黨人是不會加入這樣的政府的。可是臨時政府是革命的進步的政府，它反對舊事物而爲新事物開闢道路，它爲革命的利益服務；顯然，真正的社會民主黨人是要加入這個政府並積極參加完成革命事業的。可見這是兩回事情。可見『少數派』死抓住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是徒勞無益的，因爲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並不能使『少數派』免於破產。

看來『少數派』自己也感覺到這一點，所以他們就求助於另一個論據：他們現在向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英靈呼救。例如『社會民主黨人報』頑固地重複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反對』參加臨時政府。但是，他們到底在什麼地方和什麼時候反對過？例如，馬克思究竟是怎樣說的？原來馬克思說：『……民主主義的小資產者……向無產階級鼓吹……要它力求建立一個大的反對黨，這個黨應當把民主黨內的各種派別都包括進去……』『這樣的聯合對於無產階級無疑是有害的，而只有對於他們（小資產者）才是有利的』①等等（『』）。一句話，無產階級應當有單獨的階級政黨。但是『淵博的批評家』呵，究竟有誰反對這一點呢？爲什麼你同風車搏鬥呢？

雖然如此，『批評家』還是繼續引證馬克思的話。『和共同的敵人作鬥爭，並不需要任何特別的聯

① 見『社會民主黨人報』第五期。

合。既然必須和這種敵人進行直接鬥爭，兩黨的利益也就會暫時趨於一致，因而……也就會產生一個只適合當時需要的同盟……在鬥爭時和在鬥爭後，工人在每一場合都應當提出他們本身的需要（應該說：要求），與資產階級民主黨人的需要（要求）並列起來……一句話，從勝利的最初一瞬間起，就必須對自己從前的同盟者，對那個想獨佔共同勝利果實的政黨……表示不信任。」^①換句話說，無產階級應該走自己的道路，只有在不和本身利益相抵觸的條件下，才支持小資產階級。但是奇怪的「批評家」呵，究竟有誰反對這一點呢？你引證馬克思的話有什麼必要？難道馬克思說過什麼關於臨時革命政府的話嗎？一個字也沒有說過！難道馬克思說過在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參加臨時政府是和我們的原則相抵觸的嗎？一個字也沒有說過！那末，我們的這位作者為什麼無緣無故地狂喜呢？他從什麼地方找到了我們和馬克思之間的「原則上的矛盾」呢？可憐的「批評家」呵！他拚命想要找到這種矛盾，但是不幸得很，他一點也沒有找到。

照孟什維克的聲明，恩格斯究竟說了些什麼？原來恩格斯在給屠拉梯的信中說過：必將到來的意大利革命是小資產階級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在這個革命勝利以前，無產階級應該和小資產階級一起反對現存的制度，但他們一定要有自己的政黨；可是社會主義者假使在革命勝利後參加新政府，那是非常危險的。這樣他們就會重複路易·勃朗和其他法國社會主義者在一八四八年所犯的

① 見「社會民主黨人報」第五期。

錯誤等等。換句話說，既然意大利革命將是民主主義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所以幻想無產階級能佔統治地位和在勝利後仍然可以留在政府裏，那就會是很大的錯誤，無產階級只有在勝利以前才能夠同小資產階級一起反對共同的敵人。然而究竟誰反對這一點呢？誰說我們應當把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混爲一談呢？爲什麼要援引伯恩施坦的信徒屠拉梯的話呢？爲什麼還要提起路易·勃朗呢？路易·勃朗是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而我們所說的是社會民主黨人。在路易·勃朗時代還沒有社會民主黨，而這裏所說的正是這樣的黨。法國社會主義者曾經打算奪取政權，而我們所注意的則是參加臨時政府的問題……難道恩格斯說過，在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參加臨時政府是和我們的原則相抵觸的嗎？一個字也沒有提過！那末我們的這位孟什維克，你爲什麼要這樣誇其談呢？混淆問題並不等於解決問題，你怎麼不明白呢？爲什麼要無故地驚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英靈呢？

看來『少數派』自己也感覺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不能挽救他們，於是他們現在又抓住了第三個『證據』。『少數派』向我們說：你們想給革命的敵人以雙重的約束，你們想『使無產階級不僅「從下面」、從街頭，而且從上面、從臨時政府的大廈裏去對革命施以壓力』。但這是和原則相抵觸的呀！——『少數派』責備我們說。

① 見『社會民主黨人報』第五期。『社會民主黨人報』是把這幾句話加上引號來引證的，使人覺得恩格斯的話被引證得絲毫不差。事實上並不是這樣。在這裏引證的人只是用自己的話來轉述了恩格斯那封信的內容。

② 見『火星報』第九十三期。

由此可知，『少數派』斷定我們應當『只從下面』影響革命的進程。相反地，『多數派』却認為我們應當以『來自上面』的行動去補充『來自下面』的行動，使我們所施展的壓力更為全面。

在這種情況下，究竟是誰和社會民主黨的原則相抵觸呢？是『多數派』呢，還是『少數派』？

讓我們來請教一下恩格斯吧。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西班牙爆發了起義。於是發生了臨時革命政府的問題。當時在那裏活動的是巴枯寧派（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否認任何來自上面的行動，而這一點會引起他們和恩格斯之間的爭論。當時巴枯寧派所鼓吹的正是今天『少數派』所說的東西。恩格斯說：『巴枯寧派多年來鼓吹說，任何自上而下的革命行動都是有害的，一切都應當用自下而上的方式來組織和實行。』^①在他們看來，『建立任何一種所謂臨時政權或革命政權，都只能是一種新的欺騙，都像所有現存的政府一樣，對於無產階級是同樣危險的』^②。恩格斯嘲笑這種觀點，並且說實際生活已經無情地推翻了巴枯寧派的這一學說。巴枯寧派不得不對實際生活的要求讓步，結果他們……『只好違反自己的無政府主義原則而成立革命政府』^③。於是他們『就踐踏了他們自己剛剛宣佈的原則：成立革命政府只是一種新的欺騙，只是對工人階級的一種新的叛變行為』^④。

① 見『無產者報』第三期，那裏引證了恩格斯的這句話（四）。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恩格斯就是這樣說的。

由此可見，『少數派』的原則——僅僅『來自下面』的行動——是無政府主義的原則，這個原則確實是和社會民主黨的策略根本抵觸的。『少數派』認為任何參加臨時政府的舉動對於工人都是有害的，這種觀點就是早已受到恩格斯嘲笑的無政府主義的觀點。同樣也很清楚：實際生活必將拋棄『少數派』的觀點，必將輕而易舉地粉碎他們的這種觀點，正像粉碎了巴枯寧派的觀點一樣。

『少數派』却仍然固執地說：我們是不會反對原則的。這些人對於社會民主主義原則抱着一種奇怪的想法。我們只就他們對於臨時革命政府和國家杜馬所持的原則觀點來看一看吧。『少數派』反對參加為適應革命利益而將要產生的臨時政府，說這是和原則相抵觸的。而他們主張參加為適應專制制度利益而已經產生的國家杜馬，却說這是和原則不相抵觸的！『少數派』反對參加由革命的人民創立並由人民使之合法的臨時政府，說這是和原則相抵觸的。而他們主張參加由專制沙皇召開並由沙皇使之合法的國家杜馬，却說這是和原則不相抵觸的！『少數派』反對參加負有埋葬專制制度使命的臨時政府，說這是和原則相抵觸的。而他們主張參加負有鞏固專制制度使命的國家杜馬，却說這是和原則不相抵觸的……最可敬的先生們，你們談的是什麼原則，是自由派的原則呢，還是社會民主黨人的原則？如果你們能直截了當地回答這個問題，那你們就很不錯了。不過我們對這一點總有些懷疑。但是，我們且撇開這些問題不談吧。

問題是『少數派』在探求原則時已滾到無政府主義者方面去了。

這就是現在已經弄明白了的事實。

二

我們的孟什維克不喜歡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決議中真正革命的道理震動了孟什維克的『泥潭』，激起了孟什維克進行『批評』的慾望。看來，使他們的機會主義頭腦受到刺激的，主要是關於臨時革命政府的決議，所以他們就着手『消滅』這個決議。但是他們在決議中並沒有找到任何可以抓住和可以大肆批評的東西，所以就只好求助於他們那套慣用而又一錢不值的蠱惑宣傳手段！這些『批評家』寫道：『這次決議是爲了引誘工人、欺騙和蒙蔽工人而草擬的！可見他們是很滿意於自己所玩的這套戲法的。他們設想敵人已經遭到毀滅性的失敗，而自己則是得勝了的批評家，因而大聲叫喊：『他們（決議的起草人）還想領導無產階級呢！』當你瞧着這些『批評家』的時候，你就好像碰見了果戈里小說中一個因神經失常竟以西班牙國王自居的主人公。這就是患狂熱病的人的必然歸宿！我們且來仔細看看『社會民主黨人報』第五期上的那篇『批評』吧。大家已經知道，我們的孟什維克一想起臨時革命政府的血跡斑斑的魔影時，就不免恐懼萬分，於是去祈求自己的神仙馬爾丁諾夫——阿基莫夫一流人物，盼望他們給自己驅除這個怪物，而代之以全俄縉紳會議，現在却要代之以國家杜馬了。爲了這個目的，他們就把『全俄縉紳會議』捧上了天，力圖把腐朽的沙皇制度的腐朽產物

當做真貨來賣。他們寫道：『我們知道法國大革命沒有臨時政府也建立了共和國。』就只有這麼多嗎？『可敬的』先生們，此外什麼也不知道嗎？太少了！應該多知道一點！例如，也應該知道法國大革命是作為資產階級革命運動而獲得勝利的，而俄國的『革命運動則將作為工人運動而獲得勝利，或是完全不會獲得勝利』，就像普列漢諾夫公正地說過的一樣。在法國，領導革命的是資產階級，在俄國則是無產階級。在那裏，支配革命命運的是資產階級，在這裏則是無產階級。在革命領導力量這樣轉換的情形下，這兩個階級決不能有同等的結果，難道還不明白嗎？如果說在法國，資產階級因領導革命而享受了革命的果實，那末在俄國，既然領導革命的是無產階級，難道革命的果實也應由資產階級來享受嗎？我們的孟什維克說道：是的，凡是在法國那裏發生過的，在俄國這裏同樣應當發生。這些先生好像棺材匠一樣，拿早已死去的人的尺寸來量活人。此外，他們在這裏還玩了不少騙人的戲法：他們去掉了我們感到興趣的問題的頭部，而把爭論的中心移到問題的尾巴上去了。我們也和任何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一樣，是在談論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問題。他們却藏起『民主』一語而大談其『共和國』。他們鼓吹說：『我們知道，法國大革命建立了共和國。』是的，法國大革命建立了共和國，但究竟是怎樣的共和國呢？是真正民主的共和國嗎？是俄國社會民主黨所要求的那種共和國嗎？這個共和國給了人民以普選權嗎？當時的選舉是完全直接的選舉嗎？施行過累進所得稅嗎？難道在那裏談過什麼改善勞動條件、縮短工作日、增加工資等問題嗎？……沒有。這樣的事情在那裏根本沒有，而且也不會有，因為工人們當時還沒有受過社會民主主義的教育。所以他們的利益竟被當時法蘭西共

和國的資產階級遺忘和抹殺了。先生們，難道你們就向這樣的共和國低下自己『高貴的』頭嗎？你們的理想就是這樣的嗎？祝你們一路平安吧！不過，可敬的先生們，你們應該記住：崇拜這樣的共和國，是和社會民主黨及其綱領沒有絲毫共同之點的；這是最壞的一種民主主義，而你們却假借社會民主黨的名義用走私的方式來幹這一切勾當。

此外，孟什維克應當知道，俄國資產階級及其縉紳會議，就連法蘭西那樣的共和國也不會賜給我們，因為它根本不打算消滅君主制。資產階級明明知道在沒有君主制的地方，工人們是『傲慢不遜』的，所以資產階級力圖把這個堡壘完整地保存下來，把它變成自己的武器去反對和自己勢不兩立的敵人——無產階級。正是爲了這個目的，資產階級就假借『人民』的名義和劊子手沙皇進行談判，勸他爲了『祖國』和皇位的利益召開全俄縉紳會議，以期避免『無政府狀態』。難道你們孟什維克連這些也不知道嗎？

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所建立的那種共和國，而是二十世紀俄國社會民主黨所要求的共和國。只有無產階級領導的勝利的人民起義和它提出的臨時革命政府才能把這樣的共和國建立起來。只有這樣的臨時政府才能臨時實現我們的最低綱領，並把類似的改革辦法提交它所召開的立憲會議批准。

我們的『批評家』不相信根據我們的綱領召開的立憲會議能够表達人民的意志（他們既不能比一百十五年前所發生的法國大革命更前進一步，當然也就無法想像到這一點）。『批評家』繼續說道：

『有錢有勢的人，有很多辦法操縱選舉，使之有利於自己，所以根本談不上什麼真正人民的意志。爲了使窮人中的選民不致代表富人的意志，就需要進行巨大的鬥爭，就需要有長期的黨的紀律。』（就是孟什維克所不承認的紀律嗎？）『甚至在歐洲（？），雖然進行了長期的政治教育，這一切也沒有實現。而我們的布爾什維克却以爲這個法寶已掌握在臨時政府手裏了！』

真是十足的尾巴主義！『早已魂歸九天的』『過程策略論』和『過程組織論』①又借屍還魂了！『批評家』教訓我們說，要想在俄國要求歐洲尚未實現的東西，那是根本辦不到的！可是我們知道，我們的最低綱領不僅在『歐洲』，並且在美洲也沒有完全實現，所以按照孟什維克的意見，誰要在俄國接受這個綱領，並在推翻專制制度之後爲實現這個綱領而鬥爭，那他就是不可救藥的幻想家，就是可憐的唐·吉珂德！一句話，我們的最低綱領是虛假的，空想的，是和現實『生活』毫不相干的！『批評家』先生們，難道不是這樣嗎？按照你們的說法正是這樣。既然這樣，就請你們不要支支吾吾，大胆一些，把這一點爽直地說出來！那我們就會知道我們在和誰打交道，而你們也就不必受你們所憎恨的這個綱領的形式手續的拘束了！不然的話，你們這樣羞答答地、畏首畏尾地談論綱領的不重要性，就會使得許多人（當然布爾什維克除外）還以爲你們承認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綱領。但是又何必這樣假惺惺呢？

這裏我們就接觸到我們意見分歧的根源了。你們不相信我們的綱領並且否認它的正確性，而我們和你們相反，總是以這個綱領爲依據，力求使我們自己的一切行動都和它相符合！

我們相信，在自由競選運動的條件下，『有錢有勢的人』要想收買和欺騙全體人民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將用社會民主黨的真話（我們和你們不同，絲毫也不懷疑這種真話）去對抗他們的勢力和金錢，並以此來阻遏資產階級的騙人把戲。你們却不相信這一點，所以就的革命拉到改良主義方面去了。

『批評家』繼續說道：『一八四八年，也有工人參加的法國（又是法國！）臨時政府召開了連一個巴黎無產階級代表也沒有被選舉進去的立憲會議。』這又一次表明你們完全不懂社會民主主義學說，而對歷史抱着死板的眼光！何必這樣白費唇舌呢？『批評家』作出結論說：在法國，雖然工人參加了臨時政府，可是什麼出息也沒有，所以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也應當拒絕參加臨時政府，因為在這裏也是不會有什麼出息的。但是，難道問題就在於工人參加嗎？難道我們說過任何一個工人，不論他是誰，不論他屬於哪一派，都應該參加臨時革命政府嗎？不，我們目前還沒有成為你們的追隨者，我們決不會給每個工人發一張社會民主黨人的鑑定表。我們根本就沒有想到要把參加法國臨時政府的工人稱為社會民主黨黨員！你們何必作這種不恰當的比擬呢！況且，怎能把一八四八年法國無產階級的政治覺悟和現今俄國無產階級的政治覺悟相提並論呢？難道那時候法國無產階級舉行過一次反對當時制度的政治遊行示威嗎？它什麼時候在反對資產階級制度的標誌下紀念過五一節呢？它曾組成社會民主黨嗎？它有過社會民主黨的綱領嗎？我們知道，這一切都沒有過。這一切，法國無產階級連想也沒有想過。試問，法國無產階級當時能不能像俄國無產階級一樣，像這個早已組成社會民主黨、具有十分明確的社會民主主義綱領並自覺地為自己開闢走向目標的道路的無產階級一樣，享受

革命的果實呢？每一個稍微能够了解真情實況的人，對這個問題都一定給予否定的回答。只有那些僅會死記歷史事實而不能依據地點和時間去解釋歷史事實的來源的人，才會把這兩種不同的情形等量齊觀。

『批評家』再三再四地教訓說：『所需要的是人民方面的暴力，是不間斷的革命，而不是滿足於選舉，便各自分散回家。』這又是誹謗！可敬的先生們，誰對你們說過我們滿足於選舉，便各自分散回家呢？請指出名字來！

我們的『批評家』還因為我們要求臨時革命政府實現我黨最低綱領而焦急不安，於是大聲叫道：『這是完全不明事理；問題在於我們綱領上的各種政治要求和經濟要求只能用立法手續來實現，而臨時政府並不是立法機關。』當你閱讀這篇反對『違法行為』的檢察官式的演詞時，你會懷疑：這豈不是一位崇拜法制的自由資產者獻給『社會民主黨人報』的一篇論文嗎？否則，認為臨時革命政府似乎無權廢除舊法律和施行新法律的這種資產階級妙論，又應作何解釋呢！難道這種議論不是含有庸俗自由主義的意味嗎？從革命者口中發出這種議論，豈不令人奇怪嗎？這就好像一個判了死刑的囚

◎ 這種念頭之所以更加自然而然地發生，是因為孟什維克在『社會民主黨人報』第五期上宣佈整個梯弗里斯的資產階級中間只有十個左右商人是『共同事業』的叛徒。顯然，其餘的人都是孟什維克的擁護者並和他們具有一個『共同事業』。如果這些擁護『共同事業』的人當中，有誰忽然把一篇反對毫不妥協的『多數派』的『批評』文章寄給自已同事的刊物去發表，那又有什麼奇怪呢！

犯，腦袋將被砍掉的時候，却懇求別碰着他脖子上的疙瘩。不過，這些『批評家』還是情有可原的，因為他們不知道臨時革命政府和普通的內閣有什麼區別（這並不是他們的過失，而是他們的老師馬爾丁諾夫——阿基莫夫之流把他們弄成這樣的）。內閣是什麼呢？它是正式政府存在的結果。而臨時革命政府是什麼呢？它是正式政府被消滅的結果。前者依靠常備軍來執行現行的法律。後者則廢除現行的法律，依靠起義的人民把革命的意志變成法律。試問這兩者之間有什麼共同點呢？

假定說，革命獲得了勝利，而且勝利的人民成立了臨時革命政府。這裏就發生一個問題：如果這個政府無權廢除法律和施行法律，那它將怎麼辦呢？等待立憲會議嗎？可是爲了召集立憲會議，同樣必須施行新的法律，例如必須施行普遍、直接等等的選舉制，實現言論、出版、集會等等的自由。而這一切都已包括在我黨最低綱領裏了。如果臨時革命政府不能實行這個綱領，那末它在召開立憲會議時又將以什麼爲指南呢？莫非以布里根起草而由尼古拉第二批准的那個綱領^(註)爲指南嗎？

再假定說，獲得勝利的人民因缺乏武器而遭受很大的犧牲，他們爲了和反革命作鬥爭，要求臨時革命政府取消常備軍而武裝人民。這時孟什維克却宣傳說：取消常備軍而武裝人民，不是這個官廳（臨時革命政府）的事情，而是另外一個官廳——立憲會議的事情，大家去向它申訴吧，可別要求採取違法的行動，如此等等。還用說，出這種主意的人是多麼高明呵！

現在我們且來看看，究竟孟什維克根據什麼理由剝奪臨時革命政府的『權能』。第一個理由，臨時革命政府不是一個立法的機關；第二個理由，他們說立憲會議將無事可做。看，這些政治上的黃口

小兒竟說出何等可恥的話！原來他們竟不知道，獲得勝利的革命和代表這個革命的意志的臨時革命政府，在正式政府成立以前，乃是時局的主宰，所以它們有權廢除法律和施行法律！如果不是這樣，如果臨時革命政府沒有這種權力，那末它的存在就會毫無意義，起義的人民也就不會建立這樣一個機關。奇怪的是孟什維克竟把這種起碼的革命道理都忘記了。

孟什維克問道：如果臨時革命政府實現了我們的最低綱領，那末立憲會議又應當做些什麼呢？可敬的先生們，你們耽心立憲會議會失業嗎？請不要害怕，它的工作多着哩！它既要批准臨時革命政府在起義人民幫助下所實現的改革，又要制定國家憲法，而我們的最低綱領不過是其中一個組成部分。這就是我們對立憲會議的要求！

『批評家們』寫道：『他們（布爾什維克）想像不到小資產階級本身和工人之間的分裂，想像不到這種分裂也會在選舉中反映出來，所以臨時政府爲了本階級的利益就要壓迫工人選民。』誰懂得這種奧妙思想！『臨時政府爲了本階級的利益就要壓迫工人選民』，這話是什麼意思呢？！他們究竟講的是什麼樣的臨時政府呢？這些唐·吉訶德究竟是在同什麼樣的風車搏鬥呢？難道誰說過，小資產階級在單獨掌握臨時革命政府時也仍舊會保護工人利益嗎？爲什麼硬要把自己的糊塗思想加諸別人呢？我們說：在一定條件下，我們社會民主黨的代表也可以和民主派的代表一起參加臨時革命政府。假使是這樣，假使指的是社會民主黨人也參加的臨時革命政府，那末，它按成分說又怎麼會是小資產階級的呢？我們主張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的理由就是：實現我黨的最低綱領，和民主派——農民及城市小

資產階級（你們孟什維克邀請加入你們黨的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基本上是不矛盾的，所以我們認為和民主派一起實現我黨的最低綱領是可能的。倘若民主派阻礙實現這個綱領中的某些條文，我們這些有街頭選民即無產階級來支持的代表就會設法用實力去實現這個綱領，只要這種實力已經具備（如果還沒有這種實力，我們也就不會參加臨時政府，人家也不會把我們選進臨時政府）。由此可見，社會民主黨之所以應當參加臨時革命政府，正是爲了要在那裏保衛社會民主主義的觀點，即不讓其他階級來損害無產階級的利益。

臨時革命政府中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代表決不會像孟什維克隨便設想的那樣向無產階級宣戰，而是要和無產階級一起向無產階級的敵人宣戰。但是這些事情和你們孟什維克有什麼相干，革命的臨時政府和你們又有什麼相干！你們的位置在那裏，在『國（家杜馬）……』

本文第一部分載於一九〇五年八月十五日

『無產階級鬥爭報』第十一期

第二部分第一次刊印

本文沒有署名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① 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五八四頁正文和腳註。——譯者註。

② 手稿在此中斷。——編者註。

答『社會民主黨人報』

[EKO]

首先我應當向讀者道歉，答覆遲了一點。可是又沒有辦法：環境迫使我做別的工作，所以不得不把我的答覆暫時擱下；你們知道，我們是不能支配自己的。

我還要指出一點：許多人認為『略論黨內意見分歧』一書是聯盟委員會寫的，而不是某一個人寫的。我應當聲明，寫這本書的就是我。聯盟委員會只負編輯的責任。

現在我們來講本題吧。

反對者責難我，說我『看不見爭論的對象』，說我『模糊了問題』^①，說『所爭論的是組織問題而不是綱領問題』（第二頁）。

只要有一點觀察能力，就可以發現作者的這種斷語是荒謬的。問題在於我那本書是對『社會民主黨人報』創刊號的答覆，等『社會民主黨人報』第二期出版時，我那本書已經付印了。這位作者在創刊號上說了些什麼呢？只是說『多數派』走上了唯心主義的道路，他們的立場和馬克思主義是『根本

① 見『答聯盟委員會』（四）第四頁。

矛盾的。這裏一個字也沒有提到組織問題。我那時應該怎樣回答呢？我只能這樣回答：『多數派』是站在真正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的，如果『少數派』不了解這一點，那就表明『少數派』自己離開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凡是稍微懂得論戰的人，都一定會這樣做。可是作者一味固執已見地說：你爲什麼不談組織問題呢？可敬的哲學家，我之所以沒有談到組織問題，是因為你當時對這些問題一個字也沒有提。問題既沒有談到，當然就無從回答。所謂『模糊了問題』、『迴避爭論對象』等等，都顯然是作者的臆造。恰恰相反，我倒有理由懷疑作者自己在迴避某些問題。他說：『所爭論的是組織問題。』其實我們之間還存在着策略上的意見分歧，這種意見分歧比組織上的意見分歧更重要得多。然而我們的『批評家』在他的小冊子中，對這種意見分歧却隻字未提。這才真是『模糊了問題』。

我那本書究竟談些什麼問題呢？

現代的社會生活是按照資本主義方式安排的。這裏存在着兩大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它們之間進行着決死的鬥爭。資產階級的生活條件迫使資產階級去鞏固資本主義制度，而無產階級的生活條件則迫使無產階級去破壞資本主義制度，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和這兩個階級相適應也就創造出兩種意識：資產階級意識和社會主義意識。社會主義意識是適合於無產階級的地位的。因此，無產階級接受這種意識，領會這種意識，加倍努力地和資本主義制度作鬥爭。不用說，沒有資本主義和階級鬥爭，也就不會有社會主義意識。然而現在的問題是誰在創造，誰有可能創造這種社會主義意識（即科學社會主義）。考茨基說（我是重述他的意見）：無產者羣衆還處於無產者地位的時候，是既沒

有時間也沒有可能創造社會主義意識的。考茨基說：「現代的社會主義意識，只有在深湛的科學知識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出來。」^①科學的代表人物是知識分子，其中包括那些既有時間又有可能來領導科學並創造社會主義意識的知識分子，如馬克思、恩格斯等。顯然，創造社會主義意識乃是少數社會民主主義知識分子的事，因為他們既有時間又有可能來做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社會主義意識沒有在無產階級中間傳播開來，它本身又有什麼意義呢？它不過是空話罷了！如果這種意識在無產階級中間傳播開來，情形就會完全不同：無產階級就會認清自己的地位，並用加速的步伐向社會主義生活邁進。在這裏也就出現了社會民主黨（而不只是社會民主黨的知識分子），它把社會主義意識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考茨基說「社會主義意識是一種從外面灌輸到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去的東西」^②，指的也就是這一點。

可見創造社會主義意識的是少數社會民主黨的知識分子。而把這種意識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的則是整個社會民主黨，它使無產階級的自發鬥爭具有自覺的性質。

我那本書裏所說的就是這一點。

馬克思主義和「多數派」的立場就是如此。

我的論敵提出什麼理由來反對這一點呢？

① 見列寧「做什麼？」第二十七頁所引譯的考茨基的論文。（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一〇頁）

② 同上。

老實說，他並沒有提出任何重大的理由。他忙於謾罵而少作說明。看來他是很生氣了！他既不敢公開提出問題，也不敢直接回答問題，却像個胆小的「鬥士」，迴避爭論的對象，口是心非地抹殺已明確提出的問題，並且還要大家相信：「我一下子把所有的問題都弄清楚了！」譬如說，這位作者根本沒有提出關於創造社會主義意識的問題，不敢直率地說出他在這個問題上究竟贊同誰的意見；贊同考茨基的意見，還是贊同「經濟派」的意見。誠然，我們的「批評家」在「社會民主黨人報」創刊號上作過頗為大膽的聲明，當時他是直接用「經濟派」的口吻講話的。但是有什麼辦法呢？當時是一回事，而現在他已有「另一種心情」了；他不進行批評而迴避這個問題，這也許是因為他已深信自己犯了錯誤，不過不敢公開承認罷了。總之，我們的作者已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他根本弄不清楚究竟應該贊同誰的意見。如果贊同「經濟派」的意見，他就必須同考茨基和馬克思主義決裂；而這是對他不利的；如果和「經濟主義」決裂而贊同考茨基的意見，他就一定要贊同「多數派」的說法，但他沒有足夠的勇氣這樣做，所以他始終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那末我們的「批評家」還有什麼辦法呢？他認為在這裏最好是閉口不言，而他真的懦怯地迴避了上面所提出的問題。

關於灌輸意識這一點，作者說了些什麼呢？

他在這裏也表現了同樣的動搖和懦怯。他偷換了問題，剛愎自用地宣稱：考茨基根本沒有說過什麼「知識分子從外面把社會主義灌輸到工人階級中去」（第七頁）。

好極了，可是「批評家」先生，我們布爾什維克也並沒有這樣說過，你為什麼要同風車搏鬥呢？

按照我們的意見，按照布爾什維克的意見，把社會主義意識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的是社會民主黨^①，而不只是社會民主黨的知識分子，這一點你怎麼不能了解呢？爲什麼你以爲社會民主黨內只有知識分子呢？難道你不曉得，在社會民主黨的隊伍裏，先進的工人要比知識分子多得多嗎？難道社會民主黨的工人不能把社會主義意識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嗎？

看來作者自己也感到他這個「證據」不能令人信服，於是就改用另一個「證據」。

我們的「批評家」繼續說：「考茨基寫過『與無產階級產生的同時，無產者本身和那些領會無產階級觀點的人中間，必然也會產生社會主義傾向；社會主義傾向的產生，是應當這樣解釋的。』我們的『批評家』繼續解釋說：『由此可見，社會主義並不是從外面灌輸到無產階級中去的，恰恰相反，它是從無產階級中間產生出來，然後灌輸到那些領會無產階級觀點的人們的頭腦中去的。』（『答聯盟委員會』第八頁）

我們的「批評家」就是這樣寫的，並自以爲把問題弄清楚了！考茨基的話是什麼意思呢？他只是說：社會主義傾向是在無產階級中間自然然而產生出來的。這句話當然是對的。但我們所爭論的並不是社會主義傾向問題，而是社會主義意識問題呀！兩者之間有什麼共同點呢？難道傾向和意識是一個東西嗎？難道作者辨別不出「社會主義傾向」是不同於「社會主義意識」的嗎？他從考茨基的話

① 見「略論黨內意見分歧」第十八頁。（見本卷第九十一頁，——編者註）

中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不是從外面灌輸進去的』，這難道不是表明自己思想的貧乏嗎？『社會主義傾向的產生』和社會主義意識的灌輸之間有什麼共同點呢？難道同一位考茨基不是說過『社會主義意識是一種從外面灌輸到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去的東西』（見『做什麼？』第二十七頁）嗎？

看來作者已感到自己陷入荒謬的境地，所以在結語中不得不補充一句：『從考茨基這段話中確實可以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意識是從外面灌輸到階級鬥爭中去的。』（見『答聯盟委員會』第七頁）但他終究不敢公開大胆地承認這一科學真理。這裏我們的孟什維克在邏輯面前也表現了和先前一樣的動搖和懦弱。

這就是『批評家』先生對兩個主要問題所作的模稜兩可的『回答』。

對於從這兩個大問題中必然產生出來的其餘的小問題，又能說些什麼呢？最好是讀者自己拿我這本書和我們這位作者的那本小冊子作個比較。不過這裏還要提到一個問題。如果相信這位作者的話，就會覺得好像我們認為『分裂的發生是由於代表大會……沒有選舉阿克雪里羅得、查蘇利奇和斯塔羅維爾當編輯……』（『答聯盟委員會』第十三頁）因而我們也就『否認分裂，掩蓋其高度的原則性，並把反對派的全部活動都看做三個「造反的」編輯所幹的事情』（同上，第十六頁）。

這裏作者又把問題混淆起來了。原來這裏擺着兩個問題：分裂的原因和意見分歧的表現形式。

對於第一個問題，我直截了當地回答：『現在很清楚，黨內的意見分歧究竟是在什麼基礎上發生的。顯然，我們黨內暴露了兩種趨向：無產階級堅定性的趨向和知識分子動搖性的趨向。現在的「少

數派」就是這種知識分子動搖性的表現者。」（見『略論黨內意見分歧』第四十六頁）^①可見在這裏我認爲意見分歧是由於我們黨內存在着知識分子的趨向和無產階級的趨向，而不是由於馬爾托夫——阿克雪里維得的行爲。馬爾托夫等人的行爲不過是知識分子動搖性的表現。看來我們的孟什維克並沒有了解我那本書中的這一段話。

至於第二個問題，我確實說過，並且永遠要說：『少數派』的頭目們爲了爭奪『頭等位置』而痛哭流涕，他們的確使黨內鬥爭具有了這種形式。我們的作者不願承認這一點。然而這是事實：『少數派』的頭目們曾宣佈抵制黨，他們公開要求中央委員會裏的位置，要求中央機關報裏的位置，要求黨總委員會裏的位置，並且宣稱：『我們提出的這些條件是使黨內不致發生威脅全黨生存的唯一保證。』（見『述評』^②第二十六頁）這豈不是表明，寫在『少數派』頭目們旗幟上的不是思想鬥爭而是『爭位置』嗎？大家知道，誰也沒有阻礙他們進行思想原則的鬥爭。難道布爾什維克沒有向他們說過：你們去創辦單獨的機關報，並堅持自己的觀點，黨可以允許你們創辦這種機關報（見『述評』）嗎？如果他們真正是關心原則而不是關心『頭等位置』，那他們爲什麼不同意這樣做呢？

我們把這一切叫做孟什維克領袖們沒有政治氣節。先生們，我們這樣直言不諱，請不要見怪。

關於社會主義意識從外面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這一點，『少數派』的領袖們先前並沒有同馬克思

① 見本卷第一一七頁。——編者註。

主義和列寧發生過意見分歧（見『火星報』創刊號所載的綱領性的論文）。可是後來他們却動搖起來，開始和列寧作鬥爭，把他們自己昨天崇拜過的東西都推翻了。我把這叫做反覆無常。孟什維克先生們，也不要因此見怪。

昨天你們崇拜中央機關，對我們大發雷霆，責備我們爲什麼不信任中央委員會。今天你們卻不僅破壞中央機關，而且破壞集中制（見『第一次全俄代表會議』）。我把這叫做無原則性。孟什維克先生們，希望你們也不要因此對我發脾氣。

如果把沒有政治氣節、爭位置、不堅定、無原則以及諸如此類的特點綜合在一起，那我們就會看出一個總的特性，即知識分子的動搖性，這種動搖性是知識分子最常犯的毛病。很明顯，知識分子的動搖性就是『爭位置』、『無原則』等等所由產生的土壤（基礎）。而知識分子的不穩定性又是由他們的社會地位決定的。我們就是這樣解釋黨內分裂的。我們的作者，你究竟是否懂得了分裂的原因和分裂的形式之間的區別呢？我很懷疑。

這就是『社會民主黨人報』和它那位奇怪的『批評家』所採取的多麼荒謬和模稜兩可的立場。但這位『批評家』却又在另一方面大顯身手。這位作者在他那本總共不過八張紙的小冊子裏，居然異想天開地一連八次誹謗布爾什維克，簡直誹謗得令人發笑。不相信嗎？請看事實。

謊言第一號。照作者的意見，『列寧想把黨縮小，把黨變成狹小的職業家組織』（第二頁）。而列寧說的却是：『不要以爲黨的組織只應由職業革命家組成。我們需要有各色各樣、或大或小的各種不同

的組織——從極狹小而秘密的組織起，一直到極廣大而自由的組織爲止。」（見『記錄』第二四〇頁）

謊言第二號。照作者的說法，列寧想『只把委員會的委員們吸收到黨內來』（第二頁）。而列寧說的却是：『一切集團、小組、分委員會等等都應當和委員會的機關或委員會的分部列於同等的地位。其中有一些將公開聲明願意加入俄國社會民主黨，而一經委員會批准就可以加入。』（見『給一位同志的信』第十七頁）（見〇）

謊言第三號。照作者的意見，『列寧要求在黨內建立知識分子的統治』（第五頁）。而列寧說的却是：『委員會應當……盡可能包括工人運動中工人出身的有主要帶頭人物。』（見『給一位同志的信』第七頁至第八頁）這就是說，不僅在其他一切組織裏，而且在委員會裏，先進工人也應當佔大多數。

謊言第四號。作者說，我那本書第十二頁上所引證的『工人階級自發地傾向於社會主義』等語，『完全是臆造的』（第六頁）。其實這句話是我直接從『做什麼？』一書翻譯過來的。該書第二十九頁有以下一段話：『工人階級自發地傾向於社會主義，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時時刻刻以各種形式復活起來的）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却自發地而又最厲害地迫使工人接受它。』在我那本書第十二頁上所翻譯的正是這一段話。我們的『批評家』就把這叫做臆造的引證！我不知道這是由於作者的粗心大意，還是由於他有意騙人。

○ 可見照列寧的意見，不僅中央委員會，而且地方委員會也可以把一些組織吸收到黨內來。

謊言第五號。照作者的意見，『列寧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說工人「自然而然要」走向社會主義』（第七頁）。而列寧說的却是：『工人階級自發地傾向於社會主義。』（見『做什麼？』第二十九頁）

謊言第六號。作者硬說我認爲『社會主義是由知識分子從外面灌輸到工人階級中去的』（第七頁）。而我說的却是：社會民主黨（而不只是社會民主黨的知識分子）把社會主義意識灌輸到運動中去（第十八頁）。

謊言第七號。照作者的意見，列寧說社會主義思想體系是『完全不依賴工人運動』而產生的（第九頁）。而列寧却分明連想都沒有這樣想過。列寧說：社會主義思想體系是『完全不依賴於工人運動的自發增長』而產生的（見『做什麼？』第二十一頁）。

謊言第八號。作者說我所講的『普列漢諾夫正在離開「少數派」』這句話似乎是『造謠中傷』。然而我這句話被證實了：普列漢諾夫已經離開了『少數派』……①

至於作者慷慨地用來點綴他那本小冊子的許多瑣碎謊言，我就不必再提了。

不過應該承認，作者畢竟說了句唯一的真話。他向我們說：『任何一個組織要是造謠中傷，那它的末日就快到了。』（第十五頁）這當然是確確實實的真理。問題只是誰在造謠中傷：是『社會民主黨人報』和它那位奇怪的騎士呢，還是聯盟委員會？這一點要由讀者來判斷了。

① 這位作者竟敢在『社會民主黨人報』第五期上宣稱我們，似乎我們曲解了有關第三次代表大會的事實！

再講一個問題，我們就結束了。作者鄭重其事地宣稱：『聯盟委員會責備我們，說我們重複普列漢諾夫的意見。重複普列漢諾夫、考茨基及其他很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意見，我們認為是一種美德。』（第十五頁）可見你們認為重複普列漢諾夫和考茨基的意見是一種美德。好極了，先生們，那就請聽一聽吧：

考茨基說：『社會主義意識是一種從外面灌輸到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去的東西，而並不是一種從這個鬥爭中自發地產生出來的東西。』（見『做什麼？』第二十七頁所引證的考茨基的一段話）同一個考茨基又說：『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就是把認識無產階級地位及其任務的意識灌輸到無產階級中去。』（同上）孟什維克先生，我們希望你把考茨基的這些話重複一下，藉以消除我們的疑問。

現在我們來談談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說：『……我也不懂，為什麼有人認為列寧的草案①一旦被通過，就會使我們黨對很多工人關起大門。願意入黨的工人是不怕參加組織的。他們並不害怕紀律。怕參加組織的只是許多被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浸透了的知識分子。這倒很好。這些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通常也就是各種機會主義的代表人物。我們要使他們遠遠地離開我們。列寧的草案可以作為防止他們侵入黨內的堡壘，所以單憑這一點，凡是反對機會主義的人也都應當贊成這個草案了。』（見『記錄』第二四六頁）

① 這裏指的是列寧所擬定的黨章第一條和馬爾托夫所擬定的黨章第一條。

『批評家』先生，我們希望你摘下假面具，並且以無產階級的爽直精神重複一下普列漢諾夫的這段話。

如果你不這樣做，那就表示你在報紙上所作的聲明是輕率的，不負責任的。

載於一九〇五年八月十五日

『無產階級鬥爭報』第十一期

本文沒有署名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① 即『對同盟代表大會記錄的述評』。——譯者註。

反動加緊起來了

烏雲在我們頭上密佈着。衰朽的專制制度正在抬頭，用『火和劍』武裝自己。反動勢力出動了！再別對我們講那一套爲鞏固卑鄙的專制制度而實行的沙皇『改革』了，所謂『改革』，不過是殘暴的沙皇政府用以掩飾它那慷慨款待我們的槍彈和皮鞭的一種僞裝罷了。

有一個時候，政府避免在國內製造流血慘案。當時它正和『外敵』作戰，需要『國內安定』。所以它對『內敵』採取了某種『放任』態度，對於如火如荼的運動『佯作不知』。

現在的時候已經不同了。懾於革命魔影的沙皇政府，爲了聚集力量並『徹底地』鎮壓『內敵』，急忙和『外敵』日本簽訂了和約。於是反動開始了。早在這以前，沙皇政府就在『莫斯科新聞』(『上暴露了自己的『計劃』。這個反動報紙寫道：政府……『不得不同時進行兩個戰爭……對外戰爭和對內戰爭。它之所以沒有用足夠的力量進行這兩個戰爭……部分地是由於一個戰爭妨礙了另一個戰爭……如果遠東的戰爭現在結束……』那末政府……終於可以騰出手來，以便不用任何談判來制服……內敵……而勝利結束對內戰爭……』『對外戰爭一結束，俄國(應讀作：政府)的全部注意力將集中在國內生活上，而且會以戡亂爲主。』(見八月十八日『莫斯科新聞』)

沙皇政府和日本簽訂和約時的『計劃』就是如此。

後來，和約剛一簽訂，沙皇政府便通過它的一位大臣又把這套『計劃』重述了一遍。那位大臣說：『我們要把俄國的過激黨派都淹沒在血泊裏。』沙皇政府已通過自己的總督和督辦在實行上述『計劃』。無怪乎它把俄國變成了軍營，無怪乎它把哥薩克和兵士密佈在運動的中心地區，並把機槍對準無產階級，——可以認為政府預備再度征服遼闊廣大的俄國！

可見政府正向革命宣戰，而首先打擊的對象就是革命的先進部隊——無產階級。我們應當這樣去了解沙皇政府對『過激黨派』所施的威脅。當然，農民如果『不大知趣』，竟要求享受人的生活，政府也不會『委屈』他們，一定會慷慨地用皮鞭和槍彈款待他們。不過在目前，政府還是竭力欺騙他們：允諾給他們土地，邀請他們參加杜馬，答應將來給他們『各種各樣的自由』。

至於『潔淨的人士』，政府對他們當然會『客氣一點』，並設法和他們結成聯盟。其實國家杜馬的存在也就是爲了這個目的。不用說，自由資產者先生們是不會拒絕『協議』的。還在八月五日，他們就通過自己的領袖聲明說，他們對沙皇的改革歡喜若狂：『……必須竭力使俄國……不致走上法國的革命道路。』（見八月五日『俄羅斯新聞』）⁽²⁾所載維諾格拉多夫的論文）不用說，狡猾的自由派寧可叛變革命也不背棄尼古拉第二。他們的最近一次代表大會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一句話，沙皇政府正在竭盡全力要把人民革命鎮壓下去。

以槍彈對付無產階級，以虛偽的諾言欺騙農民，以『權利』籠絡大資產階級，——這就是反動勢

力用以武裝自己的手段。

不是自己死亡，就是粉碎革命，——這就是今天專制政府的口號。

另一方面，革命勢力也沒有打瞌睡，而是在繼續創造自己的偉大事業。由於戰爭而更加尖銳的危機和日益頻繁的政治罷工，驚醒了整個俄國無產階級，使它和沙皇專制制度直接對立起來。軍事戒嚴不但沒有嚇倒無產階級，反而火上加油，使局面更加惡化了。誰要是聽過無產者無數次的高呼『打倒沙皇政府，打倒沙皇杜馬！』，誰要是仔細聽過工人階級的脈搏，誰就不會懷疑：無產階級這個革命領袖的革命精神必將日益旺盛起來。至於農民，軍事動員早已激起了他們反對現存制度，因為軍事動員奪去了他們家中最好的勞動力，破壞了他們的家庭。如果再注意到還有瀰漫了二十六省的飢荒，那就不難了解災難深重的農民將會走上什麼道路。末了，士兵也開始發出怨言，這種怨言對於專制制度日益具有威脅性。專制制度的支柱哥薩克開始引起士兵的仇視：不久以前，在新亞歷山大里亞，士兵們打死打傷了三百名哥薩克^①。這樣的事件正在逐漸增加……

一句話，實際生活在醞釀着新的革命浪潮，這個浪潮正在逐漸高漲並向反動勢力衝去。莫斯科和彼得堡最近發生的一些事件就是這個浪潮的先聲。

我們社會民主黨人究竟應當怎樣對待這些事件，應當做些什麼呢？

① 見『無產者報』(五一)第十七期。

如果聽孟什維克馬爾托夫的話，我們就應當立即進行立憲會議的選舉，以便永遠摧毀沙皇專制制度的基礎。照他的意見，在進行合法杜馬選舉的同時，還應當進行不合法的選舉。應當在各地成立選舉委員會來號召「居民用普遍投票辦法選出自己的代表。這些代表應當在一定的時候聚集在一個城市裏開會，並宣佈自己爲立憲會議……」『消滅專制制度的過程就應當是』這樣的^①。換句話說，儘管專制制度仍然存在，我們還是可以在全俄實行普選！儘管專制制度仍然猖獗，『不合法的』人民代表還是可以宣佈自己爲立憲會議並建立民主共和國！這就是說，既不需要武裝，又不需要起義，也不需要臨時政府，只要『不合法的』代表們宣佈自己是立憲會議，民主共和國就會自然而然地到來的！不過善良的馬爾托夫忘記了，這種異想天開的『立憲會議』必有一天會落到彼得巴甫洛堡大獄^②裏去的！住在日內瓦的馬爾托夫不懂得：俄國的實際工作者是沒有工夫玩資產階級那套無聊把戲的。

不，我們想做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兇惡的反動派在集結黑暗勢力並竭力想把它們聯合起來；而我們的任務則是集結社會民主主義力量並把它們更緊密地團結起來。

兇惡的反動派在召開杜馬，它想找到新的同盟者，擴大反革命的隊伍；而我們的任務是宣佈積極抵制杜馬，向全世界揭穿它的反革命面目，擴大革命擁護者的隊伍。

① 見「無產者報」第十五期，那裏引用了馬爾托夫的「計劃」。

兇惡的反動派在向革命進行致命的攻擊，它想使我們的隊伍驚惶失措，想葬送人民革命；而我們的任務則是緊密團結，在全國各地同時向沙皇專制制度進行攻擊，永遠根除沙皇專制制度。

我們需要的不是馬爾托夫的紙房子，而是總起義。

只有人民自己的勝利起義才能拯救人民。

不是自己死亡，就是革命勝利，——這應當是我們今天的革命口號。

載於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五日

『無產階級鬥爭報』第十二期

本文沒有署名

從格魯古亞文譯成俄文

① 彼得巴甫洛堡大獄在冬宮對面，是沙皇時代囚禁革命者的地方。——譯者註。

資產階級在佈置圈套

九月中旬舉行了「地方自治局和城市自治局活動家」代表大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成立了一個以中央委員會爲領導、並在各城市設有地方機關的新「黨」^(註)。代表大會通過了「綱領」，規定了「策略」，並擬定了這個剛剛解出的「黨」要向人民發表的特別宣言。一句話，「地方自治局和城市自治局活動家」已經成立了他們自己的「黨」。

這班「活動家」是些什麼人，他們的名稱是什麼呢？

就是自由資產者。

自由資產者又是些什麼人呢？

就是富裕資產階級的自覺的代表人物。

富裕資產階級是和我們勢不兩立的敵人，他們的富裕建立在我們的貧窮上面，他們的歡樂建立在我們的痛苦上面。很明顯，他們的自覺的代表人物將是我們的死敵，將企圖自覺地擊潰我們。

總之，人民公敵的「黨」成立了，這個「黨」要向人民發表自己的宣言。

這些先生們要的是什麼，他們在自己的宣言中堅持的是什麼呢？

他們不是社會主義者，他們仇恨社會主義運動。這就是說，他們在鞏固資產階級制度，同無產階

級進行決死的鬥爭。這就說明爲什麼他們博得了資產階級集團大大的同情。

他們也不是民主主義者，他們仇恨民主共和制。這就是說，他們在鞏固沙皇寶座，並且也狂熱地反對災難深重的農民。這就說明爲什麼尼古拉第二『恩准』他們集會，允許他們召開『黨』代表大會。

他們只想把沙皇的權力稍微削弱一點，而且連這一點也是有條件的，就是這些權力只能够轉到資產階級的手中。至於沙皇制度，他們則認爲必須加以保存，作爲富裕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可靠堡壘。因此，他們在自己的『憲法草案』中說：『羅曼諾夫皇朝的寶座仍應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就是說，他們要的是一個限制君主權力的殘缺不全的憲法。

自由資產者先生們『毫不反對』也給人民以選舉權，但是要有一個條件，就是人民代表議院要受富豪議院的控制，而富豪議院一定要竭力修改和取消人民代表議院所通過的種種決議。因此，他們在自己的綱領中說：『我們需要兩院制。』

自由資產者先生們『很歡迎』言論、出版和結社的自由，只要罷工自由受到限制就行。這就說明爲什麼他們大談其『人權和公民權』，而對於罷工自由則含糊其詞，只是假惺惺地嘟囔些什麼『經濟改革』罷了。

這些奇怪的先生們也沒有忘記對農民施捨恩惠：他們『毫不反對』把地主的土地轉歸農民，但是要有一個條件，就是農民應向地主贖回這些土地，而不能『白白得到土地』。這班可憐的『活動家』，看來是多麼善良呵！

如果他們能活到這一切願望都實現了的時候，那末沙皇的權力就會落到資產階級手中，而沙皇專制制度就會逐漸變成資產階級專制制度。這就是「地方自治局和城市自治局活動家」想把我們拉去的地方。所以他們甚至在夢裏也害怕人民革命，並大談其所謂「綏靖俄國」。

既然如此，也就難怪這些倒霉的「活動家」對於所謂國家杜馬抱着莫大的希望。大家知道，沙皇杜馬根本否定人民革命，而這對於我國自由資產者是極其有利的。大家知道，沙皇杜馬給予富裕資產階級「某種」活動地盤，而這對於我國自由資產者是極其需要的。這就說明爲什麼他們把自己的全部「綱領」和全部活動都寄託在杜馬的存在上面，杜馬一垮台，他們的一切「計劃」勢必跟着破產。所以他們害怕杜馬受到抵制，所以他們勸我們加入杜馬。他們通過自己的領袖雅庫什金這樣說：「如果我們不參加沙皇杜馬，那將是嚴重的錯誤。」的確，這將是「嚴重的錯誤」，但是要看對誰來說：對人民來說，還是對人民的敵人來說，——問題就在這裏。

沙皇杜馬的使命是什麼，關於這一點，「地方自治局和城市自治局活動家」說些什麼呢？他們在自己的……宣言中說：「……杜馬的首要任務，就是改造杜馬本身。」他們在同一宣言中又說：「選民應當責成覆選人選舉那些首先願意改造杜馬的候選人。」

這種「改造」的內容究竟是什麼呢？就是要讓杜馬「在制定法律……以及在討論國家收支時有決定權……並且有權監督政府大臣的行動」。這就是說，覆選人首先應當要求擴大杜馬的權限。原來「改造」杜馬就是這麼一回事。誰會被選進杜馬裏去呢？大部分是大資產階級。很明顯，擴大杜馬權

限就是在政治上加強大資產階級。於是『地方自治局和城市自治局活動家』就勸人民把自由資產者選進杜馬裏去，委託自由資產者首先協助加強大資產階級！原來我們所應該關心的，首先和主要的就是我們要如何親手加強我們的敵人，——這就是自由資產者先生們現在勸我們去做的事情。多麼『友好的』勸告，還有什麼可說！那末究竟有誰關心人民的權利呢？噢，還用說，自由資產者先生們是不會忘記人民的。他們保證說，當他們被選入杜馬的時候，當他們在杜馬中的地位鞏固起來的時候，他們也會替人民要求權利的。『地方自治局和城市自治局活動家』希望用這種假仁假義的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就說明為什麼他們勸我們首先擴大杜馬的權利……

倍倍爾說過，凡是敵人勸我們做的事情，都是對我們有害的。敵人勸我們參加杜馬，顯然，參加杜馬對我們是有害的。敵人勸我們擴大杜馬的權利，顯然，擴大杜馬的權利對我們是有害的。破壞人民對杜馬的信任，使杜馬在人民面前丟臉，——這就是我們應當做的事情。不是擴大杜馬的權利，而是擴大人民的權利，——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如果這個敵人同時還向我們說些甜言蜜語，答應給我們一些什麼『權利』，那末這就是說，敵人在給我們佈置圈套，想用我們的手替他們築起堡壘。我們能期待於自由資產者的，至多也不過如此。

但是，關於某些向我們鼓吹自由資產者策略的『社會民主黨人』，又該說些什麼呢？關於逐字逐句地重複我們敵人的陰險勸告的高加索『少數派』，又該說些什麼呢？例如高加索『少數派』說：『我們認為必須參加國家杜馬。』（見『第二次代表會議』第七頁）這和自由資產者先生們『認為必須』這

樣做的說法真是如出一轍！

又是那些『少數派』勸告我們說：『如果布里根委員會……把選舉議員的權利只給予有產者，那末我們就應當干涉這種選舉，用革命手段迫使選民選舉進步的候選人，並在全俄縉紳會議上要求召開立憲會議。最後，用一切辦法……迫使全俄縉紳會議召開立憲會議或者宣佈自己爲立憲會議。』（見『社會民主黨人報』創刊號）這就是說，即使只是有產者享有選舉權，即使參加杜馬的只是些有產者，我們還是應當要求這個有產者會議享有立憲會議的權限！即使人民的權利被縮小，我們還是應當盡量擴大杜馬的權限！不用說，既然只是有產者才享有選舉權，那末所謂選舉『進步的候選人』不過是一句空話罷了。

如上所述，自由資產者向我們鼓吹的也就是這麼一套。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自由資產者已經孟什維克化了，或者是高加索『少數派』已經自由主義化了。

不管怎樣，這個剛剛解出的自由資產者的『黨』，無疑是在巧妙地佈置它的圈套……粉碎這個圈套，揭穿這個圈套，無情地反對人民公敵自由派，——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要做的事情。

載於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五日

『無產階級鬥爭報』第十二期

本文沒有署名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公民們！

雄偉的巨人——全俄國的無產階級又活動起來了……聲勢浩大的罷工運動席捲了整個俄國。

全俄國遼闊國土上的生活，好像聽從魔杖的一揮，都立刻停止了。僅僅在彼得堡和它的各條鐵路上就有二百多萬工人罷工。莫斯科這個靜謐的、死氣沉沉的、忠於羅曼諾夫皇朝的古都，到處瀰漫着革命的火燄。哈爾科夫、基輔、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及其他文化中心和工業中心、整個俄國中部和南部、整個波蘭和整個高加索都停止了脚步，正顏厲色地盯着專制制度。

將要發生什麼事情呢？全俄國都戰戰兢兢、提心吊胆地等待着這個問題的回答。無產階級正在向那萬惡的雙頭妖怪^①挑戰。真正的搏鬥是否就會跟着發生呢？罷工是會變成公開的武裝起義，還是像從前的罷工一樣「和平」結束並「沉寂下去」呢？

公民們！不管這個問題的回答怎樣，不管目前罷工的結局怎樣，有一點却是大家應該明白而無庸懷疑的，就是我們正處在整個俄國全民起義的前夜，而且這個起義的時刻已經迫近了。目前已爆發的政治總罷工，其規模之大，不僅在俄國史上，就是在世界史上也是空前的；這次總罷工也許今天就結束，不致釀成全民起義，但這只是爲了明天又重新爆發起來，並以更大的力量震撼全國而變成聲勢

浩大的武裝起義；其結果必定會解決俄國人民和沙皇專制制度歷來的爭端，必定會打碎這個萬惡妖怪的腦袋。

全民武裝起義，——這就是我國最近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一切事變的總和在歷史上必然要引起的、無可避免的結局！全民武裝起義，——這就是現時擺在俄國無產階級面前急待解決的一個偉大任務！

公民們！爲了你們本身的利益（除一小撮財政貴族和土地貴族而外），大家都必須響應無產階級的戰鬥號召，和無產階級一起奔向這一挽救大家的全民起義。

罪惡滔天的沙皇專制制度把我國引到了毀滅的邊緣。億萬的俄國農民貧窮破產，工人階級受盡壓迫，貧困不堪，國債累累，捐稅重重，全體居民毫無權利可言，層出不窮的專橫暴虐籠罩着生活的各方面，公民的生命財產完全沒有保障，——這就是目前在俄國呈現出的一幅可怕的圖畫。長此下去是不行的！必須消滅造成這種驚人慘象的專制制度！它一定要被消滅！專制制度也意識到這一點，並且它愈是意識到這一點，這種慘象也就顯得愈加淒慘，而專制制度在自己周圍散佈的妖氛也就變得愈加陰森可怕。專制制度除了在城市街頭屠殺了成百成千的和平公民——工人以外，除了把數萬工人和知識分子這些人民的優秀子弟囚禁在監獄和流放地受折磨以外，除了利用沙皇的暴徒在農村中、在農民中間、在整個俄國的疆土上不斷屠殺和不斷逞兇以外，最後又想出了一套新的殘酷手段。它開始煽動人民互相仇恨，挑撥各個居民階層以至各個民族互相攻擊。它武裝俄羅斯的地痞流氓並

喉使他們去反對俄羅斯的工人和知識分子，它武裝貝薩拉比亞那批飢餓而落後的俄羅斯人和莫爾達維亞人並喉使他們去反對猶太人，它武裝一羣無知狂信的韃靼人並喉使他們去反對阿爾明尼亞人。它利用韃靼人擊破了俄國革命中心之一、高加索最革命的中心——巴庫，並使整個阿爾明尼亞地區嚇得離開了革命。它把整個多民族的高加索變成了軍營，高加索的居民不僅會隨時遭受專制制度的攻擊，而且會隨時遭受鄰族——這些專制制度的不幸的犧牲品的攻擊。這樣下去是不行的！只有革命才能完全消滅這種情形！

如果指望那造成這一切驚人慘象的專制制度自己願意消滅並能夠消滅這些慘象，那就未免太奇怪太可笑了。自由黨所能採取的任何改良辦法，任何補救專制制度的辦法，如國家杜馬、地方自治局之類，都不能消滅這種慘象。恰恰相反，在這方面的任何企圖和對無產階級革命怒潮的抵禦都會使這種慘象變得愈加嚴重。

公民們！無產階級是我國社會中最革命的階級，這個至今擔負着反專制制度鬥爭的全部重任的階級，這個最堅決、最勇敢、最徹底反對專制制度的階級，目前正在準備舉行公開的武裝發動。它號召你們，號召社會上一切階級來幫助它，支援它。武裝起來吧！幫助它武裝起來並準備作決死的戰鬥吧！

公民們！起義的時刻迫近了！我們必須有充分準備地來迎接起義！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在全國各地同時發動武裝總起義的時候，我們才能戰勝我們的卑鄙的敵人——萬惡的沙皇專制制度，

並在它的廢墟上建立起我們迫切需要的自由民主共和國。

打·倒·專·制·制·度！

武·裝·總·起·義·萬·歲！

民·主·共·和·國·萬·歲！

戰·鬥·的·俄·國·無·產·階·級·萬·歲！

① 雙頭妖怪指以雙頭鷹為國徽的沙皇俄國而言。——譯者註。

按一九〇五年十月俄國社會民主黨梯弗里斯
委員會印刷所印的傳單原文刊印
署名：梯弗里斯委員會

告全體工人書

革命像霹靂一樣震響着！俄國的革命人民已經起來了，包圍了沙皇政府，並要向它衝擊！紅旗在飄揚，街壘在構築，人民拿起武器，向國家機關衝擊。勇士們的吶喊聲又響起來了，沉寂的生活又沸騰起來了。革命的大船已經揚帆向自由飛駛而去。駕着這隻大船的就是俄國無產階級。

俄國無產者要求的是什麼？他們奔向哪裏呢？

我們要推翻沙皇杜馬，要召開全民立憲會議，——這就是俄國無產者今天所說的話。無產階級不會向政府要求微小的讓步，它不會要求政府取消某些城市和鄉村中的『戒嚴』和『鞭笞制度』，無產階級不會捨本逐末，去做這種小事情。誰向政府要求讓步，誰就是不相信政府會滅亡，但無產階級却充滿着這種信念。誰期望政府『開恩』，誰就是不相信革命的雄厚力量，但無產階級却充滿着這種信念。不！無產階級不會把自己的精力分散在一些不明智的要求上。無產階級對沙皇專制制度只有一個要求：打倒它，消滅它！於是工人的革命呼聲就在俄國大地上喊得越來越勇敢。他們高呼：打倒國家杜馬！全民立憲會議萬歲！這就是俄國無產階級今天奔向的目標。

沙皇決不會給予全民立憲會議，也決不會消滅他自己的專制制度；他決不會這樣做！他所「給予」的殘缺不全的『憲法』，不過是一種暫時的讓步，不過是他的虛偽的諾言罷了！自然，我們要利用這種讓步，我們不拒絕奪取烏鴉嘴裏的硬果，以便用這硬果打碎它的腦殼。然而事實畢竟是事實，人民是不能信賴沙皇的諾言的，人民只應當信賴自己，只應當依靠本身的力量，人民的解放必須由人民親手來完成。只有在壓迫者的骸骨上才能建立人民的自由，只有壓迫者的血液才能使人民專制制度的土壤肥沃！只有當武裝的人民在無產階級率領下發動起來並舉起總起義旗幟的時候，依靠刺刀的沙皇政府才能被推翻。不是空洞的詞句，不是虛妄的『自我武裝』，而是真正的武裝和武裝起義，——這就是全俄無產者今天奔向的目標。

勝利的起義將使政府遭受失敗。然而遭受失敗的政府往往又重新站立起來。在我國遭受失敗的政府也可能站立起來。起義時向四處躲藏的黑暗勢力，在起義的第二天就會從洞裏鑽出來設法支持政府。遭受失敗的政府就是這樣死而復甦的。人民一定要制裁這種黑暗勢力，人民必須根除這種黑暗勢力！但爲了這一點，必須使勝利了的人民在起義的第二天就不分老少一律武裝起來，組成革命軍隊，準備隨時拿着武器保衛已經取得的權利。

只有勝利了的人民組成革命軍隊，那時他們才能徹底粉碎隱藏的黑暗勢力。只有革命軍隊才能使臨時政府的行動具有力量，只有臨時政府才能召開全民立憲會議以便建立民主共和國。建立革命軍隊和臨時革命政府，——這就是俄國無產者今天奔向的目標。

這就是俄國革命已經走上道路。這條道路是通向人民專制的，所以無產階級號召人民的全體朋友都循着這條道路前進。

沙皇專制制度阻礙着人民革命的道路，它想用昨天的宣言來制止這個偉大的運動；很明顯，革命浪潮一定會捲走沙皇專制制度，把它完全吞沒……

凡是不踏上無產階級道路的人都應當受到鄙棄和憎恨，因為他們卑鄙地背叛革命！凡是實際上踏上了這條道路而口頭上却說着另一套的人也是可恥的，因為他們是胆小鬼，害怕真理！

我們不害怕真理，我們不害怕革命！讓霹靂響得更厲害吧！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吧！勝利的時刻迫近了！

讓我們歡欣鼓舞地高呼俄國無產階級的口號：

打倒國家杜馬！

武裝起義萬歲！

革命軍隊萬歲！

臨時革命政府萬歲！

全民立憲會議萬歲！

民主共和國萬歲！

無產階級萬歲！

按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九日俄國社會民主
工黨高加索聯盟秘密印刷所（阿福拉巴
爾印刷所）印的傳單原文刊印

署名：梯弗里斯委員會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梯弗里斯，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偉大的俄國革命開始了！我們已經經歷了這個革命的慷慨可畏的第一幕，這一幕在形式上是以十月十七日的宣言結束的。『受命於天』的專制沙皇在革命人民面前低下了他那『戴着皇冠的頭』，答應人民實現『確定不移的公民自由的原則』……

但這不過是第一幕。這不過是結局的開端。我們正處在堪稱爲偉大俄國革命的偉大事變的前夜。這些事變循着冷酷無情的歷史法則，循着鐵一般的必然法則向我們迫近了。沙皇和人民，沙皇專制和人民專制是互相敵視、根本對立的兩極。誰勝誰敗只能是彼此決鬥的結果，拚命鬥爭的結果，生死鬥爭的結果。這個鬥爭還沒有開始。這個鬥爭還在前面。俄國革命的雄偉巨人——全俄國的無產階級，正用一切力量 and 一切辦法準備迎接這個鬥爭。

自由資產階級企圖防止這個必不可免的搏鬥。它認爲現在已經是結束『無政府狀態』、開始和平『建設』、開始『國家建設』的時候了。它確實是對的。對自由資產階級說來，無產階級在第一次革命發動中從沙皇制度那裏奪得的東西已經足够了。自由資產階級現在可以大胆地同沙皇政府結成有利於己的聯盟，同心協力反對共同的敵人，反對自己的『掘墓人』——革命無產階級了。資產階級的自

由即剝削的自由已經有了保證，這對資產階級說來，已經十分足夠了。從來就不革命的俄國資產階級現在已經公開站到反動勢力方面去了。讓它去好了！我們決不會對此特別惋惜。革命的命運從來就沒有操在自由派手裏。俄國革命的進程和結局完全取決於革命無產階級和革命農民的實際行動。

社會民主黨領導的城市革命無產階級和跟着它走的革命農民，不顧自由派的任何詭計，總是要堅定不移地繼續進行自己的鬥爭的，他們不到完全推翻專制制度並在其廢墟上建立起自由民主共和國時，是決不能休的。

這就是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當前的政治任務，這就是它在這次革命中的目的，它在農民的支持下無論如何要達到這個目的。

走向民主共和國的必經之路，也由無產階級明確地規定了。

(一) 進行我們上面所說的堅決的殊死的搏鬥；(二) 在這個『搏鬥』過程中組織一支革命軍隊；(三) 建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其形式就是由於勝利的『搏鬥』而產生的臨時革命政府；(四) 由臨時革命政府根據普遍、直接、平等和無記名的選舉制召開立憲會議。這就是偉大的俄國革命在達到圓滿結局以前所必須經歷的各個階段。

無論政府的任何威脅或沙皇的任何冠冕堂皇的宣言，無論專制制度為拯救自己而捧出的如維特政府之類的任何臨時政府，無論沙皇政府召開的、即使是根據普遍等辦法的選舉制召開的任何國家杜馬，都不能引誘無產階級離開唯一正確的、走向民主共和國所必經的革命道路。

無產階級有沒有足夠的力量走完這條道路，有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光榮地結束它在這條道路上所要遇到的巨大的流血鬥爭呢？

有，它有足夠的力量！

無產階級自己是這樣想的，並且大胆地堅決地準備迎接戰鬥。

載於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高加索工人小報」(5)創刊號
本文沒有署名

1. 1. 1.

2. 2. 2.

3. 3. 3.

4. 4. 4.

5. 5. 5.

6. 6. 6.

7. 7. 7.

8. 8. 8.

9. 9. 9.

10. 10. 10.

11. 11. 11.

12. 12. 12.

13. 13. 13.

14. 14. 14.

15. 15. 15.

16. 16. 16.

17. 17. 17.

18. 18. 18.

19. 19. 19.

20. 20. 20.

兩次搏鬥

(論一月九日事變)

你們大概還記得去年一月九日的事變……那天彼得堡的無產階級同沙皇政府直接碰頭了，並且迫不得已和它搏鬥了一場。的確是迫不得已，因為彼得堡的無產階級那天和平地走到沙皇那裏去本來是要求『麪包和正義』，可是人家却用敵視的態度對待他們，用冰雹般的槍彈掃射他們。彼得堡的無產階級本來是把自己的希望寄託在沙皇肖像和教堂旗幟上的，可是人家却把這些肖像和旗幟撕成碎片扔到他們的臉上，這樣就清清楚楚地向他們證明：只有武器才能對抗武器。於是彼得堡的無產階級拿起武器，有什麼武器就拿起什麼武器，為的是要用敵對態度去對付敵人，向敵人報仇。但是他們在戰場上留下幾千個犧牲者，受到巨大損失以後，懷恨在心地退却了……

這就是我們對於去年一月九日事變的回憶。

今天，當俄國無產階級紀念一月九日事變的一周年時，我們不妨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去年彼得堡的無產階級在當時的搏鬥中退却了，當時的搏鬥和十二月的總搏鬥有什麼不同呢？

首先，他們之所以退却，是因為他們當時連保證起義勝利所絕對必需的最低限度的革命覺悟也

沒有。既然無產階級懷着祈禱和希望的心情去找那個完全以壓迫人民來維持自己生存的血腥沙皇，既然無產階級是抱着輕信態度去向自己的死敵請求「少許恩惠」，——難道這樣的人民能在巷戰中取得勝利嗎？……

誠然，後來經過很短一個時期，排槍的射擊使受騙的無產階級睜開了眼睛，並向他們揭穿了專制制度的可憎面目；誠然，無產階級已在憤怒地叫喊：『沙皇揍了我們一頓，來，我們也去揍他一頓！』但是，如果你手裏沒有武器，這又有什麼用處；即使你很覺悟，但若赤手空拳，你能在巷戰中幹出什麼來呢？難道敵人的槍彈只會打穿不覺悟的腦袋，而不會打穿覺悟的腦袋嗎？

是的，缺乏武器，——這就是彼得堡無產階級退却的第二個原因。

然而，單是一個彼得堡，即使有武器，又能幹出什麼來呢？當彼得堡城內正在流血和構築街壘的時候，其他城市却毫無動作，——正因為這樣，政府才能從各處調來軍隊，使鮮血染遍了街道。只是後來，當彼得堡的無產階級埋好被殺同志們的屍體並回到自己日常工作崗位的時候，其他城市才發出罷工工人的呼聲；向彼得堡的英雄們致敬！但是這種遲遲而來的敬禮又能對誰有用呢？正因為這樣，政府才沒有重視這些零碎而無組織的發動，並且沒有費多大氣力就把分散為一些零星集團的無產階級驅散了。

可見缺乏有組織的總起義，無產階級發動的無組織性，——這就是彼得堡無產階級退却的第三個原因。

當時誰能組織總起義呢？人民是不能全體都來担負這個責任的，而當時無產階級的先進部分——無產階級政黨本身又因黨內意見分歧面發生分裂，以致沒有組織起來；黨內的紛爭，黨內的分裂，使黨一天天削弱下去。分裂成兩部分的年輕的黨不能担當組織總起義的責任，這是毫不奇怪的。

可見缺乏一個統一的團結的黨，——這就是無產階級退却的第四個原因。

末了，當時農民和軍隊之所以沒有響應起義，沒有支援起義，也是因為他們沒有把力量薄弱、時間短促的起義看成特殊的力量。大家知道，弱者是不會有人響應的。

這就是英勇的彼得堡的無產階級去年一月退却的原因。

過了些時候，由於危機和無權狀況所激起的無產階級又準備迎接新的搏鬥了。有人以為無產階級受到一月九日的犧牲以後就會喪失鬥志，他們想錯了，恰恰相反，無產階級更加熱烈更加奮勇地準備迎接『最後的』搏鬥，更加勇敢更加頑強地向軍隊和哥薩克作鬥爭。黑海和波羅的海艦隊的水兵起義，放德薩、洛茲及其他城市的工人起義，農民和警察不斷的衝突，這一切都清楚地證明人民心中燃燒着不可撲滅的革命怒火。

最近無產階級以驚人的速度具備了一月九日所缺乏的那種革命覺悟。有人說，在提高無產階級的覺悟方面，十年宣傳還不如幾天起義的效果來得大。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階級搏鬥過程就是一所使人民的革命覺悟與時俱增的偉大學校。

最初只有無產階級中不多的一批人在從事宣傳的武裝總起義，有些同志甚至表示過懷疑的武裝起義，已漸漸引起無產階級的同情，於是無產階級熱烈地起來組織紅色隊伍，設法弄到武器，如此等等。十月總罷工已清楚地表明，無產階級的同時發動是可能的。因而也就證明，有組織的起義是可能的，於是無產階級堅決地走上了這條道路。

當時只需要一個團結一致的黨、一個統一而不可分的社會民主黨來主持總起義的組織工作，來統一各城市單獨進行的革命準備工作，並担负發動進攻的責任。何況實際生活本身已在準備着新的高潮：城市中的危機，鄉村中的飢荒，以及其他類似的原因已使新的革命爆發日益成為不可避免的。可惜這樣一個黨此時才在建立；因分裂而削弱了的黨剛剛在恢復元氣，剛剛在實現統一。

俄國無產階級正在這個時候遇到第二次搏鬥，遇到光榮的十二月搏鬥。

現在我們來談談這次搏鬥。

如果我們說一月搏鬥缺少革命覺悟，那末我們就應該說十二月搏鬥已具備了這種覺悟。十一個月的革命風暴已經足以使俄國戰鬥的無產階級睜開眼睛，於是『打倒專制制度！』『民主共和國萬歲！』等口號就成為目前的口號，成為羣衆的口號了。此時你們已經看不見教堂旗幟，也看不見神像和沙皇肖像，你們所看見的是飄揚着的紅旗和很耀眼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畫像了。此時你們已經聽不到聖歌和『上帝阿，保佑沙皇！』，你們所聽到的是到處迸發着的震聲壓迫者的『馬賽曲』和『華沙曲』了。

所以就革命覺悟這一點來說，十二月搏鬥是根本不同於一月搏鬥的。

一月搏鬥缺乏武器，那時人民是赤手空拳投入戰鬥的。十二月搏鬥已經前進了一步，這時全體戰士拿着手槍、長槍、炸彈，在某些地方甚至帶着機關槍去拚命地弄武器了。用武器奪取武器，——這就是當時的口號。大家都在尋找武器，大家都感到需要武器，所可惜的只是武器很少，只有很小一部分無產者能拿着武器去進行戰鬥。

一月起義是完全分散的，無組織的，當時每個人都是帶着僥倖心去行動的。十二月起義在這方面也前進了一步。彼得堡和莫斯科兩地的工人代表蘇維埃，『多數派』中央機關和『少數派』中央機關都盡量『設法』使各地的革命同時發動起來，它們號召俄國無產階級同時舉行進攻。一月起義時却絲毫也沒有這樣做。可是，因為黨在提出這個號召以前，對於起義沒有進行過長期和頑強的準備工作，所以這個號召始終只是一個號召，而這次發動實際上是分散的，無組織的。當時只有同時舉行有組織的起義這一願望而已。

『領導』一月起義的主要是加邦一流的人。十二月起義在這方面則有自己的優點：領導起義的是社會民主黨人。但是很可惜，當時社會民主黨人分散為一些單個的集團，不是一個統一團結的黨，因此他們的行動不能協同一致。於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又一次沒有準備地、力量分散地迎接了起義……

一月搏鬥沒有任何計劃，沒有任何明確的政策作為指南，在它面前也沒有發生過是進攻還是防禦的問題。十二月搏鬥的優點只在於它明確地提出了這個問題，而且也只是在鬥爭進程中而不是在鬥爭一開始時就提出的。至於這個問題的解決，那末十二月起義所暴露的弱點也和一月起義一樣。假

如莫斯科的革命者一開始就實行進攻政策，比方說，假如他們一開始就進攻尼古拉車站並佔領這個車站，那末這次起義自然會更持久，而發展的方向也會更恰當。或者再舉一個例子來說，假如拉脫維亞的革命者堅決執行進攻政策而沒有動搖過，那末他們首先定會奪得大砲，從而使政府當局喪失任何支柱；政府當局起初讓革命者佔領了城市，然後重新轉入進攻並依靠大砲奪回了所有被佔領的地方〔舊〕。其他城市的情形也是這樣。無怪乎馬克思說：在起義中勇敢就能致勝，而只有堅持進攻政策的人才是始終勇敢的人。

這就是無產階級在十二月中旬退却的原因。

至於絕大多數的農民和軍隊沒有響應十二月搏鬥，至於這次搏鬥甚至引起了某些『民主』集團的不滿，那是由於這次搏鬥缺乏保證起義擴展和起義勝利所十分必需的力量和持久性。

根據以上所述，就可以明白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今天應當做些什麼。

第一、我們的任務是完成我們已經開始了的事業：建立一個統一的不可分的黨。『多數派』全俄代表會議和『少數派』全俄代表會議已經制定了實行統一的組織原則。它們已經通過了列寧的關於入黨條件的條文和民主集中制。思想領導和實際工作的中心機關已經合併，而地方組織的合併工作差不多已經結束了。只是必須召開統一代表大會來正式完成事實上的統一，使我們有一個統一的不可分的俄國社會民主黨。我們的任務是促進這個我們所珍視的事業，周密地準備召開統一代表大會；大家知道，這次代表大會是必須在最近期間召開的。

第二、我們的任務是協助黨來組織武裝起義，積極地參與這一神聖事業，毫不倦怠地爲這一事業服務。我們的任務是擴大紅色隊伍，訓練它們，團結它們；我們的任務是用武器奪取武器，研究國家機關的分佈狀況，精確計算敵人力量，研究敵人的強弱方面，並以此爲根據來擬定起義計劃。我們的任務是在軍隊中和鄉村中，特別是在城市附近的鄉村中，爲起義進行有系統的鼓動工作，把這些鄉村中的可靠分子武裝起來，如此等等……

第三、我們的任務是消除任何動搖，反對任何猶豫，堅決執行進攻政策……
一句話，團結的黨、黨所組織的起義和進攻的政策，——這就是我們今天保證起義勝利所需要的條件。

農村的飢荒和城市的工業危機愈加劇烈愈加深刻，這個任務也就愈加緊急愈加迫切。

有人竟懷疑這個起碼的真理是否正確，因而絕望地說：即使黨是統一的，如果不善於把無產階級團結在自己的周圍，那末它是一事無成的；而無產階級已被擊潰了，它已失望了，它已顧不及什麼主動性了，所以現在我們應當期待農村來解救，主動性應當出於農村等等。不能不指出這樣推論的同志是大錯特錯了。無產階級決沒有被擊潰，因爲無產階級被擊潰就等於無產階級死亡，其實恰恰相反，無產階級仍舊活着，並且日益強大起來。無產階級僅僅是退却了，爲的是要聚集力量來同沙皇政府進行最後的搏鬥。

莫斯科（實際領導了十二月起義的莫斯科）工人代表蘇維埃在十二月十五日向全國人民宣告：我

們暫時停止鬥爭是爲了認真準備，以便重新舉起起義的旗幟，這樣蘇維埃就表達了全俄國無產階級衷心的願望。

倘若某些同志還否認事實，倘若他們再也不指望無產階級而現在竟想依靠農村資產階級，——那末就要問，這究竟是什麼人呢？是社會革命黨人呢，還是社會民主黨人？因爲沒有一個社會民主黨人會懷疑城市無產階級是農村的實際領導者（而不只是思想領導者）這一真理的。

有些人從前硬要我們相信專制制度在十月十七日以後已被擊潰了，但我們並沒有相信這一點，因爲專制制度被擊潰就等於專制制度死亡，然而它不僅沒有死亡，反而聚集新的力量準備新的進攻。我們說過專制制度僅僅是退却了。事實證明我們是正確的……

不對，同志們！俄國無產階級並沒有被擊潰，它僅僅是退却了，目前它正在準備迎接新的光榮的戰鬥。俄國無產階級決不會放下染滿鮮血的旗幟，決不會把起義的領導權讓給任何人，它將是俄國革命的唯一勝任的領袖。

一九〇六年一月七日

按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高加索聯盟委員會

出版的小冊子原文刊印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國家杜馬和社會民主黨的策略 〔卷〕

大概你們聽說過農民解放的事情吧。那時政府受着兩方面的打擊：一方面是外來的打擊——克里木戰爭的失敗；另一方面是內部的打擊——農民運動。正因為這樣，兩面挨打的政府不得不實行讓步，談起農民解放來：『我們應當自己從上面來解放農民，否則人民就會暴動，就會自己動手從下面來取得解放。』我們知道所謂『從上面來解放』是怎麼一回事……既然當時人民上了當，既然政府那種假仁假義的計劃得以實現，既然政府用改良辦法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因而延遲了人民的勝利，那末，這也就說明當時人民還缺乏鍛鍊，容易受騙。

這樣的情形日前又在俄國生活中重複着。大家知道，現在政府又是受着兩方面的打擊：一方面是外來的打擊——滿洲之戰的失敗；另一方面是內部的打擊——人民革命。大家知道，兩面挨打的政府不得不再作一次讓步，並且也像上次那樣談起所謂『從上面來改革』：『我們必須從上面給人民以國家杜馬，否則人民就會暴動，就會自己從下面召開立憲會議。』由此可見，他們想用召開杜馬的手段來平息人民革命，正像他們曾一度用『解放農民』的手段平息了偉大的農民運動一樣。

因此，我們的任務就是萬分堅決地破壞反動派的計劃，推翻國家杜馬，從而為人民革命掃清

道路。

但是，杜馬是什麼，它是由誰組成的呢？

杜馬是一種不倫不類的國會。它只能在口頭上擁有表決權，事實上却只有發言權，因為上議院和武裝到了牙齒的政府將在上面監督它。宣言上公開說：杜馬的任何一個決議，若不經上議院和沙皇批准就不能付諸實施。

杜馬不是人民的國會，而是人民公敵的國會，因為杜馬的選舉既不會是普遍的、平等的，也不會是直接的、無記名的。給工人的那一點點選舉權不過是紙上空文罷了。在參加梯弗里斯省的國家杜馬代表選舉的九十八名覆選人當中，只能有兩名工人，其餘九十六名必須屬於其他階級，——宣言上這樣說。在參加巴土姆和蘇胡姆兩州的國家杜馬代表選舉的三十二名覆選人當中，只能有一名工人，其餘三十一名必須由其他階級選出，——宣言上這樣說。其他各省的情形也是如此。不用說，當選為杜馬代表的只能是其他階級分子。一名工人代表也沒有，一個議席也不給工人，——這就是成立杜馬的原則。此外，如果再加上戒嚴，如果還注意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一概被禁止的事實，那末將來聚集在沙皇杜馬裏面的究竟是些什麼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用說，我們應該更加堅決地力求推翻這個杜馬並舉起革命的旗幟。

我們怎樣才能推翻杜馬？是參加選舉呢，還是抵制選舉？目前的問題就在這裏。

有些人說：我們一定要參加選舉，以便使反動派投進自己所佈置的羅網，從而徹底破壞國家

杜馬。

另外一些人回答他們說：你們參加選舉，無意中就幫助反動派成立杜馬，因而也就會全身投進反動派所佈置的羅網。這就是說，你們起初同反動派一起成立沙皇杜馬，後來却為實際生活所迫而企圖毀壞你們自己成立的杜馬，這是和我們政策的原則性的要求不相容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你們拒絕參加選舉而着手破壞杜馬，或者你們拒絕破壞杜馬而着手參加選舉，免得你們後來要破壞你們自己成立的东西。

顯然，唯一正確的方法就是積極抵制選舉；這樣我們就能使反動派在人民中孤立起來，就能組織破壞杜馬的工作，因而也就使這種不倫不類的國會喪失任何基礎。

主張抵制選舉的人的論點就是這樣。

他們中間究竟誰對呢？

真正的社會民主黨策略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它不應當和社會生活發展的進程矛盾；第二、它應當不斷地提高羣衆的革命精神。

參加選舉的策略是和社會生活發展的進程矛盾的，因為實際生活破壞着杜馬的基礎，而參加選舉就會鞏固杜馬的基礎，因而也就和實際生活背道而馳。

抵制的策略却是從革命進程中自然產生的，因為它一開始就同革命一起破壞警察式杜馬的威信，摧毀這個警察式杜馬的基礎。

參加選舉的策略定會降低人民的革命精神，因為主張參加選舉的人是號召人民參加警察式的選舉，而不是號召人民採取革命行動，他們把選票看做救星，而不是把人民的發動看做救星。可是參加警察式的選舉却會使人民對國家杜馬產生一種錯覺，對它抱着一種幻想，使人民不自主地抱着這樣的想法：大概杜馬並不那麼壞，否則社會民主黨人就不會勸我們去參加杜馬了，——說不定碰到好運氣，杜馬會對我們有利的。

抵制的策略却不會使人對杜馬抱任何幻想，而是直截地肯定地表明：唯一的救星就是人民的勝利發動，人民的解放只能由人民自己來實現，既然杜馬阻礙人民的解放事業，我們就應該立刻設法剷除它。在這裏，人民只有依靠自己，並且一開始就對杜馬這個反動勢力的堡壘採取敵對的立場，這樣就會不斷提高人民的革命精神，為勝利的總發動打下基礎。

革命的策略應當是明白、確切和肯定的，而抵制的策略恰恰具有這些特點。

有人說：單靠口頭上的鼓動還不够，必須用事實來說服羣衆，使他們確信杜馬是要不得的東西，從而促進對杜馬的破壞工作；要達到這一切，就必須參加選舉而不是積極抵制。

下面是我們對這一點的回答。不待說，用事實來鼓動比用口頭解釋的作用當然要大得多。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參加人民的選舉大會，以便在和其他政黨鬥爭時，在和它們發生衝突時，具體地向人民指明反動派和資產階級背信棄義的行爲，從而『用事實來鼓動』選民。如果同志們不以此為滿足，如果他們除此以外還要參加選舉，那就必須指出：選舉本身，投票或不投票，不論對於『用事實』鼓動

或『用口頭』鼓動，都是毫無裨益的。但是它的害處却很大，因為主張參加選舉的人一旦這樣『用事實來鼓動』，就無意中贊成杜馬的存在，因而也就鞏固了它的基礎。這些同志究竟想用什麼來補償這種巨大的損害呢？用投票的辦法嗎？這簡直是不值一談的。

另一方面，『用事實來鼓動』也應當有一定的限度。加邦拿着十字架和聖像帶着彼得堡工人行進時也曾說過：人民相信沙皇的仁慈，他們還沒有識破政府當局的罪惡，所以我們應當把他們帶到皇宮跟前。加邦自然是錯了。他的策略是一種有害的策略，這一點已由一月九日的事變證實了。而這就是說，我們一定要遠遠地離開加邦策略。至於抵制的策略，正是根本擯棄加邦那種妄誕思想的唯一策略。

有人說：抵制手段會使羣衆離開自己的先進部分，因為在採取抵制手段時跟着你們走的只會是先進部分，而羣衆却會同那些把羣衆拉到自己方面去的反動派和自由派待在一起。

我們對於這一點的回答是這樣：凡是發生這種現象的地方，那裏的羣衆大概是同情其他政黨的，而我們社會民主黨人無論怎樣參加選舉，反正也不會被選為初選代表。要知道選舉本身是不能使羣衆革命化的！至於選舉前的鼓動，那末這種鼓動雙方都在進行，不同的是主張抵制選舉的人所進行的反對杜馬的鼓動，要比主張參加選舉的人所進行的鼓動更為徹底、更為堅決，因為激烈批評杜馬就能鼓勵羣衆拒絕選舉，而這却不是主張參加選舉的人所要做的。假如這種鼓動發生效果，人民就會團結在社會民主黨人的周圍；而當社會民主黨人一號召抵制杜馬時，人民就會立刻跟着他們走，這時反

動派和他們那幫大流氓就要陷於孤立。倘若這種鼓動『不發生效果』，那時參加選舉就有百弊而無一利，因為一採取參加杜馬的策略，我們就不得不贊同反動派的活動。由此可見，抵制是把人民團結在社會民主黨周圍的最好手段，當然這只限於有可能達到這種團結的地方，至於那些沒有這種可能的地方，參加選舉對我們就有百弊而無一利。

此外，參加杜馬的策略會模糊人民的革命意識。問題在於一切反動的和自由主義的政黨都參加選舉。這些政黨和革命者之間究竟有什麼區別，參加選舉的策略對這個問題不能給羣衆以直接的回答。羣衆容易把不革命的立憲民主黨人和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混淆起來。抵制的策略却在革命者和那些想藉杜馬來拯救舊制度基礎的不革命者之間劃出很明顯的界限。而劃清這種界限對於用革命精神來教育人民是有重大意義的。

最後，有人向我們說，我們可以利用選舉來建立工人代表蘇維埃，從而在組織上把革命羣衆團結起來。

對於這一點，我們回答說：在目前這種連召開無關緊要的會議都會有人遭到逮捕的情況下，工人代表蘇維埃是完全無法活動的，所以提出這樣的任務就是欺騙自己。

總之，採取參加選舉的策略就是無意中幫助鞏固沙皇杜馬，降低羣衆的革命精神，模糊人民的革命意識，無法建立任何革命組織，並且和社會生活的發展背道而馳，所以社會民主黨應當擯棄這種策略。

抵制的策略就是現在革命發展的方向。社會民主黨也應當朝着這個方向行進。

載於一九〇六年三月八日

『黎明報』第三期

署名：依·貝索什維里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土地問題

一

舊秩序在破壞着，農村動盪起來了。昨天還是受踐踏受侮辱的農民，今天已開始站起來並伸直腰幹了。昨天還是軟弱無力的農民運動，今天已像洶湧的洪流冲向舊制度：滾開去！不然就要沖掉你！「農民要取得地主的土地」，「農民要消滅農奴制度的殘餘」，——這就是現時俄國各個起義農村中發出的呼聲。

那些打算用槍彈迫使農民沉默下去的人是錯了。實際生活向我們表明：這種辦法使農民革命運動更加劇烈、更加尖銳起來。

那些企圖用空洞的諾言和所謂「農民銀行」來安撫農民的人也錯了。農民要土地，他們做夢也夢見土地，顯然他們在沒有奪得地主土地以前，是不會安靜下來的。空洞的諾言和所謂「農民銀行」能給他們什麼呢？

農民要奪取地主的土地。他們力求用這種手段去消滅農奴制度的殘餘，誰不背棄農民，誰就應當努力在這個基礎上解決土地問題。

但是，農民怎樣才能把地主的土地奪到自己手裏呢？

有人說，唯一的出路就是『廉價贖買』土地。這班先生對我們說，政府和地主有很多閒地，如果農民們贖買這些土地，一切就會迎刃而解；這樣，狼既能果腹，羊也可保全。但是他們却不問一下，農民不僅被刮光了錢，而且被剝光了皮，還能拿什麼去贖買這些土地呢？他們却不想一下，在贖買土地時，人家只會把壞的塞給農民，把好的留給自己，就像他們在『解放農奴』時做過的那樣！而且農民爲什麼要贖買向來就屬於自己的土地呢？難道官家和地主的土地不是浸透了農民的血汗嗎？難道這些土地不是屬於農民的嗎？難道不是從農民手裏剝奪去了這些祖傳的財產嗎？要求農民贖買從他們那裏剝奪去的土地，這難道是公平的嗎？難道農民運動問題就是買賣問題嗎？難道農民運動的目的不是解放農民嗎？然而除了農民自己，誰會把農民從農奴制度的羈絆下解放出來呢？但是這些先生却硬要我們相信地主會解放農民；只要農民送給地主一點現錢就行了。你猜怎麼樣！原來這種『解放』應該在沙皇官僚領導之下來實現，應該在那幫屢次用大砲和機槍對付飢餓農民的官僚領導之下來實現！……

不！贖買土地的辦法決不能拯救農民。凡是勸農民採用『廉價贖買』辦法的人都是叛徒，因爲他們力圖使農民陷入經紀人的羅網，而不願意農民親自動手來完成農民的解放事業。

既然農民要奪取地主的土地，既然他們應當用這個辦法消滅農奴制度的殘餘，既然『廉價贖買』的辦法不能拯救他們，既然農民應當親自動手完成農民的解放事業，那末毫無疑問，唯一的辦法就是奪取地主的土地，就是說，沒收這些土地。

出路就在這裏。

現在要問：這種沒收應該進行到什麼程度，它有沒有限度，農民只應當奪取一部分土地，還是應當奪取全部土地？

有些人說：奪取全部土地未免過分，只奪取一部分土地來滿足農民就够了。假定是這樣，但如果農民要求得更多，那又怎麼辦呢？我們決不能攔住他們的路，說『你們停住吧，不要再往前闖了！』要知道這是反動的作法！俄國各次事變不是已經證明農民確實要求沒收地主的全部土地嗎？而且『奪取一部分』是什麼意思呢？究竟應當奪取地主的多大一部分土地呢？是奪取一半呢，還是奪取三分之一？誰應該解決這個問題：單是由地主解決呢，還是由地主和農民一起解決？可見這裏還給經紀行為留下許多空子，這裏還留下一些地主和農民討價還價的餘地，而這是和農民解放事業根本矛盾的。農民必須永遠記住這個道理：不要和地主講價錢，而要向他們進行鬥爭。不應該修理農奴制度的羈絆，而應該打碎這個羈絆，以便永遠消滅農奴制度的殘餘。『只奪取一部分』的意思就是扶植農奴制度的殘餘，而這是和農民解放事業不相容的。

很明顯，唯一的辦法就是奪取地主的全部土地。只有這樣才能把農民運動進行到底，只有這樣才

能使人民更加積極努力，只有這樣才能剷除根深蒂固的農奴制度的殘餘。

總之，今天農村中的運動是農民民主運動。這個運動的目的在於消滅農奴制度的殘餘。而要消滅這些殘餘，就必須沒收地主和官家的全部土地。

有些先生責備我們說：為什麼社會民主黨在這以前沒有要求沒收全部土地，為什麼它在這以前只講到沒收「割地」呢？

先生們，這是因為在一九〇三年我黨講到「割地」的時候，俄國農民還沒有捲入運動。當時我黨的責任是向農村提出一個能够激起農民和發動農民去反對農奴制度殘餘的口號。歸還「割地」正是這樣的口號，因為「割地」很明顯地向俄國農民指出農奴制度的殘餘是不公道的。

可是以後情況變了。農民運動成長起來了，現在用不着再去激起它，它已經像怒潮似地洶湧起來了。今天的問題已不是應當怎樣發動農民，而是已發動起來的農民應當要求什麼了。很明顯，這裏需要明確的要求，所以黨就向農民說，他們應當要求沒收地主和官家的全部土地。

而這就是說，一切事物都以時間和地點為轉移，——無論歸還「割地」或沒收全部土地都是如此。

二

我們已經看到，目前農村中的運動是農民解放運動；同時我們也看到，要解放農民就必須消滅農

奴制度的殘餘，要消滅這些殘餘就必須奪取地主和官家的全部土地，以便爲新的生活、爲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掃清道路。

假定這一切都已實現了，那末這些土地以後應當怎樣分配，應當歸誰所有呢？

有些人說：奪得的土地應當歸農村公有，應當立即消滅土地私有制，這樣，農村就應當成爲土地的全權主人，以後農村自己會分給各個農民以等量的『份地』，這樣，社會主義就會立即在農村中實現，——僱傭勞動制就會由土地平均使用制來代替。

社會革命黨人向我們說：這叫做『土地社會化』。

這樣的辦法我們可以採納嗎？我們來仔細考察一下問題的實質吧。首先要說的是社會革命黨人想從農村開始實行社會主義。這是否可能呢？大家知道城市比農村發達，城市是農村的領導者，所以任何社會主義事業都應當從城市開始。但社會革命黨人想把農村變爲城市的領導者，想迫使農村開始實行社會主義，不待說，由於農村的落後，這是辦不到的。由此可見，社會革命黨人的『社會主義』將是一種死胎般的社會主義。

現在來談談他們想立即在農村實現社會主義這一點。實現社會主義就要消滅商品生產，就要廢除貨幣經濟，就要徹底破壞資本主義而使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化。社會革命黨人却想使這一切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而只是使土地公有，這是完全辦不到的。如果商品生產原封不動，那末土地也就會成爲商品，很快出現於市場，於是社會革命黨人的『社會主義』就會煙消雲散。很明顯，他們想在資本

主義範圍內實現社會主義，這當然是不可思議的。因此人們說：社會革命黨人的『社會主義』就是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至於土地平均使用制，那末應當指出，這不過是一句空話罷了。平均使用土地就需要財產上的平等，但農民之間在財產上是不平等的，目前的民主革命又無法消滅這種情形。可不可以設想，有八對耕牛的農戶竟會和連一頭耕牛也沒有的農戶同等使用土地呢？而社會革命黨人却以爲『土地平均使用制』會消滅僱傭勞動，從而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會終止，這當然是荒謬絕倫的。看來社會革命黨人想要反對資本主義的繼續發展，而使歷史開倒車，他們認爲這就是救命的辦法。但科學告訴我們：社會主義的勝利取決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誰反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誰就是反對社會主義。因此，人們又把社會革命黨人稱爲社會反動黨人。

更不用說，農民並不是反對資產階級所有制，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所有制基礎上，力求廢除封建所有制，——他們是想把奪得的土地分歸各人私有，而決不會滿意『土地社會化』。

由此可見，『土地社會化』的辦法是不能採納的。

另一些人說：奪得的土地應當交給民主的國家，農民只能向國家租佃土地。

這就叫做『土地國有』。

土地國有的辦法可以採納嗎？如果我們注意到未來的國家，不管它怎樣民主，終究是資產階級的國家，把土地交給這樣的國家勢必在政治上加強資產階級，這對於鄉村和城市的無產階級是極其

不利的；如果我們還注意到農民自己也會反對『土地國有』而不滿於只充當租佃者的角色，那就顯而易見，『土地國有』是不符合目前運動的利益。

所以『土地國有』的辦法也是不能採納的。

還有一些人說：土地應當歸地方自治局所有，而農民只能向自治局租佃土地。

這就叫做『土地市有』。

土地市有的辦法可以採納嗎？『土地市有』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第一、農民不能把他們在鬥爭過程中奪得的地主土地和官家土地收歸己有。農民對這一點會採取什麼態度呢？農民想把土地收歸己有，農民想分配自己奪得的土地，他們做夢也夢見這些土地是自己的財產，所以當他們聽說土地不交給他們而交給自治局時，他們當然不會贊同這些主張『市有』的人。我們不應當忘記這一點。

此外，如果熱中於革命的農民把奪得的土地全部據為己有，一點也不留給自治局，那又怎麼辦呢？我們當然不能攔住他們的路，不能對他們說：你們停住吧，這些土地應當交給自治局而不應當交給你們，你們有權租佃也就夠了！

第二、要是採納『土地市有』口號，我們就應當立刻把這個口號傳播到人民中去，並且應當立刻向農民說明：他們所爭的土地，他們想要奪到手的土地，將歸自治局所有，而不是歸農民所有。當然，如果黨對於農民有很大的影響，那末他們也許會贊同黨，可是不用說，農民再也不會像先前那樣努力鬥爭，而這對目前的革命將是極端有害的。如果黨對於農民沒有很大的影響，那末農民就會離開黨，

背棄黨，這就會使農民和黨發生衝突而大大削弱革命的力量。

有人會向我們說：農民的願望往往是和發展進程相矛盾的，可是我們又不能忽視歷史進程而始終順從農民的願望，——黨應當有自己的原則。這是十足的真理！黨應當以自己的原則為指南。然而，假如一個黨擯棄農民的上述一切意願，那它就是背叛自己的原則。如果農民奪取地主的土地和分配這些土地的意願並不和歷史進程矛盾，如果這些意願反而是完全從目前的民主革命中產生出來的，如果反對封建所有制的真正鬥爭只能在資產階級所有制基礎上進行，如果農民的意願正是表現這種趨向，——那末自然很明顯，黨就不能拒絕農民的這些要求，因為拒絕支持這些要求就是拒絕革命的發展。反過來說，如果黨有原則，如果黨不願變成革命的阻力，那末它就應當促使農民的這些意願實現。而這些意願是和『土地市有』根本矛盾的！

由此可見，『土地市有』的辦法也是不能採納的。

三

我們已經看到：『社會化』也罷，『國有』也罷，『市有』也罷，都不能適當地滿足目前革命的利益。那末，奪來的土地應當怎樣分配，應當歸誰所有呢？

很明顯，農民奪得的土地應當交給農民自己，由他們自己去分配這些土地。上面所提出的問題是

應當這樣解決的。土地分配會引起產權的大變動。小有產者將出賣土地而走上無產階級化的道路，富裕者將購得新的土地並着手改善耕作技術，農村將分爲各個階級，尖銳的階級鬥爭就會展開，這樣就會爲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奠定基礎。

可見土地分配的辦法是從目前經濟發展中自然產生出來的。

另一方面，『土地歸農民，只歸農民而不歸任何人』的口號能鼓勵農民，能給他們增加新的力量，並促使農村中已開始的革命運動進行到底。

可見目前革命的進程也指明土地分配的必要性。

反對者責備我們，說我們用這一切來復活小資產階級，說這是和馬克思學說根本抵觸的。請看『革命俄國報』⁽¹⁾說些什麼：

『你們既幫助農民剝奪地主，也就不自覺地幫助小資產階級經濟在或多或少發展了的資本主義農業形式的廢墟上確立起來。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看來，這不是「退一步」嗎？』（見『革命俄國報』第七十五期）

我必須說：『批評家』先生們把事實弄錯了。他們忘記了，地主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經濟，而是農奴制經濟的殘餘，所以剝奪地主就是破壞農奴制經濟的殘餘而不是破壞資本主義經濟。他們還忘記了，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來，緊隨着農奴制經濟到來的從來就不是而且也不能是資本主義經濟，因爲在這兩種經濟之間存在着小資產階級經濟，它代替農奴制經濟，然後過渡到資本主義經濟。馬克思早

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就說過：在歷史上隨着農奴制經濟到來的首先是農村小資產階級經濟，在此以後，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經濟才發展起來，——從農奴制經濟直接跳到資本主義經濟的情形，以前沒有過而且也不會有。然而這些奇怪的『批評家』却向我們說：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來，奪取地主的土地和分配這些土地是一種倒退的運動！很快他們又會責備我們，說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來，『廢除農奴法』也是倒退的運動，因為當時從地主那裏『奪來』一些土地交給了小業主農民！可笑的人們！他們不懂得馬克思主義是用歷史觀點來觀察一切事物的；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來，農村小資產階級經濟比農奴制經濟進步；破壞農奴制經濟和實行小資產階級經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要條件，而資本主義以後又會排除這種小資產階級經濟……

我們且撇開這些『批評家』吧。

問題在於將土地交給農民然後加以分配，就能破壞農奴制度殘餘的基礎，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奠定基礎，大大促進革命的高漲，正因為如此，所以社會民主黨可以採納這種辦法。

總之，要消滅農奴制度的殘餘，就必須沒收全部的地主的土地，這些土地應由農民收歸己有，並按照本身利益來自行分配。

黨的土地綱領應當建立在這個基礎上。

有人會向我們說：這一切都是和農民有關的，可是你們對農村無產者打算怎麼辦呢？我們回答他們說：如果農民所需要的是民主主義的土地綱領，那末對於農村和城市的無產者則有反映其階級

利益的社會主義的綱領，他們的日常利益則在最低綱領講到改善勞動條件的十六條中照顧到了（見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綱）。至於目前我黨所進行的直接的社會主義工作，其具體表現是黨在農村無產者中間進行社會主義的宣傳，把他們團結到自己的社會主義組織裏，並使他們和城市無產者結成一個單獨的政黨。黨經常和這一部分農民發生關係，並向他們說：你們既然實行民主革命，就要和戰鬥的農民保持聯系，反對地主；你們既然向社會主義前進，就要堅決地聯合城市無產者，無情地反對一切資產者，不管他們是農民或是貴族。和農民一起爲民主共和國而奮鬥！和工人一起爲社會主義而奮鬥！——這就是黨對農村無產者所說的話。

如果無產者的運動和無產者的社會主義綱領會煽起階級鬥爭的火燄，藉以永遠消滅一切階級性，那末農民運動及其民主主義的土地綱領就會在農村煽起等級鬥爭的火燄，藉以根本消滅一切等級性。

附言：在結束這篇論文時，不能不回答一位讀者的來信。他寫信給我們說：『你的第一篇文章①還不能令我滿意。難道黨沒有反對過沒收一切土地嗎？如果的確是這樣，那末爲什麼黨沒有講到這一點呢？』

不，可敬的讀者，黨從來沒有反對過沒收一切土地。還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正是在通過了關於『割地』這一條的代表大會（一九〇三年）上，黨就以普列漢諾夫和列寧爲代言人說過：如果農民要求

沒收一切土地，我們就要支持他們^①。過了兩年（一九〇五年），黨內的兩派，即『布爾什維克』（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和『孟什維克』（在第一次代表會議上）曾一致宣稱，他們在沒收一切土地的問題上要完全支持農民^②。後來黨內兩派的報紙，無論『火星報』和『無產者報』，或是『新生活報』^③和『開端報』^④，都一再號召農民沒收一切土地……可見黨一開始就主張沒收一切土地，所以你沒有任何根據認為黨似乎做過農民運動的尾巴。當農民運動還沒有真正開始時，當農民甚至還沒有要求『割地』時，黨在自己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就已講到沒收一切土地了。

倘若你還要問我們：為什麼在一九〇三年我們沒有把沒收一切土地的要求列入綱領，那末我們就要反問你：為什麼社會革命黨人在一九〇〇年沒有把建立民主共和國的要求列入自己的綱領，難道他們反對這個要求嗎^⑤？為什麼當時只講到國有，而今天却喋喋不休地向我們說社會化呢？假如我們今天在最低綱領中完全沒有講到七小時工作制，難道這就等於我們反對這一點嗎？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在一九〇三年，當運動還沒有鞏固起來的時候，沒收一切土地的口號就會成爲一紙空文，還沒有鞏固的運動是無力實現這個要求的，因此歸還『割地』的辦法在當時是較爲適當的。但是後來，當運動已經發展起來並提出了一些實際問題的時候，黨應當指出：運動不能夠也不應當局限

① 見『第二次代表大會記錄』。

② 見『第三次代表大會記錄』和『第一次代表會議』。

③ 見『我們的任務』，『社會革命者同盟』一九〇〇年出版。

於歸還『割地』，必須沒收一切土地。

事實就是如此。

最後，關於『新聞小報』(見第三〇三三期)還要說幾句話。這個報紙講了一些關於『時髦』和『原則』的廢話，硬說我們黨先前曾把歸還『割地』一項作為原則。讀者從上文就可以看出這是撒謊，黨一開始就從原則上公開承認沒收一切土地。至於『新聞小報』區別不出原則和實際問題，那是沒有什麼不幸的，它長大一些就能學會區別這些問題了①。

戰於一九〇六年三月十七、二十一、二十二日

『閃電報』第五、第九、第十各期

署名：依·貝索什維里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① 是指這篇論文的第一部分，因為這篇論文是在『閃電報』上分三期發表的。——譯者註。

② 「新聞小報」不知從哪裏『聽說』：「俄國社會民主黨人……通過了新的土地綱領，據此……他們擁護土地私有。」我應當聲明：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根本沒有通過任何類似的綱領。通過綱領是代表大會的事情，這樣的代表大會却還沒有召開。很明顯，『新聞小報』是被某人或某種東西所迷惑了。『新聞小報』如果不用謊言來款待自己的讀者，那就好極了。

論土地問題

你們大概還記得最近一篇關於『土地市有』的論文（見『閃電報』（六）第十二期）。我們不想詳細討論作者所涉及的一切問題，因為這樣做既乏味，又沒有必要。我們只想談兩個主要問題：土地市有是不是和消滅農奴制度的殘餘矛盾？土地分配是不是一種反動的辦法？我們那位同志正是這樣提出問題的。看來他覺得土地市有、土地分配以及類似的問題都是原則問題，而黨卻把土地問題放到完全另一種基礎上去。

其實，社會民主黨並不認為土地國有、土地市有和土地分配是原則問題，它在原則上並不反對其中任何一種辦法。只要看一看馬克思的『宣言』、考茨基的『土地問題』、『第二次代表大會記錄』、同一位考茨基的『俄國土地問題』，你們就會知道事實正是如此。黨是用實踐的觀點觀察這一切問題，並把土地問題放到實踐的基礎上：究竟哪種辦法能更充分地實現我們的原則，——是土地市有，土地國有呢，還是土地分配？

黨就是把問題放到這種基礎上的。

當然，土地綱領的原則（農奴制度殘餘的消滅和階級鬥爭的自由發展）仍舊沒有改變，改變的只

是實現這個原則的手段。

作者正是應當這樣提問題：究竟哪種辦法更便於農奴制度殘餘的消滅和階級鬥爭的發展，是土地市有呢，還是土地分配？而他却完全出人意料地跨進原則範圍，把實踐問題當做原則問題並問我們：所謂土地市有『是否和消滅農奴制度的殘餘及發展資本主義相矛盾』？無論土地國有或土地分配都是和消滅農奴制度的殘餘及發展資本主義不相矛盾的。但這並不是說兩者之間就沒有差別；也並不是說主張土地市有的人同時就應當主張土地國有和土地分配！很明顯，它們之間是有某種實踐上的區別的。問題正在這裏，所以黨才把這個問題放到實踐的基礎上。而作者却像我們上面所指出的，竟把問題移到完全另外一種基礎上，把原則本身和實現原則的手段混淆起來，於是就無意中迴避了黨所提出的問題。

其次，作者硬要我們相信土地分配是一種反動的辦法，換句話說，他責難我們的就是社會革命黨人所常常責難我們的。若是形而上學的社會革命黨人向我們說，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土地分配是反動的辦法，那末這種責難絲毫也不使我們感到驚奇，因為我們知道得很清楚，他們不是以辯證法的觀點來觀察問題的。他們不想了解：一切都以時間和地點為轉移，那些明天要成為反動的東西，今天可能是革命的。但是，當辯證唯物主義者向我們發出同樣的責難時，我們便不能不問一問：辯證論者和形而上學者到底有什麼區別？自然，如果土地分配是爲了反對資本主義的發展，那它就是反動的辦法；但如果土地分配是爲了反對農奴制度的殘餘，那它當然就是社會民主黨所應當擁護的革命手

段了。土地分配在今天反對什麼？反對資本主義呢，還是反對農奴制度的殘餘？毫無疑義，它是反對農奴制度的殘餘的。於是問題就自然而然解決了。

當然，資本主義在鄉村中相當穩固以後，土地分配就會成爲反動的辦法，因爲那時它是爲了反對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民主黨也不會贊成它。現在社會民主黨熱烈地堅持建立民主共和國的要求，把它當做革命的辦法。可是到以後，當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成爲實踐問題時，民主共和國就會成爲反動的東西，而社會民主黨就會竭力設法摧毀它。關於土地分配也必須這樣說。土地分配和一般小資產階級經濟，當進行反對農奴制度殘餘的鬥爭的時候，是革命的；但是同一的土地分配，當它反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時候，却是反動的。這就是對社會發展的辯證觀點。馬克思也是這樣辯證地觀察農村小資產階級經濟的，他在『資本論』第三卷中說農村小資產階級經濟和農奴制經濟比較起來，是進步的。

除此而外，考茨基關於分配土地問題還說過這樣一段話：

『土地的分配，俄國農民所要求而且實際上已在開始實現的土地的分配，即大地產的分配……不僅是不可避免和必要的，而且是極其有益的。所以社會民主黨有一切理由支持這種過程。』（見『俄國土地問題』第十一頁）

正確地提出問題對於解決問題有巨大的意義。任何問題都應當辯證地提出，就是說，我們任何時候也不應當忘記，一切都在變化，一切都以時間和地點爲轉移，所以我們就應當根據具體情況提出問

題。這是解決土地問題的第一個條件。第二、我們同樣不應當忘記：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今天是把土地問題放到實踐基礎上的，凡是願意解決這個問題的人就應當正是站到這個基礎上。這是解決土地問題的第二個條件。而我們那位同志對於這兩個條件連一個也沒有注意到。

那位同志會回答說：好吧，我們就假定土地分配是革命的辦法吧，很明顯，我們要努力支持這個革命運動，但這決不等於我們應當把這個運動的要求列入自己的綱領，——在綱領中不能容許有這樣的要求等等。可見作者把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混為一談了。他知道在社會主義的綱領中（即在最高綱領中）只能包括無產階級的要求，但他忘記了，民主主義的綱領（即最低綱領），尤其是土地綱領，並不是社會主義的綱領，所以其中必定有我們所擁護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要求。政治自由是資產階級的要求，儘管如此，它在我們的最低綱領中却佔有重要的地位。用不着到遠處去找例子，你在土地綱領第二條上就可看到：黨要求「……取消一切束縛農民支配自己土地的法令」。請你讀一讀這一條並回答：這一條裏有什麼社會主義的東西呢？你會說：這裏一點社會主義的東西也沒有，因為這一條是要求資產階級財產私有的自由，而不是要求消滅它。雖然如此，在我們的最低綱領中還是有這一條。那末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問題只在於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應當把它們混淆起來。誠然，無政府主義者對於這一點還會不滿，但有什麼辦法呢，要知道，我們並不是無政府主義者呀！……

至於農民對分配土地的渴望，那末我們已經講過：這種渴望的意義要用經濟發展的趨勢來衡量；

因爲農民的渴望是從這個趨勢『直接產生出來的』，所以我們黨應當支持這種渴望而不應當反對它。

載於一九〇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閃電報』第十四期

署名：依·貝爾什維里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論修改土地綱領

(一九〇六年四月十三日〔二十六日〕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四次代表大會〔三〕第七次會議上的演說)

我首先要談一談某些同志的論證方法。普列漢諾夫同志關於列寧同志的『無政府主義者的習氣』，關於『列寧主義』的危害性等等講了很多，但關於土地問題實際上給我們講得很少。然而他是作為土地問題報告人之一講話的。我以為這種製造刺激氣氛的論證方法，除了和我們這次稱為統一代表大會的性質相抵觸以外，對於土地問題的提法，根本什麼也闡明不了。我們本來也可以講一講普列漢諾夫同志的某些立憲民主黨人的習氣，但這樣做並不能使土地問題的解決有所進展。

其次，約翰〔三〕依據古里亞、拉脫維亞邊區等處的某些實際生活材料，就斷定土地市有適用於整個俄國。我必須指出，一般說來，綱領是不能這樣起草的。在起草綱領時不應從某些邊區、某些部分的特點出發，而應從俄國大多數地區所具有的共同點出發；沒有主導路線的綱領就不能算做綱領，而只能算做各種論點的機械湊合。約翰的草案就是如此。此外，約翰還引用了不正確的材料。照他的意

見，農民運動的發展過程本身證實他的草案是對的，例如古里亞，那裏在運動過程中就成立了管理森林等等的區域自治局。但是，第一、古里亞並不是一個區域，而是庫泰依斯省的一個縣；第二、古里亞從來就沒有過全古里亞統一的革命的自治局，那裏只有過一些小自治局，因而它們決不等於區域自治局；第三、管理是一回事，而佔有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一般說來，關於古里亞的情形流行着許多傳說，而俄羅斯的同志們却毫無必要地信以為真……

至於問題的本質，那末我應當說，我們的綱領必須依據這個原理：既然我們和戰鬥的農民結成暫時的革命聯盟，既然我們因此不能不考慮這些農民的要求，那末我們就應當支持這些要求，只要這些要求大體上不和經濟發展趨向及革命進程相抵觸就行了。農民要求分配土地，分配土地並不和上述現象相抵觸，這就是說，我們應當支持完全沒收和分配全部土地的辦法。從這個觀點看來，土地國有和土地私有都是不能採納的。如果我們提出土地私有或土地國有的口號，我們不僅一無所獲，反而使革命農民和無產階級的聯盟無法實現。那些說分配土地是反動辦法的人，是把兩個發展階段，即資本主義階段和資本主義之前的階段混為一談了。毫無疑問，在資本主義階段實行土地分配是反動的，但在資本主義之前的條件下（例如在俄國農村的條件下），實行土地分配大體說來是革命的。當然，森林、水源等等是無法分配的，但可以把它們收歸國有，而這決不會和農民提出的革命要求相抵觸。其次，約翰提出以革命委員會的口號代替革命農民委員會的口號，這是和土地革命的精神根本抵觸的。土地革命的目的首先和主要的是解放農民，因此農民委員會這個口號是唯一符合土地革命精神的口

號。如果說無產階級的解放只能是無產階級自己的事情，那末農民的解放也只能是農民自己的事情。

一九〇六年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
工黨統一代表大會記錄

一九〇七年莫斯科版第五十九頁至第六十頁

論目前形勢

(一九〇六年四月十七日〔二十日〕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代表大會第十五次會議上的演說)

誰都曉得，在俄國社會政治生活的發展中出現了兩條道路：一條是偽改革的道路，另一條是革命的道路。同樣也很明顯，走第一條道路的是以沙皇政府爲首的大廠主和大地主，走第二條道路的是以無產階級爲首的革命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日益發展的城市中的危機和農村中的飢荒使新的爆發不可避免，所以在這裏是不容許動搖的：或者是革命走向高潮，那我們就應當把它進行到底；或者是革命走向低潮，那我們就不能也不應當提出這樣的任務。魯登科真是枉費心機，他認爲這樣提問題不是辯證的。魯登科在尋找中間路線，他想說：革命又在高漲，又不在高漲；又應當把它進行到底，又不應當把它進行到底。因爲在他看來，辯證法正是要求這樣提問題的！我們却不是這樣了解馬克思的辯證法……

總之，我們是處在新爆發的前夜，革命在高漲，我們應當把它進行到底。在這一點上大家是一致的。但是在什麼情況下我們能够而且應當做到這一點呢？是在無產階級掌握領導權的情況下呢，還

是在民主資產階級掌握領導權的情況下？這就是基本分歧的起點。

馬爾丁諾夫同志早就在『兩個專政』中說過：在目前資產階級革命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是有害的空想。他昨天的發言也透露了這種見解。那些對他鼓掌的同志大概是贊同他的意見的。如果這樣，如果照孟什維克同志們的看法，我們需要的不是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而是民主資產階級的領導權；那末自然很明顯：無論是組織武裝起義，或是奪取政權，我們都不應當直接積極參加了。這就是孟什維克的『公式』。

反之，如果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要求無產階級掌握領導權，如果無產階級必須走在現今革命的前頭而不是做它的尾巴，那末自然很清楚：無產階級既不能拒絕積極參加組織武裝起義，也不能拒絕奪取政權。這就是布爾什維克的『公式』。

或者是無產階級掌握領導權，或者是民主資產階級掌握領導權，——這就是黨內存在着一個問題，這就是我們意見分歧的所在。

一九〇六年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俄國
社會民主工黨統一代表大會記錄

一九〇七年莫斯科版第一八七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起義

孟什維克諾·赫·(答)知道，憑勇敢可以攻下城市，所以他……胆敢再次責罵布爾什維克是布朗基主義者(見『實話報』(答)第七期)。

當然，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德國機會主義者伯恩施坦和福爾馬爾早就稱考茨基和倍倍爾爲布朗基主義者了。法國機會主義者饒勒斯和米勒蘭早就責罵蓋得和拉法格是布朗基主義者和雅各賓黨人了。雖然如此，但全世界都知道，伯恩施坦、米勒蘭、饒勒斯等人是機會主義者，他們背叛了馬克思主義，而考茨基、倍倍爾、蓋得、拉法格等人却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俄國機會主義者及其追隨人諾·赫·也模仿歐洲機會主義者把我們稱爲布朗基主義者，這又有什麼奇怪呢？這不過說明布爾什維克像考茨基和蓋得一樣都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罷了(答)。

我們本來可以在此結束和諾·赫·的談話。可是他偏要把問題『深入一步』，企圖證實自己的意見是對的。好吧，我們別委屈他，就聽聽他的話吧。

諾·赫·不同意布爾什維克以下的意見：

『譬如說①，城市民衆對政府②滿懷憤恨，他們一有機會就要起來進行鬥爭。這就是說，我們在數量上已經準備好了。但是這還不夠。要使起義獲得勝利，就必須預先擬定鬥爭計劃，制定作戰策略，

就必須建立有組織的隊伍等等。』（見『新生活報』第六期）

諾·赫·不同意這一點。爲什麼呢？因爲他說這是布朗基主義！可見諾·赫·既不願制定『作戰策略』，又不願建立『有組織的隊伍』，更不願進行有組織的發動，——這一切好像都是無關緊要的，多餘的。布爾什維克說：單是『對政府滿懷憤恨是不够的』，只有覺悟是『不够的』，還必須有『隊伍和作戰策略』。諾·赫·放棄這一切，而把這叫做布朗基主義。

我們暫且記住這一點，繼續聽下去吧。

諾·赫·不喜歡列寧以下的意見：

『我們應當收集莫斯科、頓巴斯、羅斯托夫以及其他各處起義的經驗，傳播這種經驗，頑強地耐心地準備新的戰鬥力量，並在一系列的游擊性戰鬥發動中訓練和鍛鍊這種新的戰鬥力量。新的爆發也許在春天還不會到來，但它一定要來的，大概不會很遠了。我們應當武裝起來，按軍事方式組織起來並具有採取堅決進攻行動的能力，迎接新的爆發。』（見『黨內消息』）（△）

諾·赫·不同意列寧這個意見。爲什麼呢？因爲他說這是布朗基主義！

總之，在諾·赫·看來，我們不應當『收集十二月起義的經驗』，也不應當『傳播這種經驗』。誠然，爆發是愈來愈近了，但是據諾·赫·的意見，我們不應當『武裝起來迎接它』，不應當準備『採取

① 這裏諾·赫·把『譬如說』改成『當時』，因而把意思稍微改變了一點。

② 這裏諾·赫·刪去了『對政府』幾個字（見『新生活報』（△）第六期）。

堅決的進攻行動』。爲什麼呢？大概因爲我們赤手空拳、毫無準備就容易取得勝利吧！布爾什維克說，爆發是意料中的事，因此我們的責任是既要在覺悟方面又要在武裝方面作好準備。諾·赫·知道爆發是意料中的事，可是他除了口頭鼓動以外，什麼也不承認，所以也就懷疑武裝的必要，認爲這是多餘的。布爾什維克說，必須把覺悟性和組織性灌輸到自發的和零碎的起義中去。諾·赫·連這一點也不承認。他說，這是布朗基主義。布爾什維克說，在一定時機必須『採取堅決的進攻行動』。堅決性也罷，進攻行動也罷，諾·赫·一概不喜歡。他說，這一切都是布朗基主義。

我們暫且記住這一切，再來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武裝起義的看法是怎樣的。

下面一段話是馬克思在五十年代寫的：

『既然起義已經開始，就必須以最大的決心行動起來並轉入進攻。防禦是任何武裝起義的死路……必須趁敵軍還分散的時候，出其不意地襲擊他們；每天都必須力求獲得新的勝利，即使是不大的勝利也好；必須保持由於起義者初次的勝利進展所造成的精神優勢；必須把那些總是跟着較強的人走的和總是站到較可靠的一方的動搖分子爭取過來；必須在敵人還沒有能集中自己的軍隊來攻擊你之前就迫使他們退却；一句話，要按照至今馳名的一位最偉大的革命策略家丹東的「勇敢，勇敢，再勇敢」這句話去行動。」（見馬克思『歷史隨筆』第九十五頁）（△）

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就是這樣說的。

由此可見，在馬克思看來，誰要想使起義獲得勝利，誰就應當走進攻的道路。但是我們知道，誰

要走進攻的道路，誰就必須既有武裝，又有軍事知識，並且有受過訓練的隊伍，——沒有這一切，進攻是不可能的。至於勇敢的進攻行動，據馬克思的意見，它是任何起義的血肉。而諾·赫·無論對勇敢的進攻行動，對進攻的政策，對有組織的隊伍以及對傳播軍事知識一概加以譏笑，——他說這一切都是布朗基主義！這樣一來，彷彿諾·赫·是馬克思主義者，而馬克思倒是布朗基主義者了！不幸的馬克思！可惜他不能從墳墓中站起來聽一聽諾·赫·這番謬論了。

恩格斯關於起義說了些什麼呢？恩格斯在他的一本小冊子中有一處論到西班牙起義並駁斥無政府主義者時說：

『這次起義雖然是糊里糊塗開始的，但如果能領導得稍微恰當，哪怕就像西班牙軍事暴動的做法那樣，勝利還是有很大把握的；在西班牙發生軍事暴動時，一個城市的駐軍發動起來，開到鄰近一個城市去，把該城事先聯絡好的駐軍爭取過來，於是隊伍就像滾雪球一樣，愈來愈大，衝向首都，直到會戰奏捷或者被派來對付他們的軍隊實行倒戈而決定了勝利的結局時為止。這樣的方法尤其適合於這次起義。起義者到處都早已組成義勇大隊（同志，聽見了嗎，恩格斯說的是大隊呀！）；這些隊伍的紀律固然不好，但大概並不比那大部分已經瓦解了的西班牙舊軍隊的殘餘壞些。政府唯一可靠的軍隊就是憲兵（guardias civiles），但他們却分散在全國各地。首先應當阻止憲兵隊的集中，而這只有採取攻勢和大胆開到野外去作戰才能辦到……（同志們，注意，注意！）要希望取得勝利，其他辦法是沒有的……』其次，恩格斯斥責巴枯寧主義者把本來可以避免的事情當做自己的原則，即『正是革命

力量的零星分散，使同一批政府軍隊能够把各處起義陸續地鎮壓下去」（見恩格斯『在工作中的巴枯寧主義者』（C.V.）。

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恩格斯就是這樣說的……

有組織的隊伍，實行進攻的政策，組織起義，統一各處分散的起義，——這就是恩格斯認為保證起義勝利的必要條件。

原來諾·赫·竟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恩格斯倒是布朗基主義者！不幸的恩格斯！

由此可見，諾·赫·不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起義所持的觀點。

這還不要緊。不過我們要聲明：諾·赫·所提出的策略降低了而實際上是否定了武裝、紅色隊伍和軍事知識的作用。這個策略就是赤手空拳舉行起義的策略。這個策略將使我們再次遭受『十二月的失敗』。爲什麼我們在十二月起義時沒有武器、隊伍和軍事知識等等呢？就是因爲當時黨內非常流行着類似諾·赫·的那些同志的策略……

可是馬克思主義和現實生活同樣地駁斥了這種赤手空拳舉行起義的策略。

事實證明是這樣的。

載於一九〇六年七月十三日

『新生活報』第十九期

署名：柯巴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國際反革命

目前的俄國在許多方面都和大革命時期的法國相類似。這種類似一方面表現在：俄國也像當時的法國一樣，反革命勢力在擴大，並且越出了本國的範圍，同其他國家的反革命結成聯盟，——反革命逐漸具有國際性了。在法國，舊政府曾經同奧國皇帝和普魯士國王結成聯盟，請了他們的軍隊去援助，並向人民革命發動了進攻。現在在俄國，舊政府和德奧兩國的皇帝結成聯盟，想請他們的軍隊來援助並把人民革命淹沒在血泊中。

早在一個月以前就已經流行着一種傳聞，說『俄國』和『德國』正在進行秘密談判（見『北方土地報』⁽⁷⁵⁾第三期）。此後傳聞愈來愈厲害。現在情況發展到這種地步，以致黑幫的『俄國報』⁽⁷⁶⁾竟公開宣稱：革命分子是造成『俄國』（即反革命）目前困難情況的罪人。該報說：『德意志帝國政府充分了解這種情況，所以它已採取了一系列適當的措施，而這些措施一定會產生圓滿的結果。』原來這些措施就是『奧國』和『德國』準備在俄國革命一旦有所進展時便派兵援助『俄國』。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已達成協議，並且確認『在一定情況下，為鎮壓或限制革命運動而積極干涉俄國內政，將是必要的和有利的措施……』

『俄國報』就是這樣說的。

由此可見，國際的反革命早就在大事準備。誰都知道，它早就用金錢援助反革命的俄國來反對革命。但它並不以此爲限。現在它竟決定出兵來援助了。

既然如此，解散杜馬的真正意圖，也像斯托雷平『新』命令⁽²⁾的意圖和特列波夫⁽³⁾『舊』暴行的意圖一樣，連小孩子也容易懂得了…… 既然如此，大概各種各樣的自由主義者和其他天真幼稚的人所抱的幻想就會消失了，大概他們終究會相信：我們這裏並沒有『憲制』，我們這裏在進行內戰，因而鬥爭也應當按軍事方式來進行……

可是目前的俄國在另一方面也和當時的法國相類似。當時國際的反革命使革命擴大起來，革命越出了法國的範圍，像洶湧的洪流氾濫於歐洲各國。歐洲『戴皇冠的人們』既然結成總聯盟，歐洲的人民自然也就携起手來了。我們今天在俄國也看到同樣的情形。『田鼠挖得好呀』…… 俄國反革命和歐洲反革命聯成一氣，不斷使革命擴大，使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並給國際革命奠定基礎。俄國無產階級領導着民主主義革命，伸出兄弟的手去和將要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歐洲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大家知道，隨着一月九日的發動，在歐洲各處舉行了羣衆大會。十二月的發動引起了德國和法國的遊行示威。毫無疑義，必將到來的俄國革命的發動一定會更堅決地推動歐洲無產階級起來鬥爭。國際反革命只會使國際革命更加鞏固，更加深入，更加強大，並使它的基礎更加穩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個口號將獲得真正的體現。

好吧，先生們，你們幹吧，努力幹吧！隨着正在擴大的俄國革命到來的將是歐洲革命，那時……那時，不僅農奴制度殘餘的喪鐘，就連你們所喜愛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喪鐘，也要響起來了。是的，反革命先生們，你們『挖得好呀』。

載於一九〇六年七月十四日

『新生活報』第二十期

署名：柯巴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目前形勢和工人黨統一代表大會

一

我們殷切期待的事情實現了，——統一代表大會已和平結束，黨避免了分裂，黨內兩派的合併在形式上確定下來了，因而奠定了我黨政治實力的基礎。

現在必須了解，必須更仔細地認識代表大會的面貌，冷靜地衡量這次大會的優點和缺點。

代表大會做了些什麼呢？

代表大會本來應當做些什麼呢？

對前一問題，代表大會的決議已作了回答。對後一問題，要回答它，就應當知道代表大會是在什麼情況下召開的，目前形勢向它提出了什麼任務。

我們從後一問題開始吧。

現在已經很明顯：人民革命並沒有滅亡，它雖然遭到了『十二月的失敗』，但仍然在擴大並向最高點發展。我們說，這是必然的，因為革命的動力繼續存在，繼續起作用，已爆發的工業危機日益加

劇，使農村完全破產的飢荒日甚一日，——而這意味着人民的革命義憤很快就要像洶湧的洪流一樣奔放起來。事實證明，在俄國社會生活中正醞釀着新的發動，比十二月進攻更堅決更強大的發動。我們正處在起義的前夜。

另一方面，人民深惡痛絕的反革命也正在積聚力量並逐漸加強起來。它已把權奸組織起來，它號召一切黑暗勢力集合到自己的旗幟下，它領導着黑幫「運動」，它準備向人民革命進行新的襲擊，它把嗜血成性的地主和廠主糾集在自己的周圍，——可見反革命正在準備撲滅人民革命。

愈往前去，國家就愈加分明地分成兩個敵對的陣營，即革命陣營和反革命陣營；這兩個陣營的兩個首領——無產階級和沙皇政府也就對立得愈加厲害，它們之間的一切橋梁已被燒燬的跡象也就愈加明顯。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革命勝利和人民專制，或者是反革命勝利和沙皇專制。誰若腳踏兩隻船，誰就是出賣革命。誰不和我們一道，誰就是反對我們！可鄙的杜馬和它那些可鄙的立憲民主黨人正是腳踏兩隻船。它想調和革命和反革命，想把狼和羊豢養在一起，藉以「一舉」平息革命。所以杜馬至今只是幹白中搗水的勾當，所以它沒有能把任何人民集合到自己的周圍，沒有立足的基地而飄盪在空中。

鬥爭的主要場所仍然是街頭。事實證明是如此。事實證明：在今天的鬥爭中，在街頭的鬥爭中（而不是在只會空談的杜馬中），反革命勢力一天天在削弱和動搖，而革命力量則在增長並動員起來；團結和組織革命力量是在先進工人領導下而不是在資產階級領導下進行的。這就是說，使目前革命獲

得勝利和把革命進行到底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只有在這個革命今後還是由先進工人來領導的條件下，只有在覺悟的無產階級能勝任地領導革命的條件下，才是可能的。

因此，目前形勢向代表大會提出了什麼任務，代表大會應當做些什麼，就顯而易見了。

恩格斯說，工人的政黨『是不自覺過程的自覺表現者』，換句話說，黨應當自覺地走上實際生活本身所不自覺地走着的那條道路，黨應當自覺地表達沸騰的生活所不自覺地提出的那種思想。

事實證明，沙皇制度沒有能撲滅人民革命，恰恰相反，人民革命日益增長，日益高漲，並走向新的發動，——所以黨的任務就是自覺地準備迎接這個發動並把人民革命進行到底。

很明顯，代表大會應當指出這個任務並責成黨員忠實地完成這個任務。

事實證明，調和革命和反革命是不可能的；杜馬一開始就走上了調和它們的道路，但它做不出什麼來；這樣的杜馬永遠不會成為國家的政治中心，永遠不能把人民團結在自己周圍而不得不變成反動勢力的附屬品，——所以黨的任務就是打破對杜馬的幻想，糾正人民的政治錯覺，並對全世界宣告：革命的主要場所是街頭而不是杜馬；能給人民帶來勝利的主要是街頭，是街頭的鬥爭，而不是杜馬，不是杜馬中的空談。

很明顯，統一代表大會也必須在自己的決議中指出這個任務，以便確切地規定黨的活動方向。

事實證明，使革命獲得勝利，把革命進行到底以及建立人民專制，只有在以下場合才有可能：領導革命的一定要是覺悟的工人，革命的領導權一定要掌握在社會民主黨手中，而不是掌握在資產階

殺手中，——所以黨的任務就是埋葬資產階級的領導權，把城鄉革命分子團結在自己的周圍，領導他們的革命鬥爭，領導他們今後的發動，這樣來鞏固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基礎。

很明顯，統一代表大會應該特別注意這第三個任務，即基本任務，藉以向黨指明這一任務的極重大的意義。

這就是目前形勢所要求於統一代表大會的，這也就是代表大會所應當做的。

代表大會是否完成了這些任務呢？

二

爲了闡明這個問題就必須認識代表大會本身的面貌。

代表大會的各次會議談到了許多問題，但主要問題是目前形勢問題，其餘一切問題都是以它爲中心的。民主革命的目前形勢和無產階級的階級任務，——這個問題就是我們策略上一切分歧意見的焦點。

布爾什維克說，城市的危機日益尖銳，農村的飢荒日益嚴重，政府腐敗透頂，而人民的義憤則一天天增長，因此，革命不僅沒有低落，反而一天天發展起來，並準備新的進攻。所以任務就是促成日益發展的革命，把革命進行到底並且以人民專制來完成它（見布爾什維克的決議『……目前形勢』）。

孟什維克所說的幾乎也是一樣。

但是怎樣把目前的革命進行到底，爲此需要哪些條件呢？

據布爾什維克看來，把目前的革命進行到底並且以人民專制來完成它，只在以下場合才有可能：領導這個革命的一定要是覺悟的工人，革命領導權一定要掌握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手中，而不是掌握在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手中。布爾什維克說：『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其必要條件就是它……引導農民羣衆前進，使農民的自發鬥爭帶有政治自覺性……』否則無產階級就只好放棄『人民革命領袖』的角色，而成爲那永遠不想把革命進行到底的『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的尾巴』（見決議『無產階級……的階級任務』）。自然，我國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在這方面，它是和那被資產階級享受了果實的法國大革命相似的。但是同樣很明顯，這兩個革命之間的區別也是很大的。在法國革命時期，還沒有像我們今天在我國所看見的大機器生產，階級矛盾也不像目前在我國這樣尖銳，因此那裏的無產階級是軟弱的，而這裏的無產階級却是較強大、較團結的。還應該注意到：當時那裏的無產階級還沒有自己的政黨，而目前這裏的無產階級却有自己的政黨及其綱領和策略。所以毫不奇怪，領導法國革命的是資產階級民主派，而工人却成了這些先生的尾巴，『工人進行了鬥爭，而資產者却獲得了政權』。另一方面也非常明顯，俄國無產階級並不滿意做自由派的尾巴，它以革命領導者的姿態出現，並且號召一切『被壓迫者和窮苦的人』集合到它的旗幟下。這就是我國革命比法國大革命優越的地方，這也就說明爲什麼我們認爲我國革命能够進行到底並能够最後建立人民專制。不過我們

必須自覺地促成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實現，把戰鬥的人民團結在它的周圍，以便有可能把目前的革命進行到底。而把革命進行到底之所以必要，是爲了使這個革命的果實不被資產階級所獨吞，是爲了使工人階級除了政治自由之外還能得到八小時工作制，得到勞動條件的改善，以及完全實現自己的最低綱領，從而開闢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因此，誰若捍衛無產階級的利益，誰若不願使無產階級變成資產階級的尾巴而爲它火中取栗，誰若爭取使無產階級變成獨立的力量並利用目前的革命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誰就應當公開指責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領導權，誰就應當鞏固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在目前革命中的領導權的基礎。

布爾什維克的論點就是如此。

孟什維克說的却完全是另一套。他們說：當然，革命在加強着，並且需要把它進行到底，但是爲了做到這一點，根本不需要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讓那些資產階級民主派去做革命的領導者吧。布爾什維克問道：爲什麼，是怎麼一回事？孟什維克回答說：因爲目前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所以資產階級就應充當這個革命的領袖。那末無產階級究竟應當做些什麼呢？它應當跟着資產階級民主派走，並且『推動他們』，這樣來『把資產階級革命推向前進』。被孟什維克推舉爲『報告人』的孟什維克領袖馬爾丁諾夫就是這樣說的。在孟什維克提出的『關於目前形勢』的決議中也表現了這種思想，雖然表現得不這樣明顯。馬爾丁諾夫早在他的『兩個專政』中就說過，『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是危險的空想』，是一種幻想；資產階級革命『應當由極端民主反對派來領導』，而不是由社會主義無產階級

來領導，戰鬥的無產階級『應當跟在資產階級民主派後面』，並且推動他們走上通向自由的道路（見馬爾丁諾夫的一本有名的小冊子『兩個專政』）。他在統一代表大會上又重複了這種見解。在他看來，法國大革命是藍本，而我國革命則是較藍本遜色的副本；既然在法國領導革命的，起初是資產階級佔統治地位的『國民會議』，後來又是資產階級佔統治地位的『國民公會』，那末在我國領導革命並把人民團結在自己周圍的，起初也應當是國家杜馬，以後就應當是另一個比杜馬更為革命的代表機關。無論在杜馬中或是在這個未來的代表機關中，資產階級民主派都將佔統治地位，所以我們需要的是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領導權，而不是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只要寸步不離地跟着資產階級走，把它繼續推向前進，推向真正的自由就行了。值得注意的是孟什維克對馬爾丁諾夫的演說報以響亮的掌聲。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自己的任何決議中都沒有提到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必要性，——『無產階級領導權』一語在他們的決議和代表大會的決議中都被刪掉了（見代表大會的決議）。

孟什維克在代表大會上的立場就是如此。

由此可見，這裏有兩種互相排斥的立場，其他的意見分歧都是由此產生的。

既然目前革命的領袖是覺悟的無產階級，而在現今的杜馬中佔統治地位的却是立憲民主黨的資產者，那就不言而喻，現今的杜馬決不能變成『國家的政治中心』，決不能把革命的人民團結在自己周圍，而且無論它怎樣努力都不能成為日益發展的革命的領導者。其次，既然革命的領袖是覺悟的無產階級，而要通過杜馬來領導革命又沒有可能，那就不言而喻，目前我們活動的主要場所應當是街頭，

而不是杜馬的會議廳。再其次，既然革命的領袖是覺悟的無產階級，而鬥爭的主要場所又是街頭，那就不言而喻，我們的任務是積極參加組織街頭的鬥爭，加緊注意武裝工作，擴充紅色隊伍並在先進分子中間傳播軍事知識。最後，既然革命的領袖是先進的無產階級，既然先進的無產階級應當積極參加組織起義，那就不言而喻，我們不能袖手旁觀，不能避開臨時革命政府，我們應當和農民一起去奪取政權，參加臨時政府^①，因為革命街頭的領袖同樣應當是革命政府中的領袖。

布爾什維克的立場就是如此。

反之，如果像孟什維克所想的，革命的領導權將屬於資產階級民主派，而杜馬中的立憲民主黨人又『近於這類民主派』，那就不言而喻，現今的杜馬能變成『國家的政治中心』，現今的杜馬能把革命人民團結在自己周圍，成為他們的領導者並變成鬥爭的主要場所。其次，既然杜馬能變成鬥爭的主要場所，那末加緊注意武裝工作和注意組織紅色隊伍就是多餘的事情，特別注意組織街頭的鬥爭也不是我們的事情，和農民一起去奪取政權並參加臨時政府就更不是我們的事情了。讓資產階級民主派去關心這件事情吧，因為他們將是革命的領導者。誠然，擁有武器和紅色隊伍不僅不壞而且還是必需的，但其意義並不像布爾什維克所想的那麼重大。

孟什維克的立場就是如此。

① 我們在這裏不談這個問題的原則方面。

代表大會走上了第二條道路，就是說，它放棄了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贊成孟什維克的立場。

這樣，代表大會就清楚地證明了它不懂得目前形勢的迫切要求。

代表大會的根本錯誤就在於此，其餘一切錯誤自然也就隨着產生了。

三

代表大會既然放棄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那末其餘的問題如『關於對國家杜馬的態度』、『關於武裝起義』等等，它會怎樣去解決，也就可想而知了。

現在我們就來談談這些問題吧。

首先從國家杜馬問題談起。

我們不來分析究竟哪種策略較為正確，——是抵制選舉還是參加選舉。我們只指出以下一點：既然今天杜馬除了空談以外什麼事也不幹，既然它站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間，——這就是說，主張參加選舉的人是錯了，因為他們號召人民去參加選舉，就使人民產生幻想。我們暫且撇開這一點不談吧。原來在代表大會開會時，選舉已經結束（高加索和西伯利亞除外），我們已經知道選舉的結果，因此當時可談的只是過幾天就要召開的杜馬本身。很明顯，代表大會不能回到已往的問題上去，而應該把主

要注意力放在杜馬本身究竟是什麼和我們對它應採取什麼態度這些問題上面。

那末，現今的杜馬究竟是什麼，我們對它應採取什麼態度呢？

大家從十月十七日的宣言中就已知道，杜馬沒有特別的權力：這是一個『有權』開會討論問題而『無權』逾越現行『根本法』的代表會議。杜馬受到『有權』廢除其任何決定的國家參議院的監視。而全副武裝的沙皇政府在警戒着，要是杜馬不滿足於諮議的角色，沙皇政府就『有權』把它解散。

至於杜馬的面目，那末我們在代表大會開幕以前就已知道它將由誰組成，當時我們已知道杜馬的大部分代表一定是立憲民主黨人。我們並不是想藉此說明，立憲民主黨人一定將在杜馬中佔多數，我們只是說杜馬五百個代表中，大約有三分之一將是立憲民主黨人，還有三分之一是中間集團和右派（『民主改革黨』^{（註）}、無黨派代表中的溫和分子、十月黨人^{（註）}等等），這些人在和極左派（即工人集團和革命農民集團）作鬥爭時，一定會集結在立憲民主黨人的周圍並投票擁護他們，這樣一來，在杜馬中能左右一切的就會是立憲民主黨人。

立憲民主黨人是些什麼人呢？能不能稱他們為革命者呢？當然不能！那末立憲民主黨人究竟是什麼人呢？立憲民主黨人就是一幫妥協分子；他們想限制沙皇的權力，但這並不是因為他們主張人民獲得勝利，——立憲民主黨人想用來代替沙皇專制的是資產階級專制面不是人民專制（見他們的綱領），——而是爲了使人民也減弱自己的革命性，收回自己的革命要求，並盡量和沙皇妥協；立憲民主黨人希望沙皇和人民達成協議。

可見杜馬中的多數一定會由妥協分子組成，而不是由革命者組成。這一點早在四月上半月就已看得非常清楚了。

由此可見，一面是遭受抵制，軟弱無力，權限微不足道；一面又是不革命的和妥協的分子佔多數，——這就是杜馬的面目。軟弱的人本來就慣於走妥協的道路，若再加上他們的傾向也是不革命的，那就更容易滾到妥協方面去了。國家杜馬也一定會這樣。它不會完全站到沙皇方面，因為它希望限制沙皇的權力，但它也不會轉到人民方面，因為人民提出種種革命要求。因此它必定站在沙皇和人民之間進行調停，就是說，必定幹白中搗水的勾當。一方面它必須說服人民，使人民放棄『過分的要求』而盡量向沙皇妥協；另一方面，它又必須以經紀人的身分在沙皇面前出現，請沙皇向人民讓一步，以便結束『革命的混亂局面』。

黨的統一代表大會所碰到的就是這樣的一個杜馬。

黨對這樣的杜馬應當採取什麼態度呢？不用說，黨決不能支持這樣的杜馬，因為支持杜馬就是支持妥協政策，而妥協政策是和加深革命這一任務根本抵觸的，——工人政黨不應担任綏靖革命的角色。當然，黨應當利用杜馬本身以及杜馬和政府的衝突，但這並不是說，黨就應當支持杜馬的不革命的策略。恰恰相反，揭破杜馬的兩面性，無情地批評杜馬，暴露杜馬的背叛性的策略，——這就是黨對國家杜馬應當採取的態度。

既然如此，那就很明顯，立憲民主黨的杜馬不是人民意志的表達者，它不能起人民代表機關的作

用，不能成爲國家的政治中心，不能把人民團結在自己的周圍。

在這裏，黨的責任就是打破對杜馬所抱的幻想，並且公開宣佈：杜馬不是人民意志的表達者，所以它不能成爲革命的工具；現在鬥爭的主要場所是街頭，而不是杜馬。

同時也很明顯，在杜馬中人數比立憲民主黨少得多的農民「勞動團」，不會永遠追隨立憲民主黨人的妥協策略，它很快就會把立憲民主黨人當做人民叛徒而開始和他們作鬥爭，並走上革命的道路。黨的責任就是支持「勞動團」同立憲民主黨人作鬥爭，徹底發展它的革命傾向，使它的革命策略和立憲民主黨人的不革命策略對立起來，這樣來更明顯地揭露立憲民主黨人的背叛傾向。

代表大會究竟是怎樣做的，代表大會在關於國家杜馬的決議中說了些什麼呢？

代表大會的決議說：杜馬是「從國民中間」產生出來的機關。這就是說，杜馬雖然有它的缺點，但它似乎終究是人民意志的表達者。

很明顯，代表大會未能對立憲民主黨的杜馬作應有的估計，代表大會忘記了，杜馬中的大多數是妥協分子，妥協分子既是擯棄革命的人，也就不能表達人民的意志，因而我們無權說杜馬是「從國民中間」產生出來的。

關於這一點，布爾什維克在代表大會上說了些什麼呢？

他們說：「現在已可看出（主要是）由立憲民主黨人組成的國家杜馬無論如何不能負起真正人民代表機關的使命。」這就是說，現在的杜馬不是從人民中間產生出來的，它是反人民的，所以不能表

達人民的意志（見布爾什維克的決議）。

代表大會在這個問題上否決了布爾什維克的立場。

代表大會的決議說：「杜馬」雖然具有「偽憲制的」性質，但終究「會變成革命的工具」……它和政府的衝突能够擴大到「有可能使這種衝突變成旨在推翻現存政治制度的廣大羣衆運動的出發點」。這就是說，杜馬似乎可能變成政治中心，把革命人民團結在自己的周圍並舉起革命的旗幟。

工人們，你們聽見了嗎？妥協的立憲民主黨的杜馬居然能變成革命中心，能領導革命，——狗居然能生出羊來！你們何必操心，今後既用不着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也用不着使人民一定要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了，因為不革命的杜馬自己是會把革命的、人民團結在自己周圍的，於是就萬事大吉了！原來進行革命是這麼簡單呀，原來把目前的革命進行到底是應該這樣做呀！

看來，代表大會不懂得，兩面性的杜馬及其兩面性的立憲民主黨人必然會腳踏兩隻船，必然會在沙皇和人民之間進行調解，然後就像所有兩面派一樣，不得不投到給予更多諾言的那一方面去！

關於這一點，布爾什維克在代表大會上說了些什麼呢？

他們宣稱，「目前還沒有可以使我黨走上國會道路的條件」，就是說，我們暫時還不能開始過平靜的國會生活，鬥爭的主要場所仍然是街頭，而不是杜馬（見布爾什維克的決議）。

代表大會在這一點上也否決了布爾什維克的決議。

代表大會的決議絲毫沒有確切地說明：杜馬中存在着處於少數地位的革命農民代表（『勞動

國」)，他們將不得不擴充立憲民主黨的妥協政策而走上革命道路；我們必須鼓勵他們、支持他們和立憲民主黨人作鬥爭，幫助他們更加堅定地站在革命的道路上。

看來代表大會不懂得無產階級和農民是目前革命中的兩個主力，在現時，只要革命的農民和革命的敵人作鬥爭，那末作為革命領袖的無產階級，無論在街頭或在杜馬中都應當支持他們。

關於這一點，布爾什維克在代表大會上說了些什麼呢？

他們宣稱：社會民主黨應該無情地揭露「立憲民主黨人的不徹底性和動搖性，特別留心地注視農民革命民主派的分子，把他們團結在一起，使他們和立憲民主黨人對立起來，支持他們那些符合無產階級利益的發言」（見決議）。

代表大會也沒有通過布爾什維克的這項提案。大概因為這項提案過於明顯地表現了無產階級在目前鬥爭中的先進作用，而代表大會，像我們在上面所看到的，却不信任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它說農民應當團結在杜馬的周圍，而不應當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

正因為這樣，資產階級的刊物「我們的生活報」^(*)就稱讚代表大會的決議；正因為這樣，「我們的生活報」的那些立憲民主黨人就異口同聲地叫喊：社會民主黨人終於同心轉意，離開布爾基主義了（見「我們的生活報」第四三二期）。

顯然，人民的敵人——立憲民主黨人稱讚代表大會的決議決不是無緣無故的！無怪乎倍倍爾說：凡是我們的敵人所喜歡的事情，對我們都是有害的！

四

現在我們來談談武裝起義問題。

現在誰都曉得，人民的發動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城市的危機和鄉村的飢荒有加無已，既然無產階級和農民中間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既然沙皇政府日趨腐敗，既然革命因而高漲起來，——那末不言而喻，實際生活正在準備一次比十月和十二月兩次發動更廣泛更強大的新的人民發動。至於這種新的發動是否如願，是好是壞，今天來說是多餘的；因為問題不在於我們的願望如何，而在於人民的發動正在自然地成熟着，它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發動是各有不同的。不待說，彼得堡的一月總罷工（一九〇五年）是人民的發動。十月的政治總罷工是人民的發動。莫斯科的和拉脫維亞人的「十二月搏鬥」也是人民的發動。顯然，這些發動之間都有不同的地方。在一月發動（一九〇五年）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罷工，而在十二月發動中，罷工只是一個開端，後來它就轉變為武裝起義，把主要作用讓給了武裝起義。一月、十月和十二月的發動證明：不管你怎樣「和平地」開始總罷工，不管你怎樣「客氣地」提出要求，不管你怎樣赤手空拳地走上戰場，事情還是要由搏鬥來結束（請回憶一下一月九日彼得堡民衆舉着十字架和沙皇肖像遊行的情形），政府還是要使用大砲和長槍，人民還是要拿起武器，因而總罷工還是會轉變為武裝起義。

這說明什麼呢？這不過說明：將來的人民發動不會是普通的發動，它一定具有武裝鬥爭的性質，因而起決定作用的一定是武裝起義。至於流血衝突是否如願，是好是壞，那是不必談的。再說一遍，問題不在於我們的願望如何，而在於武裝起義一定要發生，避免它是不可能的。

我們今天的任務就是建立人民專制。我們要使政權轉到無產階級和農民手中。用總罷工能達到這個目的嗎？事實證明是不可能的（請回憶一下上述的情形）。也許杜馬和它那些誇誇其談的立憲民主黨人能幫助我們，因而人民專制就會在它的幫助下建立起來嗎？事實證明這同樣是不可能的，因為立憲民主黨的杜馬所要的是大資產階級專制而不是人民專制（請回憶一下上述的情形）。

很明顯，唯一可靠的道路就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武裝起義。只有靠武裝起義才能推翻沙皇統治並建立人民統治，當然這個起義一定要以勝利來結束才行。既然如此，既然現今沒有起義的勝利就不可能有人民的勝利，而另一方面，既然實際生活本身在準備着人民的武裝發動，既然這個發動不可避免，——那末不言而喻，社會民主黨的任務是自覺地準備迎接這個發動，自覺地使這個發動獲得勝利。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我們應當攬棄人民專制（民主共和國）而滿足於君主立憲制，那末我們就有權說組織武裝起義不是我們的事情；或者我們仍舊認定我們今天的目的應當是建立人民專制（民主共和國）而堅決攬棄君主立憲制，那末我們就無權說自覺地去組織自發成長的發動不是我們的事情了。

但是，怎樣準備武裝起義，怎樣促使起義獲得勝利呢？

十二月的發動證明：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在無產階級面前除了其他一切過失外，還犯了一個很大的過失。這個過失就是我們對武裝工人和組織紅色隊伍的事情沒有關心或者關心太少。請回憶一下十二月事變。誰不記得當時梯弗里斯、西高加索、南俄、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巴庫等處奮起鬥爭的人民呢？為什麼專制政府能如此容易地驅散了這些憤激的人民呢？難道因為人民還不相信沙皇政府的腐朽無能嗎？當然不是！那末究竟為什麼呢？

首先因為人民沒有武器或武器太少，——不管你怎樣覺悟，赤手空拳是擋不住槍彈的！是的，羣衆罵我們：你們拿了錢，武器却沒有看見。這是罵得很公道的。

第二、因為我們還沒有受過訓練的紅色隊伍來領導其餘的民衆前進，用武器去奪取武器並把民衆武裝起來；民衆在街頭戰鬥中是英雄，但是，如果武裝的弟兄不引導他們，不給他們樹立榜樣，那末他們就會變成烏合之衆。

第三、因為起義是零碎的，沒有組織的。當莫斯科進行街壘戰時，彼得堡却毫無動作。莫斯科已「被征服」了，梯弗里斯和庫泰依斯才準備衝擊。南方一帶和拉脫維亞人已經「戰敗」了，西伯利亞才拿起武器。這就是說，在起義開始時，戰鬥的無產階級是分散為一些個別集團的，所以就容易被政府「打敗」。

第四、因為我們的起義所採取的是防禦政策而不是進攻政策。政府自己激起了十二月起義，政府自己向我們進攻，它有自己的計劃，而我們在應付政府的這種進攻時却是沒有準備的，我們沒有周密

的計劃，我們不得不採取自衛政策，於是我們就做了事變的尾巴。假使莫斯科民衆一開始就選定進攻政策，那末他們就會立刻佔領尼古拉車站，政府就無法從彼得堡調遣軍隊到莫斯科。這樣，莫斯科的起義就會堅持得比較久，因而就會使其他城市也受到相當的影響。關於拉脫維亞人的起義也應該這樣說：假使他們一開始就採取進攻的手段，那末他們首先就會奪得大砲並會破壞政府當局的力量。

無怪乎馬克思說：

「既然起義已經開始，就必須以最大的決心行動起來並轉入進攻。防禦是任何武裝起義的死路……必須趁敵軍還分散的時候，出其不意地襲擊他們；每天都必須力求獲得新的勝利，即使不是大的勝利也好；必須保持由於起義者初次的勝利進展所造成的精神優勢；必須把那些總是跟着較強的人走的和總是站到較可靠的一方的動搖分子爭取過來；必須在敵人還沒有能集中自己的軍隊來攻擊你以前就迫使他們退却；一句話，要按照至今馳名的一位最偉大的革命策略家丹東的「勇敢，勇敢，再勇敢」這句話去行動。」（見馬克思『歷史隨筆』第九十五頁）

十二月起義所缺少的正是這種「勇敢」和進攻政策。

有人會向我們說：十二月「失敗」的原因還不止於此，你們忘記了，在十二月，農民沒有能夠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這也是十二月退却的主要原因之一。這是十足的真理！我們也並不算忘記這一點。然而農民爲什麼沒有能夠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原因何在呢？有人會向我們說：由於沒有覺悟。好吧，但我們應如何使農民有覺悟呢？散發小冊子嗎？這當然是不夠的！那又怎麼辦呢？要鬥爭，

要吸引他們參加鬥爭，並且在鬥爭中我們要領導他們。今天城市負有領導鄉村的使命，工人負有領導農民的使命，如果城市的起義沒有組織好，那末農民在這方面是決不會跟着先進無產階級走的。

事實就是如此。

由此可見，代表大會應當如何對待武裝起義，應當向黨員同志提出什麼口號。

黨在武裝工作方面有很多缺點，黨的這一工作至今無人過問，——所以代表大會必須向黨說：要武裝起來，要加緊注意武裝工作，以便多少有準備地迎接必將到來的發動。

其次，黨在組織武裝隊伍的工作方面也有很多缺點，它對擴大紅色隊伍沒有予以應有的注意，所以代表大會必須向黨說：要建立紅色隊伍，要在人民中間傳播軍事知識，要加緊注意組織紅色隊伍，以便今後用武器去奪取武器並擴大起義。

再其次，無產階級是在分散狀態下迎接十二月起義的，誰也沒有認真考慮過組織起義的問題，所以代表大會必須向黨提出口號，使黨大力把戰鬥分子團結起來，按照統一計劃把他們發動起來，積極組織武裝起義。

再其次，無產階級在武裝起義中至今都是採取防禦政策，從來也沒有走上進攻的道路，而這種情況也就妨礙了起義的勝利，所以代表大會必須向黨員同志指出：起義勝利的時機已經迫近，必須轉入進攻政策。

代表大會究竟怎樣做的，它向黨提供了些什麼口號呢？

代表大會說：『……目前黨的基本任務是發展革命，其辦法就是在無產階級、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廣大階層中以及在軍隊中擴大和加強鼓動工作，社會民主黨及其所領導的無產階級應當經常以參預全國一切政治生活來吸引他們參加積極反對政府的鬥爭……』黨『不能承擔會引起幻想的武裝人民的義務，黨的任務應限制於協助居民自我武裝並進行組織和武裝戰鬥隊的工作……』『黨必須反對一切引誘無產階級在不利的條件下作武裝衝突的企圖……』以及其他等等（見代表大會決議）。

這樣說來，今天，在目前，當我們正處於人民新發動的前夜，爲了起義勝利，最主要的事情就是鼓動工作，而武裝和組織紅色隊伍的工作却是一種不關緊要的事情，我們不應熱中於這種事情，我們應把自己在這方面的活動『限制於』『協助』。關於我們必須組織起義而不應零碎地舉行起義的問題，關於我們必須採取進攻政策的問題（請回憶一下馬克思的話），——關於這一切，代表大會竟隻字未提。顯然，這些問題對它是沒有意義的。

事實證明，必須武裝起來和竭力鞏固紅色隊伍，代表大會却回答說，不應太熱中於武裝和組織紅色隊伍的工作，要把自己在這方面的活動『限制一下』，因爲最主要的事情是鼓動工作。

這樣說來，彷彿我們在這以前已十分關心武裝工作，已武裝了大批同志和組織了很多部隊，而只是忽略了鼓動工作，——所以代表大會教訓我們說：已經武裝得夠了，不要再操心了，進行鼓動工作才是主要任務！

當然，鼓動工作無論何時何地都是黨的主要武器之一，可是鼓動工作難道會決定當前起義的勝

利嗎？如果四年以前，當起義問題還沒有提到我們日程上來的時候，代表大會說出這些話，那還可以理解；但在今天，當我們已處在武裝起義的前夜，當起義問題已提到日程上的時候，當它不顧並違反我們的意志而開始的時候，鼓動工作「主要地」又能發生什麼作用呢，憑這種「鼓動」又能做出什麼事情呢？

再則，假定我們已擴大了鼓動工作，假定人民已經發動起來，以後又怎麼辦呢？人民沒有武器怎能進行戰鬥呢？難道赤手空拳的人民的鮮血沒有流够嗎？並且，如果人民不會使用武器，如果他們沒有足够的紅色隊伍，那末給他們武器又有什麼用處呢？有人會向我們說：我們並不拒絕從事武裝工作和組織紅色隊伍呀。就假定是這樣，但是你們若不充分注意，你們若不過問這一工作，那末事實上就等於你們拒絕這一工作了。

我們且不去說代表大會根本沒有談到組織起義和進攻政策的問題。不過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代表大會的決議比實際生活落後了四五年，在代表大會看來，起義問題仍然是一個理論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布爾什維克在代表大會上說了些什麼呢？

他們說：「……在黨的宣傳和鼓動工作中，應當加緊注意研究十二月起義的實際經驗，注意以軍事觀點批判它並吸取直接的教訓以供將來參考」，「應當更加努力地擴充戰鬥隊，改善它們的組織並供給它們各種武器。同時經驗證明，不但應當組織黨員戰鬥隊，而且應當組織接近黨的和完全非黨的戰鬥隊……」，「由於日益增長的農民運動在最近的將來可能爆發為整個的起義，我們最好是努力把工人

和農民的行動統一起來，以便盡可能組織共同的和同時的戰鬥發動……』所以，『由於新的政治危機日益增長和尖銳化，從武裝鬥爭的防禦形式過渡到進攻形式已有可能……』必須同士兵一起……以最堅決的進攻行動反對政府……』等等（見布爾什維克的決議）。

布爾什維克就是這樣說的。

但是，布爾什維克的立場却被代表大會否定了。

由此就不難了解，為什麼代表大會的決議受到自由派立憲民主黨人那麼熱烈的歡迎（見『我們的生活報』第四三二期），因為他們懂得：這些決議比目前革命落後了好幾年，這些決議完全沒有反映出無產階級的階級任務；按照這些決議去做，無產階級勢必變成自由派的附屬品，而不會變成獨立的力量，——他們了解了這一切，所以才大為稱讚這些決議。

黨員同志的任務，就是以批判的態度對待代表大會的決議，並適時加以相當的修改。

當我們着手寫這本小冊子時，我們所注意的正是這個任務。

誠然，我們在這裏只談到兩個決議：『關於對國家杜馬的態度』的決議和『關於武裝起義』的決議。但是毫無疑義，這兩個決議是最確實地表明代表大會的策略立場的基本決議。

這樣，我們就得出一個主要的結論，即問題在黨內是這樣提出的，覺悟的無產階級應當成為目前革命中的領導者呢，還是應當做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尾巴？

我們知道，其他一切問題的解決都以這個問題如何解決為轉移。

因此，同志們必須更仔細地估量這兩個立場的實質。

按「無產階級報社」一九〇六年

發行的小冊子原文刊印

署名：科同志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階級鬥爭

只有無產階級的聯盟才能動搖資產階級的聯盟。

——馬克思

現代生活非常複雜！在實際生活中，處處都可看到各種各樣的階級和集團：大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大封建主、中等封建主和小封建主，幫工、雜工和熟練產業工人，高級僧侶、中級僧侶和低級僧侶，大官僚、中等官僚和小官僚，各種知識分子及其他類似的集團，——這就是我們生活所呈現的一幅五光十色的圖畫！

但同時也很明顯，生活愈是向前發展，這個複雜生活也就愈加明顯地呈現出兩個基本的趨向，這個複雜生活也就愈加突出地分為兩個對立的陣營——資本家陣營和無產者陣營。一月經濟罷工（一九〇五年）清楚地顯示出，俄國的確分為兩個陣營了。彼得堡的十一月罷工（一九〇五年）和全俄國六、七兩月的罷工（一九〇六年）使兩個陣營的領袖發生了衝突，因而徹底揭露了現代的階級矛盾。從那時起，資本家陣營就沒有打瞌睡，這個陣營裏在熱烈地不斷地進行着準備工作：建立資本家地方聯合會，地方聯合會結成區域聯合會，區域聯合會結成全俄聯合會，創辦基金會和機關刊物，召開全

俄資本家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

可見資本家在組成一個單獨的階級，以便制服無產階級。

另一方面，無產者陣營也沒有打瞌睡。這裏也在熱烈地準備迎接必將到來的鬥爭。不管反動勢力怎樣迫害，這裏也在建立地方工會，地方工會結成區域工會，設立職工基金會，增辦職工會刊物，召開全俄工會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

可見無產者也在組成一個單獨的階級，以便制服剝削勢力。

曾經有一個時期，生活中瀰漫着一片『寧靜』的氣氛。當時這些階級及其階級組織還看不出來。當時固然也有過鬥爭，但這種鬥爭只是地方性的，而不是全階級性的；資本家們沒有自己的聯合會，所以他們每個人只有靠本身的力量來對付『自己的』工人；工人也沒有自己的工會，所以每個工廠的工人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誠然，各個地方社會民主黨組織曾領導過工人的經濟鬥爭，但大家都認為這種領導是薄弱的，帶偶然性的，因為當時社會民主黨組織甚至連黨內的事情都還沒有處理好。

一月經濟罷工是個轉折點。當時資本家手忙腳亂，於是就着手組織地方聯合會。彼得堡、莫斯科、華沙、里加和其他城市的資本家聯合會的組織就是由一月罷工促成的。至於石油業、錳礦業、煤炭業和糖業的資本家，則把自己原有的『和平的』聯合會變成了『鬥爭的』聯合會，並開始鞏固自己的陣地。但是資本家並不以此為滿足。他們決定成立全俄聯合會，於是在一九〇五年三月由莫羅佐夫發起，在莫斯科召開了全國代表大會。這是全俄資本家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他們成立了

協定，保證不經彼此協議不得對工人讓步，而「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則宣佈同盟歇業^①。從這時起，資本家和無產者的劇烈鬥爭就開始了。從這時起，俄國大規模的同盟歇業時期就開始了。嚴重的鬥爭需要有更緊密的聯合會，所以資本家決定再次集會，以便建立一個更緊密的聯合會。於是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三個月（一九〇五年七月），在莫斯科召開了全俄資本家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他們再次確認了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再次承認了同盟歇業的必要性，選出了一個常務局負責起草章程和籌備召開下屆代表大會。與此同時，這兩次代表大會的決議都已付諸實施了。事實說明，資本家是準確地執行這些決議的。如果回憶一下里加、華沙、敖德薩、莫斯科及其他大城市的資本家所宣佈的同盟歇業，如果回憶一下十一月間彼得堡的七十二個資本家以殘酷的同盟歇業手段來威嚇彼得堡二十萬工人的事實，——那末就容易了解，全俄資本家聯合會已是一支多麼巨大的力量，他們是多麼準確地執行自己的聯合會的決議。第二次代表大會後，資本家又召開了一次代表大會（一九〇六年一月），最後在今年四月間又舉行了全俄資本家聯合會成立大會，在這個大會上通過了統一的章程並選出了中央常務局。據報上消息，這個章程已由政府批准了。

由此可見，俄國大資產階級無疑地已組成一個單獨的階級了，它有自己的地方組織、區域組織和中央組織，它可以按照統一的計劃使全俄國的資本家行動起來。

① 同盟歇業是廠主的罷業。廠主爲了打破工人的反抗和拒絕工人的要求而故意關閉工廠。

降低工資，延長工作日，削弱無產階級的力量，破壞無產階級的組織，——這就是資本家總聯合會的目的。

同時，工人的工會運動也增長和發展起來了。一月經濟罷工（一九〇五年）在這方面也發生了影響。運動已具有羣衆性，它的要求擴大了。以後的事實說明，社會民主黨組織不能同時既做黨的工作又做工會工作。黨和工會需要有適當的分工。黨的工作必須由黨組織領導，工會工作則由工會領導。於是開始組織工會。在莫斯科、彼得堡、華沙、敖德薩、里加、哈爾科夫、梯弗里斯——到處都成立了工會。固然，反動勢力對此多方阻撓，然而運動本身的需要畢竟佔了上風，工會日益增多了。隨着地方工會的成立，不久就出現了區域的工會，最後在去年九月間召開了全俄工會代表會議。這是工會第一次代表會議。這次代表會議的成果之一，就是它使各個城市的工會彼此接近起來，而且終於選出了中央常務局去負責籌備召開全國工會代表大會。十月大罷工的時期到來了，於是工會組織大大加強起來。地方工會和區域工會日益發展。固然「十二月的失敗」明顯地阻礙了工會的建立，但是工會運動以後又恢復起來，並且進行得很順利，到今年二月就召開了工會第二次代表會議，其成分比第一次代表會議更爲廣泛，更爲全面。第二次代表會議認爲必須成立地方的、區域的和全俄的中心機關，選出了「籌備委員會」負責召集即將舉行的全俄代表大會，並通過了有關工會運動的迫切問題的決議。

由此可見，不管反動勢力怎樣囂張，無產階級無疑地也在組成一個單獨的階級，它在不倦地鞏固自己地方的、區域的和中央的工會組織，並且在不倦地努力把自已無數的弟兄團結起來反對資本公司。

提高工資，縮短工作日，改善勞動條件，制服剝削勢力和破壞資本家聯合會，——這就是工會的目的。

現代社會就這樣分裂成兩大陣營，每一陣營都組成單獨的階級，它們之間熾烈的階級鬥爭在日益加深和加劇，其餘一切集團都集合在這兩個陣營的周圍。

馬克思說過：任何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這就是說，今天無產者和資本家之間進行着經濟鬥爭，明天他們也不得不進行政治鬥爭，他們就這樣用雙重性的鬥爭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資本家有其私人的職業的利益。他們的經濟組織就是專為保證這些利益而存在的。但是，除了私人的職業的利益以外，他們還有共同的階級的利益，即鞏固資本主義制度。正是爲了這種共同利益，他們需要進行政治鬥爭和成立政黨。俄國資本家很簡單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們看見了唯一「公開大胆」保護他們利益的政黨是十月黨，所以就決定團結在這個黨的周圍，並服從它的思想領導。從那時起，資本家就在這個黨的思想領導下進行自己的政治鬥爭，利用這個黨來影響現在的政府（這個政府封閉工會，但同時却急忙地批准資本家聯合會的成立），把它的候選人選進杜馬，如此等等。

由此可見，依靠聯合會進行經濟鬥爭，在十月黨的思想領導下進行總的政治鬥爭，——這就是大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今天所採取的形式。

另一方面，現時在無產階級的階級運動中也可以看到同樣的情形。無產者爲了保護自己的職業的利益，就建立工會來爭取提高工資和縮短工作日等等。但是，除了職業的利益以外，無產者還有共

同的階級的利益，即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當無產階級作爲統一而不可分的階級還沒有奪到政治統治時，要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能的。這裏無產階級既需要政治鬥爭，也需要一個能對無產階級政治運動實行思想領導的政黨。當然，工會大半是非黨的和中立的組織。但這不過說明，它們只是財務上和組織上不依靠黨，就是說，它們有自己的基金會，有自己的領導機關，召開自己的代表大會，並在形式上不必服從某一政黨的決定。至於工會在思想上依靠某一政黨，那是絕對必要的，而且也不能不這樣，其原因之一就是參加工會的有各政黨的黨員，他們必然要把自己的政見帶進工會裏去。很明顯，既然無產階級不能不進行政治鬥爭，那它也就不能沒有某個政黨的思想領導。不但如此，無產階級自己還必須尋找一個足以引導它的工會走上「樂土」即走向社會主義制度的黨。然而在這方面無產階級應當隨時警惕，謹慎從事。它應當細心研究各個政黨的思想內容，不受約束地接受一個能勇敢地徹底地保護它的階級利益、能高舉無產階級的紅旗並大胆地把它引向政治統治、引向社會主義革命的政黨的思想領導。

到目前爲止，這種使命都是由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擔負的，所以工會的任務就是接受這個黨的思想領導。

大家知道，事實上也正是如此。

由此可見，依靠工會來進行經濟搏鬥，在社會民主黨的思想領導下進行政治衝擊，——這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今天所採取的形式。

毫無疑義，階級鬥爭將更加劇烈。無產階級的任務就是使自己的鬥爭成爲有系統有組織的鬥爭。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加強工會並且把它們統一起來，全俄工會代表大會在這方面一定能大有幫助。爲了使無產階級組成統一而不可分的階級，現在我們所需要的不是『非黨工人代表大會』，而是工會代表大會。同時無產階級應當把那個能對它的階級鬥爭實現思想政治領導的黨竭力鞏固和加強起來。

載於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新時代報』(七)創刊號

署名：柯……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工廠立法』和無產階級鬥爭

（關於十一月十五日頒佈的兩項法令）

有一個時期，我國工人運動是處於開始階段。那時無產階級分成各個集團，並沒有想到要進行共同的鬥爭。鐵路工人、礦山工人、工廠工人、手工業者、店員、辦事員，——這就是當時俄國無產階級所分成的那些集團。此外，每個集團的工人又分散在各個市鎮，他們彼此沒有任何聯系，既沒有黨的聯系，也沒有工會的聯系。這樣一來，就看不出無產階級是一個統一而不可分的階級。因而也看不出無產階級鬥爭是整個階級的進攻。這就說明爲什麼沙皇政府能安然地繼續其『祖傳』的政策。這就說明爲什麼當一八九三年有人把『工人保險法草案』提交國家參議院討論時，反動派的主謀人坡別多諾斯采夫就嘲笑該草案起草人，並神氣十足地宣稱：『先生們，何苦自找麻煩，你們可以放心：我們這裏並不存在着工人問題……』

但是，過了一些時候，經濟危機愈益迫近，罷工更爲頻繁，分散的無產階級也就逐漸組成統一的階級了。一九〇三年的罷工已經表明：『我們這裏』早就『存在着工人問題』。一九〇五年一、二兩月的

罷工第一次向全世界宣告；俄國無產階級作爲一個統一的階級，正在成長和壯大。最後，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二月的總罷工和一九〇六年六、七兩月的『照例的』罷工，事實上已使各城市的無產者互相接近，事實上已把店員、辦事員、手工業者、產業工人團結成一個統一的階級。這樣就向全世界大聲宣告：先前分散的無產階級的力量現在已走上團結的道路，並組成一個統一的階級了。作爲反對現存制度的無產階級總鬥爭手段的政治總罷工，在這裏也同樣顯示了力量……現在已無法否認『工人問題』的存在，沙皇政府已不得不重視這個運動了。於是在反動分子的辦公室裏開始成立各種委員會，制定『工廠法』草案；施德洛夫斯基委員會（С）、柯柯甫采夫委員會（С）、結社法（С）（見十月十七日『宣言』）、維特——杜爾諾沃訓令（С）、各種草案和計劃以及十一月十五日頒佈的關於手工業者和店員的兩項法令。

當運動還是軟弱無力的時候，當它還沒有帶羣衆性的時候，反動派對付無產階級只有一種手段，那就是監獄、西伯利亞、皮鞭和絞架。反動派隨時隨地都力求達到一個目的：把無產階級分裂成許多小小的集團，擊破無產階級的先進隊伍，脅迫中立的羣衆並把他們引誘到自己方面去，從而引起無產階級陣營內的混亂。我們看見，反動派靠着皮鞭和監獄曾經極順利地達到過這個目的。

但是當運動帶有羣衆性的時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現在反動派所碰到的已不只是一些『禍首』，現在站在他們面前的，已是具有浩大革命聲勢的不可勝數的羣衆了。所以他們應當重視的正是這種羣衆。而羣衆是不能盡行絞殺、盡行流放到西伯利亞、盡行投入監獄去的。用皮鞭抽打羣衆，對那基

礎早已動搖的反動派並不總是有利的。很明顯，除了舊的手段以外，還必須採取新的『較文明的』手段。在反動派看來，這種新手段會加深無產階級陣營中的意見分歧，引起落後工人的幻想，迫使他們放棄鬥爭並把他們聯合在政府的周圍。

『工廠立法』正是這樣一種新手段。

這樣，沙皇政府既不放棄舊的手段，同時又想利用『工廠立法』，就是說，想依靠皮鞭和法令來解決『迫切的工人問題』。它想用各種諾言，如縮短工作日，保護童工和女工的勞動，改善衛生條件，施行工人保險，廢除罰款制以及諸如此類的福利的諾言，來博得落後工人的信任，從而破壞無產階級的階級團結。沙皇政府清楚地知道，這種『活動』對它從沒有像現在這樣需要，因為在目前，十月總罷工已把各部門的無產者聯合起來並摧毀了反動勢力的根基，將來的總罷工可能變成武裝鬥爭而把舊制度推翻，所以反動派像需要空氣一樣，需要在工人陣營中造成混亂，贏得落後工人的信任並把他們引誘到自己方面去。

在這方面特別值得注意的一個事實就是：反動派十一月十五日頒佈的法令只照顧店員和手工業者，而同時却把產業無產階級最優秀的子弟投入監獄和拖上絞架。如果仔細考慮一下，也就不會覺得奇怪。第一、店員、手工業者和商業機關職員並不像產業工人那樣集中在大工廠裏，他們分散在各個小企業中，覺悟程度較低，因而他們比別人容易受騙。第二、店員、辦事員和手工業者在現時俄國的無產階級中佔相當大的數量，所以他們要是離開了戰鬥的無產者隊伍，就會大大削弱無產階級在日

前選舉中和將來發動時的力量。最後，大家知道，城市小資產階級在目前革命中的作用是不小的；大家知道，社會民主黨必須使城市小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革命化；大家同樣知道，手工業者、店員和辦事員比其餘的無產者更接近小資產階級，所以他們最能把小資產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去。很明顯，店員和手工業者離開無產階級，就會使小資產階級也離開無產階級，並使無產階級在城市中陷於孤立，而這正是沙皇政府求之不得的。由此就可明白，反動派制定只涉及手工業者、店員和辦事員的十一月十五日的法令，究竟爲了什麼目的。至於產業無產階級，反正是信任政府的，『工廠立法』對他們起不了什麼作用，也許只有槍彈才能開導他們。法令辦不到的事情，就得由槍彈來彌補！……

沙皇政府就是這樣想的。

但是，不僅我國政府是這樣想的，其他一切反無產階級的政府，——不管這個政府是封建專制的也能，資產階級君主制的也能，資產階級共和制的也能，——也是這樣想的。到處都利用槍彈和法令來和無產階級作鬥爭，並且在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爆發以前，在社會主義沒有建立以前，情形總是這樣的。請回憶一下立憲制的英國一八二四年至一八二五年的情形吧。那時一面在制定罷工自由法，一面監獄裏却關滿了罷工的工人。請回憶一下共和制的法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情形吧。那時一面在談論『工廠立法』，一面巴黎街頭却洒遍了工人的鮮血。回憶一下這些事實和許多其他類似的事實，你們就會知道，情形正是如此。

然而這並不是說無產階級不能利用此類法令。反動派頒佈『工廠法』時，固然有自己的計劃，——

他們想壓制無產階級，但是實際生活却步步破壞他們的計劃，在這種情況下，總會有一些有利於無產階級的條文夾進法令中去。其所以如此，是因為任何一項『工廠法』的出現，都不是沒有原因，沒有鬥爭的；在工人還沒有起來鬥爭以前，在政府還沒有感到必須滿足工人的要求以前，政府決不會頒佈任何『工廠法』。歷史表明每一『工廠法』頒佈以前都發生過局部罷工或總罷工。一八八二年六月法令（關於童工僱傭制、童工工作時間和施行工廠監督的法令）是同在在納爾瓦、皮爾姆、彼得堡、日拉爾多夫發生罷工以後頒佈的。一八八六年六月、十月頒佈的幾項法令（關於罰款、工資計算簿等等）是一八八五年至一八八六年間中部地區罷工的直接結果。一八九七年六月的法令（關於縮短工作日）是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六年間彼得堡罷工以後頒佈的。一九〇三年的法令（關於『企業主責任』和『廠內工頭』的法令）都是同年『南方罷工』的直接結果。最後，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的法令（關於縮短工作日以及關於店員、辦事員和手工業者星期日休息的法令）也是本年俄國各地六、七兩月罷工的直接結果。

由此可見，每一『工廠法』頒佈以前都發生過羣衆運動，羣衆終於使自己的要求得到了滿足，即使不是全部的滿足，至少也是部分的滿足。因此非常明顯，無論『工廠法』怎樣壞，其中總有一些條文可以被無產階級利用來加強自己的鬥爭。不用證明，無產階級應當抓住這些條文，利用它們作工具來更加鞏固自己的組織，比先前更有力地發動無產階級的鬥爭：爲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倍倍爾說得對：『必須用魔鬼的劍去砍掉魔鬼的頭。』……

在這方面，十一月十五日頒佈的兩項法令都很值得注意。當然那裏面有很多壞的條文，但同時也有一些是反動派不自覺地列入而無產階級應自覺地加以利用的條文。

例如這兩項法令雖然都叫做『勞動保護法』，但裏面列入了一些根本否定任何『勞動保護』，甚至連某些地方的老闆也不屑利用的壞透了的條文。雖然有很多地方已經廢除十二小時工作制而實行了十小時或八小時工作制，但這兩項法令却規定商業和手工業部門施行十二小時工作制。雖然幾乎到處都已廢除任何額外加工制，但這兩項法令却承認商店可以在四十天內，工廠可以在六十天內每天額外加工兩小時（十四小時工作制）。同時還承認老闆有權根據『和工人達成的協議』，即用強制工人的辦法延長額外工作時間，把工作日延長到十七小時等等。

當然，無產階級是絲毫也不會把已經爭得的權利讓給老闆的，所以上述法令中所說的廢話，始終不過是一些可笑的笑話罷了。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條文，無產階級可以好好地利用來鞏固自己的陣地。這兩項法令都說，凡每日工作時間超過八小時的地方必須給工作者兩小時午餐的時間，然而大家知道，現在手工業者、店員和辦事員並不是到處都可享受兩小時的休息的。這兩項法令同時還說，凡十七歲以下的青年，除這兩小時外，還有權每天離開商店或工廠三小時去上學。這對於我們的青年同志當然是一種很大的方便……

毫無疑問，無產階級一定會好好地利用十一月十五日日法令中的這種條文，一定會好好地加強自

已無產階級的鬥爭，並將再次向全世界證明：必須用魔鬼的劍去砍掉魔鬼的頭。

載於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四日

「新時代報」第四期

署名：柯……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八四）

現代社會生活的軸心是階級鬥爭。在這個鬥爭進程中，每個階級都以自己的思想體系為指南。資產階級有自己的思想體系，這就是所謂自由主義。無產階級也有自己的思想體系，大家知道，這就是社會主義。

決不能認為自由主義是什麼不可分割的整體：它適應着資產階級中各個不同的階層而分為各種不同的派別。

社會主義也不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它也包含各種不同的派別。

我們暫且不在本文內研討自由主義，最好等到以後再說。現在我們只想把社會主義及其各個派別向讀者介紹一下。在我們看來，這對讀者是更有意義的。

社會主義分成三個主要派別：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改良主義（伯恩施坦等人）認為社會主義不過是一個遙遠的目的而已，它事實上否認社會主義革命並企圖用和平手段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它宣傳的不是階級鬥爭而是階級合作，——這個改良主義一天天腐敗下去，一天天失去任何的社會主義標誌，所以我們認為在這幾篇闡述社會主義內容的論

文裏研究它是毫無必要的。

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現在它們兩者都被認為是社會主義派別，它們彼此間進行着激烈的鬥爭，它們都力圖向無產階級表明自己是真正社會主義的學說，所以把它們加以研究，加以對照，當然對讀者的意義要大得多。

我們不是那樣的人，一聽見有人提到『無政府主義』就輕蔑地轉過身去，把手一揮說：『你們何必理睬它，它是連談都不值得一談的！』我們認為這種沒有價值的『批評』既不莊重，又無益處。

我們也不是那樣的人，自己安慰自己說，無政府主義者『沒有羣衆，因而並不怎樣危險』。問題不在於今天有多少『羣衆』跟誰走，而在於學說的本質。如果無政府主義者的『學說』代表真理，那它自然會給自已開闢道路，把羣衆聚集在自己的周圍。如果它是沒有根據的，虛構的，那它就會維持不久，站不住腳。而無政府主義的沒有根據是應當加以證明的。

有些人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和無政府主義的原則是相同的，它們之間只有策略上的分歧，所以在這些人看來，把這兩個派別互相對立起來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我們認為無政府主義者是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的敵人。所以我們也就承認對真正的敵人要進行真正的鬥爭。因此，把無政府主義者的『學說』從頭到尾審察一下，並從各方面把它徹底衡量一番是必要的。

問題在於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原則上，雖然雙方登上鬥爭舞台時都舉着社會主義的旗幟。無政府主義以個人為基礎，認為解放個人是解放羣衆，解放集體的主要條件。在無政府主義看來，個人沒有解放以前，羣衆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它的口號是「一切爲了個人」。而馬克思主義則以羣衆為基礎，認為解放羣衆是解放個人的主要條件。這就是說，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羣衆沒有解放以前，個人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它的口號是「一切爲了羣衆」。

顯然，這是兩個互相否定的原則，而不只是策略上的分歧。

我們這幾篇論文的目的，是要把這兩個對立的原則加以對照，把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加以比較，從而闡明兩者的優點和缺點。同時我們認為必須在這裏先向讀者介紹一下這幾篇論文的梗概。

我們從敘述馬克思主義的特徵開始，附帶涉及無政府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看法，然後再來批評無政府主義本身。也就是說，我們將首先說明辯證方法，說明無政府主義者對於這個方法的想法和我們的批評意見，說明唯物主義理論、無政府主義者的觀點和我們的批評意見（這裏也將講到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專政、最低綱領並一般地講到策略）；說明無政府主義者的哲學和我們的批評意見，說明無政府主義者的社會主義和我們的批評意見，說明無政府主義者的策略和組織，最後則提出我們的結論。

我們將盡力證明：無政府主義者既是小村社的社會主義的鼓吹者，也就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我們也要盡力證明：無政府主義者既然否認無產階級專政，也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

現在我們就來講本題吧。

一 辯證方法

世界上的一切都在運動着…… 生活在變化着，

生產力在增長着，舊關係在破壞着。

——馬克思

馬克思主義不只是社會主義的理論，而且是一個完整的世界觀；是一個哲學體系；馬克思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就是從這個哲學體系中自然而然產生出來的。這個哲學體系叫做辯證唯物主義。

因此，闡明馬克思主義，也就是闡明辯證唯物主義。

為什麼這個體系叫做辯證唯物主義呢？

因為它的方法是辯證的，而理論是唯物的。

什麼是辯證方法呢？

有人說，社會生活處在不斷運動和不斷發展的狀態中。這是正確的：決不能認為生活是一種不變的和凝固的東西，它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它是處在永恆的運動中，處在永恆的破壞和創造過程中。因此，生活中總是有新東西和舊東西，生長着的東西和死亡着的東西，革命的東西和反革命的

東西。

辯證方法說：必須按生活的實在情形來考察生活。我們看到生活處在不斷的運動中，所以我們應當把生活當做動的東西來考察，並且要問：生活走向哪裏去？我們看到生活是一幅不斷破壞和創造的圖畫，所以我們應當把生活當做既破壞又創造的過程來考察，並且要問：生活中破壞的是什麼，創造的是什麼？

生活中新產生的、一天天成的東西是不可克服的，要阻止它的前進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說，例如無產階級，既然它作爲一個階級已在生活中產生並且一天天成長起來，那末不管它今天怎樣弱，怎樣小，歸根到底是會勝利的。爲什麼呢？因爲它在成長、壯大、前進。反之，生活中衰老的、走向墳墓的東西是必遭失敗的，哪怕它今天還顯得是一個強壯的力量。這就是說，例如資產階級，既然它在逐漸失去立足的基地，日益向後倒退，那末不管它今天還怎樣強，怎樣大，歸根到底是必遭失敗的。爲什麼呢？因爲它作爲一個階級已在腐朽、削弱、衰老而成爲生活中的累贅。

由此就產生了一個著名的辯證原理：凡是真正存在的東西，即日益成長的東西，都是合理的；凡是日益腐朽的東西，都是不合理的，因而是必遭失敗的。

舉一個例子來說。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在俄國革命知識分子中間發生了一場大爭論。當時民粹派硬說：能够担负起「解放俄國」這個任務的主要力量是鄉村和城市的小資產階級。馬克思主義者質問他們：爲什麼呢？民粹派說：因爲鄉村和城市的小資產階級現在佔大多數，而且他們的生活又窮

又苦。

馬克思主義者回答說：是的，鄉村和城市的小資產階級目前確實佔大多數，他們確實是窮，但問題難道在這裏嗎？小資產階級早已佔大多數，但直到今天，他們在爭取「自由」的鬥爭中，沒有無產階級的幫助，就沒有表現過任何的主動性，爲什麼呢？因爲小資產階級作爲一個階級不是在成長壯大，相反地，是在日益解體和分化爲資產者和無產者。另一方面，很明顯，窮在這裏並沒有什麼決定意義：「流浪漢」比小資產階級更窮，然而誰也不會說他們能擔負起「解放俄國」的責任。

由此可見，問題並不在於哪一個階級今天佔大多數，或者哪一個階級窮些，而在於哪一個階級在壯大，哪一個階級在解體。不能，由表而里，小資產階級，而在於哪一個階級在

既然無產階級是唯一的不斷成長和不斷壯大的階級，是唯一的將社會生活向前推進，把一切革命分子聚集在自己周圍的階級，那末我們必須承認它是現時運動中的主力，應該加入它的行列，把它的先進的願望當做自己的願望。

馬克思主義者就是這樣回答的。

顯然，馬克思主義者是辯證地觀察生活，而民粹派是形而上學地大發議論，把社會生活看成停滯不前的東西。

辯證方法就是這樣觀察生活發展的。

但是有各種各樣的運動。在社會生活中有過「十二月事變期間」的運動，那時無產階級挺起胸來，

襲擊軍械庫，進攻反動派。但是也必須把前幾年的運動叫做社會運動，那時無產階級在『和平』發展條件下只舉行過零星的罷工，只建立過小型的工會。

顯然，運動有各種不同的形式。

辯證方法說：運動有兩種形式，即進化的形式和革命的形式。

當進步分子自發地繼續進行自己的日常工作，使舊制度發生一些小的變化、量的變化的時候，運動就是進化的。

當這些進步分子聯合起來，抱着一個共同思想向敵人的營壘衝去，以期根本消滅舊制度，使生活發生質的變化即建立新制度的時候，運動就是革命的。

進化爲革命作準備，爲革命打下基礎，而革命則完成進化，促進進化的進一步發展。

自然界也有這樣的過程。科學史表明，辯證方法是真正科學的方法；從天文學直到社會學，到處都證實着這種思想：世界上沒有什麼永恆的東西，一切都在變化，一切都在發展。因而對於自然界的一切都應該從運動和發展的觀點去觀察。而這就是說，辯證法的精神貫穿着全部現代科學。

至於運動的形式，至於依據辯證法所說的小的變化、量的變化的歸根到底要引起大的變化、質的變化，那末這個規律在自然發展史中也是同樣有效的。門德列也夫的『元素週期系』清楚地表明，由量變而發生質變在自然發展史中有多麼大的意義。在生物學上，繼新達爾文主義而起的新拉馬克主義理論，也證明了這一點。

至於其他已由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書中十分詳盡地闡明了的各種事實，我們就不談了。辯證方法的內容就是如此。

*
無政府主義者是怎樣看辯證方法的呢？

大家知道，辯證方法的創始人是黑格爾。馬克思澄清了並改進了這個方法。當然，這種情況無政府主義者也是知道的。他們知道黑格爾是個保守主義者，於是一有機會就大罵黑格爾是『復辟主義』擁護者，他們拚命『證明』『黑格爾是復辟主義的哲學家……他讚美專制的官僚立憲制度，他的歷史哲學的總的思想是服從於和服務於復辟時代的哲學派別的』，以及如此等等（見『號召報』⁽¹⁾第六期車爾凱茲施維里的論文）。

有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在自己的著作中也『證明』這一點（見他用俄文發表的『科學和無政府主義』）。

我們的克魯泡特金派，從車爾凱茲施維里一直到沙·哥·都異口同聲地附和克魯泡特金（見『號召報』）。

其實，誰也不和他們爭論這一點，恰恰相反，每個人都同意黑格爾不是革命家。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比誰都早地在『批判的批判之批判』一書中證明過：黑格爾的歷史觀點是和人民專制根本矛盾的。雖然如此，但無政府主義者還是要『證明』並且認為必須每天『證明』黑格爾是『復辟主義』擁護

者。他們爲什麼這樣做呢？大概想用這一切來破壞黑格爾的威信，使讀者覺得『反動分子』黑格爾的方法也不能不是『令人厭惡的』和『非科學的』吧。

無政府主義者想用這種手段來駁倒辯證方法。

我們說：他們用這種手段除了證明自己愚昧無知而外，是什麼也證明不了的。巴斯噶和萊布尼茨不是革命者，但他們所發現的數學方法現在被公認爲科學方法了。邁爾和赫爾姆霍茨不是革命者，但他們在物理學方面的發現成了科學的基礎。拉馬克和達爾文也不是革命者，但他們的進化論方法使生物科學站住了腳……爲什麼不能承認黑格爾雖是保守主義者，但正是他黑格爾創造出了叫做辯證法的科學方法這一事實呢？

不，無政府主義者用這種手段除了證明自己愚昧無知而外，是什麼也證明不了的。

繼續講下去吧。在無政府主義者看來，『辯證法就是形而上學』，他們既然『想把科學從形而上學桎梏下解放出來，想把哲學從神學桎梏下解放出來』，所以他們就駁斥辯證方法了（見『號召報』第三期和第九期沙·哥·的論文。又見克魯泡特金『科學和無政府主義』）。

咳，這夥無政府主義者！真是『嫁禍於人』。辯證法是在和形而上學的鬥爭中成熟的，它在這個鬥爭中博得了光榮，而無政府主義者認爲辯證法就是形而上學！

辯證法說，世界上沒有什麼永恆的東西，世界上一切都是暫時的，變動的，自然界在變化，社會在變化，風俗習慣在改變，正義的概念在改變，真理本身也在改變，——正因爲如此，辯證法對一切

都採取批判的態度，正因為如此，它否認「一成不變的真理，因而也否認抽象的」——經發現後就只須熟讀死記的教條」（見恩格斯「費爾巴哈論」）（同上）。

形而上學向我們說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套。在形而上學看來，世界是一種永恆不變的東西（見恩格斯「反杜林論」），它是由某個人或某種東西永遠確定了的，所以形而上學者一開口就是「永恆的正義」和「不變的真理」。

無政府主義者的「始祖」蒲魯東說：世界上存在着一成不變的正義，這種正義應當成為未來社會的基礎。因此蒲魯東被稱為形而上學者。馬克思藉助辯證方法和蒲魯東作鬥爭，並證明說：既然世界上一切都在變化，那末「正義」也一定要變化，因而「不變的正義」只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藝語（見馬克思「哲學的貧困」）。形而上學者蒲魯東的格魯吉亞的門徒却一味向我們重複說：「馬克思的辯證法就是形而上學！」

形而上學承認各種含糊不清的教條，例如所謂「不可認識的東西」和「自在之物」，歸根到底也就變為毫無內容的神學。與蒲魯東和斯賓塞相反，恩格斯藉助辯證方法來反對這些教條（見「費爾巴哈論」）。而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和斯賓塞的門徒向我們說：蒲魯東和斯賓塞是科學家，而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形而上學者！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無政府主義者自己騙自己，或者是他們不知道自己說的是什麼。但是有一點是毫無疑義的，那就是無政府主義者把黑格爾的形而上學體系和他的辯證方法混為

一談。

不用說，以永恆觀念爲依據的黑格爾哲學體系，徹頭徹尾是形而上學的。但是同樣很明顯，否定任何永恆觀念的黑格爾辯證方法，却徹頭徹尾是科學的和革命的。

正因爲如此，所以馬克思給黑格爾的形而上學體系以致命的批判，同時又稱讚黑格爾的辯證方法，認爲他的辯證方法『在任何東西面前都不低頭，在本質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見『資本論』第一卷的跋）。

正因爲如此，所以恩格斯認爲黑格爾的方法和黑格爾的體系有很大的區別。『特別重視黑格爾體系的人可能在這兩方面都很保守。而把辯證方法當做主要東西看待的人在政治方面和宗教方面而都能持最極端的反對立場。』（見『費爾巴哈論』）

無政府主義者看不出這種區別，却一味輕率地重複說：『辯證法就是形而上學。』

我們再往下講吧。無政府主義者說：辯證方法是『詭計』、『詭辯方法』、『邏輯的翻筋斗』（見『號召報』第八期沙·哥·的論文），『利用這個方法可以同樣容易地證明一個東西既是真的又是假的』（見『號召報』第四期車爾凱茲施維里的論文）。

這樣，在無政府主義者看來，辯證方法能同樣證明一個東西既是真的又是假的。

初看起來，也許覺得無政府主義者的責難不無根據。現在請聽聽恩格斯論到形而上學方法信奉者的時候所說的話吧：

「……他們的說法：『是就是，非就是非，除此以外，都是鬼話。』在他們看來，一個事物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一個東西決不能同時既是它自身又是別的什麼東西；肯定和否定是絕對互相排斥的……」（見『反杜林論』引言）

無政府主義者狂叫道：『怎麼能够這樣呢！難道同一個東西能够同時既是好的又是壞的嗎？！這是『詭辯』呵，這是『玩弄字眼』呵，這就是說，『你們想同樣容易地證明一個東西既是真的又是假的』呵！……』

然而，我們且思索一下問題的本質吧。

今天我們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國。我們能不能說民主共和國在各方面都好或是在各方面都壞呢？不，不能這樣說！爲什麼呢？因爲民主共和國只有從一方面看，即當它破壞封建制度的時候，才是好的，而從另一方面看，即當它鞏固資產階級制度的時候，却是壞的。因此我們說：民主共和國既然破壞封建制度，所以它是好的，我們就要爲它而奮鬥；但是民主共和國既然鞏固資產階級制度，所以它是壞的，我們就要和它作鬥爭。

由此可見，同一個民主共和國同時既『好』又『壞』，既『是』又『非』。

關於八小時工作制也可以這樣說，它在同一時候既然加強無產階級，所以是『好的』；既然鞏固僱傭勞動制度，所以又是『壞的』。

恩格斯用上面引證的那段話來描述辯證方法特徵的時候，正是指這樣的事實。

無政府主義者不了解這一點，所以他們覺得這個十分清楚的思想是一種含糊不清的「詭辯」。

無政府主義者看見或看不見這些事實，當然可以隨心所欲，他們甚至在沙岸上也看不見沙子，——這是他們的權利。但這和辯證方法有什麼關係呢，辯證方法和無政府主義相反，不是閉上眼睛看生活，而是感覺到生活的脈搏，並且直率地說：既然生活總在變化，總在運動，那末任何一種生活現象都有兩種趨勢，即肯定的趨勢和否定的趨勢，我們應當維護前一種趨勢，反對後一種趨勢。我們再往下說吧。在我們的那些無政府主義者看來，「辯證的發展是毀滅性的發展，由於這種發展，首先是過去的一切消滅乾淨，然後是將來的一切另行確立起來……居維葉的激變是由一些不知道的原因引起的，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毀滅則是由辯證法產生的」（見『號召報』第八期沙·哥·的論文）。

同一個作者又在另一個地方寫道：「馬克思主義是依據達爾文主義，並對它採取不批判的態度。」（見『號召報』第六期）

請注意一下！

居維葉否認達爾文的進化，只承認激變，而激變是『由一些不知道的原因引起的』突然爆發。無政府主義者說：馬克思主義者附和居維葉，因而是排斥達爾文主義的。

達爾文否認居維葉的激變，承認逐漸的進化。於是那些無政府主義者又說，『馬克思主義是依據達爾文主義，並對它採取不批判的態度』，就是說，馬克思主義者否認居維葉的激變。

一句話，無政府主義者一面責備馬克思主義者附和居維葉，同時又指摘他們附和達爾文而不附和居維葉。

這才真是無政府狀態！這真是下士的老婆自己揍自己^①！顯然，『號召報』第八期上的沙·哥·忘記了第六期上的沙·哥·說的話。

究竟哪一期說得對？是第八期還是第六期呢？

讓我們看看事實吧。馬克思說：

『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便和現存生產關係或不過是現存生產關係在法律上的表現的財產關係發生矛盾……那時社會革命時代就到來了。』但是，『不論哪種社會形態，當從它這裏獲得充分發展餘地的一切生產力還沒有展開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註〕）

如果把馬克思這個論點應用到現代社會生活中去，那就可以看出具有社會性的現代生產力和具有私人性的產品佔有形式之間存在着根本的衝突，而這個衝突是一定要由社會主義革命來結束的（見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三編第二章）。

由此可見，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見，革命並不是由居維葉所說的『不知道的原因』產生的，而是由那些叫做『生產力的發展』的完全確定的和極端重大的社會原因產生的。

由此可見，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見，革命只有在生產力足夠成熟的時候才會發生，而並不是

像居維葉所想的那樣突如其來的。

很明顯，居維葉的激變和馬克思的辯證方法之間是沒有絲毫共同點的。

另一方面，達爾文主義不僅擠斥居維葉的激變，而且擠斥包括革命在內的、按辯證法來了解的發展，但從辯證方法觀點看來，進化和革命、量變和質變乃是同一運動的兩個必要形式。

看來也決不能斷言「馬克思主義……對達爾文主義採取不批判的態度」。

這樣，「號召報」在前後兩種場合，即無論在第六期或第八期，都弄錯了。

最後，無政府主義者責備我們說，「辯證法……並不使人有可能翻來翻去、跳躍自如」（見「號召報」第八期沙·哥·的論文）。

可敬的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這完全是真話，諸位在這裏說得十分對，辯證方法確實不使人有這種可能。但是，爲什麼不使人有這種可能呢？因爲「翻來翻去、跳躍自如」是野羊的消遣，而辯證方法是供人使用的。

秘密就在這裏！……

一般說來，無政府主義者對於辯證方法的看法就是如此。

很明顯，無政府主義者沒有懂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證方法，他們虛構了自己的辯證法，並且正是這樣無情地和自己的這套辯證法進行鬥爭。

我們聽見這種情景只能付之一笑，因爲看到一個人和自己的幻想作鬥爭，粉碎自己的虛構，同時

却竭力要別人相信他在打擊敵人，這是不能不令人發笑的。

二 唯物主義理論

『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馬克思

我們已經認識了辯證方法。

什麼是唯物主義理論呢？

世界上的一切都在變化，生活中一切都在發展，但這種變化是怎樣發生的呢，這種發展採取的是什麼形式呢？

例如我們知道，地球原來是熾熱的熔漿，後來逐漸冷卻，然後生出植物和動物，隨着動物界的進化出現了一種猿猴，最後才出現了人類。

一般說來，自然界的發展情形就是如此。

同時我們又知道，社會生活也不是停滯不前的。有過一個時期，人們過着原始共產主義的生活，靠原始的狩獵維持生存，出沒於森林，尋找食物。後來原始共產主義爲母權制所代替，這時人們主要

靠原始農業來滿足自己的需要。接着母權制爲父權制所代替，這時人們主要靠牧畜業維持生存。然後父權制爲奴隸制所代替，這時人們已靠較爲發達的農業來維持生存了。在奴隸制度之後出現了農奴制度，最後就出現了資產階級制度。

一般說來，社會生活的發展情形就是如此。

是的，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但這種發展的經過是怎樣的，是意識引起『自然』和『社會』的發展呢，或者相反，是『自然』和『社會』的發展引起意識的發展？

唯物主義理論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

有些人說，在『自然』和『社會生活』出現以前就有世界觀念，以後這種世界觀念成了它們發展的基礎，所以『自然』現象和『社會生活』現象的發展，可以說是世界觀念的發展的外在形式或簡單表現。

例如唯心主義者的學說就是如此，後來唯心主義者分成了幾派。

另外一些人說，世界上一開始就存在着兩種互相否定的力量：觀念和物質，意識和存在；與此相應，各種現象也分爲兩類：觀念的和物質的；這兩類現象互相否定，彼此鬥爭，所以自然和社會的發展就是觀念的現象和物質的現象之間的經常的鬥爭。

例如二元論者的學說就是如此，後來二元論者也像唯心主義者一樣分成了幾派。

唯物主義的理論既根本否定二元論，也根本否定唯心主義。

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當然，世界上存在着觀念的現象和物質的現象，但這決不是說，它們似乎是互相否定的。恰恰相反，觀念的方面和物質的方面是同一個自然或社會的兩種不同的形式，決不能把它們看做不相依存的東西；它們共同存在，共同發展，因而我們沒有任何根據設想它們是互相否定的。

由此看來，所謂二元論是沒有根據的。

統一而不可分的自然表現在物質的和觀念的兩種不同的形式上；統一而不可分的社會生活也表現在物質的和觀念的兩種不同的形式上，——我們應該這樣去看自然和社會生活的發展。

唯物主義理論的一元論就是如此。

同時，唯物主義理論也否定唯心主義。

認為觀念方面以至整個意識的發展彷彿先於物質方面的發展，這是不正確的。世界上還沒有生物的時候，所謂外部的、『無生命的』自然就已經存在了。第一個生物是沒有任何意識的，它僅僅具有感受刺激的性能和感覺的萌芽。以後動物的感覺能力漸漸發展，隨着動物的有機體構造和神經系統的發展而慢慢轉化為意識。如果猿猴總是用四隻腳行走，如果它沒有直起身子，那末它的後代（即人類）就不能自由地利用自己的肺和聲帶，因此也就不能說話，而這種情形就會根本阻滯人類意識的發展。還有，如果猿猴沒有用後面兩隻腳站起來，那末它的後代（即人類）也就不能不總是用四隻腳行走，總是向下方看並從下方攝取印象，也就沒有可能向上方看，向四周看，因而也就沒有可能使自己的頭腦獲得的印象較四腳動物為多。這一切就會根本阻滯人類意識的發展。

由此可見，爲了意識的發展，就需要有機體的某種構造及其神經系統的發展。

由此可見，物質方面的發展，外部條件的發展，先於觀念方面的發展，先於意識的發展；首先是外部條件發生變化，首先是物質方面發生變化，然後意識、觀念方面才相應地發生變化。

這樣一來，自然發展史就根本粉碎了所謂唯心主義。

關於人類社會發展史也應該這樣說。

歷史表明：各種不同時代的人們之所以抱有各種不同的思想和願望，是由於人們在不同的時代用不同的方式和自然作鬥爭以求滿足本身的需要，與此相適應，他們的經濟關係也按各種不同的方式形成起來。有一個時期，人們在原始共產主義的基礎上共同和自然作鬥爭，當時他們的所有制也是共產主義的，因而他們幾乎不分『我的』和『你的』，他們的意識是共產主義的。後來生產中浸透了『我的』和『你的』之間的分別，於是所有制也就具有了私有性，即個人主義的性質，人們的意識中也就浸透了私有感。到了現在這個時期，生產又具有社會性，因而所有制也將很快地具有社會性，正因為如此，人們的意識也就逐漸浸透着社會主義思想。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假定有一個鞋匠開了一個小鞋舖，因為競爭不過大廠主，結果只好關門，到梯弗里斯皮鞋工廠老闆阿德里漢諾夫那裏當僱傭工人去。他進阿德里漢諾夫的工廠，並不是想永遠當個僱傭工人，而是想積些錢，湊一筆資本，再開自己的鞋舖。可見這個鞋匠的地位雖然已經是無產階級的地位，但他的意識暫時還不是無產階級的意識，而是徹頭徹尾的小資產階級意識。換句話

說，這個鞋匠的小資產階級地位已經消失，再也不存在了，然而他的小資產階級意識還沒有消失，他的意識落後於他的實際地位。

很明顯，就是在這裏，在社會生活中，也首先是外部的條件發生變化，首先是人們的地位發生變化，然後人們的意識才相應地發生變化。

我們還是回頭講我們那位鞋匠吧。我們已經知道，他打算積些錢，再開自己的鞋舖。這個無產階級化了的鞋匠工作了一個時期就感覺到積些錢是一件很難的事，因為領到的工資只够勉強維持生活。而且他又看到開個舖子並不是那樣吸引人：要付房租、顧客刁難、手頭無錢、大廠主的競爭以及諸如此類的種種麻煩，——多少令人操心的事在折磨一個開小舖子的鞋匠。而無產者可以少操這種心，既沒有顧客的麻煩，也不必耽心房租，早晨去上工，晚間『安心地』下工，星期六也同樣安心地把『工錢』裝進口袋。我們這位鞋匠的小資產階級的夢想就在這裏受到了第一次打擊，在他的心坎中就初次產生出無產階級的意向。

過了一些時候，我們這位鞋匠覺察到：領到手的錢連買最必需的東西也不够，增加工資對於他是極端重要的。同時他又發現他的工友們在談論着什麼工會和罷工。我們這位鞋匠在這裏意識到：要改善自己的地位，就必須和廠主作鬥爭，而不是開自己的鞋舖。他加入工會，參加罷工運動，並且很快就開始接受社會主義思想了……

這樣，鞋匠的意識終於隨着他的物質地位的變化而變化了：首先是他的物質地位發生了變化，然

後經過一些時間，他的意識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

關於各個階級和整個社會也必須這樣說。

在社會生活中，也首先是外部條件發生變化，首先是物質條件發生變化，然後人們的思維、人們的風俗習慣、人們的世界觀也相應地發生變化。

因此馬克思說：

『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如果我們把物質方面、外部條件、存在以及諸如此類的現象叫做內容，那末我們就可以把觀念方面、意識以及諸如此類的現象叫做形式。由此就產生了一個著名的唯物主義原理：在發展過程中，內容先於形式，形式落後於內容。

因為在馬克思看來，經濟發展是社會生活的『物質基礎』，是它的內容，而法律、政治的和宗教、哲學的發展是這個內容的『思想形式』，是它的『上層建築』，所以馬克思作出結論說：『隨着經濟基礎的改變，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會相當迅速地發生變革。』

當然，這決不是說在馬克思看來，彷彿沒有形式的內容是可能的，像沙·哥·夢見的那樣（見『號召報』創刊號『一元論批判』一文）。沒有形式的內容是不可能的，但是問題在於這種或那種形式因落後於自己的內容，始終不能完全適合於這個內容，於是新的內容『不得不』暫時包藏在舊的形式中，因而引起它們之間的衝突。例如現在具有私人性的產品佔有形式不適合於生產的社會內容，而現代

的社會「衝突」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發生的。

另一方面，認為意識是存在的形式，這並不是說，彷彿意識按其本性說來也是一種物質。只有庸俗的唯物主義者（如布赫納爾和摩萊蕭特）才這樣想，他們的理論和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是根本矛盾的。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論」中很公允地嘲笑過他們。按照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說來，意識和存在、觀念和物質，這是一般稱為自然或社會的同一現象的兩種不同形式。所以它們既不互相否定，也不是同一現象。問題只在於在自然和社會的發展中，在意識（我們頭腦中發生的東西）產生以前，總是有相應的物質變化（我們身外發生的東西）出現；隨着某種物質變化之後，遲早一定會有相應的觀念變化。

有人會向我們說：很好，這就自然和社會的歷史說來也許是正確的。但是，現在我們頭腦中各種各樣的觀念和思想又是怎樣產生的呢？所謂外部條件是否實際存在，或者存在的只是我們關於這些外部條件的觀念呢？如果外部條件存在，那末可以感覺和認識它們的程度又是怎樣的呢？

關於這一點，唯物主義理論說道：我們的觀念，我們的「我」之所以存在，只是因為使我們的「我」發生印象的外部條件存在的緣故。誰要是輕率地斷定說，除了我們的觀念以外什麼都不存在，誰就不得不否認任何外部條件的存在，因而也就否認其餘一切人的存在，而只承認自「我」的存在，但這種

○ 這並不與認為形式和內容間存在着衝突的意見相矛盾，問題在於這種衝突不是存在於一般內容和形式之間，而是存在於舊形式和新內容之間，因為新內容尋求新形式，並且趨向於新形式。

觀點是荒誕無稽而和科學原理根本矛盾的。

顯然，外部條件是確實存在的，這些條件存在於我們未生之前，也將存在於我們已死之後，並且它們愈是頻繁而強烈地影響我們的意識，我們就愈能容易地感受和認識它們。

至於現在我們頭腦中各種各樣的觀念和思想是怎樣產生的，那我們應當指出，這裏也是簡略地重複着自然歷史和社會歷史中所發生的那種情形。在這種場合，我們身外的對象也是先於我們關於這個對象的觀念而存在的；在這種場合，我們的觀念即形式也落後於對象，即落後於自己的內容。如果我望着樹，就看見了樹，這只是表明，在我的頭腦中還沒有產生樹的觀念以前，樹本身就已存在，樹使我產生了相應的觀念……

扼要說來，馬克思唯物主義理論的內容就是如此。

不難了解，唯物主義理論對於人們的實際活動該有多麼重大的意義。

既然首先是經濟條件發生變化，然後是人們的意識相應地發生變化，那就很明顯，我們要探求某種理想的根據，就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去探求，不應當在他們的幻想中去探求，而應當在他們所處的經濟條件的發展中去探求。只有依據對經濟條件的研究而創造出來的理想才是好的，才是可以接受的。一切不顧及經濟條件、不以經濟條件的發展為依據的理想都是壞的，都是不能接受的。

這就是唯物主義理論的第一個實際結論。

既然人們的意識、人們的風俗習慣是由外部條件決定的，既然法律形式和政治形式的不適用是

決定於經濟內容的，那就很明顯，我們應當促進經濟關係的根本改造，以便使人民的風俗習慣及其政治制度也隨之根本改變過來。

以下就是馬克思關於這一點所說的話：

『並不需要多大的聰明就可以看出……唯物主義學說和社會主義之間的聯系。如果人是從感性世界吸取自己的一切知識、感覺等等……那就必須這樣安排周圍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體驗到真正合乎人性的東西，使人在其中習慣於養成人的特性……如果從唯物主義的意義上來說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說，如果人不是由於有避免某種事物的消極力量，而是由於有表現本身真正個性的積極力量才是自由的，那就不應懲罰個別分子的犯罪行為，而應消滅犯罪行為的反社會的根源……如果人的性格是由環境造成的，那就必須使環境成為合乎人性的環境。』（見『費爾巴哈論』的附錄：『馬克思論十八世紀法國唯物主義』）（△△）

這就是唯物主義理論的第二個實際結論。

*

*

*

無政府主義者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義理論的看法是怎樣的呢？

如果說辯證方法導源於黑格爾，那末唯物主義理論就是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發展。這是無政府主義者所熟知的，於是他們就企圖利用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兩人的缺陷來糟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證唯物主義。關於黑格爾和辯證方法，我們已經指出：無政府主義者玩弄這種詭計，不過證明他們自

己的愚昧無知罷了。關於他們對費爾巴哈和對唯物主義理論的攻擊也必須這樣說。

例如無政府主義者剛愎自用地向我們說：『費爾巴哈是個汎神論者……』他『把人神化了……』（見『號召報』第七期傑連吉的論文）『在費爾巴哈看來，人就是他所吃的那種東西……』似乎馬克思由此作出了結論：『因此，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是經濟地位……』（見『號召報』第六期沙·哥·的論文）誠然，費爾巴哈是個汎神論者，他把人神化了，同時還犯了其他類似的錯誤，這是誰也不懷疑的。恰恰相反，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揭露了費爾巴哈的錯誤。但無政府主義者還是認為必須把已經揭露的錯誤再『揭露』一次。為什麼呢？大概因為他們想在痛罵費爾巴哈的時候，間接地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義理論也糟蹋一番。當然，我們要是大公無私地觀察問題，那我們也許就會看到：費爾巴哈除了有不正確的思想外，還有一些正確的思想，正如歷史上的許多學者那樣。然而無政府主義者還是要繼續『揭露』……

我們再一次聲明：他們玩弄這種詭計不過證明他們自己的愚昧無知罷了。

很有趣的一點（這一點我們在下面就可看到）是無政府主義者對唯物主義理論毫無認識，竟想憑道聽途說妄加批評。因此他們往往互相矛盾，互相駁斥，這當然就使我們的『批評家』陷於可笑的地步。例如，假若聽信車爾凱茲施維里先生的話，那末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憎惡一元論的唯物主義的了，他們的唯物主義就是庸俗的而不是一元論的了。他說：

『自然科學家的那種具有進化論體系、變遷說和一元論唯物主義思想的偉大科學，即恩格斯極其

憎惡的科學……是避開了辯證法的」等等（見『號召報』第四期車爾凱茲施維里的論文）。

這樣說來，車爾凱茲施維里所贊同而為恩格斯所『憎惡』的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是一元論的唯物主義，因而是值得贊同的，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義却不是一元論的唯物主義，因而顯然是不值得承認的。

但是另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義是一元論的唯物主義，因而是應該擯棄的。他說：

『馬克思的歷史觀點是黑格爾隔代遺傳的東西。一般地說，絕對客觀主義的一元論唯物主義，其中也有馬克思的經濟一元論，在自然界中是不可能的，在理論上是錯誤的……一元論唯物主義乃是一種掩飾不周的二元論，並且是形而上學和科學之間的妥協……』（見『號召報』第六期沙·哥·的論文）

這樣說來，一元論的唯物主義是不可接受的東西，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憎惡它，恰恰相反，他們自己就是一元論的唯物主義者，因此一元論的唯物主義是應該擯棄的。

真是各人唱各人的調子！你去分辨一下看，誰說得對，是前者還是後者！他們彼此之間對於馬克思唯物主義的優點或缺點的問題還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他們自己還不懂得這個唯物主義是不是一元論的唯物主義，他們自己還沒有弄清楚比較可以接受的是庸俗唯物主義還是一元論的唯物主義，就大吹大擂地說：我們把馬克思主義粉碎了！

是的，是的，如果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今後還是這樣彼此拚命粉碎對方的觀點，那末不用說，末來是要屬於無政府主義者的了……

另一件同樣可笑的事實就是某些『有名的』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大名鼎鼎』，但對於科學中各種不同的派別還沒有初步的認識。他們原來不知道科學中有各種各樣的唯物主義，不知道各種唯物主義彼此間有很大的區別，例如有否認觀念方面的意義及其對物質方面的影響的庸俗唯物主義，也有科學地考察觀念方面和物質方面相互關係的所謂一元論的唯物主義，即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理論。而無政府主義者把這種種不同的唯物主義混爲一談，甚至看不見它們之間有顯著的差別，同時却又神氣十足地聲稱：我們讓科學復活起來了！

例如克魯泡特金在他的『哲學』著作中自信地宣稱共產主義的無政府主義是以『現代唯物主義哲學』爲根據的，但是他却没有用片紙隻字來說明共產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究竟根據哪一種『唯物主義哲學』：是根據庸俗的或一元論的，還是其他的什麼『唯物主義哲學』。他大概不知道各種唯物主義派別間存在着根本的矛盾，他不懂得把這些派別混爲一談並不是『讓科學復活起來』，而是表現出十足的愚昧無知（見克魯泡特金『科學和無政府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及其哲學』）。

關於格魯吉亞的那些克魯泡特金信徒也必須這樣說。請聽吧：

『在恩格斯看來，以及在考茨基看來，馬克思對人類的巨大貢獻，在於他……』也發現了『唯物主義的學說。這種意見是否正確呢？我們認爲是不正確的，因爲我們知道……凡認爲社會機構彷彿是

受地理條件、氣候和地球轉動條件、宇宙條件、人類進化條件和生物條件推動的歷史家、科學家和哲學家，全是唯物主義者」（見『號召報』第二期）。

這樣說來，亞里士多德的『唯物主義』和霍爾巴赫的『唯物主義』之間，或者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和摩萊蕭特的『唯物主義』之間，是沒有任何區別的了！這算什麼批評！具有這樣的認識的人居然也想來革新科學！俗語說得好：『皮匠做肉包，真是糟糕！……』

其次，我們那些『有名的』無政府主義者不知在什麼地方聽說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理論就是『填胃的理論』，於是責備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說：

『在費爾巴哈看來，人就是他所吃的那種東西。這個公式迷住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以馬克思作出結論說，『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是經濟地位，是生產關係……』接着，無政府主義者就用哲學家的口吻教訓我們說：『如果吃飯和經濟生產是達到這個目的（社會生活）的唯一手段，那就錯了……如果思想體系主要地、一元地由吃飯和經濟地位來決定，那末某些饕餮之徒就會是天才人物了。』（見『號召報』第六期沙·哥·的論文）

你看，要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義駁倒，原來多麼容易呵。只須從某個貴族女學生那裏聽到一些誹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街談巷議，只須用哲學家的武斷的口吻把這些街談巷議在什麼『號召報』上重複一下，就能馬上博得批評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頭銜了！

但是，請諸位先生告訴我們吧：究竟何時、何地、在哪個行星上，有哪個馬克思說過『吃飯決定思

想體系」呢？爲什麼你們沒有從馬克思著作中引出一句話或一個字來證實你們這種論調呢？誠然，馬克思說過，人們的經濟地位決定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思想，可是誰向你們說過吃飯和經濟地位是同一種東西呢？難道你們不知道，像吃飯這樣的生理現象是和人們經濟地位這種社會現象根本不同的嗎？要是有某個貴族女學生把這兩種不同的現象混爲一談，那還情有可原，但是你們這些「社會民主黨的摧毀者」和「科學的復活者」，怎麼會如此漫不經心地重複着貴族女學生的錯誤呢？

而且吃飯又怎能決定社會思想體系呢？請考慮一下你們自己所說的話吧：吃飯和吃飯的形式是不變的，人們吃飯、咀嚼和消化食物古今都是一樣的，而思想體系始終在變化。例如古代的思想體系、封建的思想體系、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以及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這也就是思想體系的幾種形式。難道可以設想不變的東西能決定經常變化的東西嗎？

我們再往下講吧。在無政府主義者看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也就是平行主義……』或者說：『一元論唯物主義乃是一種掩飾不周的二元論，並且是形而上學和科學之間的妥協……』馬克思之所以陷入二元論，是因為他把生產關係說成物質現象，而把人們的意向和意志說成雖然存在但沒有意義的幻想和空想。』（見『號召報』第六期沙·哥·的論文）

第一、馬克思的一元論唯物主義是和糊塗的平行主義毫無共同之處的。從這個唯物主義的觀點看來，物質方面（內容）必然先於觀念方面（形式）。平行主義却駁斥這個觀點並堅決宣稱物質方面和觀念方面沒有先後之分，它們兩者是一道地、平行地發展的。

第二、即使實際上『馬克思把生產關係說成物質現象，而把人們的意向和意志說成沒有意義的幻想和空想』，難道這就表明馬克思是二元論者嗎？大家知道，二元論者是把觀念方面和物質方面作為兩個對立的原則而認為它們有同等意義的。但是，如果據你們所說馬克思是偏重物質方面而把觀念方面看做沒有意義的『空想』，那末你們這班『批評家』先生們又是從哪裏弄出馬克思的二元論來的呢？

第三、連小孩子也知道一元論從一個原則出發，即從具有物質形式和觀念形式的自然或存在這個原則出發，而二元論則從兩個原則出發，即從物質和觀念這兩個按二元論說來是互相否定的原則出發，那末唯物主義一元論和二元論之間又能有什麼聯系呢？

第四、馬克思什麼時候『把人們的意向和意志說成空想和幻想』呢？的確，馬克思曾用經濟的發展來說明『人們的意向和意志』，並且把某些書獃子的不適合於經濟環境的意向叫做空想。難道這能表明馬克思認為人的意向一般地是空想嗎？難道這還需要說明嗎？真的你們不知道馬克思說過『人類始終只會提出自己所能解決的任務』（見『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話，即一般說來，人類並不追求空想的目的。很明顯，我們這位『批評家』不是不了解他自己所說的話，就是有意歪曲事實。

第五、誰告訴你們說似乎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人們的意向和意志是沒有意義的』呢？為什麼你們不指明他們在什麼地方說過這一點呢？難道馬克思在『拿破崙第三政變記』、『法蘭西階級鬥爭』、『法蘭西內戰』及其他小冊子中沒有說過『意向和意志』的意義嗎？如果馬克思不承認『意向和意志』

的意義，那他爲什麼又努力用社會主義精神來發展無產者的『意志和意向』，他爲什麼又在無產者中間進行宣傳呢？再者，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四年間發表的一些著名論文中說的不是『意志和意向的意義』，又是什麼呢？誠然，馬克思認爲人們的『意志和意向』是從經濟地位中吸取本身的內容，然而，難道這就是說『意志和意向』絲毫不影響經濟關係的發展嗎？難道無政府主義者真是這樣難於了解這一簡單的意思嗎？

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還『責難』說：『不能想像沒有內容的形式……』因此就不能說『形式跟隨着內容（落後於內容。——柯註）……它們「同時並存」……否則一元論就成爲無稽之談了』（見『號召報』創刊號沙·哥·的論文）。

我們這位『學者』又有點糊塗了。沒有形式的內容是不能想像的，這是正確的。但同樣正確的，是現有的形式永遠不會完全適合於現有的內容。前者落後於後者，新內容在某種程度上總是包藏在舊形式中，因此舊形式和新內容之間總是存在着衝突。革命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發生的，馬克思唯物主義的革命精神也表現在這一點上。『有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却沒有了解這一點，這當然只能怪他們自己，而不能怪唯物主義的理論。

如果一般說來可以把無政府主義者的觀點叫做觀點的話，那末他們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義理論的看法就是如此。

三 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現在我們已經認識了馬克思的理論學說：認識了他的方法，也認識了他的理論。

我們從這個學說中應當作出什麼實際結論呢？

辯證唯物主義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之間的聯系是怎樣的呢？

辯證方法說：只有天天成長壯大、永遠前進並不倦地爲美好的未來而鬥爭的階級才會始終是進步的，才能粉碎奴役的枷鎖。我們看到，不斷成長壯大、永遠前進並爲未來而鬥爭的唯一階級就是城市和鄉村的無產階級。因此，我們應當爲無產階級服務，應該把自己的希望寄託在它的身上。

這就是從馬克思的理論學說中得出來的第一個實際結論。

然而，服務和服務各有不同。伯恩施坦要無產階級忘掉社會主義，也是爲無產階級『服務』。克魯泡特金向無產階級提出分散的、沒有廣大工業基礎的、村社式的『社會主義』，也是爲無產階級『服務』。馬克思號召無產階級去爭取以廣闊的現代大工業基礎爲依據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也是爲無產階級服務。

我們應當怎樣使我們的工作有利於無產階級呢？我們應當怎樣爲無產階級服務呢？

唯物主義理論說：一種理想，只有它和國內經濟發展不相矛盾，只有它完全適合於這個發展的要

求，才能對無產階級有直接的幫助。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發展表明：現代生產具有社會性，生產的社會性根本否定現存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因此我們的主要任務是促進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消滅和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建立。這就是說，鼓吹忘掉社會主義的伯恩斯坦學說是和經濟發展的要求根本矛盾的，它會使無產階級受到損害。

其次，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發展表明：現代生產在一天天擴大，它不能局限於個別城市和個別省份的範圍內，它不斷地打破這種範圍而遍及全國。因此我們應當歡迎生產範圍的擴大，承認將來社會主義的基礎不是個別城市和個別村社，而是統一與不可分的全國的領域，這個領域將來當然會更加擴大起來。這就是說，把未來的社會主義局限於個別城市和個別村社範圍中的克魯泡特金學說，是和大力發展生產的利益相矛盾的，它會使無產階級受到損害。

爲實現廣泛的社會主義生活這一主要目的而奮鬥，——我們就應當這樣爲無產階級服務。

這就是從馬克思的理論學說中得出來的第二個實際結論。

很明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是直接從辯證唯物主義中得出來的結論。

什麼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呢？

現代制度是資本主義制度。這就是說，世界分成了兩個對立的陣營，一個是一小撮資本家的陣營，一個是大多數人的即無產者的陣營。無產者日夜工作，而依舊貧窮。資本家不從事勞動，却總是富有。這種情形之所以發生，並不是因爲無產者彷彿缺乏智慧，資本家別有天才，而是因爲資本家奪

去了無產者的勞動果實，因為資本家剝削無產者。

為什麼奪去無產者的勞動果實的正是資本家，而不是無產者自己呢？為什麼是資本家剝削無產者，而不是無產者剝削資本家呢？

因為資本主義制度是建立在商品生產的基礎上的：這裏一切都成了商品，到處都是買賣原則佔統治地位。在這裏你們不僅能買消費品，買食品，並且也能買人們的勞動力，買他們的血汗和良心。資本家知道這一切，於是就買無產者的勞動力，僱傭他們。而這就是說，資本家成為他所購買的勞動力的人。無產者却失去支配這種已經賣出的勞動力的權利。就是說，由這種勞動力造成的東西已不歸無產者所有，而只歸資本家所有，只落到資本家的口袋裏。也許你們賣出的勞動力一天能生產值一百盧布的商品，但這和你們無關，不歸你們所有，這只和資本家有關，歸資本家所有；你們應得的只是你們一天的工資，這工資也許能滿足你們必不可少的需要，當然你們要過得很儉省才行。簡言之，資本家買無產者的勞動力，僱傭無產者，因此資本家也就奪去無產者的勞動果實，因此是資本家剝削無產者，而不是無產者剝削資本家。

但是，為什麼是資本家買無產者的勞動力呢？為什麼是無產者被資本家僱傭，而不是資本家被無產者僱傭呢？

這是因為資本主義制度的主要基礎是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這是因為工廠、土地、礦藏、森林、鐵路、機器和其他生產資料都變成了一小撮資本家的私有財產。這是因為無產者被剝奪了

這一切。所以資本家爲了使工廠開工必須僱傭無產者，否則他們的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就不會產生任何利潤。所以無產者必須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否則他們就會餓死。

這一切都足以闡明資本主義生產的一般性質。第一、很明顯，資本主義生產不能是什麼統一的和有組織的生產，它完全分散成各個資本家的私人企業。第二、同樣很明顯，這種散漫的生產的直接目的不是滿足人民的需要，而是生產出賣的商品以增加資本家的利潤。但是，因爲任何一個資本家都想多得利潤，所以他們都盡量多生產商品，結果市場上商品充斥，物價下跌，普遍的危機就隨之發生。

由此可見，危機、失業、生產中斷、生產無政府狀態以及諸如此類的現象，乃是現代資本主義生產無組織性的直接結果。

這種無組織的社會制度之所以暫時還沒有被摧毀，它之所以暫時還能堅強地抵抗無產階級的攻擊，首先是因爲有資本主義國家保衛它，有資本主義政府保衛它。

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就是如此。

*

*

*

毫無疑義，未來的社會將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礎上。

未來的社會是社會主義社會。這首先就是說，那裏不會有任何階級存在；既不會有資本家，也不會有無產者，因此也就不會有剝削。那裏只會有集體工作的勞動者。

未來的社會是社會主義社會。這也就是說，那裏隨着剝削的消滅，商品生產和買賣也會消滅，

因此那裏不會有勞動力的購買者和出賣者、僱傭者和被僱傭者存在的餘地，那裏只會有自由的勞動者。

未來的社會是社會主義社會。這最後就是說，那裏隨着僱傭勞動的消滅，任何的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私有制也會消滅，那裏不會有貧民無產者，也不會有富翁資本家，那裏只會有集體佔有一切土地、一切礦藏、一切森林、一切工廠和一切鐵路等等的勞動者。

由此可見，未來生產的主要目的是直接滿足社會的需要，而不是爲了增加資本家的利潤來生產出賣的商品。這裏不會有商品生產、爭奪利潤等等現象存在的餘地。

同樣很明顯，未來生產將是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高度發達的生產，它將顧及社會的需要，看社會需要多少就生產多少。這裏不會有生產的分散性，不會有競爭、危機和失業現象存在的餘地。

凡是沒有階級的地方，凡是沒有富人和窮人的地方，也就不需要國家，也就不需要壓制窮人和保護富人的政權。所以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政權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見「哲學的貧困」）*

因此，馬克思還在一八四六年就說道：

『工人階級在發展進程中將創造一個消除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聯合體來代替舊的資產階級社會，從此再不會有任何原來的意義的政權了……』（見『哲學的貧困』）（九）

因此，恩格斯在一八八四年說道：

『由此可見，國家不是自古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和國家政權爲何物

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爲各階級時，國家就……成爲必要的了。我們現時正以迅速的步伐走近這樣的生產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再無必要，而且還成爲生產的直接障礙。階級將不可避免地歸於消失，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一樣。隨着階級的消失，國家也就不可避免地歸於消失。以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爲基礎的、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適得其所的地方去，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而與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一起。」（見「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26）

同時很明顯，爲了處理公共事務，社會主義社會除需要集中各種資料的地方局之外，還需要一個中央統計局來搜集有關全社會各種需要的資料，然後適當地把各種工作分配給勞動者。代表會議，特別是代表大會，也將是必要的；它們的決定，在下屆代表大會召開以前，佔少數的同志一定要無條件地服從。

最後，很明顯，自由而友愛的勞動必定使未來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一切需要都得到平等而充分的滿足。這就是說，如果未來的社會要求每個成員能勞動多少就勞動多少，那末社會本身也應當根據每個人需要多少產品就給予多少產品。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就是未來的集體制度應藉以建立起來的原則。自然，在社會主義第一階段上，既然參加新生活的還有一些不習慣於勞動的分子，生產力也沒有足夠地發展，而且還有「粗」工和「細」工的差別，這時要實行「各取所需」的原則一定大感困難，所以社會不得不暫時走上某一條中間道路。但同樣很明顯，當未來社會走上自己的軌道而資本

主義殘餘被連根剷除的時候，上述原則就會是適合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唯一原則。

因此，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說道：

『在共產主義（即社會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上，當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社會分工的情形消失後，當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隨之消失後，當勞動不再只是謀生的手段，而其本身已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時，當生產力也隨着個人的全面發展而相當增長時……只有那時才能完全打破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界限，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見『哥達綱領批判』（31））

依據馬克思的理論，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一般情景就是如此。

這都很好。但社會主義的實現是可以想像的嗎？可以設想人們能剷除本身的『野蠻習慣』嗎？

還有，如果大家都各取所需，可以設想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水平够得上這種需要嗎？

社會主義社會的必要條件是足夠發達的生產力和人們的社會主義意識以及人們的社會主義教育。現存資本主義所有制阻礙着現代生產力的發展，如果估計到在未來社會中不會有這種所有制，那末顯而易見，生產力一定會增長許多倍。同時還不應忘記，在未來社會中，現在的數十萬寄生蟲和失業者都會担任工作而補充勞動者的隊伍，這樣就會大大推進生產力的發展。至於人們的『野蠻』情感和觀點，並不是像某些人所設想的那樣永恆的東西：有一個時期即原始共產主義時期，人們是不承認私有制的；後來一個時期即個人主義生產的時期，私有制掌握了人們的情感和理性；現在一個新的

時期即社會主義生產的時期快要到來，那時人們的情感和理性浸透着社會主義的意向，這有什麼奇怪的，難道存在不決定人們的『情感』和觀點嗎？

但是，有什麼東西能證明社會主義制度必然要建立起來呢？社會主義是否必然要繼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到來呢？或者換句話說，我們怎麼知道馬克思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不只是一種美妙的理想或幻想呢？其科學證明又在哪裏呢？

歷史表明：所有制形式直接以生產形式為轉移，生產形式一改變，所有制形式遲早也必然要改變。有一個時期，所有制具有共產主義性質，當時原始人出沒其間的森林和原野歸大家所有，而不歸個人所有。為什麼當時是共產主義所有制呢？因為當時的生產是共產主義的，勞動是共同的，集體的，大家共同勞動，誰也離不開誰。後來一個時期，即小資產階級生產的時期，所有制具有個人主義的（私人的）性質，人所必需的一切（當然空氣、日光等除外）都被認為私有財產。為什麼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呢？這是因為生產已成了個人主義的生產，每個人都藏在自己的角落裏開始為自己而勞動了。最後，資本主義大規模生產時期到來了，這時成百成千的工人集合在一個場所、一個工廠裏一起勞動。在這裏，已看不見舊時那種自願自、各幹各的情形了，在這裏，每個工人和每個車間所有的工人，在工作方面和本車間的工友、和其他車間都有密切的聯系。只要某個車間停頓下來，整個工廠的工人就會無事可做。由此可見，生產過程、勞動已經具有社會性，已經帶有社會主義的色彩。不僅個別工廠的情形是如此，整個生產部門和各生產部門之間的情形也是如此：只要鐵路工人舉行罷工，生

產就會陷於困難的境地；只要石油和石炭的生產停頓下來，很快就會有整批的工廠關門。很明顯，在這裏，生產過程已具有社會的集體主義的性質了。既然佔有的私人性不適合生產的社會性，既然現代集體主義的勞動必然引向集體所有制，所以不言而喻，繼資本主義而來的必然是社會主義制度，正像繼黑夜而來的必然是白天一樣。

歷史就這樣論證着馬克思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必然性。

*

*

*

歷史告訴我們說：凡在社會生產中起主要作用並掌握主要生產職能的階級或社會集團，經過一些時候必然成為這種生產的主人。有一個時期，即母權制時期，婦女被認為是生產的主人。為什麼這樣呢？因為在當時的生產中，在原始的農業中，婦女在生產中起主要作用，她們担负着主要的職能，而男子則出沒於森林，尋找野獸。後來一個時期，即父權制時期，男子在生產中佔統治地位了。為什麼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呢？這是因為在當時的生產中，在以戈矛、套繩、弓箭為主要生產工具的牧畜經濟中，男子起着主要作用……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生產時期到來了，這時無產者開始在生產中起主要作用，一切主要生產職能都轉入他們的手中，沒有他們則生產一天也不能維持（且回憶一下總罷工吧），這時資本家不僅對生產無益，而且還妨礙了生產。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或者是一切的生活都要完全遭到破壞，或者是無產階級遲早一定會成為現代生產的主人，成為這種生產的唯一所有者，成為這種生產的社會主義所有者。

爲資本主義所有制作臨終祈禱並確定地提出不是資本主義就是社會主義這一問題的現代工業危機，使這個結論完全明顯，並一目了然地揭露了資本家的寄生性和社會主義勝利的必然性。

歷史又這樣論證着馬克思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必然性。

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並不是建立在悲天憫人的情感上，並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正義」上，並不是建立在對無產階級的熱愛上，而是建立在上述的科學根據上。

這就是爲什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也稱爲「科學社會主義」的緣故。

恩格斯還在一八七七年就說道：

「如果我們對現代勞動產品分配方式日益逼近的變革所抱的信心……只是根據一種意識，即認爲這種分配方式不合正義，認爲正義總有一天定要勝利，那我們的事情就糟了，我們就得長久等待了……」這裏最主要的是「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生產力和由這生產方式造成的財富分配制度，已和這種生產方式本身發生驚人的矛盾，並且矛盾到了這種程度：如果想要避免整個現代社會滅亡的話，就必須使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發生一個會消除一切階級差別的變革。對現代社會主義必獲勝利的信心，正是根據這個可以感觸到的物質事實……而不是根據某個學究關於正義和非正義的觀念而奠定的」（見「反杜林論」）（312）。

這當然不是說，既然資本主義已在腐朽，那只要我們想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就可以隨時建立起來。只有無政府主義者和其他小資產階級思想家才這樣想。社會主義理想並不是一切階級的理想。這只

是無產階級的理想，對實現這一理想直接關心的並不是一切階級，而只是無產階級。這就是說，當無產階級還只佔社會中的一小部分的時候，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可能的。舊生產形式的滅亡，資本主義生產進一步的擴大，以及社會大多數人的無產階級化，——這一切就是實現社會主義所必需的條件。但是這還不够。社會大多數人可能已經無產階級化了，然而社會主義可能還實現不了。這是因為要實現社會主義，除這一切而外，還需要無產階級具有階級意識，需要無產階級團結一致，並善於領導本身的事業。要獲得這一切，又必須有所謂政治自由，即言論、出版、罷工和結社的自由，一句話，就是必須有階級鬥爭的自由。政治自由並不是到處都有同樣保障的。因此，究竟無產階級必須在什麼條件下進行鬥爭：在專制的農奴制條件下（俄國）、君主立憲制條件下（德國）、大資產階級共和國條件下（法國）還是在民主共和國條件下（俄國社會民主黨所要求的正是這種條件）進行鬥爭，這對無產階級並不是無關緊要的。政治自由在民主共和國裏有最好的和最完全的保障，自然只限於它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一般能够有的保障。因此，一切擁護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人都必須爭取建立民主共和國，把它作為走向社會主義的最好的『橋梁』。

正因爲如此，所以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在現時條件下分爲兩部分，一部分是以實現社會主義爲目的的最高綱領，一部分是以開闢一條經過民主共和國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爲目的最低綱領。

*

*

*

要自覺地實現自己的綱領，要推翻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當怎樣行動，應當走什

麼道路呢？

答案是很清楚的：無產階級不能靠和資產階級妥協而達到社會主義，它一定要走鬥爭的道路，而且這個鬥爭應當是階級鬥爭，是整個無產階級反對整個資產階級的鬥爭。不是資產階級及其資本主義，就是無產階級及其社會主義！這就是無產階級的行動、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所應當依據的原則。

但是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有多種多樣的形式。例如罷工（不論它是局部罷工還是總罷工）就是一種階級鬥爭。抵制和怠工，無疑地也是階級鬥爭。遊行示威、參加代表機關（無論是一般議會或地方自治機關）等等，也都是階級鬥爭。這一切都是同一階級鬥爭的各種不同形式。在這裏，我們不打算說明哪一種鬥爭形式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有更大的意義，而只指出，在一定時間和一定地點，其中每一種形式都是無產階級所絕對需要的，都是提高無產階級的覺悟性和組織性的必要手段。而覺悟性和組織性像空氣一樣是無產階級所必需的。但也應該指出這一切鬥爭形式對於無產階級都不過是準備手段，其中任何單獨的一種形式都不是無產階級能够藉以摧毀資本主義制度的決定的手段。單靠總罷工是不能摧毀資本主義的；總罷工只能為摧毀資本主義準備某些條件。決不能想像無產階級只要參加議會就能推翻資本主義；利用議會鬥爭只能替推翻資本主義準備某些條件罷了。

無產階級用以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決定的手段是什麼呢？

這樣的手段就是社會主義革命。

罷工、抵制、議會鬥爭、遊行示威，——這一切鬥爭形式作為鍛鍊和組織無產階級的手段是很好

的。但是這些手段沒有一種能夠消滅現有的不平等現象。要徹底摧毀資本主義，就必須把這一切手段集中成一個主要的和決定的手段，無產階級必須起來堅決進攻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正是這種主要的和決定的手段。

決不能把社會主義革命看做一個突然的、短促的打擊，社會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羣衆用以擊敗資產階級並奪取其陣地的長期鬥爭。因為無產階級的勝利同時就是對戰敗的資產階級的統治，因為在階級衝突時期一個階級的失敗就是另一個階級的統治，所以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階段就是無產階級在政治上對資產階級的統治。

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開始時應當採取的步驟。

這就是說，當資產階級還沒有完全戰敗時，當它的財富還沒有被沒收時，無產階級一定要擁有軍事力量，一定要有自己的『無產階級近衛軍』，以使用它來打退垂死的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攻擊，正如巴黎無產階級在公社時期曾有過的那樣。

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之所以必要，是因為無產階級利用這種專政就能够剝奪資產階級，並沒收整個資產階級的土地、森林、工廠、機器、鐵路等等。

剝奪資產階級，——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應當達到的結果。

無產階級用以推翻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主要的和決定的手段就是如此。

因此，馬克思還在一八四七年就說道：

『……工人革命中的第一步是無產階級變為統治階級……無產階級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到……已組成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中……』
(見『共產黨宣言』)

如果無產階級想要實現社會主義，這就是它應走的道路。

其餘一切策略觀點都是由這個總原則產生的。罷工、抵制、遊行示威、議會鬥爭等，只是在有助於組織無產階級、有助於鞏固和擴大無產階級的組織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這個條件下才是有意義的。

*

*

*

總之，要實現社會主義就必須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社會主義革命則應當從無產階級專政開始，就是說，無產階級應當把政權奪到自己手中，以便利用它來剝奪資產階級。

但是，要做到這一切，就必須無產階級組織起來，團結起來，聯合起來，就必須建立堅強的無產階級的組織，並使之不斷地壯大起來。

無產階級的組織應當採取哪些形式呢？

最普遍的羣衆性的組織就是工會和工人合作社（主要是生產消費合作社）。工會的目的（主要是）反對工業資本，在現代資本主義範圍內改善工人的狀況。合作社的目的（主要是）反對商業資本，用

減低日用必需品價格的辦法來擴大工人的消費，這當然也是在資本主義範圍內。無論工會或合作社，作爲組織無產階級羣衆的手段，都是無產階級所絕對必需的。因此，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觀點看來，無產階級應當抓住這兩種組織形式，鞏固和加強它們，當然這要以現存政治條件所允許的程度而定。

然而，單有工會和合作社是不能滿足戰鬥的無產階級在組織方面的需要的。這是因爲上述組織不能超出資本主義範圍，其目的只是在資本主義範圍內改善工人的狀況。但工人所需要的，是完全擺脫資本主義的奴役，是根本打破這種範圍，而不是只在資本主義範圍內兜圈子。因此，還需要一個能把各行各業工人中的覺悟分子集合在自己的周圍，能把無產階級變成覺悟的階級，並以粉碎資本主義制度和準備社會主義革命爲其最主要的組織。

這樣的組織就是無產階級的社會民主黨。

這個黨應當是階級的黨，應當完全不依賴其他政黨，——這因爲它是無產階級的黨，無產者只有靠自己的手才能獲得解放。

這個黨應當是革命的黨，——這是因爲工人的解放只有用革命手段、用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實現。這個黨應當是國際主義的黨，黨的大門應向每個覺悟的無產者敞開，——這是因爲工人的解放不是一個民族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這個問題無論對格魯吉亞無產者，或是對俄羅斯無產者和其他民族的無產者，都是同樣重要的。

因此很明顯，各民族的無產者團結得愈緊密，橫互在他們中間的民族壁壘破壞得愈徹底，則無產階級政黨就愈強大，無產階級組成一個不可分的階級就容易。

因此，必須盡可能在無產階級的各種組織中實行集中制原則，反對聯邦主義的散漫性，無論黨、工會或合作社都必須這樣。

同樣很明顯，這一切組織都應當建立在民主基礎上，自然要某些政治條件及其他條件不阻止這樣做才行。

黨和合作社、黨和工會間的相互關係應當是怎樣的呢？合作社和工會應當是黨的組織還是非黨的組織呢？這個問題要以無產階級在什麼地方和在什麼條件下進行鬥爭來決定。不管怎樣，有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就是無論工會或合作社，它們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政黨的關係愈友好，其發展就愈充分。因為這兩個經濟組織若不接近堅強的社會主義政黨，往往就會瑣碎化，就會只顧狹隘的職業的利益而忘記整個階級的利益，從而使無產階級受到嚴重損害。因此在任何情形下，都必須保證工會和合作社受到黨的思想政治影響。只有這樣，上述組織才會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學校，把分散為各個集團的無產階級組成爲覺悟的階級。

一般說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特點就是如此。

無政府主義者怎樣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呢？

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首先必須知道，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不單是哲學學說。它是無產階級羣衆的學說，是他們的旗幟，全世界無產者都尊重它，『崇拜』它。因而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單是什麼哲學『學派』的創始人，他們是日益發展壯大的活生生的無產階級運動的活生生的領袖。誰要反對這個學說，誰想『推翻』它，誰就應當好好地估計到這一切，免得在力量懸殊的鬥爭中碰得頭破血流。這一點，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因此他們在與馬克思和恩格斯作鬥爭時，使用着一種迥非尋常的新武器。

這種新武器是什麼呢？是不是對資本主義生產作新的研究？是不是駁斥馬克思的『資本論』？當然不是！也許他們是用『新事實』和『歸納』方法武裝起來，『科學地』駁斥社會民主黨的『福音書』——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吧？也不是！那末這種不尋常的手段究竟是什麼呢？

這就是責備馬克思和恩格斯『盜竊他人的著作』！你們以爲怎樣？原來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一點自己的東西，科學社會主義乃是一種捏造，因爲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徹頭徹尾都是從孔西得朗的『宣言』中『偷來』的。這種說法當然是很可笑的，但是無政府主義者的『無比的領袖』車爾凱茲施維里却神氣十足地向我們講這個滑稽故事，而有位什麼拉姆斯這樣一個輕率的、車爾凱茲施維里的『門徒』和我們的那些土產的無政府主義者，就如此拚命地重複這種『發現』，所以我們至少也要把這個『故事』簡略地說一下。

請聽聽車爾凱茲施維里的話吧：

『『共產黨宣言』的整個理論部分，即第一章和第二章……都是從孔西得朗那裏拿來的。因此馬

克思和恩格斯的「宣言」——合法革命民主派的這部聖經——不過是笨拙地把孔西得朗的「宣言」改頭換面一番。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抄襲了孔西得朗「宣言」的內容，而且……甚至剽竊了個別的標題。」（見車爾凱茲施維里、拉姆斯和拉布里奧拉三人論文集『共產黨宣言』的起源，德文版第十頁）

另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拉姆斯也重複着這一套：

『可以堅決地斷定：他們（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共產黨宣言』）簡直是一種盜竊（剽竊），一種無恥的盜竊，然而他們並不像普通的竊賊那樣逐字逐句地抄，而只偷去了思想和理論……』（見同書第四頁）

我們的無政府主義者在『號召報』、『工人報』、『呼聲報』等報上面也重複着這一套。

總之，科學社會主義及其理論基礎原來是從孔西得朗「宣言」中「偷來」的。

這種說法有沒有什麼根據呢？

孔西得朗是什麼人呢？

馬克思又是什麼人呢？

孔西得朗死於一八九三年，是空想主義者傅立葉的門生，始終是個不可救藥的空想主義者。他認為只有階級調和才能「挽救法國」。

馬克思死於一八八三年，是唯物主義者，是空想主義者的敵人。他認為生產力的發展和階級鬥爭

是人類獲得解放的保證。

他們之間有什麼共同點呢？

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義理論。從這個理論的觀點看來，社會生活的發展完全決定於生產力的發展。如果說繼地主農奴制度而來的是資產階級制度，那末這只能「歸咎於」生產力的發展，因為生產力的發展使資產階級制度必然產生出來。再就是，如果說繼現代資產階級制度而來的必然是社會主義制度，那末這是因為現代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這樣。由此就產生出資本主義毀滅和社會主義建立的歷史必然性。由此就產生出一個馬克思主義原理：我們應當在生產力的發展史中而不是在人們的頭腦中去探求自己的理想。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的理論基礎就是如此（見『共產黨宣言』第一章和第二章）。孔西得朗的『民主宣言』講過什麼類似的話嗎？孔西得朗的觀點是唯物主義觀點嗎？

我們斷定說，無論車爾凱茲施維里、拉姆斯或是我們的『號召報派』，都沒有從孔西得朗的『民主宣言』中引出一段話或一個字來證實孔西得朗是個唯物主義者，證實他是用生產力的發展來說明社會生活的演進的。反之，我們很清楚地知道，孔西得朗在社會主義的歷史上是以空想派的唯心主義者聞名的（見波爾·路易『法國社會主義史』）。

既然這些奇怪的『批評家』連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都不能區別，那末究竟是什麼東西促使他們饒舌呢？為什麼他們要批評馬克思和恩格斯呢？難道是爲了引人發笑嗎？……

科學社會主義的策略基礎是關於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的學說，因為這是無產階級手中最好的武器。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是無產階級用來奪取政權然後剝奪資產階級以建立社會主義的武器。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所敘述的科學社會主義的策略基礎就是如此。

孔西得朗在『民主宣言』中講過什麼類似的話嗎？孔西得朗承認階級鬥爭是無產階級手中最好的武器嗎？

從車爾凱茲施維里和拉姆斯的論文（見上述文集）中可以看出，孔西得朗的『宣言』對這一點隻字未提，而僅僅指出了階級鬥爭是一件悲慘的事實。至於作為摧毀資本主義的手段，階級鬥爭，那末請看孔西得朗在其『宣言』中對這一點所說的話吧：

『資本、勞動和才幹是生產的三個要素，是財富的三個來源，是工業機構的三個輪子……代表這三個方面的三個階級有着『共同的利益』；這些階級的任務是迫使機器為資本家工作和為人民工作……這些階級面前的……偉大目標是用民族統一原則把一切階級聯合起來……』（見考茨基的小冊子『共產黨宣言是剽竊』第十四頁，那裏從孔西得朗的『宣言』中引證了這段話）

一切階級，聯合起來！這就是孔西得朗在其『民主宣言』中所宣佈的口號。

這種階級調和的策略和堅決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一切反無產階級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調和的階級鬥爭策略，有什麼共同點呢？

當然是沒有什麼共同點的！

那末，車爾凱茲施維里這夥先生們和他們的輕率的應聲蟲爲什麼胡說呢？莫非他們把我們看成死人嗎？難道他們以爲我們不會使他們原形畢露嗎？！

最後，還有一種值得注意的情況。孔西得朗活到了一八九三年。他在一八四三年出版了自己的『民主宣言』。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末寫成了自己的『共產黨宣言』。從那時起，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宣言』已用歐洲各國文字再版多次。誰都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創造了一個時代。雖然如此，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的時候，無論孔西得朗本人或他的朋友，無論在任何地方，一次也沒有說過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從孔西得朗『宣言』裏剽竊了『社會主義』。讀者，這難道不奇怪嗎？

那末，究竟什麼東西激起這些『歸納派的』風頭家們……對不住，——『學者們』——胡說八道呢？他們究竟是用誰的名義講話呢？難道他們比孔西得朗本人更清楚地知道他的『宣言』嗎？或許他們以爲孔西得朗及其信徒們沒有讀過『共產黨宣言』嗎？

但是够了……已經够了，因爲連無政府主義者自己都沒有認真地注意拉姆斯和車爾凱茲施維里的唐·吉訶德式的討伐，這種滑稽的討伐的可恥結局已經過於明顯，用不着再去注意了……

現在我們來談一談批評的實質。

*

*

*

無政府主義者患有一種宿疾，就是很愛『批評』歐方的政黨，但又不願費一點力去稍微了解一下

這些政黨。我們看到，無政府主義者在『批評』社會民主黨人的辯證方法和唯物主義理論的時候，正是這樣做的（見第一章和第二章）。他們講到社會民主黨人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時候，也是這樣做的。

就拿下面一件事實來說吧。社會革命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之間存在着原則上的分歧，這誰不知道呢？社會革命黨人否認馬克思主義，否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理論，否認它的辯證方法，否認它的綱領，否認階級鬥爭，而社會民主黨人完全以馬克思主義為根據，這誰不知道呢？對於即使偶然聽到一些有關『革命俄國報』（社會革命黨的機關報）和『火星報』（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論戰的人，這種原則上的區別也應該是很明顯的。但是對於那些看不出這種區別而竟叫嚷着說社會革命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都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批評家』，又有什麼話可說呢？例如，無政府主義者就硬說『革命俄國報』和『火星報』這兩個機關報都是馬克思主義的機關報（見無政府主義者文集『麪包和自由』第二〇二頁）。

無政府主義者對社會民主黨的原則的『認識』就是如此！

說到這裏，究竟他們的『科學批評』有多少根據也就不言而喻了……

現在，我們就來分析一下這種『批評』吧。

無政府主義者的主要『責難』就是他們不承認社會民主黨人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他們反覆地說：你們不是社會主義者，你們是社會主義的敵人。

看吧，克魯泡特金關於這一點寫道：

『……我們得出和……社會民主學派大多數經濟學家不同的結論……我們……要達到的是自

由的共產主義，而大多數社會主義者（自然也包括社會民主黨人在內。——作者註）要達到的是國家資本主義和集體主義。』（見克魯泡特金『現代科學和無政府主義』第七十四頁至第七十五頁）

社會民主黨人的『國家資本主義』和『集體主義』究竟是什麼呢？

看吧，克魯泡特金關於這一點寫道：

『德國社會主義者說，所有一切積累起來的財富都應當集中在國家手中，國家將把這些財富交給工人團體，組織生產和交換，並注視着社會的生活和工作。』（見克魯泡特金『一個反抗者的話』第六十四頁）

其次：

『集體主義者在自己的……草案中犯了……雙重的錯誤。他們既想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又要保存構成這個制度基礎的兩種制度：代表制和僱傭勞動制。』（見『爭取麪包』第一四八頁）……『大家知道，集體主義……保存着……僱傭勞動。只有……代表制政府……能够做主人……』這個政府的代表『有權爲大家的利益而使用從生產中獲得的剩餘價值。此外，在這個制度中規定出工人的勞動和受過教育的人的勞動之間的……差別；雜工的勞動在集體主義者看來是簡單勞動，而手工業者、工程師、科學家等等則從事馬克思稱爲複雜勞動的工作，並有權獲得高額工資』（見同書第五十二頁）。這樣，

工人在領取其必需的產品時，不是以他們的需要爲標準，而是以他們『對社會的貢獻的比例爲標準』（見同書第一五七頁）。

格魯吉亞的無政府主義者也重複這一套，不過講得更加神氣十足罷了。他們中間素以魯莽見稱的就是巴頓先生。他寫道：

『社會民主黨人的集體主義是什麼呢？集體主義，或者確切些說，國家資本主義，是建立在下述原則之上的：每個人願做多少就做多少，或者國家規定多少就做多少，而他得到的報酬是用商品支付的自己勞動的價值……』於是，這裏『必須有立法會議……（也）必須有執行機關，即閣員、各種行政人員、憲兵和偵探，如果不滿分子過多，也許還要有軍隊』（見『號召報』第五期第六十八頁至第六十九頁）。

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對社會民主黨的第一個『責難』就是如此。

*

*

*

總之，從無政府主義者的議論中得出的結論就是：

一、彷彿在社會民主黨人看來，社會主義社會非有政府不可，這個政府將以大老闆的資格僱用工人，並且一定要有『閣員……憲兵、偵探』。二、彷彿照社會民主黨人的意見，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粗』工和『細』工的區別不會消滅，那裏將擯棄『各取所需』的原則而承認『按功取酬』的原則。

無政府主義者對社會民主黨的『責難』就建立在這兩點上。

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的這種「責難」有沒有什麼根據呢？

我們可以斷定：無政府主義者在這種場合所講的這些話，不是糊塗，便是無恥的造謠。請看事實吧。

馬克思還在一八四六年就說道：『工人階級在發展進程中將創造一個消除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聯合體，來代替舊的資產階級社會；從此再不會有任何原來意義的政權了……』（見『哲學的貧困』）

一年以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又表達了同樣的思想（『共產黨宣言』第二章）。

恩格斯在一八七七年寫道：『國家將作為全社會的真正代表所作的第一個行動——把生產資料變為公共財產——就是它以國家資格所作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係的干涉便會漸漸成為多餘的東西而自行停止……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反杜林論』）

同一位恩格斯在一八八四年又寫道：『由此可見，國家不是自古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各階級時，國家就……成為必要的了。我們現時正以迅速的步伐走近這樣的生產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再無必要，而且還成為生產的直接障礙。階級將不可避免地歸於消失，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一樣。隨着階級的消失，國家也就不可避免地歸於消失。以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為基礎的、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適得其所的地方去，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而與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一起。』（見『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又重複過同樣的話（見『法蘭西內戰』引言）。

由此可見，在社會民主黨人看來，社會主義社會乃是這樣一個社會，在那裏不會有所謂國家、政權及其開員、省長、憲兵、警察和兵士存在的餘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將是國家存在的最後階段，那時無產階級將把國家政權奪到自己手中，並建立自己的政府（專政）來徹底消滅資產階級。但是在資產階級已經消滅後，在各個階級已經消滅後，在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後，就不再需要任何政權了，所謂國家就會成為歷史的陳跡了。

由此可見，上述無政府主義者的『責難』乃是一種毫無根據的誹謗。

至於『責難』的第二點，馬克思說過以下的話：

『在共產主義（即社會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上，當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社會分工的情形消失後，當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隨之消失後，當勞動……已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時，當生產力也隨着個人的全面發展而相當增長時……只有那時才能完全打破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界限，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見『哥達綱領批判』）

由此可見，在馬克思看來，共產主義（即社會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乃是這樣一個制度：其中『粗』工和『細』工間的區分以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間的矛盾已完全消除，勞動一律平等。在社會中佔統治地位的是真正共產主義的原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裏沒有僱傭勞動存在的餘地。

顯然，這一『責難』也是毫無根據的。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根本沒有見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著作，只憑道聽途說妄加『批評』，或者是他們雖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作品，但是有意撒謊。

第一個『責難』的命運就是如此。

無政府主義者的第二個『責難』就是他們否認社會民主黨的革命性。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向我們這樣說：你們不是革命者，你們否認暴力革命，你們想單憑選票來建立社會主義。

請聽吧：

『……社會民主黨人……喜歡高談『革命』、『革命鬥爭』、『拿着武器鬥爭』等等題目……但是，如果你實心實意地向他們要武器的話，他們却會鄭重其事地給你一張選票……』他們硬說：『革命者所宜於採取的唯一適當策略，就是和平地、合法地進行議會活動，同時宣誓忠於資本主義，忠於既有的政權和整個現存的資產階級制度。』（見『麪包和自由』文集第二十一頁和第二十二頁至第二十三頁）

格魯吉亞無政府主義者說的也是這一套，當然是說得更加神氣十足些。就拿巴頓來說吧，他寫道：

『整個社會民主黨……都公開宣稱：用步槍和武器進行鬥爭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方法，黨只有憑選票，只有靠普選，才能取得政權，然後經過議會多數和立法程序去改造社會。』（見『奪取國家政權』第

三百至第四頁

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就是這樣議論馬克思主義者的。

這個『責難』有沒有什麼根據呢？

我們說：無政府主義者在這裏又表現了自己愚昧無知和熱心誹謗。

請看事實吧。

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在一八四七年末就寫道：

『共產黨人認為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是可鄙的事情。他們公開地宣稱：他們的目的，只有暴力推翻整個現存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而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革命中只會失去自己的鎖鏈。而他們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見『共產黨宣言』。在某些公開版本的譯文中遺漏了幾個字。）

一八五〇年，在德國即將有新的發動時，馬克思寫給當時的德國同志們說：

『不論在什麼藉口下他們都不應當把武器和彈藥交出去……工人們應當……組成一支有司令官和總參謀部的獨立的無產階級近衛軍……』這是大家『在即將到來的起義中和起義後應當注意的』（見『科倫審判記』中馬克思『告共產主義者書』）（參見）。

在一八五一年至一八五二年間，馬克思和恩格斯寫道：『……既然起義已經開始，就必須以最大的決心行動起來並轉入進攻。防禦是任何武裝起義的死路……必須趁敵軍還分散的時候，出其不

意地襲擊他們；每天都必須力求獲得新的勝利，即使是不大的勝利也好……必須在敵人還沒有能集中自己的軍隊來攻擊你之前就迫使他們退却。一句話，要按照至今馳名的一位最偉大的革命策略家丹東的「勇敢，勇敢，再勇敢」這句話去行動。」（見「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

我們以為這裏所說的不僅是「選票」。

最後，請回憶一下巴黎公社的歷史，請回憶一下巴黎公社是怎樣和平地行動的，當時公社竟滿足於在巴黎的勝利，放棄對凡爾賽這個反革命巢穴的進攻。你們以為馬克思當時說過什麼話呢？他號召過巴黎人去進行選舉嗎？他贊同過巴黎工人（當時整個巴黎都在工人手中）疏忽大意的態度嗎？他贊同過他們對戰敗的凡爾賽人所表示的寬大態度嗎？請聽聽馬克思的話吧：

「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靈活性，何等的歷史主動性，何等的自我犧牲精神呀！挨了六個月的餓……他們在普軍的刺刀下起義了……歷史上還沒有過這種英勇奮鬥的範例！如果他們將來戰敗了，那只能歸咎於他們的「寬大」。當維努亞和隨後巴黎國民近衛軍反動部分一逃出巴黎的時候，本來是應該立刻向凡爾賽進軍的。由於講良心而把時機放過了。他們不願開始內戰，彷彿醜陋不堪的梯也爾在金圖解除巴黎武裝時也還沒有開始內戰似的！」（「給庫格曼的信」）（見）

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就是這樣想，這樣做的。

社會民主黨人現在就是這樣想，這樣做的。

然而無政府主義者一味重複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信徒們只對選票感覺興趣，他們不承認暴

力的革命行動！

可見這個「責難」也是一種誹謗，表明無政府主義者根本不知馬克思主義的實質為何物。

第二個「責難」的命運就是如此。

*

*

*

無政府主義者的第三個「責難」就是他們否認社會民主黨的人民性，把社會民主黨人描寫成一些官僚主義者，並且斷定說：「社會民主黨的無產階級專政計劃使革命陷於滅亡，既然社會民主黨人主張這種專政，那末事實上他們並不是想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是想建立自己對無產階級的專政。」

請聽一聽克魯泡特金先生的話吧：

「我們無政府主義者已對專政宣告了最後判決……我們知道：任何專政，無論其意圖怎樣真

誠，都會使革命陷於滅亡。我們知道……專政這個觀念無非是把政府偶像化的有害產物，它……力圖永遠保持奴役制。」（見克魯泡特金『一個反抗者的話』第一三一頁）社會民主黨人不僅承認革命專政，並且他們「主張對無產階級實行專政……他們對工人所以感到興趣，只因為工人是一支被他們掌握的有紀律的軍隊……社會民主黨力圖利用無產階級來把國家機器抓到自己手裏」（見『麪包和自由』文集第六十二、六十三頁）。

格魯吉亞無政府主義者說的也是這一套：

「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主張專政的人們是國家派，他們的專政不會是整個

無產階級的自由活動，而是在社會頭上建立一個現今也存在的代表制政權。』（見巴頓『奪取國家政權』第四十五頁）社會民主黨人主張專政，不是爲了促進無產階級的解放，而是爲了……『用自己的統治來建立新的奴役制』（見『號召報』創刊號第五頁巴頓的論文）。

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的第三個『責難』就是如此。

無政府主義者的又一個專爲欺騙讀者而進行的誹謗，也是不難揭破的。

我們不在這裏分析克魯泡特金極端錯誤的觀點，即認爲任何專政都會使革命陷於滅亡的觀點。這一點讓我們在以後分析無政府主義者的策略時再說。現在我們只想就這個『責難』的本身談一談。

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在一八四七年末就說過，爲了建立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當取得政治上的專政，以便運用這個專政來打退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攻擊並沒收其生產資料，這個專政不應當是幾個人的專政，而應當是無產階級整個階級的專政。

『無產階級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到……已組成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中……』（見『共產黨宣言』）

可見無產階級專政將是無產階級整個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專政，而不是幾個人對無產階級的統治。

後來，他們幾乎在自己的一切著作中，例如在『拿破崙第三政變記』、『法蘭西階級鬥爭』、『法蘭西內戰』、『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反杜林論』等等著作中都重複過這種思想。

但是還不僅如此，爲了要弄清楚馬克思和恩格斯怎樣理解無產階級專政，爲了要弄清楚他們認爲這個專政能實現到什麼程度，極有意義的就是要知道他們對巴黎公社的態度。問題在於無產階級專政不僅在無政府主義者中間遭到指摘，而且在包括屠夫和酒館老闆在內的城市小資產階級中間，在所有那些被馬克思和恩格斯稱爲庸人的人們中間都遭到指摘。下面就是恩格斯向這些庸人講到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段話：

『近來德國庸人又是一聽到無產階級專政，就嚇得大喊救命。諸君，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嗎？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見『法蘭西內戰』恩格斯的引言）（註）

由此可見，恩格斯是把無產階級專政想像爲巴黎公社那樣的。

顯然，誰想知道馬克思主義者所想像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誰就應當了解一下巴黎公社。我們也來看看巴黎公社吧。如果巴黎公社真的是個別人物對無產階級的專政，那末就打倒馬克思主義、打倒無產階級專政吧！但如果我們看出巴黎公社事實上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專政，那末……那末我們就要盡情恥笑無政府主義的誹謗家，因爲他們在和馬克思主義者作鬥爭時除了造謠之外是什麼也不做的。

巴黎公社的歷史分爲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由有名的『中央委員會』管理巴黎城內一切事情的時期；第二個時期是『中央委員會』任期已滿而將管理權交給了剛剛選出的公社的時期。『中央委員會』是什麼，它是由什麼人組成的呢？我們面前擺着阿爾努的『巴黎公社人民史』，這部書，照阿爾努

說來，就是對這個問題的一個簡短的回答。鬥爭剛開始時，就有約三十萬組成爲中隊和大隊的巴黎工人選出了自己的代表。『中央委員會』就是這樣組成的。

阿爾努說道：『所有這些公民（即『中央委員會』委員）都是由自己的中隊或大隊分別選出的，知道他們的只是他們所代表的那些小集團。這是些什麼人，是怎樣的人，他們想做些什麼？』這是一個『無名的政府，差不多全由普通工人和小職員組成，其中四分之三的人在本條街道或本事務所以外都是不知名的……』傳統被打破了。世界上發生了一種意外的事。在那裏沒有一個是來自統治階級的人。革命爆發了，代表這個革命的不是律師，不是議員，不是新聞記者，不是將軍。代表革命的不是這些人，而是來自克列索的礦工，裝訂工人，廚師等等（見『巴黎公社人民史』第一〇七頁）。

阿爾努繼續寫道：

『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們聲明說，——是出名的樣關，是被攻擊的人民手中順從的工具……我們是……執行人民意志的僕人，我們在這裏要響應人民的呼聲，使人民取得勝利。人民要成立公社，我們就留下來着手選舉公社。我們所要做的，不過如此而已。這些專政者沒有升到羣衆之上，也沒有降到羣衆之下。令人感覺到他們是和羣衆生活在一起，生活在羣衆中間，並且是依靠羣衆的，他們時時刻刻都和羣衆商量，他們聽從羣衆的話，傳達他們所聽到的東西，力求用簡單的形式……表達出三十萬人的意見。』（見同書第一〇九頁）

巴黎公社在其存在的第一個時期就是這樣行動的。

巴黎公社就是如此。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講巴黎公社的第二個時期，這時公社已經代替了『中央委員會』。阿爾努講到爲時兩月的這兩個時期，歡欣地說，這是真正的人民專政。請聽吧：

『這裏的人民在兩個月內所體現出的雄偉的圖畫，給予我們力量 and 希望……正視未來。在這兩個月內，巴黎有過真正的專政，有過最完備的和無可爭辯的專政，不是一個人的專政，而是作爲時局之唯一主宰的全體人民的專政……這個專政一直繼續了兩個多月，從三月十八日至五月二十二日（一八七一年）……其實……公社不過是一種精神上的政權，它除了……公民的普遍同情外，沒有其他的物質力量；人民成了統治者，成了唯一的統治者，人民自己創立了自己的警察和法院……』（見同書第二四二、二四四頁）

積極參加過白刃戰的公社社員阿爾努就是這樣描述巴黎公社特徵的。

另一個同樣積極參加過公社工作的公社社員利沙加勒，也是這樣描述巴黎公社特徵的（見他的『巴黎公社史』）。

人民是『唯一的統治者』，『不是一個人的專政，而是全體人民的專政』，——巴黎公社就是這樣的。

『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恩格斯大聲地對庸人們說。

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你看，原來馬克思和恩格斯想像中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如此。

由此可見，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認識，對巴黎公社的認識，對他們時常加以『批評』的馬克思主義的認識，竟像我和讀者對中國文字的認識一樣。

很明顯，專政有兩種。有少數人的專政，一小羣人的專政，特列坡夫和依格納切夫之流的專政，其目的是反對人民。這種專政通常由一羣權奸把持，他們秘密決定問題，加緊絞殺大多數人民。

馬克思主義者是反對這種專政的人，而且他們反對這種專政要比我們那些喜歡叫囂的無政府主義者頑強得多，奮勇得多。

又有另一種專政，即無產階級多數人的專政，羣衆的專政，其目的是反對資產階級，反對少數人。這裏領導專政的是羣衆，這裏不容權奸立足，也不容秘密決定問題，這裏一切都公開進行，在街道上進行，在羣衆大會上進行，這因為它是街頭的專政，是羣衆的專政，是旨在反對任何壓迫者的專政。

這種專政，馬克思主義者是會『雙手』支持的，因為這種專政是偉大社會主義革命的雄偉的開端。

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把這兩種互相否定的專政混爲一談，因而陷於可笑的境地：他們不是和馬克思主義作鬥爭，而是和他們自己的幻想作鬥爭；他們不是和馬克思、恩格斯搏鬥，而是像不朽的唐·吉訶德當時那樣同風車搏鬥……

第三個「責難」的命運就是如此。(待續。)

載於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八日、二十五日和一九〇七年一月一日『新時代報』第五、第六、第七和第八各期
載於一九〇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二十七日 and 二十八日『我們的生活報』第三、第五、第八和第九各期
載於一九〇七年四月四日、五日、六日和十日『時報』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和第二十六各期
署名：柯……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① 引自果戈里的劇本『欽差大臣』中市長對赫列斯塔科夫說的話。——譯者註。

② 續文不曾刊印出來，因為斯大林同志在一九〇七年年中被黨中央委員會調到巴庫做黨的工作，幾個月後他在那裏被捕了，而『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這一著作末尾幾章的筆記則在彼搜查時遺失了。——編者註。
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附錄：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辯證唯物主義

一

我們不是那樣的人，一聽見有人提到『無政府主義』就輕蔑地轉過身去，把手一揮說：『你們何必理睬它，它是連談都不值得一談的！』我們認為這種沒有價值的『批評』既不莊重，又無益處。

我們也不是那樣的人，自己安慰自己說，無政府主義者『沒有羣衆，因而並不怎樣危險』。問題不在於今天有多少『羣衆』跟誰走，而在於學說的本質。如果無政府主義者的『學說』代表真理，那它自然會給自己開闢道路，把羣衆聚集在自己的周圍。如果它是沒有根據的，虛構的，那它就會維持不久，站不住腳。而無政府主義的沒有根據是應當加以證明的。

我們認為無政府主義者是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的敵人。所以我們也就承認對真正的敵人要進

行真正的鬥爭。因此，把無政府主義者的「學說」從頭到尾審察一下，並從各方面把它徹底衡量一番是必要的。

但是，在批評無政府主義的同時，還必須闡明我們自己的立場，並這樣來大致地說明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這所以尤其必要，是因為某些無政府主義者散佈着一種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觀念，並使讀者們的頭腦趨於混亂。

現在我們就來講本題吧。

世界上一切都在運動着…… 生活在變化着，生產力在增長着，舊關係在破壞着…… 永恆的運動與永恆的破壞和創造，——這就是生活的本質。

——馬克思

（見『哲學的貧困』）

馬克思主義不只是社會主義的理論，而且是一個完整的世界觀，是一個哲學體系，馬克思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就是從這個哲學體系中邏輯地產生出來的。這個哲學體系叫做辯證唯物主義。很明顯，闡明馬克思主義，也就是闡明辯證唯物主義。

為什麼這個體系叫做辯證唯物主義呢？

因爲它的方法是辯證的，而理論是唯物的。

什麼是辯證方法呢？

什麼是唯物主義理論呢？

有人說，生活在於不斷的成長和發展，這是正確的：社會生活不是什麼不變的和凝固的東西，它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它是處在永恆的運動中，處在永恆的破壞和創造過程中。無怪乎馬克思說：永恆的運動與永恆的破壞和創造，——這就是生活的本質。因此，生活中總是有新東西和舊東西，生長着的東西和死亡着的東西，革命的東西和反革命的東西，生活中總是有什麼在死亡，同時又總是有什麼在產生……

辯證方法說：必須按生活的實在情形來考察生活。生活處在不斷的運動中，所以我們應當把生活當做動的東西，當做既破壞又創造的過程來考察。生活走向哪裏去，生活中死亡的是什麼，產生的是什麼，破壞的是什麼，創造的是什麼，——這就是我們首先應當注意的問題。

辯證方法的第一個結論就是如此。

生活中新產生的、一天天成長的東西是不可戰勝的，要阻止它的前進是不可能的，它的勝利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是說，例如無產階級，既然它已在生活中產生並一天天成長起來，那末不管它今天還怎樣弱，怎樣小，歸根到底是會勝利的。反之，生活中死亡的、走向墳墓的東西是必遭失敗的，這就是說，例如資產階級，既然它在失去立足的基地，日益向後倒退，不管它今天還怎

樣強，怎樣大，歸根到底是要失敗和走進墳墓的。由此就產生了一個著名的辯證原理：凡是真正存在的東西，即日益成長的東西，都是合理的。

辯證方法的第二個結論就是如此。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在俄國革命知識分子中間發生了一場很有意義的爭論。當時民粹派說：能够担負起『解放俄國』這個任務的主要力量是窮苦的農民。馬克思主義者質問他們：為什麼呢？他們說：因為農民在俄國社會裏人數最多，同時處境最窮。馬克思主義者回答說：農民今天確實佔大多數，他們確實很窮，但問題難道在這裏嗎？農民早已佔大多數，但直到今天，他們在爭取『自由』的鬥爭中，沒有無產階級的幫助，就沒有表現過任何的主動性。為什麼呢？因為農民作爲一個等級在日益崩潰，分化爲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而無產階級作爲一個階級則在日益成長壯大。窮在這裏並沒有什麼決定的意義：『流浪漢』比農民更窮，然而誰也不會說他們能担负起『解放俄國』的責任。問題只是生活中誰在成長起來，誰在衰老下去。既然無產階級是唯一的不斷成長和不斷壯大的階級，所以我們應該同它一道前進，並承認它是俄國革命的主力，——馬克思主義者這樣回答說。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者是辯證地觀察問題，而民粹派是形而上學地大發議論，因為他們把生活現象看做『不變的、凝固的、永恆的東西』（見恩格斯『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

辯證方法就是這樣觀察生活運動的。

但是有各種各樣的運動。有過「十二月事變期間」的社會運動，那時無產階級挺起胸來，襲擊軍械庫，進攻反動派。但是也必須把前幾年的運動叫做社會運動，那時無產階級在「和平」發展條件下只舉行過零星的罷工，只建立過小型的工會。顯然，運動有各種不同的形式。辯證方法說：運動有兩種形式，即進化的形式和革命的形式。當進步分子自發地繼續進行自己的日常工作，使舊制度發生一些小的變化、量的變化的時候，運動就是進化的。當這些進步分子聯合起來，抱着一個共同思想向敵人的營壘衝去，以期根本消滅舊制度及其質的特點而建立新制度的時候，運動就是革命的。進化爲革命作準備，爲革命打下基礎，而革命則完成進化，促進進化的進一步發展。

自然界也有這樣的過程。科學史表明，辯證方法是真正科學的方法，從天文學直到社會學，到處都證實着這種思想：世界上沒有什麼永恆的東西，一切都在變化，一切都在發展。因而對於自然界的一切都應該從運動和發展的觀點去觀察。而這就是說，辯證法的精神貫穿着全部現代科學。

至於運動的形式，至於依據辯證法所說的小的變化、量的變化歸根到底要引起大的變化、質的變化，那末這個規律在自然發展史中也是同樣有效的。門德列也夫的「元素週期系」清楚地表明，由量變而發生質變在自然發展史中有多麼大的意義。在生物學上，繼新達爾文主義而起的新拉馬克主義理論，也證明了這一點。

至於其他已由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書中十分詳盡地闡明了的各種事實，我們就不談了。

*

*

*

這樣，我們現在已認識了辯證方法。我們知道：按照這個方法，世界是處在永恆的運動中，處在永恆的破壞和創造過程中，因此必須把自然界和社會中任何一種現象當做動的東西，當做又破壞又創造的過程來考察，而不要把它看做凝固的和靜止的東西。我們也知道：這個運動本身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進化的，一種是革命的……

我們的無政府主義者是怎樣看辯證方法的呢？

大家知道，辯證方法的創始人是黑格爾。馬克思只是澄清了並改進了這個方法。這種情況無政府主義者也是知道的。他們也知道黑格爾是個保守主義者，於是一有『機會』就大罵黑格爾，誣稱他是『反動分子』和『復辟主義』擁護者，他們拚命證明『黑格爾……是復辟主義的哲學家……他讚美專制的官僚立憲制度，他的歷史哲學的總的思想是服從於和服務於復辟時代的哲學派別的』，以及如此等等（見『號召報』第六期車爾凱茲施維里的論文）。其實，誰也不和他們爭論這一點，恰恰相反，每個人都同意黑格爾不是革命家，同意他是君主派。然而無政府主義者總還是要『證明』並且認為必須無止境地『證明』黑格爾是『復辟主義』擁護者。爲的什麼呢？大概想用這一切來破壞黑格爾的威信，使讀者覺得『反動分子』黑格爾的方法也是『令人厭惡的』和『非科學的吧』。如果真是這樣，如果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真是想用這種手段來駁倒辯證方法，那我就應當

說：他們用這種手段除了證明自己蠢笨而外，是什麼也證明不了的。巴斯噶和萊布尼茨不是革命者，但他們所發現的數學方法現在被公認為科學方法了。邁爾和赫爾姆霍茨不是革命者，但他們在物理學方面的發現成了科學的基礎。拉馬克和達爾文也不是革命者，但他們的進化論方法使生物科學站住了腳……是的，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用這種手段除了證明自己蠢笨而外，是什麼也證明不了的。

繼續講下去吧。在無政府主義者看來，『辯證法就是形而上學』（見『號召報』第九期沙·哥·的論文），他們既然『想把科學從形而上學桎梏下解放出來，想把哲學從神學桎梏下解放出來』（見『號召報』第三期沙·哥·的論文），所以他們就駁斥辯證方法了。

咳，這夥無政府主義者！真是『嫁禍於人』。辯證法是在和形而上學的鬥爭中成熟的，它在這個鬥爭中博得了光榮，而無政府主義者認為『辯證法就是形而上學』（無政府主義者的『始祖』蒲魯東相信世界上存在着一成不變的正義）（見愛爾茨巴赫爾『無政府主義』國外版第六十四頁至第六十八頁），因此蒲魯東被稱為形而上學者。馬克思藉助辯證方法和蒲魯東作鬥爭並證明說：既然世界上的一切都在變化，那末『正義』也一定要變化，因而『不變的正義』乃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妄想（見馬克思『哲學的貧困』）。形而上學者蒲魯東的格魯吉亞的門徒却出來『證明』說，『辯證法就是形而上學』，形而上學承認『不可認識的東西』和『自在之物』，歸根到底也就變為毫無內容的神學。與蒲魯東和斯賓塞相反，恩格斯藉助辯證方法同形而上學鬥爭過，也同神學鬥爭過。

（見恩格斯『費爾巴哈論』和『反杜林論』）。他證明了它們那種可笑的空洞性。我們的無政府主義者却『證明』說：蒲魯東和斯賓塞是科學家，而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形而上學者。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自己騙自己，或者是他們自己不了解什麼是形而上學。無論如何，辯證方法在這裏是沒有什麼罪過的。

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還對辯證方法有過什麼責備呢？他們說：辯證方法是『詭計』、『詭辯方法』、『邏輯的和思維的翻筋斗』（見『號召報』第八期沙·哥·的論文），『利用這個方法可以同樣容易地證明一個東西既是真的又是假的』（見『號召報』第四期車爾凱茲施維里的論文）。

初看起來，也許覺得無政府主義者的責難是正確的。現在請聽聽恩格斯論到形而上學方法信奉者的時候所說的話吧：『……他們的說法：「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除此以外，都是鬼話。」在他們看來，一個事物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一個東西決不能同時既是它自身又是別的什麼東西；肯定和否定是絕對互相排斥的……』（見『反杜林論』引言）無政府主義者狂叫道：『怎麼能够這樣呢！難道同一個東西能够同時既是好的又是壞的嗎？！這是『詭辯』呵，這是『玩弄字眼』呵，這就是說，『你們想同樣容易地證明一個東西既是真的又是假的呵！……』』

然而，我們且思索一下問題的本質吧。今天我們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國，而民主共和國是鞏固資產階級所有制的；能不能說民主共和國無論何時何地都是好的呢？不，不能這樣說！爲什麼呢？因爲民主共和國只有在『今天』，當我們破壞封建所有制的時候，才是好的，而在『明天』，當

我們着手破壞資產階級所有制並建立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時候，民主共和國就不會是好的了，恰相反，它將變成我們所要粉碎和拋開的桎梏；而既然生活是處在不斷的運動中，既然過去和現在是不能分開的，既然我們同時既要反對封建主又要反對資產階級，——所以我們就說：民主共和國消滅封建所有制，所以它是好的，我們就要維護它；民主共和國鞏固資產階級所有制，所以它是不好的，我們就要批評它。由此可見，民主共和國同時既「好」又「壞」，因而對於問題可以回答既「是」又「非」。恩格斯用上面引證的那段話來證明辯證方法正確的時候，正是指這樣的事實說的。無政府主義者却不了解這一點，竟認為這是「詭辯」！無政府主義者看見或看不見這些事實，當然可以隨心所欲，他們甚至在沙岸上也看不見沙子，——這是他們的權利。但這和辯證方法有什麼關係呢？辯證方法和無政府主義者相反，不是閉上眼睛看生活，而是感覺到生活的脈搏，並且直率地說：既然生活總在變化，總在運動，那末任何一種生活現象都有兩種趨勢，即肯定的趨勢和否定的趨勢；我們應當維護前一種趨勢，反對後一種趨勢。無政府主義者真是一些怪人：他們始終一味說着「公正」，而他們對於辯證方法採取十分不公正的態度！

我們再往下說吧。在我們的那些無政府主義者看來，「辯證的發展是毀滅性的發展，由於這種發展，首先是過去的一切消滅乾淨，然後是將來的一切另行確立起來……居維葉的激變是由一些不知道的原因引起的，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毀滅則是由辯證法產生的」（見『號召報』第八期沙·哥·的論文）。同一個作者又在另一個地方寫道：「馬克思主義是依據達爾文主義，並對

它採取不批判的態度。」（見『號召報』第六期）

讀者，請好好地思索一下吧！

居維葉否認達爾文的進化，只承認激變，而激變是『由一些不知道的原因引起的』突然爆發。無政府主義者說：馬克思主義者附和居維葉，因而是排斥達爾文主義的。

達爾文否認居維葉的激變，承認漸次的進化。於是那些無政府主義者又說，『馬克思主義是依據達爾文主義，並對它採取不批判的態度』，因而馬克思主義者不是擁護居維葉的激變的人。

這才真是無政府狀態！這真是下士的老婆自己摸自己！顯然，『號召報』第八期上的沙·哥·忘記了第六期上的沙·哥·說的話。究竟哪一期說得對：是第六期還是第八期呢？或者是兩期都在撒謊呢？

讓我們看看事實吧。馬克思說：『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便和現存生產關係或不過是現存生產關係在法律上的表現的財產關係發生矛盾……那時社會革命時代就到來了。』但是，『不論哪種社會形態，當從它這裏獲得充分發展餘地的一切生產力還沒有展開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如果把馬克思的思想應用到現代社會生活中去，那就可以看出具有社會性的現代生產力和具有私人性的產品佔有之間存在着根本的衝突，而這個衝突是一定要由社會主義革命來結束的（見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三編第二章）。由此可見，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見，『革命』（『毀滅』）並不是由居維葉所說的『不知道

的原因』產生的，而是由那些叫做『生產力的發展』的完全確定的和極端重大的社會原因產生的。由此可見，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見，革命只有在生產力足夠成熟的時候才會發生，而並不是像居維葉所想的那樣突如其來的。很明顯，居維葉的激變和馬克思的辯證方法之間是沒有絲毫共同點的。另一方面，達爾文主義不僅攔斥居維葉的激變，而且也攔斥按辯證法來了解的革命，但從辯證方法觀點看來，進化和革命、量變和質變乃是同一運動的兩個必要形式。很明顯，同樣也決不能說『馬克思主義……對達爾文主義採取不批判的態度』。這樣，『號召報』在前後兩種場合，即無論在第六期或第八期，都是撒謊的。

這些撒謊的『批評家』糾纏着我們，一味固執地說：不管你們願意不願意，我們的謊話總比你們的真話好些！大概他們以為無政府主義者總是情有可原的。

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在另一點上也不能寬恕辯證方法，他們說『辯證法……並不使人有可能翻來翻去、跳躍自如』（見『號召報』第八期沙·哥·的論文）。可敬的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這完全是真話，諸位在這裏說得十分對，辯證方法不使人有這種可能。但是，為什麼不使人有這種可能呢？因為『翻來翻去、跳躍自如』是野羊的消遣，而辯證方法是供人使用的。秘密就在這裏！……

一般說來，我們那些無政府主義者對於辯證方法的看法就是如此。

很明顯，無政府主義者沒有懂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證方法，他們虛構了自己的辯證法，並

且正是這樣無情地和自己的這套辯證法進行鬥爭。

我們瞧見這種情景只能付之一笑，因為看到一個人和自己的幻想作鬥爭，粉碎自己的虛構，同時却竭力要別人相信他在打擊敵人，這是不能不令人發笑的。

二

『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馬克思

什麼是唯物主義理論呢？

世界上的一切都在變化，世界上的一切都在運動，但這種變化是怎樣發生的呢？這種運動是採取什麼形式的呢？——問題就在這裏。例如我們知道，地球原來是熾熱的熔漿，後來逐漸冷卻，然後產生出動物界，隨着動物界的進化出現了一種猿猴，最後這種猿猴變成了人。但這種發展的經過是怎樣的呢？有些人說在自然界及其發展以前先有世界觀念，以後這種世界觀念成了這種發展的基礎，所以自然現象的發展進程不過是觀念發展的空洞形式。這些人叫做唯心主義者，他們後來分成了幾派。有些人則說，世界上一開始就存在着兩個彼此對立的力量：觀念和物質，與此相適應，各種現象也分為兩類：觀念的和物質的，這兩類現象之間經常發生鬥爭，所以自然現象

的發展就是觀念的現象和物質的現象之間的經常的鬥爭。這些人叫做二元論者，他們也像唯心主義者一樣分成各種不同的派別。

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理論既根本否定二元論，也根本否定唯心主義。當然，世界上確實存在着觀念的現象和物質的現象，但這決不是說，它們似乎是互相否定的。恰恰相反，觀念的現象和物質的現象是同一現象的兩個不同的形式；它們共同存在，共同發展，彼此間有密切的聯系。因而我們沒有任何根據設想它們是互相否定的。這樣，所謂二元論就根本倒台了。統一而不可分的自然表現在物質的和觀念的兩種不同形式上，——我們應該這樣去看自然的發展。統一而不可分的生活也表現在觀念的和物質的兩種不同的形式上，——我們應該這樣去看生活的發展。

這就是馬克思唯物主義理論的一元論。

同時，馬克思也否定唯心主義。認為觀念和一般精神方面的發展彷彿是先於自然和一般物質方面的發展，這是不正確的。世界上還沒有生物的時候，所謂外部的、無機的自然界就已經存在了。第一個生物（原形質）是沒有任何意識（觀念）的，它僅僅具有感受刺激的性能力和感覺的萌芽。以後動物的感覺能力漸漸發展，隨着動物神經系統的發展而慢慢轉化為意識。如果猿猴總是用四隻腳行走，如果它沒有直起身子，那末它的後代（即人類）就不能自由地利用自己的肺和聲帶，因此也就不能說話，而這種情形就會大大阻滯人類意識的發展。還有，如果猿猴沒有用後面兩隻腳站起來，那末它的後代（即人類）也就會總是只向下方看並只從下方攝取印象，也就沒有

可能向上方看，向四周看，因而也就沒有可能使自己的頭腦獲得的材料（印象）較猿猴爲多；這樣就會使人類意識的發展大大受到阻礙。由此可見，爲了精神方面的發展，就需要有機體的適當構造及其神經系統的發展。由此可見，物質方面的發展，存在的發展，先於精神方面的發展，先於觀念的發展。顯然，首先是外部條件發生變化，首先是物質發生變化，然後意識和其他精神現象才相應地發生變化，——觀念方面的發展落後於物質條件的發展。如果我們把物質方面、外部條件、存在以及諸如此類的現象叫做內容，那末我們就應當把觀念方面、意識以及諸如此類的現象叫做形式。由此就產生出一個著名的唯物主義原理：在發展過程中，內容先於形式，形式落後於內容。

關於社會生活也要這樣說。這裏也是物質的發展先於觀念的發展，這裏也是形式落後於自己的內容。當科學社會主義還根本不存在的時候，就已經有了資本主義並且進行着劇烈的階級鬥爭了；當任何地方都還沒有產生社會主義思想的時候，生產過程就已經具有社會性質了。

因此，馬克思說：『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在馬克思看來，經濟發展是社會生活的物質基礎，是它的內容，而法律、政治的和宗教、哲學的發展是這個內容的『思想形式』，是它的『上層建築』，所以馬克思說：『隨着經濟基礎的改變，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會相當迅速地發生變革。』（見同書）

在社會生活中也是外部物質條件首先發生變化，然後才是人們的思維、人們的世界觀發生變化。內容的發展先於形式的產生和發展。當然，這決不是說，在馬克思看來，彷彿沒有形式的內容是可能的，像沙·哥·以爲的那樣（見『號召報』創刊號『一元論批判』一文）。沒有形式的內容是不可能的，但是問題在於這種或那種形式因落後於自己的內容，始終不能完全適合於這個內容，於是新的內容往往『不得不』暫時包藏在舊的形式中，因而引起它們之間的衝突。例如現在生產品佔有的私人性不適合生產的社會內容，而現代的社會『衝突』恰恰是在這個基礎上發生的。另一方面，認爲觀念是存在的形式，這並不是說，彷彿意識按其本性說來也是同一種物質。只有庸俗的唯物主義者（如布赫納爾和摩萊蕭特）才這樣想，他們的理論和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是根本矛盾的，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論』中很公允地嘲笑過他們。按照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說來，意識和存在、精神和物質，這是一般稱爲自然的同一現象的兩種不同形式。所以它們既互相互否定^①，也不是同一現象。問題只在於在自然和社會的發展中，在意識（我們頭腦中發生的東西）產生以前，總是先有相應的物質變化（我們身外發生的東西）出現；隨着某種物質變化之後，遲早一定會有相應的觀念變化。因此我們說觀念變化是相應的物質變化的形式。

一般說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證唯物主義的一元論就是如此。

① 這並不與認爲形式和內容間存在着衝突的意見相矛盾。問題在於這種衝突不是存在於一般內容和形式之間，而是存在於舊形式和新內容之間，因爲新內容尋求新形式，並且趨向於新形式。

有些人會向我們說：很好，這一切就自然和社會的歷史說來都是正確的。但是，現在我們頭腦中關於這些或那些對象的各種各樣的觀念和思想又是怎樣產生的呢？所謂外部條件是否實際存在，或者存在的只是我們關於這些外部條件的觀念呢？如果外部條件存在，那末可以感覺和認識它們的程度又是怎樣的呢？

關於這一點，我們說：我們的觀念，我們的「我」之所以存在，只是因為使我們的「我」發生印象的外部條件存在的緣故。誰要是輕率地斷定說，除了我們的觀念以外什麼都不存在，誰就不得不否認任何外部條件的存在，因而也就否認其餘一切人的存在，而只承認自「我」的存在，但這是和科學原理和實際活動根本矛盾的。是的，外部條件是確實存在的，這些條件存在於我們未生之前，也將存在於我們已死之後，並且它們愈是頻繁而強烈地影響我們的意識，我們就愈能迅速和容易地感受和認識它們。至於現在，我們頭腦中關於這些或那些對象的各種各樣觀念和思想是怎樣產生的，那我們應當指出，這裏也是簡略地重複着自然歷史和社會歷史中所發生的那種情形。在這種場合，我們身外的對象也是先於我們關於這個對象的觀念而存在的，在這種場合，我們的觀念即形式也落後於對象，即落後於自己的內容等等。如果我望着樹，就看見了樹，這只是表明，在我的頭腦中還沒有產生樹的觀念以前，樹本身就已存在，樹使我產生了相應的觀念。不難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元論唯物主義對於人們的實際活動該有多麼重大的意義。既然我們的世界觀，我們的風俗習慣由外部條件引起，既然法律形式和政治形式的不適用是決

定於經濟內容的，那就很明顯，我們應當促進經濟關係的根本改造，以便使人民的風俗習慣和國家的政治制度也隨之根本改變過來。

以下就是馬克思關於這一點所說的話：

『並不需要多大的聰明就可以看出……唯物主義學說和社會主義之間的聯系。如果人是從感性世界吸取自己的一切知識、感覺等等……那就必須這樣安排周圍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體驗到真正合乎人性的東西，使人在其中習慣於養成人的特性……如果從唯物主義的意義上來說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說，如果人不是由於有避免某種事物的消極力量，而是由於有表現本身真正個性的積極力量才是自由的，那就不應懲罰個別分子的犯罪行為，而應消滅犯罪行為的反社會的根源……如果人的性格是由環境造成的，那就必須使環境成為合乎人性的環境。』（見『費爾巴哈論』的附錄：『馬克思論十八世紀法國唯物主義』）

唯物主義與人們實際活動之間的聯系就是如此。

無政府主義者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元論唯物主義的看法是怎樣的呢？

如果說馬克思的辯證法導源於黑格爾，那末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就是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發展。這是無政府主義者所熟知的，於是他們就企圖利用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兩人的缺陷來糟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證唯物主義。關於黑格爾，我們已經指出：無政府主義者玩弄的這種詭計，

除了證明自己論戰無力而外，是什麼也證明不了的。關於費爾巴哈也必須這樣說。例如無政府主義者竭力強調說：『費爾巴哈是個汎神論者……』他『把人神化了……』（見『號召報』第七期傑連吉的論文）『在費爾巴哈看來，人就是他所吃的那種東西……』似乎馬克思由此作出了結論：『因此，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是經濟地位』等等（見『號召報』第六期沙·哥·的論文）。誠然，費爾巴哈是個汎神論者，他把人神化了，同時還犯了其他類似的錯誤，這是我們誰也不懷疑的。恰恰相反，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揭露了費爾巴哈的錯誤，但無政府主義者還是認為必須把費爾巴哈那些已被揭露的錯誤再『揭露』一次。為什麼呢？大概因為他們想在痛罵費爾巴哈的時候，把馬克思從費爾巴哈那裏借用來然後科學地發展了的唯物主義也糟蹋一番。難道費爾巴哈除了有錯誤的思想而外就不能有正確的思想嗎？我們斷言，無政府主義者用這種詭計絲毫也動搖不了一元論唯物主義，只不過證明他們自己的無力罷了。

在無政府主義者自己中間對馬克思唯物主義的看法也是互不一致的。假若聽信車爾凱茲施維里先生的話，那末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憎惡一元論的唯物主義的了；按照他的意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義就是庸俗的而不是一元論的了；『自然科學家的那種具有進化論體系、變遷說和一元論唯物主義思想的偉大科學，即恩格斯極其憎惡的科學……是避開了辯證法的』等等（見『號召報』第四期車爾凱茲施維里的論文）。這樣說來，車爾凱茲施維里所喜歡而為恩格斯所憎惡的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是一元論的唯物主義。另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却向我們說，馬克思和恩

格斯的唯物主義是一元論的唯物主義，因而是應該摺棄的。『馬克思的歷史觀點是黑格爾隔代遺傳的東西。一般地說，絕對客觀主義的一元論唯物主義，其中也有馬克思的經濟一元論，在自然界中是不可能的，在理論上是錯誤的……一元論唯物主義乃是一種掩飾不周的二元論，並且是形而上學和科學之間的妥協……』（見『號召報』第六期沙·哥·的論文）這樣說來，一元論的唯物主義是不可接受的東西，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不憎惡它，而且相反，他們自己就是一元論的唯物主義者，所以一元論的唯物主義是應該摺棄的。

這才真是無政府狀態！他們自己還沒有弄清馬克思唯物主義的本質，他們自己還不懂得馬克思唯物主義是不是一元論的唯物主義，他們彼此之間對這個唯物主義的優點和缺點的問題還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就大吹大擂地說：我們是在批評和消滅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單從這一點已可看出他們的『批評』能有多少是有根據的。

我們往下講吧。原來有些無政府主義者甚至不知道科學中有各種各樣的唯物主義，不知道各種唯物主義彼此間有很大的區別，例如有否認觀念方面的意義及其對物質方面的影響的庸俗唯物主義（在自然科學和歷史方面），也有科學地考察觀念方面和物質方面相互關係的所謂一元論的唯物主義。某些無政府主義者把這一切混為一談，同時神氣十足地聲稱：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但我們是要徹底批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義的！請聽吧：『在恩格斯看來，以及在考茨基看來，馬克思對人類的巨大貢獻，在於他……』也發現了『唯物主義的學說』。『這種意見是否

正確呢？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因為我們知道……凡認為社會機構彷彿是受地理條件、氣候和地球轉動條件、宇宙條件、人類進化條件和生物條件推動的歷史家、科學家和哲學家，全是唯物主義者。（見『號召報』第二期沙·哥·的論文）你跟他們說去吧！這樣說來，亞里士多德的『唯物主義』和孟德斯鳩的『唯物主義』之間，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和聖西門的『唯物主義』之間，是沒有區別的了。這就是所謂了解敵人和徹底批評敵人呀！……

某些無政府主義者不知是在什麼地方聽說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理論就是『填胃的理論』，於是他們就來普及這個『思想』，這大概是因為『號召報』編輯部對紙張價格估計很低，覺得這種做法花錢不多吧。請聽吧：『在費爾巴哈看來，人就是他所吃的那種東西。這個公式迷住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於是在無政府主義者看來，馬克思由此就作出結論說，『因此，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是經濟地位，是生產關係……』接着，無政府主義者就用哲學家的口吻教訓我們說：『如果吃飯和經濟生產是達到這個目的（社會生活）的唯一手段，那就錯了……如果思想體系主要地、一元地由吃飯和經濟生活來決定，那末某些饕餮之徒就會是天才人物了。』（見『號召報』第六期沙·哥·的論文）你看，要把馬克思的唯物主義駁倒，原來多麼容易呵。只須從某個貴族女學生那裏聽到一些誹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街談巷議，只須用哲學家的武斷的口吻把這些街談巷議在什麼『號召報』上重複一下，就能馬上博得『批評家』的頭銜了。但是，請諸位先生告訴我們吧：究竟何時、何地、在哪個國家，有哪個馬克思說過『吃飯決定思想體系』呢？為什麼你們沒有從馬

克思著作中引出一句話或一個字來證實你們的這種責難呢？難道經濟生活和吃飯是同一種東西嗎？要是某個貴族女學生把這些完全不同的概念混爲一談，那還情有可原，但是你們這些『社會民主黨的摧毀者』和『科學的復活者』，怎麼會如此漫不經心地重複着貴族女學生的錯誤呢？而且吃飯又怎能決定社會思想體系呢？請考慮一下你們自己所說的話吧：吃飯和吃飯的形式是不變的，人們吃飯、咀嚼和消化食物古今都是一樣的，而思想體系始終在變化和發展。例如古代的思想體系、封建的思想體系、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以及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這也就是思想體系的幾種形式。一般說來，難道不變的東西能決定經常變化的東西嗎？經濟生活決定着思想體系，馬克思確實這樣說過，而這是容易了解的，但是，難道吃飯和經濟生活是同一種的東西嗎？爲什麼你們一定要把自己的糊塗觀念加在馬克思頭上呢？……

我們再往下講吧。在我們的那些無政府主義者看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也就是平行主義……』或者說：『一元論唯物主義乃是一種掩飾不周的二元論，並且是形而上學和科學之間的妥協……』『馬克思之所以陷入二元論，是因爲他把生產關係說成物質現象，而把人們的意向和意志說成雖然存在但沒有意義的幻想和空想。』（見『號召報』第六期沙·哥·的論文）第一、馬克思的一元論唯物主義是和糊塗的平行主義毫無共同之處的。同時從唯物主義的觀點看來，物質方面（內容）必然先於觀念方面（形式），平行主義却駁斥這個觀點並堅決宣稱物質方面和觀念方面沒有先後之分，它們兩者是一道地、平行地運動的。第二、我們清楚知道（無政府主義者

先生們，如果你們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的話，你們也應該知道！）馬克思的一元論從一個原則出發，即從具有物質形式和觀念形式的自然這個原則出發，而二元論則從兩個原則出發，即從物質和觀念這兩個按二元論說來是互相否定的原則出發，那末馬克思的一元論和二元論之間又有什麼共同點呢？第三、誰說過似乎「人們的意向和意志是沒有意義的」呢？為什麼你們不指明馬克思在什麼地方說過這一點呢？難道馬克思在『拿破崙第三政變記』、『法蘭西階級鬥爭』、『法蘭西內戰』及其他小冊子中不是說的『意向和意志』的意義嗎？如果馬克思不承認『意向和意志』的意義，那他為什麼又努力用社會主義精神來發展無產者的『意志和意向』，他為什麼又在無產者中間進行宣傳呢？再者，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四年間發表的一些著名論文中說的不是『意向和意志的意義』，又是什麼呢？人們的意向和意志是從經濟生活中吸取本身的内容，然而這並不是說意向和意志絲毫不影響經濟關係的發展。難道我們的無政府主義者真是這樣難於了解這一簡單的意思嗎？無怪乎有人說：熱心批評是一回事，而批評本身是另一回事！真是一點也不錯……

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還責難說：『不能想像沒有內容的形式……』因此就不能說『形式落後於內容……它們「同時並存」……否則一元論就成為無稽之談了』（見『號召報』創刊號沙·哥·的論文）。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有點糊塗了。沒有形式的內容是不能想像的，然而現有的形式永遠不會完全適合於現有的內容，新內容在某種程度上總是包藏在舊形式中，因此舊形式和新內

容之間總是存在着衝突。革命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發生的，馬克思唯物主義的革命精神也表現在這一點上。無政府主義者並沒有了解這一點，却固執地重複說：沒有形式的內容是不會有的……

無政府主義者對唯物主義的看法就是如此。我們就說到這裏為止吧。這也就夠清楚的了：無政府主義者捏造出了一個自己的馬克思，並把他們自己捏造出的一種『唯物主義』硬加在他頭上，然後來攻擊它。可是一粒子彈也沒有打中真正的馬克思和真正的唯物主義……

辯證唯物主義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之間的聯系是怎樣的呢？

載於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二十四

日、二十八日和七月九日『新生活報』第

二、第四、第七和第十六各期

署名：柯巴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註 釋

(一)「鬥爭報」是梯弗里斯社會民主黨組織的列寧火星派用格魯吉亞文秘密出版的第一個報紙。「鬥爭報」的發起人是斯大林。關於創辦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秘密刊物的問題，格魯吉亞第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組織「麥撒曼達西社」中革命的少數（斯大林、克澤霍越里、楚魯啓則）從一八九八年起就進行鬥爭，反對該社機會主義的多數（饒爾丹尼亞等人），而「鬥爭報」的出版就是這一鬥爭的結果。「鬥爭報」在巴庫秘密印刷所排印，這個印刷所是梯弗里斯社會民主黨組織中的革命派責成斯大林最親近的戰友克澤霍越里設立的。該報出版方面的實際工作也由克澤霍越里負責。「鬥爭報」上關於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綱領和策略問題的指導性論文都是斯大林寫的。「鬥爭報」出了四期：創刊號於一九〇二年九月出版，第二、三兩期的合刊於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二月間出版，第四期於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出版。除「火星報」之外，「鬥爭報」是俄國最好的馬克思主義報紙，它堅決主張南高加索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必須和全俄工人階級革命鬥爭緊密聯系。「鬥爭報」也像列寧的「火星報」一樣，捍衛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宣傳了社會民主黨組織必須轉而進行羣衆政治鼓動工作和進行反對專制制度的政治鬥爭，堅持了應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列寧思想。「鬥爭報」在反「經濟派」的鬥爭中，論證了建立工人階級統一的政治黨的必要性，並揭露了自由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和各種各樣的機會主義者。列寧的「火星報」曾指出，「鬥爭報」創刊號的出版是一個極重大的事件。（正文第三頁）。

(二)「工人思想報」是公開宣傳「經濟派」機會主義觀點的報紙，於一八九七年十月創刊，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停刊。共出十六期。——（正文第十四頁）。

(三)一八九七年六月二日頒佈的法令規定工業企業和鐵路工廠工人每日工作時間爲十一小時半，同時這法令又減少了工人的休假日。——（正文第十四頁）。

(四) 指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政府批准的「高等學校學生兵役暫行條例」。根據此項條例，凡參加集體行動來反對高等學校中警察制度的學生，一律開除學籍並罰他們去當沙皇軍隊的普通兵士，期限一年至三年。——(正文第十九頁)。

(五) 「格魯吉亞報」是僑居外國的一批格魯吉亞民族主義者辦的報紙，這批人成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社會聯邦主義黨的核心。該報於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五年在巴黎用格魯吉亞文和法文印行。

格魯吉亞聯邦主義黨於一九〇四年四月在日內瓦成立，參加該黨的，除「格魯吉亞報派」外，還有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民族民主主義者。聯邦主義者的基本要求是格魯吉亞在俄國地主資產階級國家的版圖內實行民族自治。在反動時期他們變成革命的公開敵人。——(正文第二十九頁)。

(六) 「阿爾明尼亞社會民主工人組織」是阿爾明尼亞民族聯邦主義分子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不久建立的。列寧指出，這個組織和崩得有着密切關係。列寧在一九〇五年九月七日(新曆)致中央委員會委員的信中寫道：「這無非是尊為滋養高加索崩得主義而製造出來的崩得的走狗……高加索的同志們都反對這夥搗亂的文人。」(見「列寧文集」第五卷第四九三頁)——(正文第三十一頁)。

(七) 崩得(即立陶宛、波蘭和俄羅斯猶太工人總聯盟)是猶太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組織，於一八九七年十月在維里諾舉行的代表大會上成立。崩得主要是在猶太手工業者中間進行工作。一八九八年俄國社會民主黨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崩得「作為只在專門涉及猶太無產階級的問題上才是獨立的自治組織」，加入俄國社會民主黨，但加入後就在俄國工人運動中以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傳播者的姿態出現。崩得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立場受到列寧「火星報」的嚴厲批評，高加索的火星派完全擁護列寧對崩得的鬥爭。——(正文第三十四頁)。

(八) 這裏所指的黨委員會，於一九〇三年三月在柯弗里斯舉行的高加索社會民主工人組織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統一成為俄國社會民主黨高加索聯盟。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有佛里里斯、巴庫、巴士姆、庫泰依斯、古里亞及其他地方組織的代表。代表大會贊同列寧「火星報」的政治路線，接受「火星報」和「曙光」雜誌的綱領草案為指南，制定並批准了聯盟的專門章程。高加索聯盟第一次代表大會為高加索社會民主主義組織的國際性結構奠定了基礎。代表大會建立了黨的領導機關，即俄國社會民主黨高加索聯盟委員會，當時被監禁在巴士姆監獄中的斯大林缺席當選為該委員會的委員。一九〇四年初，斯大林逃出流放地回到柯弗里斯後，即行領導俄國社會民主黨高加索聯盟委員會。——(正文第三十四頁)。

(九) 斯大林寄自庫泰依斯的兩封信，是在列寧和克魯普斯卡婭兩人同俄國國內各布爾什維克組織來往的信件中發現的。這兩封信是斯大林於一九〇四年九月、十月間逗留庫泰依斯時寫給一位曾在南高加索和他一起進行革命工作的同志達維塔施維里的，後者當時住在萊比錫（德國）並參加萊比錫的布爾什維克小組。關於這兩封信，萊比錫布爾什維克小組中的另一參加者蘇里阿施維里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我們收到斯大林同志興奮地論及列寧的信，這些信是達維塔施維里同志收到的。在這些信中，斯大林同志對列寧表示欽佩，欽佩他那堅定不移的純粹馬克思主義的策略，欽佩他對於黨的建設問題的解決辦法等等。斯大林同志在一封信中稱列寧為「山鷹」，讚美他對孟什維克進行的不調和的鬥爭。我們把這些信轉給了列寧，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他在信中稱斯大林為「熱烈的科爾希德人」。格魯吉亞文的原信沒有找到。——（正文第四十七頁。）」

(十) 指新的、孟什維克的「火星報」。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後，孟什維克在普列漢諾夫的協助下，奪取了「火星報」，利用它來進行反對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鬥爭。他們開始在該報公開宣傳自己的機會主義觀點。孟什維克的「火星報」於一九〇五年十月停刊。——（正文第四十七頁。）

(十一) 一九〇四年秋，「火星報」編輯部被孟什維克奪去後，列寧責成邦契—布魯也維奇組織了一個專門出版社，其任務是出版「黨的書刊，特別是捍衛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多數派的原則立場的書刊」。當時落入孟什維克手中的黨總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多方阻撓布爾什維克書刊的出版和發行。因此，一九〇四年十一月舉行的高加索布爾什維克委員會代表會議就通過了「關於多數派的書刊」的如下決議：「代表會議建議中央委員會把邦契—布魯也維奇和列寧出版的書刊和其他一切闡明黨內意見分歧的黨內書刊一併供給各地黨委員會。」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底，出版工作交給了列寧創辦的「前進報」。——（正文第四十七頁。）

(十二) 「二十二宣言」就是列寧起草的「告全黨書」。一九〇四年八月由列寧主持在瑞士舉行的布爾什維克會議通過了這篇宣言。在斯大林信中提到的小冊子「告全黨書」，其內容除「告全黨書」外，還有里加委員會、莫斯科委員會和日內瓦布爾什維克小組對二十二個布爾什維克會議決議表示贊成的決議。「告全黨書」已成為布爾什維克為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而鬥爭的綱領。俄國社會民主黨大多數的委員會贊成這次布爾什維克會議的決議。一九〇四年九月，高加索聯邦委員會、梯弗里斯委員會和依麥列梯亞—明格列里亞委員會都響應「二十二宣言」並展開鼓動工作，主張立即召開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正文第四十七頁。）

(三) 列寧的「進一步，退兩步」一文寫於一九〇四年九月。這篇論文是對「火星報」第六十九期和德國「新時代」雜誌第四十二、四十三兩期上盧森堡的小品文「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以及「火星報」第六十六期上考茨基的信的答復。列寧本來打算把他的答覆登在德國「新時代」雜誌上，但因該雜誌編輯部同情孟什維克而遭到拒絕。——（正文第四十七頁）。

(四) 即「俄國革命社會民主黨旅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記錄」，由該同盟於一九〇四年在日內瓦出版。——（正文第四十七頁）。

(五) 列寧的「進一步，退兩步」一書寫於一九〇四年二月至五月，並於五月六日（十九日）出版（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一八五頁至第三九二頁）。——（正文第四十七頁）。

(六) 指列寧的「做什麼？」一書（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五卷第三一九頁至第四九四頁）。——（正文第四十七頁）。

(七) 根據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黨總委員會是全黨最高機關。黨總委員會由五人組成：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機關報各委派兩位委員，第五位委員由代表大會選出。總委員會的基本任務是使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機關報的活動協調一致。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後不久，孟什維克就在黨總委員會內獲得優勢而把它變成了自己的派別組織的機關。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消除了黨內幾個中央機關並存的現象，建立了統一的黨中央機關，即中央委員會，而把它分成國外和國內兩部分。根據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中央機關報主筆由中央委員會委派中央委員一人担任。——（正文第五十三頁）。

(八) 列寧的附有作者的序和跋的小冊子「關於我黨組織任務給一位同志的信」，於一九〇四年由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在日內瓦出版（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六卷第二〇五頁至第三二四頁）。——（正文第五十三頁）。

(九) 柯斯特羅夫和安恩都是饒爾丹尼亞的筆名。——（正文第五十三頁）。

(十) 「黎溝報」是格魯吉亞文周報，自由民族主義派的機關刊物。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七年間，這個周報常供給「麥撒羅達西社」中的初學寫作者以篇幅。一八九七年底，該報轉入「麥撒羅達西社」多數派（饒爾丹尼亞等人）手中而成了「合法馬克思主義」的傳聲筒。俄國社會民主黨內部產生了兩派——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以後，「黎溝報」就成為格魯吉亞孟什維克的機關報了。該報於一九〇四年被政府封閉。——（正文第五十三頁）。

(十一) 「無產階級鬥爭報」是用格魯吉亞文出版的秘密報紙，俄國社會民主黨高加索聯盟的機關刊物，於一九〇三年

四、五月創刊，一九〇五年十月停刊。第十二期出版後即被封閉。一九〇四年斯大林從流放地歸來後便領導該報的編輯部。參加編輯部的還有：楚魯啓則、邵武勉等人。報上所載指導性的論文是斯大林寫的。『無產階級鬥爭報』是『鬥爭報』的繼承者。俄國社會民主黨高加索聯盟第一次代表大會決定把阿爾明尼亞社會民主黨的『無產階級報』和『鬥爭報』合併爲一個總的機關報，用格魯吉亞文、阿爾明尼亞文和俄文三種文字出版，內容都是一樣的，仍舊保持以前用上述文字出版的期次。『無產階級鬥爭報』一貫堅持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思想原則、組織原則和策略原則，除『前進報』和『無產者報』外，它是最大的布爾什維克秘密報紙。『無產階級鬥爭報』編輯部與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國外中央保持密切聯繫。一九〇四年十二月，當『前進報』發表出版通告時，高加索聯盟委員會就組織了一個寫稿組來支持『前進報』。列寧於一九〇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新曆）在答覆聯盟委員會請他參加『無產階級鬥爭報』撰稿工作的來信中寫道：『親愛的同志們！我收到了你們關於『無產階級鬥爭報』的來信。我將盡力給你們寫東西並把你們的意見轉告編輯部的同志們。』（見『列寧文集』第十五卷第二六七頁）『無產階級鬥爭報』經常從列寧『火星報』後來又從『前進報』和『無產者報』上轉載各種文章和材料。該報發表了列寧的許多論文。『無產者報』屢次登載對於『無產階級鬥爭報』的良好評論和介紹，並轉載該報的論文和通訊。『無產者報』第十二期報道了俄文版『無產階級鬥爭報』創刊的消息。在這段消息的末尾說道：『我們還要談到這個極有意義的報紙的內容。我們熱烈慶賀高加索聯盟出版事業的擴大，並祝它在高加索一帶進行恢復黨性的工作上獲得進一步的成功。』（正文第五十三頁）。

（三）指斯大林的『社會民主黨怎樣理解民族問題？』一文（見本卷第二十七頁）。——（正文第五十三頁）。

（三）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沙皇尼古拉第二所下的『聖旨』連同政府特別通告，於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報上公佈。這道『聖旨』在允許實行某些不關重要的『改革』的同時，宣佈專制政權的不可搖撼性，並包含許多不僅是對革命工農羣衆，而且也是對那些敢於向政府提出怯懦的憲制要求的自由派分子的威嚇。照列寧的說法，尼古拉第二的『聖旨』是『直接賞給自由派的一個耳光。』（正文第六十七頁）。

（四）『憲法草案』是自由派『解放同盟』中一批盟員於一九〇四年十月間所擬定的，並於同年在莫斯科出版單行本。題爲『俄羅斯帝國根本法。俄國憲法草案』。——（正文第六十八頁）。

（五）斯大林的『略論黨內意見分歧』一書寫於一九〇五年四月底。這是對饒爾丹尼惠的幾篇論文（在『社會民主黨人報』

上發表的「多數派還是少數派？」和在「旅行家」雜誌上發表的「什麼是黨？」等等）的答覆。關於斯大林的「略論黨內意見分歧」一書出版的消息，布爾什維克國外中央很快就知道了。一九〇五年七月十八日，克魯普斯卡婭致函俄國社會民主黨高加索聯盟委員會，要求把這書寄一本到國外去。「略論黨內意見分歧」一書在南高加索各布爾什維克組織中傳播得很廣泛，先進工人們根據這本書認識了黨內的意見分歧，認識了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立場。這本書是在俄國社會民主黨高加索聯盟秘密印刷所（阿爾拉巴爾印刷所）用幾種文字（一九〇五年五月用格魯吉亞文，同年六月又用俄文和阿爾明尼亞文）印的，每種文字各印一千五百冊至二千冊。——（正文第七十九頁）。

(二六)「火星報」是第一個全俄馬克思主義的祕密報紙，一九〇〇年由列寧創辦。列寧「火星報」創刊號於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二十四日）在萊比錫出版，隨後幾期在慕尼黑出版，自一九〇二年四月起在倫敦出版，自一九〇三年春大起則在日內瓦出版。當時在俄國許多城市（彼得堡、莫斯科及其他城市）中建立了列寧火星派的俄國社會民主黨小組和委員會。在南高加索堅持「火星報」思想的，有格魯吉亞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祕密的機關刊物「鬥爭報」（關於「火星報」的意義和作用，見「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四九年莫斯科中文版第四十六頁至第五十六頁）。——（正文第八十頁）。

(二七)「社會民主黨人報」是高加索亞什維克的祕密報紙，於一九〇五年四月至十一月在梯弗里斯用格魯吉亞文出版。該報由薩爾丹尼亞主持，「社會民主黨人報」創刊號是作為「俄國社會民主黨梯弗里斯委員會機關報」出版的，後來該報自稱為「高加索社會民主工人組織機關報」。——（正文第八十一頁）。

(二八)「工人事業」雜誌是僑居外國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合會（「經濟派」）的不定期機關刊物。該雜誌於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二年在日內瓦出版。——（正文第八十二頁）。

(二九)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四卷第三四三頁。——（正文第八十三頁）。

(三〇)斯塔羅維爾是波特列索夫的筆名。——（正文第八十三頁）。

(三一)見「馬克思選集」兩卷本一九四一年俄文版卷上第一五〇頁。——（正文第八十八頁）。

(三二)「新時代」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德文雜誌，於一八八三年至一九二三年在斯圖加特出版。——（正文第八十九頁）。

(三三)「旅行家」是一種歷史考古學和地理人種學的格魯吉亞文雜誌，於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在梯弗里斯出版。從一九〇五年一月起，「旅行家」成了格魯吉亞社會民主黨人的文藝政治周刊，由馬哈拉則主編。「旅行家」除刊登布爾

什維克的文章外，還刊登孟什維克的文章。——（正文第九十一頁）。

〔四〕「加因斐綱領」是奧國社會民主黨於一八八八年在加因斐城建黨大會上通過的。這個綱領的原則部分包含一些正確闡明社會發展進程和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任務的論點。後來，在一九〇一年維也納代表大會上，「加因斐綱領」已被含有修正主義原則的新綱領代替了。——（正文第一〇〇頁）。

〔五〕見「馬克思選集」兩卷本一九四一年俄文版卷下第二七八頁至第二七九頁。——（正文第一〇四頁）。

〔六〕「曙光」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雜誌，由列寧創辦，同時與「火星報」由同一個編輯部主編出版。該雜誌於一九〇一年四月至一九〇二年八月在斯圖加特出版。——（正文第一〇八頁）。

〔七〕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一七七頁。——（正文第一一二頁）。

〔八〕「社會民主黨人日誌」是一九〇五年三月至一九一二年四月由普列漢諾夫在日內瓦出版的不定期雜誌，共出十六期。一九一六年又出過一期。——（正文第一一二頁）。

〔九〕公察克黨人是阿爾明尼亞小資產階級「公察克黨」的黨員。該黨於一八八七年由阿爾明尼亞族大學生發起在日內瓦成立。「公察克黨」在南高加索取名阿爾明尼亞社會民主黨，在工人運動中進行分裂政策。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革命以後，「公察克黨」已蛻變成一個反動的民族主義集團。——（正文第一二二頁）。

〔一〇〕見「聯共（布）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四〇年第六版卷上第四十五頁。——（正文第一二二頁）。

〔一一〕「無產階級鬥爭報」第十一期只登載了斯大林的「臨時革命政府和社會民主黨」一文的前一部分。根據保存在檔案中的，由斯大林擬定的「無產階級鬥爭報」各期（第十二、十三、十四期）編輯計劃的手稿看來，該文後一部分原定在該報第十三期上發表，但因「無產階級鬥爭報」出到第十二期就停刊了，所以這一部分也就未能發表。保存在憲兵局檔案中的這一部分只有俄文譯稿。格魯吉亞文的原稿沒有找到。——（正文第二二五頁）。

〔一二〕第二國際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於一九〇四年八月舉行。——（正文第一二八頁）。

〔一三〕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見「馬克思選集」兩卷本一九四一年俄文版卷下第一三一、一三二頁）。——（正文第二二九頁）。

〔四〕指列寧的「論臨時革命政府」一文，其中引證了恩格斯的論文「在工作中的「巴枯寧主義者」」（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八卷第四四三、四四四、四四六頁）。——（正文第一三二頁）。

〔五〕指內政部長布里根主持的委員會所制定的關於成立諮詢性國家杜馬的法令草案和杜馬選舉條例。法令草案和選舉條例是一九〇五年八月六日（十九日）和沙皇宣言一起公佈的。布爾什維克宣佈積極抵制布里根杜馬。布里根杜馬還沒有召集起來就被革命力量掃除了。——（正文第一四〇頁）。

〔六〕發表在「無產階級鬥爭報」第十一期的斯大林的「答「社會民主黨人報」」一文，受到僑居外國的布爾什維克中央的熱烈歡迎。列寧在「無產者報」上簡括地說明斯大林這篇論文的基本內容時寫道：「在「答「社會民主黨人報」」這篇論文中，我們看到對於「從外面灌輸意識」這一有名問題的絕妙提法。作者把這個問題分成四個獨立部分：

（一）關於意識對存在的關係的哲學問題；存在決定意識。由於存在着兩個階級，所以就創造出兩種意識：資產階級意識和社會主義意識。社會主義意識是適合於無產階級地位的。

（二）「誰能創造和誰在創造這種社會主義意識（科學社會主義）呢？」

「現代社會主義意識只有在深廣的科學知識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出來」（考茨基），這就是說，這種意識的創造工作「是個具有為此所必需的經費和閒暇時間的社會民主主義知識分子的事」。

（三）這種意識怎樣深入到無產階級中去呢？「在這裏也就出現了社會民主黨（而不只是社會民主黨的知識分子），它把社會主義意識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

（四）社會民主黨到無產階級中去宣傳社會主義時在無產階級那裏遇到的是什麼呢？就是對社會主義的本能的傾向。「與無產階級產生的同時，無產者本身和那些傾向無產階級觀點的人中間，必然也會產生社會主義傾向。社會主義傾向的產生是應當這樣解釋的。」（考茨基）

孟什維克却由此得出一個可笑的結論：「由此可見，社會主義並不是從外面灌輸到無產階級中去的，恰恰相反，它是從無產階級中間產生出來，然後灌輸到那些傾向無產階級觀點的人們頭腦中去的！」（見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一日（二十四日）「無產者報」第二十二期「黨內生活」欄第六頁。）——（正文第一四三頁）。

〔四七〕「答聯盟委員會」一文是以一九〇五年七月一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三期附張的形式出版的。該文作者是格魯吉

亞孟什維克的領袖德爾丹尼亞，他的觀點在斯大林的「略論黨內意見分歧」一書及其他著作中受到無情的批評。——（正文第一四三頁）。

（四六）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六卷第二一九頁。——（正文第一五一頁）。

（四九）「莫斯科新聞」是一七五六年創刊的報紙，代表最反動的農奴主貴族和僧侶集團的利益。一九〇五年起成為黑黨的機關報。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被封閉。——（正文第一五五頁）。

（五〇）「俄羅斯新聞」是一八六三年起由莫斯科大學的自由派教授和地方自治局活動家們在莫斯科出版的報紙，代表自由派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利益。一九〇五年起成為立憲民主黨右派的機關報。——（正文第一五六頁）。

（五一）「無產者報」是布爾什維克的秘密周報，是根據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創辦的黨中央機關報，於一九〇五年五月十四日（二十七日）至十一月十二日（二十五日）在日內瓦出版。共出二十六期。該報主筆是列寧。「無產者報」繼續了舊「火星報」即列寧「火星報」的路綫，並且是布爾什維克「前進報」的繼承者。「無產者報」因列寧遷居彼得堡而停刊。——（正文第一五七頁）。

（五二）立憲民主黨是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的主要政黨，成立於一九〇五年十月。立憲民主黨人以虛偽的民主主義為掩飾，自稱為「人民自由黨」，竭力要把農民拉到自己方面去。他們力圖用君主立憲形式把沙皇制度保全下來。後來立憲民主黨變成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政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立憲民主黨人組織了許多反革命的陰謀和暴動來反對蘇維埃共和國。——（正文第一六一頁）。

（五三）「高加索工人小報」是高加索第一個公開的布爾什維克日報，於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十四日在梯弗里斯用俄文出版，由斯大林和邵武勉兩人主持。俄國社會民主黨高加索聯盟第四次代表會議承認該報為高加索聯盟正式機關報。共出十七期。最後兩期曾改名「葉里薩維特波里通報」出版。——（正文第一七七頁）。

（五四）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拉脫維亞的若干城市，如杜爾姆、達里奈、魯恩、弗利得利赫什達特等等都被起義的工人、傭農和農民的武裝隊伍佔領。反對沙皇軍隊的游擊戰爭開始了。一九〇六年一月拉脫維亞各地的起義都被沙皇的將軍奧爾洛夫、索洛古布等人率領的討伐隊鎮壓下去。——（正文第一八四頁）。

（五五）斯大林的「國家杜馬和社會民主黨的策略」一文發表於一九〇六年三月八日的「黎明報」上。該報是俄國社會民主

工黨梯弗里斯聯合委員會的機關報（日刊），於一九〇六年三月五日至十日出版了幾次。這篇文章正式闡述了布爾什維克對於杜馬的策略問題的觀點，在第一期「黎明報」上曾登一篇署名赫、標題為「國家杜馬的選舉和我們的策略」的文章，其中反映孟什維克對這一問題的觀點。在斯大林的論文發表時，編輯部附有下列一段按語：「昨天我們在本報上登了一篇文章，它所表明的是我們一部分同志關於參加國家杜馬問題的見解。今天又按照預告登了第二篇文章，它所表明的是我們另一部分同志關於本問題的原則性的見解。讀者可以看出，這兩篇文章彼此有原則上的差別：前一篇文章贊成參加杜馬選舉，後一篇的作者則反對參加。前後兩種見解都不僅是個人的意見，它們表示黨內存在着的兩個派別的策略方針，不僅我們這裏的情形如此，整個俄國的情形也如此。」——（正文第一八七頁）。

〔英〕「革命俄國報」是社會革命黨的機關報，於一九〇〇年底創刊，一九〇五年停刊，起初由「社會革命者同盟」出版，自一九〇二年一月起成為社會革命黨的中央機關報。——（正文第二〇三頁）。

〔五〕「新生活報」是布爾什維克的第一個公開報紙，於一九〇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三日在彼得堡出版。自列寧回國後，「新生活報」就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出版。高爾基積極參加過該報工作。「新生活報」出至第二十七期被當局封閉。該報最後一期（即第二十八期）是秘密出版的。——（正文第二〇六頁）。

〔其〕「開端報」是孟什維克公開出版的日報，於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二日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二〇六頁）。

〔五〕「新聞小報」是格魯吉亞文日報，於一八九六年至一九〇六年在梯弗里斯出版。該報自一九〇〇年底起成為格魯吉亞民族主義者的傳聲筒，自一九〇四年起又成為格魯吉亞社會聯邦主義者的機關報。——（正文第二〇七頁）。

〔六〕「閃電報」是格魯吉亞文日報，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梯弗里斯聯合委員會的機關報，在「黎明報」被封後開始出版。創刊號於一九〇六年三月十二日出版，最後一期出版於同年四月十五日。代表布爾什維克在「閃電報」上發表指導性文章的是斯大林。共出了二十七期。——（正文第二〇九頁）。

〔六〕俄國社會民主黨第四次（統一）代表大會於一九〇六年四月十日至二十五日（四月二十三日至五月八日）在斯德哥爾摩舉行。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有波蘭、立陶宛、拉脫維亞的民族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和崩得的代表。有許多布爾什維克組織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武裝起義後被政府擊散，沒有能夠派出代表。代表大會上的多數（雖然為數並不怎樣多）是在孟

什維克方面，孟什維克在代表大會上既佔優勢，也就決定了代表大會對若干問題的決議的性質。斯大林化名依萬諾維奇代表梯弗里斯布爾什維克組織出席大會。他在大會上參加了關於土地綱領草案、關於對目前形勢估計和關於國家杜馬等問題的辯論，曾幾次發言。此外，斯大林在代表大會上還發表幾次聲明，用具體事實揭露南高加索孟什維克對於國家杜馬、對於和崩得訂立協約等問題上的機會主義策略。——（正文第二二五頁）。

〔三〕約翰是馬斯洛夫的筆名。——（正文第二二五頁）。

〔四〕諾·赫·就是孟什維克諾依·赫米里基。——（正文第二二一頁）。

〔五〕『實話報』是格魯吉亞孟什維克的政治文藝日報，於一九〇六年用格魯吉亞文在梯弗里斯出版。——（正文第二二一頁）。

〔六〕考茨基和蓋得在那個時期還沒有轉入機會主義者的營壘。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的俄國革命對於國際革命運動，特別對於德國工人階級，發生了巨大的影響，所以考茨基在這次革命影響下對於若干問題是以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態度發表意見的。——（正文第二二一頁）。

〔七〕『新生活報』是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十四日用格魯吉亞文在梯弗里斯出版的布爾什維克日報。該報領導人是斯大林，經常參加該報工作的有達維塔施維里、捷里亞、基柯則等人。共出二十期。——（正文第二二一頁）。

〔八〕這裏引證的是列寧的『俄國目前形勢和工人政黨的策略』一文（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卷第九十八頁至第九十九頁）。這篇論文是在『黨內消息』上發表的。『黨內消息』是俄國社會民主黨聯合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於黨的第四次（統一）代表大會前夜在彼得堡秘密出版，共出兩期，創刊號在一九〇六年二月七日出生，第二期在一九〇六年三月二十日出生。——（正文第二二三頁）。

〔九〕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見『馬克思選集』兩卷本一九四一年俄文版卷下第一一〇頁至第一一二頁）。——（正文第二二三頁）。

〔十〕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五年俄文版第十五卷第一一八頁至第一一九頁。——（正文第二二五頁）。

〔十一〕『北方土地報』是布爾什維克公開出版的日報，於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二二七頁）。

(二)『俄國報』是警察黑幫性質的日報，於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創刊，一九一四年四月停刊，是內政部的機關報。——(正文第二二七頁)。

(三)一九〇六年六、七月間，內政部大臣斯托雷平通令各地方當局對工農革命運動和革命組織採取殘酷的軍事懲治辦法。——(正文第二二八頁)。

(七) 特別坡夫是彼得堡總督，曾領導鎮壓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正文第二二八頁)。

(四) 斯大林的『目前形勢和工人黨統一代表大會』一文，於一九〇六年在梯弗里斯由『無產階級報社』用格魯吉亞文出版。這本小冊子裏附有布爾什維克提交第四次(統一)代表大會討論的三個決議草案：(一)『民主革命的目前形勢』(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卷第一三〇頁至第一三一頁)；(二)『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目前形勢中的階級任務』(見『聯共(布)』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四〇年第六版卷上第六十五頁)；(三)『武裝起義』(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卷第一三一頁至第一三三頁)；還有列寧代表布爾什維克在代表大會上提出的關於國家杜馬的決議草案(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卷第二六六頁至第二六七頁)。此外，這本小冊子裏還附有代表大會關於武裝起義的決議和孟什維克『關於目前革命形勢和無產階級任務』的決議草案。——(正文第二三一頁)。

(五)『民主改革黨』是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的政黨，成立於一九〇六年第一屆國家杜馬選舉時期。——(正文第二四〇頁)。

(六)十月黨人或十月十七日同盟是工商業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的反革命政黨，成立於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月黨人完全擁護斯托雷平制度，擁護沙皇政府的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正文第二四〇頁)。

(七)勞動團分子或『勞動團』是小資產階級民主分子集團，一九〇六年四月由參加第一屆國家杜馬的農民代表組成。勞動團分子曾提出下列各項要求：廢止一切等級限制和民族限制，使地方自治局和城市自治局民主化，實現國家杜馬普選制，以及首先解決土地問題。——(正文第二四二頁)。

(八)『我們的生活報』是自由資產階級的報紙，於一九〇四年十一月至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在彼得堡出版，時斷時續。——(正文第二四四頁)。

(九)『新時代報』是工會公開刊物，於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至一九〇七年一月八日每星期在梯弗里斯用格魯吉亞文

出版，由斯大林、齊哈卡雅、達維塔施維里三人主持，後被梯弗里斯總督下令封閉。——（正文第二六一頁）。

（△）參議員施德洛夫斯基主持的委員會，於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由沙皇下令設立，其目的彷彿是「爲要刻不容緩地闡明聖彼得堡及其近郊工人不滿的原因」，打算也吸收一些由工人選出的代表參加這個委員會。布爾什維克認爲沙皇政府的這種謀劃是企圖使工人脫離革命鬥爭，於是建議利用這個委員會的選舉向沙皇政府提出一些政治要求，在政府拒絕了工人的要求之後，獨選人就拒絕選舉工人代表參加這個委員會，並號召彼得堡工人舉行罷工。次日開始了羣衆性的政治罷工。一九〇五年二月二十日，沙皇政府迫不得已才解散了施德洛夫斯基委員會。——（正文第二六四頁）。

（△）財政部大臣柯柯甫采夫主持的委員會於一九〇五年二月設立。這個委員會也像施德洛夫斯基委員會一樣，是爲審理工人問題而設立的，但沒有工人參加。這個委員會只存在到一九〇五年夏季。——（正文第二六四頁）。

（△）一九〇六年三月四日頒佈的結社法，規定各種團體和會社必須先將它們的章程向政府登記始可享受合法存在的權利。雖然這個法令對於各種會社的活動有許多限制，而且違反法令者要受刑事處分，但工人還是廣泛地利用了該法令所給予的權利，建立無產階級的工會組織。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這一時期，俄國初次開始建立羣衆性的工會，這些工會在革命的社會民主黨領導之下進行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正文第二六四頁）。

（△）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沙皇宣言公佈以後，內閣首相維特和內政部大臣杜爾諾沃在發給各省市長官的許多通令和電報中，不顧官方正式宣佈的「自由」，要求用武力驅散各種羣衆集會，封閉報館，對各種會社採取斷然措施，按行政手續把一切有革命活動嫌疑的分子發配到流放地去等等。——（正文第二六四頁）。

（△）一九〇五年末和一九〇六年初，在格魯吉亞一帶，由克魯泡特金思想的崇拜者、有名的無政府主義者車爾凱茲施維里及其信徒米哈柯·策烈鐵里（巴頓）、沙爾瓦·哥格利亞（沙·哥·）等人所領導的無政府主義者集團，展開了猛烈攻擊社會民主黨人的運動。這個集團在梯弗里斯出版了「號召報」、「工人報」等等。無政府主義者在無產階級中間沒有得到任何支持，但他們在游民無產者和小資產階級分子中間獲得了某些成就。斯大林發表了總標題爲「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幾篇論文來反對無政府主義者。前四篇論文是於一九〇六年六、七兩月在「新生活報」上發表的。以後幾篇論文，因該報被當局封閉，沒有登出來。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和一九〇七年一月一日，曾刊載於「新生活報」的論文又轉載在「新時代報」上，不過略有修改。該報編輯部對這些論文加了以下的按語：「不久前職員工會寫信給我們，要我們登一些關於無政府主義」

社會主義及諸如此類問題的文章（見「新時代報」第三期）。另一些同志也表示了這種願望，我們很願意滿足這種願望，就登了這樣的文章。至於這些文章的本身，我們認為必須指出其中有一部分從前已在格魯吉亞報刊上發表過（由於和作者無關的原因，這些文章沒有登完）。雖然如此，但我們認為必須把這些文章完全登出來，並請作者把文章修改得通俗一些，作者已經樂意地這樣做了。」這樣，「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這部著作的前四部分就有了兩種原稿。這部著作的續文是在一九〇七年二月「我們的生活報」和一九〇七年四月「時報」上發表的。在「新生活報」上發表過的「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第一種原稿，作為附錄收入本卷。

「我們的生活報」是布爾什維克的格魯吉亞文日報，自一九〇七年二月十八日起在梯弗里斯公開出版，由斯大林主持。共出十三期。該報於一九〇七年三月六日「因持極端主張」被封閉。

「時報」是布爾什維克的格魯吉亞文日報，「我們的生活報」被封閉後，於一九〇七年三月十一日至四月十五日在梯弗里斯出版。由斯大林主持。參加該報編輯部的還有齊哈卡雅和達維塔施維里。共出三十一期。——（正文第二七一頁）。

〔五〕「號召報」是格魯吉亞無政府主義者的周刊，於一九〇六年用格魯吉亞文在梯弗里斯出版。——（正文第二七八頁）。

〔六〕見「馬克思選集」兩卷本一九四一年俄文版卷上第三八七頁。——（正文第二八〇頁）。

〔七〕見「馬克思選集」兩卷本一九四一年俄文版卷上第三二七頁至第三二八頁。——（正文第二八四頁）。

〔八〕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聖的家族」中「對法國唯物主義進行的批評」一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〇年俄文版第三卷第一六〇頁）。——（正文第二九四頁）。

〔九〕見馬克思「哲學的貧困」一九四一年俄文版第一四八頁。——（正文第三〇六頁）。

〔十〕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七年俄文版第十六卷上册第一四九頁。——（正文第三〇七頁）。

〔十一〕見「馬克思選集」兩卷本一九四一年俄文版卷下第四五三頁。——（正文第三〇八頁）。

〔十二〕見恩格斯「反杜林論」一九三八年俄文版第二二八、二二九頁。——（正文第三一一頁）。

〔十三〕「工人報」是格魯吉亞無政府主義者的日報，於一九〇六年用格魯吉亞文在梯弗里斯出版。——（正文第三一九頁）。

〔十四〕「呼聲報」是格魯吉亞無政府主義者的日報，於一九〇六年用格魯吉亞文在梯弗里斯出版。——（正文第三一九頁）。

〔十五〕見馬克思「科倫共產主義者審判案真相記」一九〇六年聖彼得堡「鐵錘」出版社版第一一三頁（第九節「附錄」）。

八五〇年三月「中央委員會告同胞書」。（見『馬克思選集』兩卷本一九四一年俄文版卷下第一三三、一三四頁）。——（正文第三二九頁）。

〔六〕 見『馬克思選集』兩卷本一九四一年俄文版卷下第四二七頁。——（正文第三三〇頁）。

〔九〕 引自馬克思『法蘭西內戰』，該書附有恩格斯的「序言」。一九〇五年版，從德文譯出的俄文本經列寧校審過（見『馬克思選集』兩卷本一九四一年俄文版卷下第三六八頁）。——（正文第三三三頁）。

① 科爾希德是格魯吉亞西部利昂河一帶低地的古稱。斯大林同志的故鄉哥里城即在該地。——譯者註。

年 表

(一八七九年至一九〇六年)

一八七九年

十二月九日 (二十一日)

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朱加施維里(斯大林)誕生於哥里城(格魯吉亞)。

一八八八年

九月

斯大林進哥里四級制正教小學讀書。

一八九四年

六月

斯大林以優等成績畢業於哥里小學。

九月二日

斯大林進梯弗里斯正教中學一年級讀書。

一八九五年

斯大林和當時被沙皇政府流放到南高加索一帶的俄羅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秘密小組建立聯系。

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八年

斯大林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學領導學生的馬克思主義小組，研究『資本論』、『共產黨宣言』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閱讀列寧的早期作品。

一八九八年

一月

斯大林開始領導梯弗里斯總鐵路工廠的工人馬克思主義小組。

八月

斯大林加入格魯吉亞社會民主主義組織『麥撒墨達西社』。斯大林、克澤霍越里、楚魯啓則三人組成『麥撒墨達西社』中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少數的核心。

斯大林編寫工人馬克思主義小組學習大綱。

斯大林、克澤霍越里、楚魯啓則三人提出必須創辦秘密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刊物的問題，因此『麥撒墨達西社』內部革命的少數和機會主義的多數之間開始發生尖銳的意見分歧。

一八九九年

五月二十九日

斯大林因宣傳馬克思主義被梯弗里斯正教中學開除學籍。

十二月二十八日

斯大林到梯弗里斯觀象台工作。

一九〇〇年

四月二十三日

夏季

斯大林在梯弗里斯城郊鹽湖一帶工人紀念五一的集會上發表演說。

斯大林和當時來到梯弗里斯進行黨工作的一位著名的列寧「火星報」的擁護者庫爾納托夫斯
基建立聯系。

八月

斯大林領導梯弗里斯總鐵路工廠的羣衆性的罷工。

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〇年

在斯大林、克澤霍越里、楚魯啓則三人領導下逐漸形成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梯弗里斯社會民主
黨組織的中心領導集團。這個領導集團進行由小組宣傳過渡到羣衆政治鼓動的工作，設法印
刷傳單並在工人中間散發，建立秘密的社會民主黨小組，領導梯弗里斯無產階級的罷工和政
治鬥爭。

一九〇一年

三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在梯弗里斯觀象台的住所被搜查。

三月二十八日

斯大林辭去觀象台的工作，轉入秘密狀態。

四月二十二日

斯大林領導在梯弗里斯城中心區士兵市場舉行的五一工人遊行示威。

九月

由斯大林發起的秘密刊物——格魯吉亞馬克思主義者革命派的機關報「鬥爭報」創刊號在巴

庫出版，上面載有斯大林寫的一篇綱領性論文『編輯部的話』。

十一月十一日

斯大林當選爲俄國社會民主黨列寧火星派梯弗里斯第一屆委員會委員。

十一月底

梯弗里斯委員會派斯大林去巴土姆建立社會民主黨組織。

十二月

『鬥爭報』第二、三兩期合刊出版，上面載有斯大林的論文『俄國社會民主黨及其當前任務』。

斯大林和巴土姆先進工人建立聯系，並在路特希爾德、曼塔舍夫、西傑利吉斯及其他工廠中

組織社會民主黨小組。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斯大林以迎接新年的名義召開社會民主黨小組秘密代表會議。代表會議選出以斯大林爲首的領導集團。這個領導集團實際上起了俄國社會民主黨列寧火星派巴土姆委員會的作用。

一九〇二年

一月

斯大林在巴土姆設立秘密印刷所，起草傳單，並佈置印發傳單的工作。

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十七日

斯大林組織曼塔舍夫工廠工人的罷工，結果工人獲得勝利。

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初

斯大林領導路特希爾德工廠罷工委員會的工作。

三月八日

斯大林領導罷工工人的遊行，工人們要求釋放因參加罷工而被捕的三十二個同志。

三月九日

斯大林組織並領導巴土姆各企業工人的巨大政治遊行示威，參加者六千餘人，要求釋放三月八日被警察逮捕的三百個參加遊行的工友。在拘禁被捕工人的遞解站近旁，示威羣衆遭到軍隊開槍掃射，結果十五個工人被打死，五十四個工人受傷，約五百名示威者被捕。當夜，斯大

林起草抗議槍殺示威羣衆的傳單。

三月十二日

斯大林領導他所組織的爲安葬三月九日死難同志的工人遊行示威。

四月五日

斯大林在巴土姆黨的領導集團會議上被捕。

四月六日

斯大林被囚禁於巴土姆監獄。

一九〇二年四月至
一九〇三年四月
十九日

斯大林雖被囚禁於巴土姆監獄，但仍設法建立並經常保持和巴土姆社會民主黨組織的聯系，指導其工作，起草傳單，在囚人中間進行政治工作。

一九〇三年

三月

在高加索社會民主黨工人組織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成立了俄國社會民主黨高加索聯盟。當時斯大林被囚禁於巴土姆監獄，但他缺席當選爲這次代表大會所成立的高加索聯盟委員會委員。

四月十九日

斯大林從巴土姆監獄被解到庫泰依斯監獄。他在這裏和政治犯建立聯系，在他們中間宣傳列寧火星派的思想。

秋季

斯大林被解回巴土姆監獄，隨後又從那裏被遞次解往西伯利亞東部流放地。

十一月二十七日

斯大林到達伊爾庫茨克省巴拉干縣新烏達村流放地。

十二月

斯大林在西伯利亞收到列寧寄去的一封信。

一九〇四年

一月五日

斯大林從流放地逃走。

二月

斯大林到達梯弗里斯並領導俄國社會民主黨高加索聯盟委員會的工作。

斯大林起草論述黨內意見分歧和黨的組織任務的綱領性文件「信條」。

六月

斯大林到巴庫，他受高加索聯盟委員會的委託解散孟什維克的委員會，成立布爾什維克的新委員會。

夏季

斯大林巡視南高加索各主要地區，在各大辯論會上發言反對孟什維克、聯邦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等等。

斯大林在庫泰依斯建立布爾什維克的依麥列梯亞—明格列里亞委員會。

九月一日

「無產階級鬥爭報」第七期發表斯大林的論文「社會民主黨怎樣理解民族問題？」。

九月至十月

由於黨內發生意見分歧，斯大林在庫泰依斯時寫信給僑居外國的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信中發揮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結合的思想。

十一月

斯大林到巴庫，領導為召開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而進行的鬥爭。

十二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

斯大林領導巴庫工人總罷工。

一九〇五年

一月一日

「無產階級鬥爭報」第八期發表斯大林的論文「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政黨」。

一月八日

斯大林就沙皇政府在遠東遭受失敗事而寫的宣言「高加索的工人們：是復仇的時候了！」出版。

二月初

高加索聯盟委員會根據斯大林的倡議，解散了當時宣佈退出俄國社會民主黨高加索聯盟的

孟什維克梯弗里斯委員會，並建立了新的布爾什維克梯弗里斯委員會。

由於警察在巴庫挑起了韃靼人和阿爾明尼亞人間的互相殘殺，斯大林寫了『各民族友愛萬歲！』的傳單。

由於在梯弗里斯勝利地舉行了數千人的遊行示威，抗議警察想在梯弗里斯也挑起民族互相殘殺的企圖，斯大林寫了『告公民書。紅旗萬歲！』的傳單。

四月 斯大林在巴士姆的大辯論會上發言，反對孟什維克的領袖拉米施維里、阿爾謝尼則等人。

五月 斯大林的『略論黨內意見分歧』一書出版。

六月十二日 斯大林在安葬楚魯啓則時發表演說，闡述工農羣衆反對專制制度的鬥爭的綱領，並對孟什維克的策略給以毀滅性的批評。

七月十五日 『無產階級鬥爭報』第十期發表斯大林的論文『武裝起義和我們的策略』。

七月十八日 克魯普斯卡婭寫信給高加索聯盟委員會，要求把斯大林的『略論黨內意見分歧』一書寄去，並經常寄去『無產階級鬥爭報』。

七月 斯大林在齊阿土雷兩千人的辯論會上發言，反對無政府主義者、聯邦主義者和社會革命黨人。

八月十五日 『無產階級鬥爭報』第十一期發表斯大林的兩篇論文：『臨時革命政府和社會民主黨』和『答

『社會民主黨人報』』。

十月十五日 『無產階級鬥爭報』第十二期發表斯大林的兩篇論文：『反動加緊起來了』和『資產階級在佈置圈套』。

十月十八日

斯大林在納札拉德維（梯弗里斯的一個區）工人羣衆大會上，就沙皇十月十七日宣言發表演說。

十月

針對着十月發生的全俄政治罷工，斯大林寫了兩個傳單：『公民們！』和『告全體工人書』。

十一月二十日

『高加索工人小報』創刊號出版，上面載有斯大林所寫的社論：『梯弗里斯，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十一月底

斯大林領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高加索聯盟第四次代表會議的工作。

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七日

斯大林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高加索聯盟代表的資格出席了塔墨爾福斯全俄布爾什維克第一次代表會議。在這次代表會議上，斯大林和列寧第一次會面。

一九〇六年

一月初

斯大林的小冊子『兩次搏鬥』出版。

三月八日

斯大林的論文『國家杜馬和社會民主黨的策略』在『黎明報』第三期上發表。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九日

『閃電報』第五、第九、第十、第十四各期登載了斯大林的兩篇論文：『土地問題』和『論土地問題』。

三月底

斯大林當選爲梯弗里斯組織出席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統一』）代表大會的代表。

四月十日至二十五日

斯大林出席了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統一』）代表大會，他在發言反對孟什維克時，論證並捍衛了布爾什維克在革命中的策略。

六月二十日

斯大林領導的『新生活報』創刊號出版。

六月二十一日至七月九日

布爾什維克的『新生活報』第二、第四、第七和第十六各期刊載了斯大林的題爲『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幾篇論文。

六月至十一月

斯大林領導組織梯弗里斯的第一批工會（印刷工人工會、店員工會和其他工會）的工作。

七月十三日

『新生活報』第十九期發表斯大林的論文『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起義』。

七月十四日

『新生活報』第二十期發表斯大林的論文『國際反革命』。

七月至八月

斯大林的『目前形勢和工人黨統一代表大會』一書出版。

九月

斯大林出席了俄國社會民主黨高加索組織全區代表大會。

十一月十四日

斯大林領導的『新時代報』創刊號出版，上面載有斯大林的論文『階級鬥爭』。

十二月四日

『新時代報』第四期發表斯大林的論文『工廠立法』和『無產階級鬥爭』。

十二月十一日

『新時代報』第五期開始重新刊載斯大林的題爲『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幾篇論文。

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一九〇七年四月十日

『新時代報』、『我們的生活報』、『時報』等布爾什維克報紙繼續刊載斯大林的題爲『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幾篇論文。